

W

都市文化研究译丛

William Julius Wilson

当工作消失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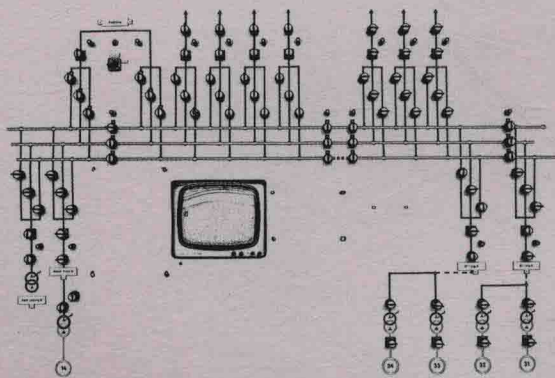
城市新穷人的世界

[美] 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 著

成伯清 王佳鹏 译

When Work Disappears

The World of the New Urban Poor



当工作消失时

城市新穷人的世界

[美] 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 著

成伯清 王佳鹏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工作消失时:城市新穷人的世界/(美)威廉·
朱利叶斯·威尔逊著;成伯清,王佳鹏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都市文化研究译丛)
书名原文:When Work Disappears: The World of
the New Urban Poor
ISBN 978-7-208-14062-2

I. ①当… II. ①威… ②成… ③王… III. ①城市-
社会问题-研究-美国 IV. ①D771.2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3172号

责任编辑 吴书勇
封面装帧 胡枫

当工作消失时

——城市新穷人的世界

[美]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 著

成伯清 王佳鹏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1.25 插页 4 字数 284,000

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4062-2/C·523

定价 52.00元

都 市 文 化 研 究 译 丛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规划丛书

都市文化研究译丛编委会

主编

孙逊

编委

薛毅（执行）刘北成

成伯清 陈恒 林鹤

胡大平 倪伟 詹丹

出版说明

都市文化研究是一门新兴的前沿学科，主要研究现代都市文化的缘起、变化和发展的规律。它与文化研究、都市研究、社会学、地理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紧密相关。都市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也与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我们期待着这门学科在中国生根、发展，能以中国经验为基础，放眼世界，取得新的突破，并积极参与到中国的都市文化建设中去。为达到此目的，大规模地译介国外的都市文化研究成果，不仅是必需的，而且也是很紧迫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科的自主和创新，必定要建立在全面了解已有成果的基础之上。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研究院自 2002 年成立后，策划了大型的“都市文化研究译丛”，译丛不仅包括一批都市文化研究、文化理论的经典著作，也包括显示出最新发展动向的近作，我们注重在理论方法上有重要启示意义的名家名著，也注重对某种现象作实证性研究的学术专著，同时计划译介一些概论性的著作。总之，只要是对中国的都市文化研究有参考价值作品，都在我们译介的范围内。我们吁请海内外的学者、专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吁请更多的翻译家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研究院

2007 年 3 月

献给贝弗莉^①

① 指作者的妻子贝弗莉·安·休伯纳(Beverly Ann Huebner)。——译者注

致 谢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许多个人和机构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我要特别感谢詹尼弗·霍克希尔德(Jennifer Hochschild)、爱丽丝·奥康纳(Alice O'Connor)、谢尔登·丹齐格(Sheldon Danziger)、特蕾西·米尔斯(Tracey Meares)、詹姆斯·昆恩(James Quane)和罗伯特·桑普森(Robert Sampson)，他们阅读了本书的全部初稿，并提供了详细的评注，包括诸多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它们促使我对本书的不少部分进行重大修改。布伦达·史密斯(Brenda Smith)仔细地阅读了第四章，也提供了有益的评注。我要感谢克诺夫(Knopf)公司的责任编辑维多利亚·威尔逊(Victoria Wilson)，她第一个使我意识到，在有些政策建议上，我必须另辟蹊径；她还帮助我提高了初稿的连贯性。苏珊·艾伦(Susan Allen)以她高超的编辑技巧，极大地帮助我提高了书稿对于一般读者的可读性。最后，我要感谢我在城市不平等研究中心的秘书杰基·哈里斯(Jackie Harris)，他非常细心地校对了全部初稿；感谢艾伦·希考克-沃尔(Ellen J.Hickok-Wall)在定稿的修改和重新编排上所提供的有益的编辑建议。

跟我一道为分析而建立了复杂数据集的研究助理们，尤为值得认可。我先要特别提到以下几位：负责处理源自城市贫困与家庭生活研究(UPFLS)的民族志数据和开放式访谈的索菲娅·派德(Sophia Pedder)、负责同样资料外加UPFLS雇主调查的罗威娜·亚伯拉罕(Rowena Abrahams)，以及负责雇主调查的桑德拉·史密斯(Sandra

Smith)。他们三位在分析、组织和解释复杂的数据集上，展示出丰富的想象力和巨大的奉献精神。我也要感谢卢瓦克·华康德(Loïc J.D. Waquant)在 UPFLS 调查分析中所提供的帮助；感谢阿米特·赛瓦克(Amit Sevak)、琴·特文格(Jean Twenge)和西蒙·韦费尔(Simon Weffer)在 UPFLS 的民族志资料、开放式访谈和雇主调查方面的工作；感谢庄凯莉(Kelly Chong)在参考文献编排上的协助工作；感谢杰弗瑞·莫雷诺夫(Jeffrey Morebnoff)在绘制芝加哥社区区域地图上的工作。本书也受益于布鲁斯·兰金(Bruce Rankin)所提供的帮助，他是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城市不平等研究中心的合作研究者。兰金跟我一起分析了我所主持的三项研究的全部数据，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这三项研究：城市贫困与家庭生活研究、伍德朗(Woodlawn)和奥克兰(Oakland)两个居民点研究，以及有关高风险居民点对青少年社会发展的影响的研究。

芝加哥大学的许多教师和学生为这三项研究的资料收集付出了努力。城市贫困和家庭生活研究包括了一支庞大的研究团队。这个项目由罗伯特·阿庞特(Robert Aponte)管理执行。芝加哥大学的两位教师雷蒙·史密斯(Raymond Smith)和理查德·陶布(Richard Taub)负责指导民族志小组的研究工作，这个小组的成员包括南·阿斯顿(Nan Astone)、丹尼尔·布雷斯劳(Daniel Breslau)、梅泽·科尔曼(Major Coleman)、卡伦·弗雷尔(Karen Freel)、安东尼娅·古铁雷斯-马奎斯(Antonia Gutierrez-Marquez)、莎伦·希特斯-巴特莱特(Sharon Hicks-Bartlett)、玛丽莲·柯劳格(Marilyn Krogh)、罗伯特·莱斯特(Robert Laseter)、瓜达罗佩·罗德里格斯-戈麦斯(Guadalupe Rodriguez-Gomez)、玛莎·范·赫茨玛(Martha Van Haitsma)和丹尼尔·沃尔克(Daniel Wolk)。雷蒙·史密斯还负责指导从事内城区居民开放式调查的一组研究助理的工作，这个群体包括梅泽·科尔曼、金铭(Ming Chin)、乔琳·基尔申曼(Joleen Kirschenman)、马修·劳森(Matthew Lawson)、帕特里夏·波特(Patricia Porter)、迈克尔·雷诺兹(Michael Reynolds)、玛莎·范·赫茨玛和卢瓦克·华康德。马克·泰斯塔

(Mark Testa)和玛尔塔·廷达(Marta Tienda)二位芝加哥大学教师,负责指导 UPFLS 的大型封闭式调查的数据收集。其他参与这一调查的教师有唐娜·富兰克林(Donna Franklin)、德洛莉丝·诺顿(Delores Norton)和迈克尔·索欣(Michael Sosin)。我也非常感谢参与这一大型调查的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NORC)的员工,他们是萨米尔·亚伯拉罕(Sameer Abraham)、维吉尼亚·巴洛特(Virginia Barrot)、芭芭拉·坎贝尔(Barbara Campbell)、马丁·弗兰克尔(Martin Frankel)、玛丽·奥布莱恩(Mary O'Brien)和戴维·佩珀(David Pepper)。全国民意研究中心使用封闭式问卷进行了面对面的访谈。

城市贫困与家庭生活研究中的雇主调查,受益于乔琳·基尔申曼和凯瑟琳·内克曼(Kathryn Neckerman)的领导才干,他们同我、华康德、丹尼尔·布雷斯劳和罗莉·斯帕罗(Lori Sparzo)一道完成了问卷的设计,他们还同布雷斯劳、华康德、斯帕罗和朱迪·明茨(Judy Mintz)一起进行了实际的访谈。

伍德朗和奥克兰两个居民点的研究,由戴维·坎贝尔·莉娜(David Campbell Lena)和伦德格伦-加瓦拉斯(Lundgren-Gaveras)负责指导。这项研究也受益于詹姆斯·昆恩和布鲁斯·兰金的工作以及研究助理米妮安·摩尔(Mignon Moore)不懈的努力。艾丽西亚·巴苏克(Alicia Bassuk)和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也在这个项目中担任了研究助理。罗伯特·莱斯特巧妙地组织了伍德朗和奥克兰两个居民点的焦点小组讨论;这两个居民点的调查数据,则由芝加哥市信息中心收集,这是一家私营的非营利研究机构,由加斯·泰勒(Garth Taylor)领导。

有关高风险地区居民点对青少年社会发展的影响的研究,包含了芝加哥大学两位教师迈克尔·索欣和罗伯特·桑普森以及这一研究的项目合作者乔琳·基尔申曼的工作和指导。玛丽莲·柯劳格和布鲁斯·兰金担任了这个项目的数据分析员,素德·文卡特斯(Sudhir Venketesh)和戴维·莱因戈尔德(David Reingold)作为研究助理参与了这一项目。威廉·麦克里迪(William McCready)及其来自北伊利诺伊大学调查研究

中心的同事，完成了这项研究中的面对面访谈工作。

下述机构为这三项研究提供了资金支持。城市贫困与家庭生活研究得到了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耐基公司、乔伊斯基金会、斯宾塞基金会、威廉·T·格兰特基金会、劳埃德·A·弗赖伊基金会、伍兹慈善基金会、芝加哥社区信托基金会、贫困研究所及卫生和福利部的支持。伍德朗和奥克兰两个居民点研究之成为可能，端赖于约翰·D和凯瑟琳·T·麦克阿瑟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家庭国际组织对城市不平等研究中心的慷慨资助。所有这些基金会，外加一笔来自高风险地区成功青少年麦克阿瑟研究项目的资助，支持了有关高风险地区居民点对青少年社会发展的影响的研究。

我还要感谢法美基金会(the French-American Foundation)，其所提供的研究基金，使我得以在法国巴黎的社会科学高等实践研究院度过1989—1990学术年度。在这一年里，我访问了多个欧洲国家，并观察和研究了它们的种族、贫困和失业问题。由此获得的认识，都体现在第六和第八章，在那里我对欧洲和美国进行了比较。

最后，谨将本书献给我的妻子。

W.J.W.

目录

致谢/1

导言/1

第一部分 城市新贫困

第一章 从制度聚居区到失业聚居区/15

第二章 社会变迁与脆弱的聚居区/41

第三章 聚居区行为模式与机会结构/68

第四章 内城区家庭的衰落/105

第五章 种族的意义和重要性：雇主与内城区雇员/129

第二部分 对社会政策的挑战

第六章 美国有关贫困与福利的信念体系/171

第七章 种族对立和基于种族的社会政策/208

第八章 更广阔的视野：跨民族视角下的社会政策选择/233

附录 A 有关贫困集中化的观点/267

附录 B 城市不平等研究中心的方法论说明/271

附录 C 有关城市贫困与家庭生活研究的数据/278

参考文献/281

索引/306

译者说明/323

导 言

在 20 世纪，许多市中心聚居区首次出现了绝大多数成年人无所事事的状况。工作的消失，不仅对个人、家庭和居民点产生负面影响，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恶化了城市的社会生活。内城区的失业虽然问题严重，但当我们把注意力主要放在贫困及其后果上时，这个问题又经常遭到忽视或者遮蔽。尽管自 1970 年以来贫困的集中程度不断增强，内城区总是以高贫困率而著称，但在有些居民点，目前的失业水平实属前所未有的。

居民点高失业率所带来的后果，远比居民点高贫困率带来的后果，更具破坏性。一个虽然贫穷但都有工作的居民点，截然不同于一个既贫穷又没有工作的居民点。根本而言，如今市中心聚居区的诸多问题——犯罪、家庭破裂、福利、社会组织水平低下等等——都是工作消失的一种后果。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工作的消失？围绕着这个问题所展开的公共争论，并不是特别地富有成效，因为这种争论总在寻求谴责的对象，而不是去认识和应对使许多美国人陷入经济困境的复杂多变的现实。而且，针对这类问题的解释和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也经常是受到意识形态的驱动。

这样一来，那些赞成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人，往往强调包括种族在内的社会结构因素。所谓社会结构，我是指社会位置(或者地位)的定序和社会关系的网络，它们都基于社会中相互依存的制度(经济、政

治、家庭，教育)安排。种族，既反映了个体的社会位置(在根据肤色界定的社会地位的意义上)又反映了社会关系网络，所以是一个社会结构变量。许多有关社会不平等的自由主义解释，只提到种族，排除掉其他的结构变量。

那些赞成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人，在解释群体的不同体验、行为和结果的时候，往往强调价值观念、态度、习惯和风格的重要性。根据这种观点，群体差异都反映在文化之中。按照一个人所属的文化来行动，就是遵循一个人的性情倾向来行动，这种性情倾向是一个人在自己所属的或者认同的共同体中向其他成员学习或者受其影响而形成的。

本书就是试图证明，在理解内城区穷人的失业和其他经历时，社会结构因素是重要的，但也有很多此类因素并不能解释所发生的一切。尽管种族在内城区黑人的社会状况中显然属于一个重要变量，但对于种族的含义和重要性，在某些情况下是非常含糊不清的。文化因素确实起到作用，但对于内城区失业和贫困的任何充分的解释，都应当考虑到其他的变量。社会心理的因素——在目前的争论中，这类因素一般都无人提及——必须与社会结构变量和文化变量整合起来。我们需要一种包含了所有主要变量的广阔视野，而且尤为关键的是，我们必须揭示出它们在决定内城区居民的经历和生活机会上的相对重要性和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正是这种视野，指导着我在以下各章的解释和对相关研究的整合。

为了让公众和社会政策争论了解到更多事实，我将注意力集中在相关的问题上。作为社会科学家所呼吁的，大多与我们研究的终极面目密切相关。欲图阐明事实以影响公共政策的社会研究者，往往将焦点聚集在一个共同体的问题而不是优点之上。他们的目的就是激发思考，这样，决策者、相关市民、新闻记者和其他人就能有一个基础来理解此类问题和体会到解决它们的必要性。考虑到有关遗传天赋的重要性的讨论一再出现，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就必须站出来，为了公共政策的目

的，强调社会环境在塑造内城聚居区居民的生活经历上的强大而复杂的作用。

自《钟型曲线》(*The Bell Curve*)在1994年末出版以来，一种遗传学的观点一再出现在有关内城区居民的苦难的公共讨论之中。由理查德·赫恩斯坦(Richard Herrnstein)和查尔斯·穆雷(Charles Murray)所著的这本受到争议的书，认为无论社会、经济或族群背景如何，低智商是我们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本源由。赫恩斯坦和穆雷试图证明，可以根据智力测验来测量的“认知能力”，不仅能够有力地预测收入，而且还能预测大量的其他结果，从为人父母的能力一直到犯罪行为。《钟型曲线》质疑环境对于群体的社会发展的影响程度，也怀疑干预计划能否补偿遗传天赋的缺陷。

譬如，赫恩斯坦和穆雷认为，对于“底层阶级”儿童的早期干预计划希望不大。何以如此呢？因为在学前计划中所得到的标准测试分数上的明显提高，在儿童离开这个计划以后就迅速减退。他们指出，在若干年内，参加过“领先计划”(Head Start program)的儿童的测试分数，与没有参加过的儿童的分数相比，并无显著差异。“在学校一年级经常可以获得的认知增益，到三年级往往就已减退，”他们写道，“到六年级，在总体统计上就已消失殆尽。”这就是所谓的“渐趋衰退”(fade-out)：“参加计划的儿童与可以比较的没有参加的儿童在测试分数上的渐趋一致。”^[1]两位作者由此得出结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诸如“领先计划”之类的外在干预计划不会产生任何效果，因为它们并未解决认知能力低下所带来的问题。

任何熟悉内城聚居区严酷环境的人，不对有关“领先计划”的效果渐趋衰退的研究结论感到吃惊。倘若从“领先计划”中所获得的进步在这种环境中还能得到保持，那才令人奇怪呢。内城聚居区的儿童必须与条件恶劣的公立学校斗争，这类学校课程乏味，教室拥挤，设施不足，只有极少数教师对他们的学生怀有信心，期望他们能够学点东西。^[2]内城聚居区的儿童所由成长的居民点，情况同样恶劣，失业率

达到了灾难性的程度，而这又引发了一系列其他问题，它们都不利于健康的儿童发展或智力开发。除此之外，还有破裂的家庭，反社会的行为，局限于聚居区环境之内的社会网络，对于居民点中儿童和成人的行为和活动的非正式社会控制的缺乏。

如果像“领先计划”之类的丰富和强化项目，能够延展和贯穿到小学、初中乃至高中，那么最初的进步很有可能得到保持。而在没有这种计划的情况下，把这些儿童的学业失败或他们毕业以后就业上的不成功归结于他们的“认知能力”，就缺乏根据，在理论上也是不负责任。此外，绝大多数遗传学家都同意，就目前而言，在遗传影响和环境影响之间并无明确的分界线。

事实上，赫恩斯坦和穆雷作为先天认知能力的一个指标而使用的测验，即武装部队资格测验(Armed Forces Qualifications Test, AFQT)，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成就测验，而非遗传天赋的测验。其中反映了贫困和种族经历的累积性影响。^[3]近期的研究表明，学校教育和工作经历的额外年数，导致了AFQT分数的显著改变。^[4]赫恩斯坦和穆雷声称，他们使用家庭背景指标(双亲的教育程度、职业地位、家庭收入)——这个指标在青年参加AFQT测验时(在15到23岁)加以测量——控制了环境经历的影响。然而，正如经济学家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指出的，这种测量并未捕捉到15到23年的累积性环境影响，包括生活在特定居民点的长期效应、文化背景、学校教育的质量、父母的抚育、他们能够花费在或者传递给他们孩子的资源等等。^[5]

如果说聚居区环境的重要性在诸如《钟型曲线》之类的研究中被低估了，那么，那些自称在“捍卫”内城区居民，并力图校正对于他们行为和经历的歪曲性描述的学者，也对此轻描淡写。这种倾向的早期提倡者是一群美国黑人学者，他们在1970年代对《黑人家庭：国家行动的理由》(*The Negro Family: The Case for National Action*)一书中对聚居区黑人的坦率描绘感到怒不可遏，群起而攻之。该书是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在1965年撰写的关于黑

人家庭的富有争议的报告。^[6]

莫伊尼汉报告中对于聚居区居民点中存在的社会病态的强调，受到这群学者的猛烈批判，这不仅是因为这种描绘可能让人难堪，也是因为这种强调同他们的主张相冲突：在他们看来，黑人正在形成一种共同体权力基础，而这可能成为美国社会中一股主要力量。他们认为，这一权力基础反映了黑人共同体的力量和活力。这群美国黑人学者强调黑人体验中的积极方面。事实上，聚居区行为的某些方面，在1960年代晚期有关内城区研究中被描绘为是病态的，到了这种新解释中，就被视为是功能性的了，因为——根据他们的观点——内城区的黑人，尤其是黑人家庭，是富有活力的，能够在一种种族主义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甚至还走向繁荣。这种修正主义的观点，把关注的焦点从种族孤立和经济上的阶级屈从，转向了内城区黑人的成就。^[7]总之，就如在《钟型曲线》中一样，尽管是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内城区环境的毁灭性效应，就这样要么被忽视了，要么被轻描淡写了，要么就被否定了。

近期最为突出的“饱含同情心的”对于内城区居民的描绘——这种描绘也把焦点从聚居区环境上转移开来——是由社会学家米切尔·邓奈尔(Mitchell Duneier)呈现的。^[8]在一本名为《斯利姆的餐桌》(*Slim's Table*)的书中，邓奈尔报告了自己对一小群工人阶级男人的深度访谈，这些人来自芝加哥市南区一个内城区居民点，其中有一个男子名叫“斯利姆”。这些男人经常光顾邻近富裕的海德公园居民点的一家自助餐馆，访谈也是在这家餐馆进行的。邓奈尔认为，社会学家和新闻记者们忽略了像斯利姆这样的人，他们继续生活在聚居区。为反对我在《真正的穷人》中提出的观点，邓奈尔指出，即便是在最为混乱的居民点，依然可以发现勤奋工作和关心家庭的人，他们信奉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

《真正的穷人》中的观点与此并无矛盾。^[9]我只是指出，无论中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黑人——他们在历史上都曾强化过内城区的工作、家庭和教育的传统模式——都纷纷离开许多聚居区居民点，而且数量庞

xviii 大。我还认为，这种家庭的不足和稀缺，不仅是因为高收入家庭的外迁，也是由于就业机会的减少，而就业机会的减少又与目前经济影响到所有族群的美国人的经济重组密切相关。换言之，在许多内城区居民点，稳定和就业的家庭的数量已经急剧减少了，但并未完全消失。

本书将会讨论和记述内城聚居区环境的毁灭性影响。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居民自己已经平淡无奇地目睹了这一过程，他们中的许多人，要比正在研究这些居民点的社会科学家，以更为清晰和生动的方式谈论他们所面对的局势。

就像那位经常在海德自助餐馆吃饭、被邓奈尔视为聚居区黑人代表的年长男子一样，在他们的实际家庭和居民点接受我们的研究者访谈的人们，说起话来也是充满了尊严，在他们的谈论中也体现了工作、家庭和教育的价值观念。但他们也关注一些在《斯利姆的餐桌》善良仁慈的描绘中未曾强调的问题——种族隔离、阶级屈从和社会孤立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使他们的生存努力变得异常艰难，而且也摧毁了他们众多的亲属、朋友和邻居。

在强调环境在塑造内城区居民生活上的强大作用的同时，我们不应忽视或否认令人难堪的行为的存在，尽管这类行为的出现是由于发展机会遭到阻塞。事实上，正如本书第三章将要说明的，此类行为代表着对于外在强制和机会有限的文化反应，是长期演化的结果，但它们也经常阻碍内城区居民的社会流动。一些自由主义者否认内城区中这种文化上具有破坏作用的行为和态度的存在，这种倾向实际上再次贬低了环境在决定个体的发展和生活机会上的重要性。^[10]环境既体现了结构和文化上的限制，也体现了机会。为了充分理解和解释人类群体在社会发展上的不同，我们必须考虑所受到的不同文化影响。

xix 说明所受到的不同结构影响，也是必要的。比如，理解和传达许多聚居区居民仅仅为了跟上有关工作、家庭和法律的主流期望而必须克服的主要障碍，就很重要。在中产阶级社会中，这种期望是理所当然的。生活于富裕地区的美国人，拥有能够提额外福利的工作岗位，他

们习惯于覆盖了带薪病假和医疗费用的健康保险。他们不必生活于这种居民点，在那里，正常的抚养孩子的尝试，总是不断地受到干预健康儿童发展的社会力量的暗中破坏。而且，他们家庭的生存前景，也不必至少要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非正式的经济活动（也就是所得收入不申报从而不纳税的经济活动）。

就如把内城区居民视为能够克服种族主义压迫的超级英雄是站不住脚的一样，把他们视为无助的牺牲品也是站不住脚的。但我们应当充分感受和理解内城区居民所面临的选择范围，包括在特定文化影响下的选择，他们在生活中所遭遇的种种限制，是一般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所不经历的。

在我看来，工作的消失以及工作消失对于社会和文化生活所造成的后果，是内城聚居区的核心问题。认识到聚居区依然还有人在工作，以及几乎所有的聚居区居民，无论就业与否，都支持工作伦理规范（参见第六章），不应使我们忽视如下事实，即在许多内城区居民点，大多数成人在任何给定的时点都处于失业状态。

本书还强调，工作的消失和相关问题的剧增，已经激化了城市地区原本就非常紧张的种族处境。我们国家对于中心城市的种族冲突和城市与郊区之间日益扩大的种族分裂的反应，让人非常失望。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往往采用一种不是减缓而是增强都市种族紧张的修辞。自1992年洛杉矶骚乱以来，媒体着重关注的是分裂种族群体的因素，而非团结种族群体的因素。对于种族分裂的强调，在1995年随着辛普森(O.J.Simpson)谋杀案审判中陪审团的裁定，而达到顶峰。在裁定宣布之前的民意测验表明，压倒多数的白人认为辛普森先生有罪，而相当多数的黑人感到他是无辜的。显示公众对裁定的反应的媒体新闻报道，渲染夸张了种族分裂——黑人显得兴高采烈，欢呼雀跃，而白人则显得震惊，愤怒，郁闷沮丧。黑人相信辛普森陷入了一个种族主义警察的阴谋，而白人则坚信他犯有谋杀两人的罪行并且还逍遥法外。

如媒体所描绘的，种族分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这些事态的发展，对于种族关系的未来和被认为是使黑人受益的计划的影响，还需拭目以待。正如一位观察家在辛普森案裁定的当天晚上所说：“当O.J.逃脱惩罚，白人将会以我们白人的方式发动暴乱：离开城市，到爱达荷州去，到俄勒冈州去，或者到亚利桑那州去，投票给金里奇(Gingrich)……通过终止日托计划和削减他们的医疗补助来惩罚黑人。”^[11]

在这个国家，种族分裂的程度不容低估。对辛普森审判案及其裁定结果的不同反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黑人与白人迥然不同的种族经验：前者承受着种族不公，而后者基本上不会受到偏见和仇恨效应的侵扰。然而，对种族差异的强调，掩盖了一个事实：非裔美国人、白人及其他族群拥有共同的关怀，遭遇着许多共同的问题，也具有许多共同的价值、追求和希望。

如果说内城区黑人经受着失业的巨大痛苦，那不过是自1980年代以来影响了大多数美国人的经济边缘化的极端表现形式罢了。正如我在第七章和第八章将要讨论的那样，通过解决经济边缘化给这个国家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包括由于全球经济变迁所带来的问题，可以极大地推动内城区失业问题的解决，特别是如果在资源的使用上包含了对亟须帮助群体的适度倾斜。以共同的方案来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这种讨论在不同族群间可以提升一种一体感，尽管这些问题影响特定群体的严重程度各有不同。这种思想能使不同种族的人走到一起，而不是各自分开，而这在种族关系紧张的时期显得尤为重要。相比于渲染种族分裂的修辞，促进不同种族间统一的讯息则在媒体中鲜有提及，普遍遭到忽视。^[12]

关键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种族对抗或者种族紧张的外显，是经济、政治和社会局势的产物。在1992年《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我基于这种观点提出，在经济困难时期，政治领袖沿着建设性或是破坏性的方向来排遣一般市民的挫折何以至关紧要。^[13]在文章中，我讨论

了比尔·克林顿总统 1992 年的政治竞选运动，他不仅明确认识到美国社会中日益加剧的种族紧张以及政治领袖应当团结而不是分裂不同种族的必要性，而且他确实形成了一套反映这些问题的公共修辞。这套竞选修辞警示美国人不要陷入种族之间相互争斗的混乱，敦促公民把他们实际收入的下降、职业不稳定性增加和消极情绪的蔓延同这些问题复杂而又真正的根源联系起来。我指出，在一个种族紧张升级的时期运用这种积极的公共修辞，使克林顿在预选阶段能把充满敌意的种族群体凝聚成一个有效的政治联盟，即使是在路易斯安那也不例外，要知道那里的多数白人投票者在 1991 年州长选举中还支持前任州长、三 K 党徒戴维·杜克(David Duke)。而令人遗憾的是，媒体由于津津乐道于对克林顿私人生活的指控，而没能记录这一事件的重大意义。

由于聚居区的失业问题如此严重，也由于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使我们的许多中心城市日益失去其居住和工作的吸引力，一种种族统一的愿景——既认识到独特的种族问题，但又谋求以共同的方案解决共同的问题——才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显得重要。这一愿景应该得到这个国家所有领袖人物尤其是政治领袖的培育、分享和推进。

在我心中存有一个愿景，我们应当增强种族和群体之间和谐与统一的价值观念，而拒绝那种老生常谈，即种族分歧如此之大，以至于白人、黑人、拉丁美洲裔人和其他族群不可能为了共同的事业而一起奋斗。这种愿景承认如下事实，即如果一种政治讯息是针对白人听众的需要而发，则少数民族的听众就会避之惟恐不及，就像当一个政治讯息是针对少数民族听众的需要而发，白人将会避开一样。这一愿景的基础，是强调关系到所有族群背景的家庭的问题和难题，这样，族群中的个体就会逐步认识到他们的共同利益，并加入到一个多民族的联盟来推动美国迈向进步；这一愿景倡导如下观点：美国人具有共同的利益和困扰，它们超越了种族和阶级的界线——比如失业和工作安全、实际工资的下降、医疗和住房成本的上升、高效的儿童照管计划的稀缺、公立教育质量的急剧下降以及所有居民点由于犯罪和毒品贩卖而造成的损

xxii 害。这一愿景敦促美国人看到，用以解决这些问题的计划可以让所有人受益，而不仅仅是真正的弱势群体；让他们认识到郊区和中心城市之间的分裂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种族分裂，当务之急是强调城区—郊区的合作而不是分离；最后，敦促他们赞同这种观点，即所有群体，包括那些处于聚居区失业的痛苦之中的人们，应当能够成为社会中合格的一员，因为经济和社会边缘化问题根源于社会中的不公而非群体的缺陷。我相信，在一种倡导不同种族间团结和统一的公共修辞的支持下，这一愿景对于解决本书所讨论的问题至关重要。

本书的绝大部分章节，倚重于在芝加哥大学城市不平等研究中心进行的三项研究项目中所收集的数据。在附录 B 中将详细介绍这些研究，但在此我愿意指出，在这些研究中最重要的是城市贫困与家庭生活研究(UPFLS)。在这项进行于 1987 和 1988 年的研究，包括了一项对 2 500 名生活于芝加哥贫困内城区居民点中贫穷和相对富裕的非裔、拉丁美洲裔和白人居民的随机调查。所调查的这些居民点，贫困率至少在 20% 以上。作为这项庞大项目的一部分，城市贫困与家庭生活研究中包含了从“社会机会调查”(Social Opportunity Survey)中所获得的数据。社会机会调查是针对一个由 175 名城市贫困与家庭生活研究的参与者构成的子样本，以开放式的问题调查了他们对于机会结构和生活机遇的感知。这项计划还包括了 1988 年对 179 名雇主的调查。在这个调查中，绝大部分信息都来自所抽到的每个公司的最高管理层，而公司的抽选也反映了芝加哥都市区不同行业 and 不同规模的公司中的就业分布。另外，这项研究还包括了综合性的民族志研究，其中又分参与观察和生活史访谈，它们是由 10 名研究助理在 1986 至 1988 年间在具有代表性的内城区居民点进行的。

其余两个研究项目中的第一项，包括了 1993 年对一个由 500 名调查对象构成的代表性样本的调查，他们都来自芝加哥市南区的两个高失业率居民点；还包括 6 场焦点小组讨论，参与者都是这些居民点的居民

和前居民。第三项研究是1989—1990年对一个代表性样本的调查，样本由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居民点和高贫困率居民点中的黑人母亲及其不多于两个的青少年孩子(11到16岁)构成。来自高贫困率居民点家庭的调查对象包括383位母亲和614位青年。而来自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居民点家庭的则包括163位母亲和273位青年。我把来自这三项研究的数据，与普查类的信息和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发现，整合起来以更为清楚地说明问题。

注 释:

- [1] Herrnstein and Murray(1994), p.403.
- [2] 肯尼思·克拉克(Kenneth B.Clark)是最早关注这一问题的人之一，参见 Clark (1965)。
- [3] Heckman(1995) and Patterson(1995)。
- [4] Neal and Johnson(1995)。
- [5] Heckman(1995)。
- [6] 有关莫伊尼汉报告的全文及其所激起的批评性反应，参见 Rainwater and Yancey (1967)。
- [7] 比如 Ladner (1973), Hill (1972), Hare (1969), Alkalimat (1969), and Staples (1970 and 1971)。
- [8] Duncier(1992)。
- [9] Wilson(1987)。
- [10] 有关文化和社会结构对于特定行为都具有重要影响的讨论，参见 Patterson (1995)和 West(1993)。有些观点认为，社会结构影响较弱，因而更强调文化因素对于种族行为差异的影响，参见 Sowell(1994) and D'Souza(1995)。
- [11] Rich(1995)。
- [12] 最有名的例外便是，大众媒体对于全国城市联盟(the National Urban League)主席休·普锐斯(Hugh Price)就职演说的广泛报道。他的这次演讲通过强调各个种族群体都存在的共同问题和共同解决方案，而促进了种族团结。参见 Price(1994)。
- [13] Wilson(1992)。

第一部分
城市新贫困

第一章

从制度聚居区到失业聚居区

3

在芝加哥市南区一个内城区居民点生活了四十多年的一位老年妇女回忆道：

从1953年3月21日起，我就生活在这儿了。我刚搬进来的时候，这个居民点完好无损。那时我们这里什么都有，有住宅，漂亮的住宅，小型公寓大楼，有商店，自助洗衣房，有干洗店，中国人开的干洗店。我们有药店。我们有旅馆。我们还有医生，就住在不远的39号街。我们这个居民点有医生的诊所。我们这里有中产阶级和中上阶级。它从当年的富足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我希望看到它变回来，我们能够拥有我们过去拥有的一些东西。因为我年轻时就来了，我现在是一个老居民了，我希望有些东西能够变回来，这样我就能像当初刚来时那样享用它们了。

一位35岁的已婚工作妇女，也生活在南区的一个居民点，跟她具有类似的想法。

我认为……任何想要工作和希望得到一个工作岗位的人，应该能够走出去就得到它，而不是需要等上半年才行……我想，社会应该做出更大的努力，千方百计地照顾病人、老年人、倒霉的人和一无所有的人。另一件我最关心的事情，我想是……[语速变

慢，略显愤怒]这太……太糟糕了，你看，从南区到西区，你穿过城市，到处都是空旷的地段，到处都是废弃的建筑，人们生活在大街上。或者四五个人甚至十个人挤在本来只住一两个人的公寓里——你会发现八个或十个，因为他们没有地方可去，没有房子可住。整个城市，你都看到这些废弃的建筑，闲置的建筑，成片成片的空旷地段，在那儿，他们本来可以建设负担得起的、中等收入的住房。

一位年轻卡车司机，也表达了必须改善自己所住居民点的看法：“我非常希望每隔一段时间就有警察来这儿巡逻一下。为了孩子，我们需要角色榜样。”一位年长的打字员补充道：“这个地区需要资金来开展商业。一个大的食品杂货店可以带来不少工作岗位，也能让人放心地来买东西，不必心怀恐惧。”

一位91岁高龄的老妪也谈到了对安全的担忧：“不再安全了，因为街上不太平。所有的黑人商店一关门，经济也完蛋了。商店，买卖，还有表演，过去这里到处灯火通明，现在商店和买卖都消失了。”

消极的社会影响促使一位忧心忡忡的母亲作出了把儿子送到别处的决定：

我有一个13岁的儿子。在他9岁的时候，我就把他送到外面去了，因为这里周围全是帮派，简直让人无法脱身，而他不会加入——他喜欢打篮球，篮球是他最在意的事情。他们竟从他脚上扒去了球鞋，还抢走了衣服，让他从学校步行回家。每天都欺负他啊。在大冬天扒去他的外套。你知道，我们家离学校也就两个街区……一个男孩儿拿枪顶着他的脑袋，威胁说：“你如果不加入，下周就送你上西天。”我不得不把他送出城外。他爸爸住在城外。上周他来住了一个礼拜。他说：“妈妈，我太想回家了。”我说绝对不行！

在这些居民的证词中，聚居区居民点的社会恶化是个核心话题。正如来自媒体的一位代表所说，聚居区可谓是“已从糟糕到了更糟”。^[1]在1960年代后期，极少有观察家会预见到，从那时开始，社会制度的普遍崩溃和社会断裂的急剧增加会席卷所有聚居区，并扩展到原先稳定的居民点。例如，位于芝加哥市南区的伍德朗(Woodlawn)居民点，在1950年，共有超过800家的商业和工业机构。如今，据估计剩下的仅有一百来家，而且它们中大多数是“只有一两个雇员的小酒馆、理发店和廉价旧货店”。^[2]正如城市贫困与家庭生活研究小组的一位成员华康德(Loic Waquant)所说：

曾经生机勃勃的街道——居民们还记得，就在不久前，在高峰时间需要挤着穿过稠密的人群才能到车站——现在一片空寂，犹如遭到狂轰滥炸之后的战区。繁华的商业带变成了一长排乱七八糟的小店构成的地道，空旷的地面堆满了碎玻璃和垃圾，圯废失修的建筑在高架铁道的阴影下腐朽。在第63号大街和别墅路大街(Cottage Grove Avenue)的拐角，屈指可数的几家机构蜷缩在锻铁栅栏的后面苟延残喘……唯一显得兴旺的行业是出售酒类的小店和货币交易点，在这些“穷人银行”，可以把支票兑成现金、支付账单和通过汇票来支付一笔费用。^[3]

在孩提时代就离开了这个居民点的一位伍德朗居民，描述了她重返故地之后对所发生变化的感受：“我真的惊呆了！在我还小的时候，顺着第63号大街走下去，你想要的东西应有尽有。但现在，作为一个成年人带着自己的孩子重返故地，这些都不见了，完全不见了……还有……住房，每个人都迁走了，到处都是空旷一片。”另外一位在其他地方生活了数年的居民，在重返居民点之后也表达了类似的感受：“第63号大街过去上上下下全是各式各样的商店，你知道，这是一个很好玩的地

方。但当我1970年代再回来的时候，它就像……荒漠。跟我记忆中的完全不同了。”

6 在1950年，伍德朗几乎三分之二的人口是白人；到1960年，白人所占比例下降到只有一成。尽管白人在这一阶段突然外迁，但居民点的居民数量还是略有上升。不过，在1960年之后，相当规模的黑人居民开始外迁，包括大量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家庭。居民点的人口从1960年的80 000人下降到1970年的53 814人；在1980年进一步下滑到36 323人，最后到1990年仅剩24 473人。随着居民的减少，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资源大量流失，而这些资源可以让一个社区充满活力。为人口减少和社会经济恶化所困扰的贫困黑人居民点，在芝加哥比比皆是，而且日益增多，伍德朗不过是其中一例而已。

在我们城市贫困与家庭生活研究的大型调查中，当黑人调查对象被要求评价他们居住区的生活品质时，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他们的居住区是好的或非常好的地方，而在那些来自聚居区贫困人口普查区（人口普查局把一个人口普查区定义为“一个在人口特征、经济地位和生活条件方面相对同质、平均人口为4 000人的区域。贫民区指那些至少20%居民为贫困人口的区域，而聚居区贫民区则指那些至少40%的人口为贫困人口的区域”）的黑人回答者中，仅有18%认为他们的居民点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生活区。^[4]

一位31岁的在职劳工，“近西区”一栋公共住宅的门房，措辞激烈地描述了他所在的居民点：

瞧，这是一个充满暴力的小区！你常会听说有人被枪击，几乎每天都有，或者每个晚上都有。因为你知道，就像我说过的，人们挤在一块儿，特别是高层建筑里。我敢说这会把你拖垮，因为，你知道，当人们变得疯狂到极点，什么都有可能，这会把你拖垮。他们会抢你，你知道，他们想要揍你。他们不想工作，你知道，他们更愿让你去工作，然后等着你，你知道，把你的支票拿去，这样

他们就能抢你或者别的什么。

一位 39 岁的离异母亲，是个学校教师，有四个孩子，谈到不久前在她居住的南区居民点遭到枪杀的一个男孩：

我想，他只是……想买什么东西，或者要做其他事，比如吃饭什么的，从街上走来一些孩子，走近他后，朝他开了五枪。我……我不知道这事是不是跟帮派有牵连，或者那些孩子……你知道，也许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你知道。当你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中的时候，这些都是你必须非常小心的事情。

7

另一位有四个孩子的已婚母亲，在一家工厂当包装工，也表达了对暴力犯罪的担忧。她提到在她居住的南区居民点，犯罪分子经常

把老年妇女击倒，然后拿走她们的养老金支票。在那边的高架铁道站，就常发生这种事。特别是当她们领了社会保障支票，他们就出来了，等在那儿，候着她们，抢走她们的钱包和所有东西。很多这种事情就发生在这周围。他们强借强当，破门而入，什么都干。我刚搬过来的时候，他们强行闯入过我家一次，所以我就装上了栅栏。他们拿走了我的立体声录放机。但自从我装上了栅栏之后，就没遇到什么麻烦。

暴力也是一位 32 岁的黑人单身父亲感到担心的原因，他有一个孩子，没有工作，生活在近西区的一个贫困聚居地段。

不，我不喜欢这个居民点。许多朋友，他们要么被杀了，要么不时碰到诸如此类的事情，你知道，在这个居民点我目睹了许多

的凶杀。这里真是一团糟！我母亲已经 66 岁了，有一次一个年轻人跑到她跟前说：“喂，把你的钱给我！”她只好乖乖听话。这帮家伙，他们在这周围做了很多敲竹杠抢劫的事情，他们也到处偷窃。他们还讹诈人，无所不做。然后，他们还让毒品买卖到处蔓延开来。这里整个儿一团糟，天哪！

许多调查对象谈到了他们的居民点对他们自己个人前景的负面影响。来自西区一个贫困聚居地段的一位未婚职员说道：

- 8 如果你来自一个向上流动的居民点，你对于未来前景的展望肯定要比住在这里更为积极。在这种类型的居民点，你耳闻目睹的都是消极的事情，你要是想做点什么，都会感到沮丧。所以，你住在哪里显然大有关系。

来自西区一个衰败居民点的一位 17 岁的大学生，课余时间从事兼职工作，也持有类似观点。

我敢说我们小区大概 40%……我敢说 40% 是酒鬼……而且……只有 5% 的酒鬼有家庭。可想而知，其他 35% 就游荡在大街上……他们或许住在其他地方，但他们就在大街上游荡，每天都在街角转来转去，日复一日，因为除此之外，他们别无选择。他们真是今朝有酒今朝醉。[他们说]“嗨，今天喝高啦。”“噢，哈哈！”“明天干点啥呢，伙计？”“我不知道，伙计，真不知道。”你可以问问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你明天准备做什么？”“我不知道，老兄，到时候就知道了。”你知道，我真能理解处于这种状态是什么滋味。如果你周围都是消极悲观的人，无所事事的人，你也会变得不管不顾。

内城区公立学校的状况，是我们的调查对象所关注的另外一个主要问题。抱怨的内容，从学校人满为患一直到教师的不称职和不上心。在这些问题上，一位有两个孩子的 25 岁的已婚母亲措辞尖锐，她来自南区的一个普查地段，那里最近刚刚变成贫困区。她说：“我的女儿才不会进这里的学校呢，她去了一家付费的幼儿园，当然，他们那里工作认真，会在她身上花时间，因为他们收钱！但公立学校，不能去！那里孩子太多，教师忙不过来，而且老师也缺乏责任心。”

一位来自南区的依靠福利生活的 29 岁母亲，带着 4 个孩子，她说在她所住的“居民点[的孩子]不可能学到什么东西，如果他们沒有合适的设施、图书和其他条件，因为我知道，在这种学校，他们没有孩子需要从中学习知识的合适图书。这也是他们落后许多的原因”。

不过，一位 35 岁的已婚黑人母亲，有 2 个孩子，作为芝加哥市的一个管理助手，她主要关心的是学生的行为。

9

初级中学的主要问题是学生人满为患，帮派活动众多，怀孕率高。我想，境况如此糟糕，对于那些想要寻求更高教育的孩子来说，它们简直就是一种障碍了。

最后，一位 40 岁的依靠福利生活的母亲，带着四个孩子，生活在西区一个聚居区贫困人口普查区，她谈到如何改善所在居民点的状况：

即便是这种地方，如果他们整顿一下，并维持下去，把毒品挡在外面，也会好上很多。一定要把毒品赶出去。如果，嗯，让这里的人有更多的工作，你知道，工作。现在他们就坐在街角，他们无所事事。所以，我想如果一个人有工作……我倒不想别的，也许情况是一样的糟糕，你知道，照样抢劫杀人。因为我想他们杀人抢劫，是因为他们一无所有，所以他们盘算着他们能够从别人那里弄点什么回来。

我们也询问了调查对象，他们的居民点作为一个生活的地方，在过去的岁月中是否有所变化。71%的非裔调查对象感到他们的居民点要么一仍其旧，要么变得更糟。

来自西区一个住宅项目的一位失业黑人男性居民认为，在他所生活的居民点，唯一的变化是“江河日下而非蒸蒸日上”。他还说：“今非昔比了。他们解雇了許多人。要是摆在以前，你坏了一扇窗户，打个电话给项目处，他们马上就派人来修好，但现在再也不像以前了。”

调查对象在谈论他们居民点的变化时，经常说到贩毒和吸毒的增多了。“好吧，在我长大的时候，我是认识到存在着毒品这事儿，但他们不像现在这么公开呀”，一位电话调度员——也是五个孩子的母亲，生活在一个最近从非贫困变为贫困的居民点——说，“现在，看到一个10岁的孩子吸毒成瘾，或者一个10岁的孩子在贩毒，根本就不算什么了。我是说，放到过去，当他们做这种事情的时候，也是偷偷摸摸地去做。现在都明目张胆了。”

我在上文已经引述过的那位来自西区的17岁黑人大学生，也描述了毒品在他那个居民点如何成为一大问题。

当我刚搬来这个居民点时，一切都很好。你知道，在这个居民点，晚上六点以后，街上就看不到人，哪怕夏天也是如此。人们可能在公园，但如果你沿着街道走过去，你可能会看到有人坐在他们的门廊里，但都很安静，不大可能吵闹，也没有多少车辆经过。但当毒品开始流入的时候，人们开始为了毒品打鬥，你都无法入睡，因为这里整夜都有汽车在街上来来往往。你知道，这非常糟糕，因为这让你的社区看起来非常糟糕。

最后，一位41岁的护士助理，已婚但与丈夫分居，两个孩子的母亲，来自西区的—个贫困聚居地段，描述了她所在居民点的变化对于孩子的影响：

以前,你知道,年轻人他们有青年团(Youth Corps),但你知道的,这都全裁减掉了。现在,年轻人什么都没有了。夏天他们从学校出来就在街上东游西逛,惹是生非,因为他们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我感到像青年团之类,在我上学的时候就加入过它,还真能排忧解难,帮助不少呢。它教会了我许多,教我——学会了工作时要坚持,因为他们训练你啊。但现在,他们什么也不为年轻的孩子们做,真的,你知道的。

黑人调查对象对于他们居民点的负面情绪,也体现在他们纷纷表示宁可生活在别处。当被问到,他们更愿意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居民点、芝加哥另外一处居民点、郊区还是其他地方,所有来自贫困地段的调查对象中,仅有35%的人表示他们喜欢生活在自己的居民点;而来自贫困聚居地段的调查对象中,仅有23%的人表明喜欢他们自己的居民点。 11

在谈到为何选择生活在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居民点时,来自西区的一位依赖社会福利救济为生的母亲^①(27岁,三个孩子)说道:“当我搬进来的时候,这是唯一我支付得起的地方。”她还补充道:“我搬进来的时候,有两个孩子,我已经在这里生活了11年。不,我很不喜欢这里。但现在我没有能力迁出去啊。”

这种情绪,得到了来自同一居民点的另外一位福利母亲(24岁,四个孩子)的共鸣:“我搬到这里来的原因,是因为租金啊,这里非常便宜,我不用为煤气费和电费担忧了。不,我不喜欢住在这里,人太多了,人挨人,人挤人。真是太拥挤了!”

最后,也是住在这个居民点的一位福利母亲(三个孩子)说,“出租车都不愿意到这里来载你出去,也不愿载你回到这里。你知道的呀,其他地方的朋友真不愿意到这里来。就是你自己,你也不想邀请明白事理的人来这儿:墙上到处都是斑斑点点,胡涂乱抹,下流肮脏,让人生厌!”

^① 下文中简称为“福利母亲”。——译者注

我们研究中所访谈的许多调查对象的感受，可用一位 33 岁的已婚母亲(三个孩子，来自西区一个非常贫困的居民点)的话来概括：

如果你生活在这样一个地区，在这个居民点，许多人不工作，生活无着，你知道，他们没有工作，就会闯入你的家里，偷走任何东西，卖掉之后换点钱花。你不可能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还能专心于工作，你在工作时会担心是不是有人破门而入闯进你的屋里了。所以，你知道，最好是搬到一个体面的地区，生活在一个人人都工作的社区。

在 1959 年，美国贫困人口中生活在大都市中心城区的人不足三分之一。到 1991 年，中心城区容纳了这个国家将近一半的穷人。集中贫困最为急剧增多的地方，多在非裔美国人聚居区。^[5]譬如，在代表了芝加哥黑人居住带历史核心的 10 个社区中(见图 1.1)，8 个社区的贫困率在 1990 年超过了 45%，其中有 3 个超过了 50%，还有 3 个竟然超过了 60%。而在 25 年前，在 1970 年，这些居民点中仅有两处的贫困率在 40% 之上。

近些年来，社会科学家对城市居民点贫困率上升的问题予以了特别的关注。“出于分析的目的来界定一个城市居民点绝非易事。”^[6]图 1.1 中所显示的芝加哥市不同社区范围，包括了许多邻近的人口普查地段。芝加哥市内的 77 个社区，是芝加哥大学城市社会学家们为 1930 年人口普查所划定的统计单位，他们试图分析该市内的不同状况。这些范围的划定，最初是基于地区的定居历史、地方认同和贸易模式、地方制度以及自然和人为的屏障。^[7]自那时起，在人口和土地使用上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这些单位在追溯历史变化时仍然有用，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继续反映了芝加哥居民点的当代现实。

不过，其他城市可没有这么方便的居民点分类，这也就意味着不能通过社区来进行城市之间的比较。用以表征城市居民点的最为合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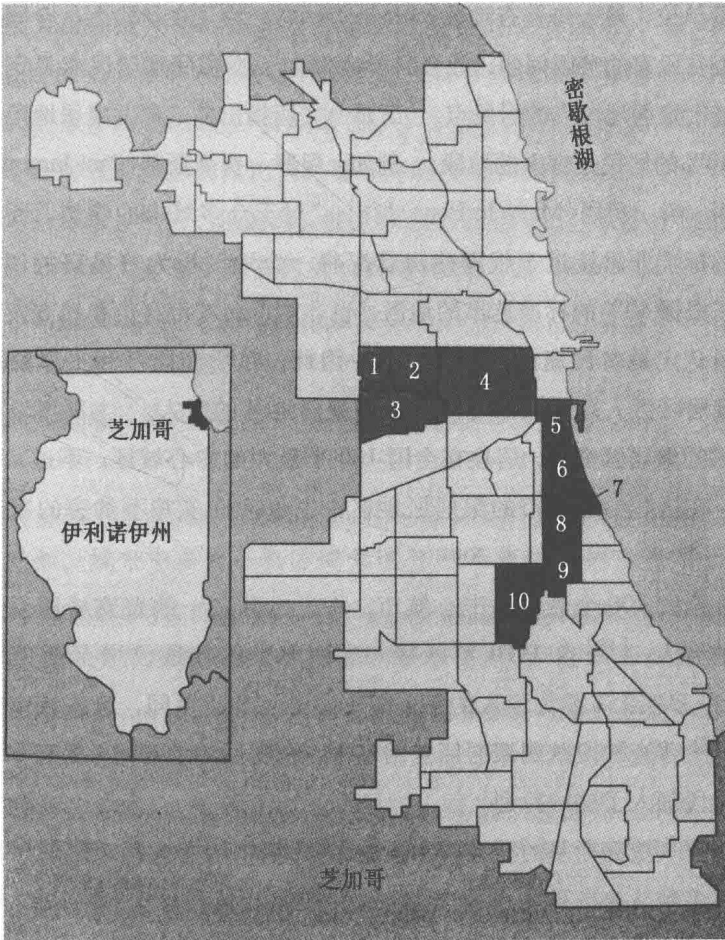


图 1.1 芝加哥市黑人地带的社区图

1. 西加菲尔德公园(WEST GARFIFELD PARK)
2. 东加菲尔德公园(EAST GARFIFELD PARK)
3. 北朗代尔(NORTH LAWNDALE)
4. 近西区(NEAR WEST SIDE)
5. 近南区(NEAR SOUTH SIDE)
6. 道格拉斯(DOUGLAS)
7. 奥克兰(OAKLAND)
8. 格兰大道(GRAND BOULEVARD)
9. 华盛顿公园(WASHINGTON PARK)
10. 英格伍德(ENGLEWOOD)

可测量单位，是人口普查地段(census tract)。为了在经验上从全国范围来检视贫民窟的贫困问题，社会科学家倾向于将贫民窟居民点界定为坐落在贫困聚居地段内的居民点。正如上文所指出的，贫困聚居地段是指至少40%的居民是穷人的地段。例如，保罗·贾高斯基(Paul Jargowsky)和玛丽·乔·贝恩(Mary Jo Bane)指出：“对于众多城市的参访，证实了40%的标准非常接近于根据住房状况将一个地区视为贫民窟的印象。此外，根据40%的标准选出的地区，也非常符合城市官员和地方人口普查官员认定是贫民窟的居民点。”^[8]因此，在贾高斯基和贝恩的研究中，聚居区穷人是指那些生活在贫困聚居地区的穷人。大都市地区四分之三的聚居区穷人，居住在全国100个最大的中心城区；不过，亦须记住，在这些中心城市的聚居区地区，也包括许多并不贫穷的家庭和个人。^[9]

14 在全国100个最大的中心城市，将近七分之一的普查地段至少有40%的穷人。^[10]自1970年以来，这种地段的数量已增至两倍以上了。^[11]事实上，颇为惊人的是，在1970至1980年间，这些城市中共有579个普查地段跌到聚居区贫困水平，在随后的十年间，另有624个普查地段加入了这一行列。

保罗·贾高斯基的研究揭示，在1990年生活于大都市区域贫民窟的绝大多数人(差不多八分之七)是少数民族成员。^[12]从1980年到1990年，在这些贫民窟中非裔美国人的数量增长了三分之一以上，达到将近600万。^[13]这一增长多与穷人有关。生活在聚居区的大都市黑人的比例，由三分之一多(37%)攀升到差不多一半(45%)。事实上，大都市的贫穷黑人越来越陷于孤立。^[14]生活在聚居区的大都市黑人的贫困率在上升，而生活在非聚居区的比率在下降。

聚居区黑人数量的增多，与聚居区的地理蔓延有关。贾高斯基和贝恩发现，在他们所研究的城市(费城、克利夫兰、密尔沃基、孟菲斯)中，到1980年变为聚居区的地区，在1970年还是混合收入地段，但它们邻近于被确认为聚居区的地段。^[15]在1970年代，非穷人从混合收入

地区的大批外迁，是这些城市中聚居区蔓延的主要因素。自1980年起，在全国绝大多数大都市区，聚居区人口普查地段都有增加，包括了那些人数减少的聚居区。费城增加了9个新的聚居区地段，尽管该市居住在聚居区地段的人口比例，是下降幅度最大的地区之一。^[16]在其他一系列城市，包括巴尔的摩、波士顿和华盛顿特区，较小比例的贫困黑人生活在更大数量的聚居区人口普查地段。从1980年到1990年，芝加哥的聚居区人口普查地段的数量增加了61.5%，尽管生活在这些地区的穷人数量所增甚微。

贾高斯基如是反思聚居区大规模蔓延的重要意义：

城市聚居区的地理规模，极大地影响到对聚居区贫困问题的感知。城市中多大一块区域你认为不能进去的？为了不穿过一块危险区域，你愿意绕多少路？事实上，低密度使问题恶化了。更多的废弃建筑，意味着更多的贩毒窝点，为犯罪活动提供了更多的空间。试图保护特定数量居民的警察，不得不多伸展覆盖数平方英里，如此一来，更难抓到犯罪分子。低密度也使社区认同感难以形成，也难以让人感受到在人群中的安全感。从地方政治官员的观点来看，聚居区规模的增大实乃灾难。他们中许多人搬离聚居区，住到中心城市政治管辖范围之外的非聚居区。因此，聚居区的地理范围在扩展，从我们大都市地区的核心挖去了一块更大的地方。^[17] 15

总之，1970年代和1980年代，见证了被划定为贫困聚居区的地段的急剧增多，穷人在这些地区集中，少数民族和白人的贫困集中模式也截然不同。美国历史上种族和阶级征服的遗产之一，就是少数民族居民越来越集中到这个国家的大都市中最为贫困的地区，这种现象颇为独特。

有人认为这种贫困集中现象并不新鲜，颇类似于 1930 年代盛行的状况。根据道格拉斯·马西(Douglas Massey)和南希·登顿(Nancy Denton)的看法，在大萧条期间，贫困也是集中在 1930 年代的聚居区，就像在 1970 年代的聚居区一样。1930 年代的黑人社区和 1970 年代的黑人社区，都有一种共同的经验：高度的种族隔离使之远离主流社会。马西和登顿认为：“一个群体的总体贫困率，以及这个群体在社会中的隔离程度，两者恶性的交互作用，造就了集中贫困现象。当一个被严重隔离的群体经受很高的或升高的贫困率，那么，贫苦在地理上的集中也就在所难免。”^[18]无论这一观点的逻辑如何令人信服，但却不能解释下述事实：在构成芝加哥黑人带的 10 个居民点中，1970 年至 1990 年间，贫困率增长了几近 20% (从 32.5% 到 50.4%)，而同期芝加哥市的黑人总体贫困率仅增加了 7.5% (从 25.1% 到 32.6%)。

当一个被高度隔阂的群体出现了总体贫困率的上升时，集中贫困或许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19]但隔离并不能解释下述事实，即这种被隔离群体中的某些居民点的贫困集中，何以竟高达这一群体总体贫困增长率的差不过三倍？毫无疑问，非裔美国人不成比例的贫困集中，确实是历史上种族隔离的遗产之一。同样确凿的是，隔离经常让黑人面对社会中的其他变化时(包括经济变化，正如我们下文要讨论的)，表现得更为脆弱，无力招架。不过，聚焦于隔离来说明集中贫困的增加，就会忽视发生在像芝加哥之类的城市中的社会和人口变迁的动向。隔离确实存在，我们还需要考虑社会中的其他变化，它们与隔离交互作用，最后导致了内城区居民点急剧的社会转型，特别是自 1970 年以来。

例如，构成了芝加哥黑人带的社区，在最近 40 年来，几乎清一色是黑人，但在 1970 至 1990 年间，它们失去了将近一半的居民。人口的急剧减少，对处在隔离之中的黑人带居民点的社会和经济状况的恶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包括集中爆发的贫困和失业。倘若只是将 1930 年代的大萧条岁月和 1980 年代进行比较，确实能够发现，这些居

民点的聚居区贫困和失业的比率，极为相似。但是这种比较，掩盖了这些居民点 50 年间所发生的重要变化！

在《真正的穷人》中，我主要探究了聚居区居民点自 1970 年左右的以来的变化。^[20]内城区居民点在大萧条之后所取得的许多获益和成果，在 1970 年代之后就消失殆尽。如果只是说 1970 年代或者 1980 年代黑人的集中贫困，在严重性和普遍性上与大萧条时期发生的情况大致相当，那并没有解释自 1970 年代以来集中贫困的急剧上升，也没有触及一个更为根本的、体现集中贫困异常增加和扩散之本质的问题，即失业的急剧增长，而且在这二十年间呈加速趋势。芝加哥贫困居民点的居民所提到的问题，并非单单是贫困造成的后果。一些更具毁灭性的事情的发生，只能归结于集中而持续的失业的发生，以及失业对社区、家庭和个体的严重危害。芝加哥市集中体现了这些变化。 17

自 20 世纪早期，芝加哥就已成为一个实验室，在其中可以科学地研究各种社会、经济和历史力量，如何创造和维持经济上受压迫和被孤立的社区。此类研究最具特色的时期，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由芝加哥大学的社会科学家在 1950 年之前即已完成。^[21]紧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芝加哥学派就完成了一系列经典研究，其中不少是在罗伯特·帕克(Robert E.Park)和欧内斯特·伯吉斯(Ernest W.Burgess)的指导下于随后三十多年取得的。这些研究经常融汇了统计和观察分析，对我们理解城市过程、社会问题和城市增长作出了杰出的经验和理论贡献，从 1930 年代晚期开始，更是为理解种族和阶级征服的本质提供了洞见。^[22]

芝加哥社会科学家承认了居民点——包括聚居区居民点(the ghetto neighborhood)——作为科学分析对象的正当性。芝加哥，一个由居民点构成的大社区，被认为是一个实验室，从中可以得出有关一般城市状况的概况。

指导芝加哥学派研究种族和阶级问题的城市过程视角，历年来也有

微妙的变化。在 1920 年代，帕克和伯吉斯认为，移民贫民窟以及它们中典型的社会问题，是走向不可避免的进步之路上的临时状况。他们更进一步认为，黑人代表了最后的移民群体，正处在“从冲突到适应再到同化”的“交互作用周期”。^[23]

黑人符合移民同化模式的观点，随后出现在 E·法兰克林·弗雷泽 (E. Franklin Frazier) 1930 年代的研究中。^[24]但弗雷泽，这位受训于芝加哥大学的非裔美国社会学家，也认识到并强调了帕克和伯吉斯早期著作中忽视的一个问题——黑人家庭结构和产业经济之间的重要联系。弗雷泽相信，产业部门中就业机会的可得性，将极大地决定非裔美国人的向上流动和他们最终在美国生活中的同化。

1945 年，随着圣克莱尔·德雷克 (St. Clair Drake) 和贺拉斯·凯顿 (Horace Cayton) 的经典研究《黑色都市》 (*Black Metropolis*) 的出版，芝加哥学派的框架发生了根本的改变。^[25]德雷克和凯顿首先利用人口普查数据、调查和档案资料，检视了黑人在就业、住房和社会整合方面的进步。他们的分析清晰地表明，存在着一条颜色之线，有效地阻碍了黑人在职业、居住和社会方面的流动。他们证明，任何有关城市黑人复制了移民经验的假设，都必定碰到种族的问题。此外，正如历史学家爱丽丝·奥康纳 (Alice O'Connor) 所言，“德雷克和凯顿认识到，芝加哥的种族格局，绝非城市增长的有机过程的体现，而是人类行为、制度实践和政治决策的产物”。^[26]

《黑色都市》还在另外一个方面偏离了芝加哥学派早期的研究，即包含了一项民族志的研究。利用 W·劳埃德·沃纳 (W. Lloyd Warner) 的人类学技术，德雷克和凯顿研究了芝加哥南区三个社区 (华盛顿公园、格兰大道和道格拉斯) 中的日常生活模式。^[27]他们把这些地区称为“布朗兹威尔” (Bronzeville)，而这本来是当地居民自己用来描述他们社区的一个词。综合使用了基于芝加哥学派研究风格和人类学方法的资料，《黑色都市》对于黑人的进步，呈现了一幅并不那么令人鼓舞的图景。^[28]

在出版于1962年的修订和扩展版《黑色都市》中，德雷克和凯顿以乐观主义的眼光，检视了布朗兹威尔自该书初版以来所发生的变化。他们感到1960年代的美国正在“经历着一个繁荣的时期”，非裔美国人“生活在一个整合的时代”。^[29]当然，他们没有办法预见到，在接下来的十年当中，像布朗兹威尔之类的社区会遭遇社会和经济的急剧恶化。

今天的内城区居民点与德雷克和凯顿所研究的那些居民点之间最根本的区别，是高得多的失业水平。事实上，在我们国家的都市之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贫困，而这对与都市地区生活质量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包括种族关系）都有影响。 19

所谓“城市新贫困”，我是指贫困的、隔离的居民点，其中绝大多数成年个体，要么失业，要么彻底退出了劳动力市场。例如，1990年达到贫民窟贫困率的12个芝加哥社区，三分之一的16岁以上成年人通常每周拥有一份工作。^[30]这些社区位于这座城市的南区和西区，差不多都是清一色的黑人。我们还可以在这12个高失业率的社区之外，加上3个也主要是黑人构成的社区，它们接近贫民窟贫困率，1990年时仅有42%的成年人通常每周工作。因此，在这15个社区——总人口是425 125——的全部成年人中，仅有37%于1990年通常每周工作挣钱。相比之下，在17个其他也主要是黑人构成的社区——总人口为545 408——中，54%的成年人1990年通常每周工作。这很接近于整个城市中成年人57%的就业数字。最后，除了一个亚裔社区49%的就业率，以及一个拉丁裔社区49%的就业率，在芝加哥剩下的其他45个社区中，绝大多数成年人通常每周拥有一份工作。

但芝加哥绝非唯一的以新贫困居民点为特征的城市。在全国100个最大的中心城市的聚居区地段，1990年时，相对于每100个不是通常每周工作的成年人，仅有65.5%的人就业。^[31]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在非贫困地区，相对于每100个不工作的人，则有182.3个就业者。换言之

之，就业者与失业者的比例，在人口普查地段未被标识为贫困地区的要大三倍！

看看德雷克和凯顿研究过的布朗兹威尔，我们就可一窥内城区的许多聚居居民点近年来所发生的惊人变化。在1950年，布朗兹威尔的三个区域中大多数成年人都有工作，但到1990年，道格拉斯小区中10个人里面仅有4个人通常每周工作，华盛顿公园小区是3个人里面1个人工作，格兰大道小区是4个里面1个。在1950年，14岁及以上的生活在布朗兹威尔的所有男性中，69%通常每周工作；在1960年，这一群体中64%的人就业。然而，到1990年，在上述三个小区中16岁及以上的所有男性，仅有37%通常每周拥有工作。

当《黑色都市》首版于1945年问世的时候，在黑人社区中阶级整合的程度很高。正如德雷克和凯顿所指出的，布朗兹威尔的居民，很难就“自己属于‘下层阶级’和‘中产阶级’作出明确的归类……虽谈不上是中产阶级地区，但在布朗兹威尔的所有地方，往往可见中产阶级的建筑，或者这里那里散落着一些中产阶级的街区”。^[32]虽然他们可能生活在不同的街道，但在像布朗兹威尔之类的内城居民区，所有等级的黑人都生活在同样的社区，在同样的商店购物。他们的孩子在同样的学校上学，在同样的公园游玩。尽管也有一些阶级对抗，但他们的居民点要远比今天的内城居民点安定。简言之，他们拥有更高的社会科学家所说的“社会组织”水平。

我所说的社会组织，是指一个地方的居民能够维持有效的社会控制，并能实现他们的共同目标。居民点的社会组织，包括三个主要维度：(1)社会网络的普遍程度、强度和互依程度；(2)居民实施的集体监管程度，以及在处理居民点问题时居民承担的个人责任；(3)居民在自愿和正式组织中的参与率。^[33]正式制度(比如教会和政党组织)、自愿结社(比如街区俱乐部、家长与教师组织)和非正式网络(居民点的朋友和熟人、同事、姻亲和直系亲属)都反映了社会组织程度。^[34]

居民点的社会组织程度，取决于地方友谊的连结程度、社会凝聚程

度、居民参与正式和非正式自愿结社的水平、正式组织的密度和稳定度以及非正式社会控制的性质。^[35]居民点的成年人若能根据义务、期待和关系来相互交往，则就能够更好地监管和控制孩子们的活动和行为。在社会组织水平很高的居民点，成年人更有条件采取行动来提升居民点生活质量——例如，通过驱散青年在街角的聚集，通过监管年轻人的闲暇活动。

21

而为高失业率所困的居民点，更有可能存在着社会组织水平下的问题：两者密切相关。高失业率，会在居民点中激发削弱社会组织的问题，从犯罪、帮派暴力、毒品交易到家庭破裂和家庭生活组织中的问题。

试看毒品交易和暴力犯罪的问题。正如许多研究所表明的，在内城区居民中，当合法的就业机会减少的时候，贩卖毒品的诱因就会增强。^[36]而毒品在居民点的分销又会诱使人卷入暴力和不法活动。在1985至1992年间，24岁以下的男性中谋杀率急剧上升；18岁以及更为年轻的男性，谋杀率增加了一倍。尤其是黑人男性卷入了暴力犯罪的猛增。例如，14到17岁白人男性的杀人犯罪率，从1984年的每十万8人增加到1991年的14人，而同期黑人男性的杀人犯罪率增至三倍（从每十万32人到112人）。^[37]年轻男性中暴力犯罪的急剧增多，还伴随着强效可卡因毒瘾的快速蔓延。暴力犯罪与吸毒成瘾之间的联系，在深受失业和社会组织弱化之苦的内城聚居区，尤为紧密。

强效可卡因市场上的暴力分子，对居民点社会组织具有强大的影响。饱受高失业率、经济机会匮乏、居民高流动率之困扰的居民点，没有能力控制动荡不定的毒品市场和与之相关的暴力犯罪。^[38]当非正式控制弱化的时候，管制行为的社会过程就变了。

结果，毒品市场中的行为和规范，更有可能影响居民点中其他人的行动，甚至是那些没有卷入毒品活动的人。^[39]贩毒者使居民点中枪支的使用和扩散逐步升级，而这增大了下述可能，即其他人，特别是年轻人，渐渐认为拥有武器是必要的或者可取的，有助于自我保护、解决分

歧以及获得同侪和其他人的尊重。

此外，正如阿尔弗雷德·布鲁姆斯坦(Afred Blumstein)指出的，毒品产业在居民点积极地招募青少年，“部分是因为他们要比成人用起来便宜，部分是因为他们可能不太容易受到成人刑事司法制度的惩罚，部分是因为他们往往比成人更加胆大和愿意去冒成熟的成人会设法躲避的风险”。^[40]内城区黑人青年，因为就业前景渺茫，不大可能找到稳定而有吸引力的工作，容易受到蛊惑而去从事毒品交易，因此也就越来越多地发现自己身陷伴随着毒品买卖而来的暴力行为。

失业和暴力犯罪之间更为直接的关系，在科罗拉多大学的德尔伯特·埃利奥特(Delbert Elliott)最近一项研究中得到揭示。这项研究建立在1976到1989年间收集的全国纵向青年调查数据基础之上，涵盖的青年从11岁到30岁。正如埃利奥特所指出的，从青春期到成年期的转变，当个体开始承担新的成年角色和责任的时候，绝大部分犯罪行为都会因此而急剧减少。“[对所有男性来说]，参与严重暴力攻击型行为(严重伤害、强奸和抢劫)，从11和12岁到15和16岁会增加，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急剧下降”。虽然黑人男性和白人男性表现出类似的年龄曲线，“黑人的年龄曲线在20岁以后的负斜率，要远小于白人的”。^[41]

在男性卷入严重暴力犯罪的黑人和白人的比例差异上，虽然在11岁时差不多持平，但在青春期余下的其他岁月则会增加到3:2，一直扩大到快30岁时的4:1。不过，当埃利奥特只比较就业的黑人和白人男性，发现到21岁时两个群体的暴力行为模式并无显著差异。就业的黑人男性，就像白人男性一样，在他们的青春期之后经历了严重暴力行为的急剧下降。相应地，青春期之后暴力行为上的种族差异的一个主要形成原因，是失业。相当比例的失业黑人男性，并不承担成人角色和责任，因此，他们的严重暴力行为更有可能延伸到成年期。新贫困居民点聚集了大量的失业男性，结果就是遭受了超过其他城区居民点的暴力犯罪率。

失业和居民点社会组织的问题，包括犯罪和毒品交易，在“城市贫

困与家庭生活研究”中，是被访谈者集中反应的突出问题，是他们最为担忧的事情。类似的情况也反映在1993年的一项问卷调查(参见附录B)中，这项调查是建立在对芝加哥南区的两个新贫困居民点即伍德朗和奥克兰成年居民的随机抽样的基础上。在1990年，伍德朗的27473名成人中37%就业，而奥克兰4953名成人中仅23%有工作。当被问及在他们的居民点中失业问题有多严重时，伍德朗73%的居民和奥克兰76%的居民都认为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对调查的回答也显示出居民们还担忧其他一系列相关的问题，诸如犯罪和吸毒，它们不过是严重的社会组织问题的症状。事实上，每个居民点中66%的居民都将犯罪认定为一个**主要**的问题。而吸毒，则被奥克兰86%、伍德朗79%的成年居民列举为一个**主要**问题。

虽然高失业率居民点也是以贫困为特征，但在高贫困率的居民点，如果居民都有工作，则不大可能触发社会组织的问题。多年以前，当像布朗兹威尔之类的地区，居民虽穷，但大都有工作，情形即是如此。而今天，没有工作的穷人在高度隔离和贫穷的居民点要占大多数。

新贫困居民点的增多，代表了一种变动，即从历史学家艾伦·斯皮尔(Allan Spear)所谓的制度聚居区(institutional ghetto)——正如雷克和凯顿在有关布朗兹威尔的描述中所呈现的，其结构和活动与一般社会颇为类似——转向失业聚居区(jobless ghetto)，这种聚居区则以机会和资源严重匮乏、社会控制严重不足为特征。^[42]

那么，究竟如何解释像布朗兹威尔之类的内城区社区中所发生的失业成年人比例日益增高以及相应的社会组织问题日趋恶化的现象？一个简便的答案是种族隔离。然而，局限于种族视角的观点，并不能充分解释像布朗兹威尔之类居民点的近期变化。别忘了，布朗兹威尔在1950年和今天一样，也是为肤色所隔离，但那时的就业水平要高得多！

虽说如此，种族隔离确实重要。如果大部分非裔美国人历史上不曾被隔离在内城聚居区，我们也就不用讨论城市新贫困的问题了。隔离的聚居区，并非生活在其中的居民自愿选择或积极决定的结果。正

24 如马西和登顿周密而详尽地记述的，隔离的聚居区是系统性的种族实践的结果，诸如限制性契约、银行和保险公司的拒绝房产抵押、分区规划、房地产经纪人的恐慌性抛售以及在低收入地区实行大规模的公共住宅项目。^[43]

隔离的聚居区要比城市中的其他地区更不利于就业和就业准备。聚居区的隔离使就业问题恶化了，因为隔离导致非正式就业网络趋于弱化，使个体和家庭陷于社会孤立，从而减少了他们获得人力资源技能的机会，包括可以促进社会流动的充分的教育培训。因为社会中没有其他群体像非裔美国人那样，经受了如此程度的隔离、孤立和贫困集中，故而，当他们不得不跟社会中其他群体，包括其他遭人鄙视的群体，为获取资源和权益而进行竞争的时候，他们更有可能处于劣势。

为理解城市新贫困，我们必须澄清种族隔离和社会中的其他变化如何交互作用，造成了内城聚居区居民点失业率攀升和社会组织瓦解的问题。

注 释：

[1] Shapiro(1987).

[2] Wacquant(1992), p.16.

[3] Wacquant(1992), p.16.

[4] Kasarda(1993b), p.254.

[5] 生活在中心城区的贫困黑人比例，从1959年的38%上升到了1991年的80%。1972年，全国贫困人口中有三分之一居住在中心城区的各普查地段，但是1991年，这一数字却飞升至60%(Kasarda[1993a])。

因为贫困的概念是美国统计局定义的，所以有关贫困的官方数字并不能反映上述变化的深远影响。贫困线代表的是政府所规定的收入标准。若家庭年收入低于这一标准，那么该家庭所有成员都会被划定为“穷人”。于是，这一标准是随着家庭规模而变化的，其基础是对家庭需要的大致估计。1963年进行的家庭需要估计，根据的却是1955年的家庭消费调查数据。尽管统计局每年都会根据通货膨胀率对贫困标准进行调整，但是贫困的基本含义却从未改变，因而难以反映家庭需求的实际变化。所以，有些专家，其中还有一个全国研究小组，提出应该调整官方的贫困测量方法，以便反映家庭需求的实际变化和各地区生活成本的差异。参见 Citro and Michael(1995), Ruggles(1990), and O'Hare, Mann, Porter, and Greenstein(1990)。

1988年，一个四口之家的贫困标准是年收入低于12 092美元。但是，根据当前的调查数据，这一标准似乎过低。1989年，从7月到10月，盖洛普公司连续每个月都对其抽出的成年美国人样本提出了如下问题：“收入低于某一标准的人会被视为穷人。这一标准被称为‘贫困线’。在您所生活的社区中，您觉得一周收入多少钱可以作为四口之家(丈夫、妻子、两个孩子)的贫困线？”我们可将应答者所给出的平均周收入数据转换为年收入数据，并根据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使其可与1988年联邦政府所界定的四口之家的贫

困线进行比较。可以得出,盖洛普调查的年收入是15 017美元,比官方贫困线要高出将近3 000美元(24%)。如果按照大众给出的这一贫困标准,“美国的贫困人口规模将会接近4 500万,而根据政府统计,贫困人口规模大概是3 200万”(O'Hare, Mann, Porter, and Greenstein[1990], p.vii)。

在对政府的贫困测量方法进行综合分析时,奥黑尔(O'Hare)、曼(Mann)、波特(Porter)和格林斯坦(Greenstein)(1990)指出:

盖洛普民意测验中调查问题的设计,是为了了解人们根据其自身生活环境而对恰当贫困线的大致估计。该问题询问的是,应答者认为何种收入水平可以作为他们所生活社区的贫困线。于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会因应答者所生活地区的不同而变化。那些生活在市中心地区的人们所给出的贫困线标准,可能会高于那些生活在非市中心地区的人们。美国西部的人们也许会给出最高的地区贫困线,而南部和中西部的人则会给出最低的地区贫困线。然而,无论在全国哪个地区,应答者所给出的贫困线都高于政府确定的贫困线。

如果大众的贫困线是随着地理区域而变化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这一民意测验的结果,来确定哪些人应该被划定为贫困人口。根据不同地区对应答者的回答进行平均,可以确定每一地区的贫困线。这一方法可以使贫困线大致符合不同地区生活成本的差异。如果以这些地区贫困线为标准的话,将有4 400人口被划为贫困人口。这跟上面未考虑地区差异时计算出的4 500万这一数字大致相当。贫困人口规模之所以未出现较大变化,是因为各地区的贫困线不同,有些地区较高,有些地区较低,二者会相互抵消。在非城市地区、中西部和南部,低于当地贫困线的人口较少;而在城市地区和西部,贫困人口则较多,一增一减,彼此抵消(p.vii)。

有人认为,政府给予的诸如住房补贴、食物券等非现金福利,也应该包含到对贫困家庭的估计中。有关这一点,奥黑尔(O'Hare)、曼(Mann)、波特(Porter)和格林斯坦(Greenstein)(1990)指出,

即使将非现金福利算作收入,根据大众给出的贫困线算出的贫困人口,仍然要比政府制定的、并未考虑非现金福利的贫困线高出不少。如果将食物和住房方面的福利视为收入的一部分,根据大众贫困线算出的美国贫困人口规模是4 300万,或者说是美国总人口的18%。如果再将医疗福利也视为是收入的话,美国贫困人口将接近有3 900万,或者说是美国总人口的18%(p.viii)。

有关贫困人口的家庭收入与家庭消费的另一项综合研究,请参见Jencks and Edin(1990)。

[6] Kasarda(1993b), p.254.

[7] *Local Community Fact Book—Chicago Metropolitan Area*(1984).

[8] Jargowsky and Bane(1991), p.239.

[9] Kasarda(1993b), and Jargowsky and Bane(1991).

[10] 有关贫困聚居区普查地段的增加,请参见Kasarda(1993b)。在1970年代,在增加的聚居区贫困人口中,有将近四分之三(74%)的人口都主要居住在十座大城市。其中,新增贫困人口中的三分之一,都主要是在纽约市;纽约市和芝加哥市增加的贫困人口,就占了二分之一。如果再加上费城、纽瓦克、底特律,这五座城市中增加的贫困人口,占1970年代聚居区所有新增贫困人口的三分之二。从聚居区新增贫困人口的多少来看你,其他五座城市分别是哥伦布市(俄亥俄州)、亚特兰大、巴尔的摩、水牛城、帕特森(新泽西州)。所以,当我们谈论1970年代美国聚居区贫困人口的增加时,主要关注的其实是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大都市。

确实,贾高斯基和贝恩(1991)发现,在1970年代存在聚居区贫困问题的195个标准大城市地区中,有88个都经历了聚居区贫困人口的减少。在他们的研究中,根据聚居区贫困人口的减少幅度,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的城市:在布朗斯威尔、麦卡伦、科珀斯克里斯蒂(Corpus Christi)、圣安东尼奥等得克萨斯州各城市中,西班牙裔聚居区的贫困人口急剧下降;而在什里夫波特、查尔斯顿、杰克逊(密西西比州)、孟菲斯、新奥尔良、哥伦布市(佐治亚州)等南部城市中,黑人聚居区的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这十座城市所减少的贫困

人口，占1970年代减少的全部贫困人口中的46%。因此，“贫困人口在少数城市中的减少程度，远远不及贫困人口在少数城市中的增加幅度”（p.40）。

然而，1970年代的这种趋势并未在1980年代得到延续。中西部城市的贫困集中化程度日益严重。在100座大城市中的聚居区或极端贫困地段，贫困人口的比例从1970年的12.8%攀升到了1990年代的36.2%。这一增加幅度所对应的绝对数字将意味着，在过去二十年中，贫困人口从1970年代的22 272人增加到了1990年的789 778人，将近原先的四倍。东北部各城市（纽约、费城、纽瓦克等）的总贫困人口虽然有所降低，但是生活在聚居区中的贫困人口却并无变化。

在1970年代，南部城市则不仅经历了贫困人口数的绝对增加，也经历了聚居区贫困人口规模和比例的降低。而在1980年代，这一趋势却反了过来。在1980到1990年之间，南部城市的贫困人口几乎增加了50万。1980年代的聚居区贫困人口数，则从583 945增加到了886 341。聚居区贫困人口的比例从23.7%转变为30.3%。西部城市的变化趋势跟南部城市比较类似：1970年代，聚居区贫困人口规模和比例都不断下降；而到了1980年代，却又转变为大幅增加，其中聚居区贫困普查地段的数量就增加了80%。

[11] 从1970年到1990年，贫困聚居区普查地段的数量在全国100座大城市的所有普查地段中所占的比例，从6%上升为13.7%（Kasarda[1993b]）。

[12] 参见Jargowsky(1994)。贾高斯基运用了一种稍微调整后的方法来测量聚居区贫困率，从而得出了这一数字。他的测量方法可以更准确地算出白人、黑人混住地段的黑人贫困集中化程度。由于美国城市中存在严重的种族隔离，多数普查地段几乎全都是黑人或全是白人。但是，越来越多的一些普查地段开始同时具有相当数量的黑人和白人。而种族混合地段的贫困率却代表的是该地区所有居住人口，这可能会使某一特定群体的贫困集中化趋势变得不那么精确。如果某个普查地段一半是黑人、一半是白人，那么，该普查地段实际上是由两个相互隔离的区域所构成，这两个区域之间很少有社会联系，仅仅因为地理界限而被划分到了一个普查地段中。如果该普查地段中黑人的贫困比例是50%，而白人的贫困比例是20%，总的贫困率将是35%。这一地区将不会被划分为贫困聚居区，尽管这一地段中的黑人区域事实上构成了聚居区，如果将种族界限考虑进来后，这一种族差异将会变得很明显。

贾高斯基在对达拉斯（得克萨斯州北部城市）的混合居住地段进行研究时，对上述方法进行了经验性检验。如果黑人在人口在某地段占到了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比例，他就将该地段称为“混合”地段。以这一标准看，达拉斯市的400个普查地段中，只有31个属于混合地段。“这些混合地段包括了1000个普查街区，每个街区的平均人口为100人左右”（1994，p.290）。但他运用街区层面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70%的街区都不是种族混合居住的；住在混合地段的居民，将近有三分之二（64.4%）的人并未生活在种族混合的街区之中”（p.291）。于是，他认为，这个有关特定种族之贫困集中化程度的测量方法更为恰当有效。如果将这一方法运用到上面的例子中（该混合地段的总贫困率是35%），将可以较为准确地测量出混合地段中黑人贫困人口的比例为50%，白人贫困人口的比例是20%。因此，这一普查地段的黑人将会被划分为聚居区人口，因为他们的贫困率超过了40%的标准。

[13] 1990年，将近有600万非裔美国人居住在这些聚居区；从1980年以来，这一数字增加了35.9%。这部分是由于人口的总体增长。尽管非裔美国人在大都市地区的总人口也有所增加，但其增加幅度仅仅是16%。生活在聚居区的大城市黑人人口增加比例甚至更快，从1980年代的37.2%转变为1990年的45.5%（Jargowsky[1994]）。

[14] 参见Jargowsky(1994)。在大都市中的所有生活区（普查地段），黑人的贫困率都稍有增加，从1980年的26.9%上升为1990年的26.5%（原文如此。——译者注）。在并不属于聚居区的普查地段，黑人人口的贫困率则稍有降低，从1980年的21.2%下降为1990年的18.9%。然而，在那些属于聚居区的普查地段，这一数字却从49.5%上升到了50.8%。

[15] Jargowsky and Bane(1991)。

[16] 贾高斯基(1994，p.296)指出，“由于统计局的方法论局限，难以对1980年和1990年分别被划分为聚居区的普查地段数量进行比较。因为跟1980年相比，统计局在1990年将更多的低收入普查地段纳入了其范围。为了避开这一问题，我选择了那些至少有100人为黑人的普查地段。被划分为聚居区的普查地段数量，从3 256个增加为5 003个，几乎增加了54%。鉴于这些普查地段的总人口增加缓慢，我们可以推测，聚居区普查地段的人口密度降低了11.9%。”这段话中所汇报的有关1980年到1990年的数据，都

是以至少有 100 位黑人的普查地段为基础的。

[17] Jargowsky(1994), p.18.

[18] Massey and Denton(1993), p.118.

[19] 需要指出的是, 尽管集中贫困主要发生在 1970 年代大都市地区的非裔美国人身上, 但是, 在 1980 年代, “在路易斯维尔、肯塔基、塔尔萨、俄克拉荷马等小城市地区, 西班牙裔白人的贫困集中程度也非常高”(Pear[1987])。

[20] Wilson(1987)。

[21] 芝加哥学派的代表性研究有帕克和伯吉斯的《城市》(*The City*, 1925); 安德森(N.Anderson)的《流浪汉》(*The Hobo*, 1923)和《不断漂泊的人》(*Men on the Move*, 1940); 斯拉舍(F.Thrasher)的《黑帮》(*The Gang*, 1927); 沃思的(L.Wirth)的《聚居区》(*The Ghetto*, 1928); 佐尔博(H.W.Zorbaugh)的《金海岸与贫民窟》(*The Gold Coast and The Slum*, 1929); 法里斯(R.E.L.Faris)和邓纳姆(W.Dunham)的《美国城市中的精神失常》(*Mental Disorder in Urban American*, 1931); E·法兰克林·弗雷泽(E.Franklin Frazier)的《芝加哥的黑人家庭》(*The Negro Family in Chicago*, 1932)。上述著作均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22] 下述有关芝加哥学派的讨论, 很多受益于奥康纳(1992)。她准确地指出:

此后有关移民和黑人城市体验的历史研究, 逐渐表明了芝加哥学派同化理论框架的不足, 无论是描述移民的经历还是预测移民如何在城市中生活, 这一理论框架都已经不太适用。芝加哥学派认为贫困、社会“解组”、隔离是城市增长这个有机过程不可避免的结果(尽管是暂时的), 这一观点实际上忽视了经济或其他结构性因素对于新来者的流动模式和流动轨迹的形塑作用。他们的分析还忽视了政治和地方性政府政策对聚居区所具有的创造和维持作用, 其内在的乐观主义和不可避免的语气, 几乎没有为干预的可能留下任何空间或需要。(p.5)

[23] O'Connor(1992)。

[24] Frazier(1932 and 1939)。

[25] Drake and Cayton(1945)。

[26] O'Connor(1992)。

[27] Warner and Lunt(1941 and 1942)。

[28] O'Connor(1992)。

[29] Drake and Cayton(1962), p.xv.

[30] 这里有关成人社区就业率的数据, 都是以 1990 年美国统计局所提供的数据和 1950 年、1960 年《芝加哥地方社区统计资料》(*Local Community Fact Book for Chicago-1950 and the Local Community Fact Book-Chicago Area, 1960*)为基础进行计算的。成人就业率表示的是该地区成人人口中(1950 年为 14 岁及以上、1990 年为 16 岁及以上)的就业人数。未就业人数则包括属于劳动力人口但却并未参加劳动的人和已经退出劳动力大军或尚未成为成年劳动力的人口。未算作劳动力的人口主要包括“学生、家庭主妇、退休工人、囚犯和精神病患者、残疾人以及偶尔从事没有报酬的家庭事务的人”(Local Community Fact Book-Chicago Metropolitan Area, Based on the 1970 and 1980 Censuses [1984], p.xxv)。

[31] Kasarda(1993b)。

[32] Drake and Cayton(1962), pp.658—660.

[33] Sampson and Groves(1989), Sampson(1992b), and Sampson and Wilson(1995)。

[34] Sampson(1992b)。

[35] Sampson(1992b)。

[36] Fagan(1993)。

[37] 有关暴力犯罪的数据, 来源于 Blumstein(1994)。

[38] Fagan(1993) and Sampson(1986) and(1988)。

[39] Blumstein(1994)。

[40] Blumstein(1994), p.18.

[41] Elliott(1992), pp.14—15.在埃利奥特的研究中, 那些 18 到 20 岁时开始工作的黑人男性中, 75%的人都在 21 岁后结束了他们的暴力行为; 相对而言, 那些 18 到 20 岁

当工作消失时：城市新穷人的世界

尚未工作的黑人男性，则有 52% 的人在 21 岁后结束了其暴力行为。埃利奥特还发现，恋爱和结婚关系也跟黑人男性结束暴力行为具有紧密关联。对于那些在 18 到 20 岁经历了一年或多年恋爱、婚姻关系的男性，无论白人还是黑人，他们在 21 岁时结束严重暴力行为这一点上都没有显著差异。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是否处于恋爱、婚姻关系，或者是否有工作。

[42] Spear(1967).

[43] Massey and Denton(1993).

第二章

社会变迁与脆弱的聚居区

25

众多内城区居民点出现的失业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同全国范围内低技能工人的命运多舛有关。尽管日益增大的工资不平等，伤害到了低技能的男性和女性，但就业降低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低技能的男性。在1987至1989年间，一位低技能男性要比同样类型的工人在1967—1969年间多失业8周半。^[1]此外，在1980年代末，“永久性地”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男性的比例，是1960年代末的两倍。^[2]实际工资——即剔除通胀因素之后的工资——的急剧下降，也与失业率的升高一同出现在低收入工人中间。如果根据工资百分位数将所有工资分为五组（由高到低），你会看到，在这种收入分布的最底端的五分之一，在1970年到1989年间，实际工资下降了30%。^[3]

即便是一直就业的低技能工人，也面临着经济升级的问题。职业阶梯——在公司内获得晋升的机会——已经失去，许多技能较差的工人停滞在没有出路的薄酬岗位。这就意味着通过变动工作来提高收入的机会减少了：如果一家公司对内部有经验的工人来说都不太可能提供稍好的职位，那么对于公司之外的人就更是一职难求了。^[4]

但这里也存在着一种悖论。尽管低薪工人的经济边缘性日趋明显，1994年和1995年初失业率低于6%，但许多工人拥有不止一份工作，超时工作已经创造了新纪录。然而，尽管在过去二十年中新增了数千万的工作岗位，但远未到退休年龄的人却要比二十年前工作得要少——而且越来越高比例的人既不工作，也不找工作。^[5]在生命的壮年

26

时期(22岁到58岁)十年中至少八年在全职全年工作的男性工人的比例,从1970年代的79%下降到1980年代的71%。^[6]虽然美国经济在高科技和服务业快速发展,特别高级服务,但在传统上由男性担任的蓝领工厂、运输和建筑岗位的增长,却赶不上就业年龄人口增长的步伐。结果就是这些人工作得更少。^[7]

不工作的壮年男性阶层的增长,以及大量经常失业者、兼职工或临时工,都集中在受教育很少的人、辍学者和少数民族中间。^[8]在1970年代,三分之二的高中教育以下的壮年男性工人,在十年中的八年里全职和整年工作。而在1980年代,仅有一半是如此。壮年黑人男性也经历了类似的急剧下降。在1970年代,所有黑人男性中十分之七的人在十年中的八年里全职和整年工作,但在1980年代,仅有一半如此。那些居住在内城区的人,显然数字会更低。^[9]

据一项研究估算,在1967年以来,在特定年份中的任何一周,不上学、不工作也不找工作的壮年男性的数量,已经增至两倍以上,白人与非白人皆然(分别从3.3到7.7和5.8到13.2)。^[10]这项研究的数据还显示,在1992年,四分之一的男性中学辍学者,根本就没有正式的就业。在拥有中学毕业文凭的人中,有十分之一在1993年没有工作,而在1967年,仅有五十分之一的人报告说全年没有工作,可见上升之快!在非白人的壮年男性中,在特定年份根本就没有工作的比例,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从3%增加到17%。

27 这些变化,跟美国大规模生产体系的衰落有关。传统美国经济的特征,是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快速增长。^[11]大规模生产体系,得益于大量廉价自然资源、规模效应、市场力量从农业转移到制造业以充分利用生产率的过程,以及一个产业部门的改进(比如降低钢铁成本)导致其他部门的进步(比如汽车业的更高销量和更大的规模效应)的过程。在这个体系中,大量的蓝领工作岗位,可提供给几乎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工人。而今,绝大多数可提供给教育和经验极为有限的工人的新岗位,都在雇佣相对较多女性的服务部门。^[12]有项研究发现,1980年

代,美国创造了每千就业年龄人口 27 个职员、销售和服务岗位。^[13]同一时期,这个国家失去了每千就业年龄人口 16 个生产、运输和劳工岗位。另外一项由社会科学家罗伯特·勒曼(Robert Lerman)和马丁·赖因(Martin Rein)完成的研究表明,从 1989 至 1993 年间,包括经济衰退时期,社会服务业(健康、教育和福利)增加了差不多 300 万个岗位,而其他所有行业失去了 140 万个岗位。社会服务中扩大的就业市场,抵消了其他行业中跟经济不景气有关的失业。^[14]

教育程度较低的男性流向经济增长部门的速度,已经大为减缓。例如,“那一小部分进入实习护士或行政工作之类所谓粉领岗位的人,仍然可以忽略不计”。^[15]女性在扩张的社会服务部门的大量集中,部分可以说明工作岗位增长中显著的性别差异。^[16]不像教育程度低的男性,教育程度低的女性跟以前相比,现在不是工作得更少,而是更多。教育程度低的女性的就业模式,就像那些受到很高程度教育和培训的人一样,反映了社会服务业的迅猛发展。在 1989 至 1993 年间,女性拥有的工作岗位增加了 130 万,而男性拥有的几乎没有上升(大概 10 万)。^[17]

虽然在 1970 年代,低技能女性(受教育程度少于 12 年)的工资增长缓慢,但在 1980 年代则停止增长,而且继续低于低技能的男性。^[18]低技能的男性与女性之间工资差异的缩小,不是因为女性工人的工作涨了,而主要是因为男性的实际工资降了。^[19]低技能女性的失业率稍微低于低技能男性,但过去十年间,她们的劳动参与率停滞不前,进一步落后于受到更高教育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后者在持续上升。低技能男性和女性的失业率,是受过大学教育者的 5 倍。^[20]

在造成低技能工人与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之间就业和工资日益增长的差异的诸种因素中,首当其冲的是美国经济的日趋国际化。正如经济学家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B.Freeman)和劳伦斯·卡茨(Lawrence F.Katz)所指出的:

在 1980 年代,贸易失衡毫无疑问起到扩大全国受教育程度

少的工人的供给，特别是高中以下学历的人。同以往相比，许多生产和常规性的事务更容易转移到海外进行。从贸易赤字中形成的受教育程度少的工人的供给增加，导致大学毕业和中学毕业的工资差异从1970年代到1980年代中期增加了15%。相比之下，一种均衡的国际贸易扩张，也就是出口增长与进口增长不相上下，对于相对的劳动力需求似乎具有相当中性的效应。事实上，贸易的均衡增长，会为没有大专学历的工人带来工作岗位的提升，因为出口部门的工作岗位往往要比进口竞争的工作岗位为“相似可比的”工人提供更高的工资。^[21]

伴随着大规模生产体系的衰落而来的工会加入率的降低，也影响到技能较差工人的工资和非工资性补偿的缩水。正如经济学家丽贝卡·布兰克(Rebecca Blank)所指出的：“加入工会的工人通常不仅得到更高的工资，而且也有更多的非工资福利。随着不熟练工人可能获得的加入工会的工资岗位的减少，非工资福利也减少了。”^[22]

最后，熟练工人和不熟练工人之间工资和就业的差异在不断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在新的全球经济中，教育和培训被认为比以前要重要得多。同时，技术革新产生了新的工作岗位，它们淘汰了许多其他岗位。^[23]从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到信息高速公路之类的技术革新，使工作场所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当受过良好训练的工人从技术变革——涉及基于电脑的技术和微机的日益广泛使用——的步伐中获益时，更多的一般工人，则面临着某些行业中日益增大的裁员威胁。例如，技艺精湛的设计师、工程师和操作员，随着电脑运作的新型机床的发明，就成为急需人才；而这些同样令人激动的新机会，却淘汰了那些只会手工操作的装配线工人的岗位。还有，在某些行业，文字处理技术的进步加大了对那些不仅会打字而且也会操作特定软件的人的需求；同时，这些进步减少了对一般打字员和秘书的需求。在新的全球经济

中，凡受过高等教育和系统训练的人，无论男女，都有需求。这最戏剧性地体现在男性就业经验的强烈反差中。跟受教育程度低的男性不一样，受过大学教育的男性现在工作得更多，而不是更少。^[24]

需求上的变化，对于那些低技能的工人尤其具有灾难性影响，他们即便被吸纳进主流经济，也是边缘的或者新近的。即便在国民经济体系结构调整之前，低技能的非裔美国人也是排在就业行列的末端。^[25]因为他们往往居住在高失业率和低就业增长的社区，而且也没有渠道进入更高就业和就业增长的地区，他们的经济处境又被进一步弱化。此外，正如我们将要在第五章看到的，他们远比其他民族和种族的群体更有可能面临消极的雇主态度。

在对低技能非裔工人产生不利影响的经济变迁中，或许最重要的是发生在制造部门的变迁。一项研究表明，在1970年代，“教育程度较低的黑人的大幅就业下降(数据)中的一半，可用从制造业向其他部门的产业转移来解释”。^[26]另外一项研究显示，自1960年代，“去工业化”和“工作机会的减少，特别是中西部和东北部，……要为‘真正的穷人’阶层的增长负责”。^[27]在某些北部城市，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流失向来惊人。^[28]从1967至1987年，费城失去了64%的制造业岗位，芝加哥失去了60%，纽约市58%，底特律51%。就绝对数字来说，这些百分数代表了费城16万人，芝加哥32.6万人，纽约52万人和底特律10.8万人。

30

另有一项研究，通过关注一般蓝领就业的类型和性质的改变，来调查经济结构调整在1980年代的影响。^[29]根据工作性质(通过收入、福利、工会保护和非自愿的非全日制就业来衡量)，将岗位分为一系列相对同质的类型。研究者们发现，黑人不熟练工人，无论是相对收入还是就业率，都比较低，原因有二：提供最低生活工资的传统岗位(高工资的蓝领工人集群，渐近50%是制造业岗位)减少，他们不得不越来越依赖的第二份工作的质量下降，导致劳动力市场中其他工人的相对收入降低了。当就业前景恶化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低技能黑人工人退出了

合法的劳动力市场。

来自“芝加哥城市贫困与家庭生活调查”的数据显示，离开学校的内城区黑人男性，在试图获得他们父辈就业的蓝领工作岗位时，因产业结构调整而阻力重重。“19到28岁的回答者所报告的最常见职业，从最大年龄组的操作工和装配工岗位，变为最小年龄组的服务岗位（侍者和守卫）。”^[30]在1974年，出生于1950至1955年间的芝加哥内城区就业的黑人父亲（15岁及以上、没有本科文凭），其中57%工作在制造业和建筑业。^[31]到1987年，这个群体中在工业部门就业的下降到31%。那些出生于1956至1960年的人，直到1978年还有52%在工业部门工作。但到1987年，这个群体在工业部门就业的降至28%。在内城区，没有其他族群的男性在制造业就业中经历过这种总体性的急剧下降（参见附录C）。这些就业改变，伴随着芝加哥市传统制造业和其他蓝领岗位的丧失。结果，年轻的黑人男性，为了就业，只好越来越多地转向低薪的服务部门和无需技能的劳动岗位，要么只好失业。美国人所坚持的文化和经济信念，即儿子在劳动力市场至少要跟父亲做得一样好，并不适用于内城区的许多年轻男性。

31 如果说产业结构调整伤害了芝加哥内城区黑人工人，它对全国的非裔美国人则产生了严重后果。“直到1968—1970年间”，约翰·卡萨达（John Kasarda）说：“所有在都市地区工作的黑人，超过70%的是在蓝领工作岗位，而同时，所有都市地区的工人中，超过50%的拥有白领岗位。此外，在1960年代后期，被归入蓝领工人的大量都市黑人中，超过一半就业于从事商品生产的行业。”^[32]

在1973至1987年间，就业于制造业的20到29岁黑人男性的数量急剧下降（从八分之三到五分之一）。同时，就业于零售业和服务业岗位的年轻黑人男性在上述期间则迅速上升（分别从17%到差不过27%和从10%到接近21%）。而这一就业机会的转移，并非没有经济后果：在1987年，就业于零售业和服务业的20到29岁男性的平均年收入，要比就业于制造部门的男性少25%到30%。收入潜力的这种重大损失，影

响到任何就业于服务部门的男性，无论肤色如何。〔33〕

工业工作机会分布的结构性转移，并非年轻黑人男性工人中失业增加和收入减少的唯一原因。事实上，公司和产业内部的职业人员配置模式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包括制造业在内。此类变化主要有利于受到更多正式教育的人。大量新的专业、技术和管理职位被创造出来。但是，此类职位至少需要若干年的高等教育。年轻的中学辍学者，甚至高中毕业生，“面临着逐渐减少的职业岗位的供给，而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他们有机会由此获得实际收入”。〔34〕

在某些都市地区，受教育程度低的工人的就业前景，变得极为黯淡。约翰·卡萨达分析了所选择的城市中心的就业变化，发现北部主要城市在雇员教育程度平均较低的行业出现了持续的就业减少，而在工人具有较高教育程度的行业则有持续的就业增加。〔35〕例如，纽约市在32
整个1980年代期间，在就业者平均少于12年教育的行业失去了13.5万个工作岗位，而在就业者具有13年或以上教育程度的行业则增加了差不过30万个工作岗位。费城在较低教育程度的行业失去了5.5万个工作岗位，增加了4万个要求工人高中以后至少念过几年大学的岗位。巴尔的摩和波士顿，也经历了类似的雇佣较低教育程度工人的行业工作岗位大量减少、雇佣教育程度较高工人的行业岗位大量增多的情况。

卡萨达的研究，也证明了在9个“经济转型”的北部城市和洛杉矶，教育的重要性与日俱增。〔36〕1980年到1990年间，所有9个北部城市，传统上由中学辍学者拥有的工作岗位全都减少，而由大学毕业生拥有的工作岗位则增加了。〔37〕“在洛杉矶，由大学毕业生拥有的城区工作岗位增加了50%，由未完成中学教育的人所占有的工作岗位也增加了15%。后者无疑是因为西班牙裔和其他少数民族工人的大量移民”，他们通常受教育程度较低。〔38〕

在一定程度上，上述变化反映了都市劳动力中教育获得的整体改善。不过，它们“还比不上同时发生的城市中有固定工作者的教育程度的提高”。〔39〕此外，每个城市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作岗位的增

多，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郊区通勤者的教育地位，而“中学以下”的工作岗位的减少，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城市居住者的工作流失，他们中极少有人想在中学以后再去读上四年大学。

正如上文指出的，适合于受过有限训练和教育的工人的新增岗位，大都在服务部门，而且主要是由女性占据。这在社会服务业尤为如此，包括健康产业、教育和福利部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中心城区，适合教育程度较低工人的工作岗位数量急剧减少。不过，由于社会服务部门的扩展带来的工作岗位，许多工人得以维持生存，特别是中学以下教育程度的黑人女性。据罗伯特·勒曼(Robert Lerman)和马丁·赖因(Martin Rein)报告，在所有女性工人中，1979至1993年间，就业于社会服务部门的比例有所提高(从28%到33%)。^[40] 健康和教育产业几乎吸纳了所有新增比例。1993年，5400万女性工人中，差不多三分之一就业于社会服务部门。社会服务往往以更高教育程度的劳动力为特征。1993年，社会服务部门所雇佣的女性工人中，仅有20%的具有高中以下学历(这一数字对于可比较的男性工人来说更低。1993年，教育程度较低的就业男性中，仅有4%是在社会服务岗位)。不过，自1989年以来，社会服务部门中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工人的比例显著提升。^[41]

事实上，尽管社会服务工人的教育水平相对较高，勒曼和赖因的研究表明，1993年，中心城市教育程度较低的就业黑人女性中，37%是在社会服务部门工作，主要是医院、小学、护理和保育的岗位。^[42] 在最大都市区的中心城市，社会服务部门中教育程度较低的非裔女性工人的比例，从1970年的30.5%急剧增加到1993年的40.5%。就教育程度较低的中心城市工人的岗位总体下降而言，社会服务产业中的就业机会，防止了许多内城区工人加入不断增加的失业者行列。教育程度较低的黑人女性工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服务部门的就业。甚至，还有极小部分教育程度较差的黑人男性，可在社会服务业找到工作。尽管1993年在教育程度较低的男性就业者中，仅有4%在社会服

务业工作，但在大都市地区的中心城市中，12%的教育程度较低的就业黑人男性拥有社会服务岗位。^[43]如果没有社会服务就业的增加，内城区失业的比例还将超出它们本已史无前例的水平了。

多种产业和职业的劳动力市场需求，转向了教育程度较高的工人。职业和产业结构的变动，与处在劣势的都市工人的失去工作的比率上升(失业和“退出”或不参与从劳动力市场)和相对工资的降低联系在一起。^[44]

导致处在劣势的工人的经济地位相对降低的因素，并不能单纯归咎于需求方面的问题，比如经济结构调整。1980年代工资差异的扩大也是受到两个供给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即大学毕业生相对供给的下降和贫困移民的大量涌入。“在197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相对供给增长迅速，这是因为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在1960年代晚期和1970年代早期上了大学，当时大学文凭的回报很好，而且也害怕被征募去参加越战，”弗里曼和卡茨写道，“这种供给的增长超过了对教育程度较高工人的需求的增长，结果大学的回报减少。”^[45]在1980年代，大学的回报又开始升高，因为大学毕业生相对供给的增长减缓。

34

也是在1980年代，大量受到极少正规教育的移民从发展中国家来到美国，影响到教育程度较差的本地工人的工资，特别是中学辍学者。^[46]根据一项估算，男性中学辍学者相对其他工人在1980年代收入降低中的接近三分之一，可能与移民有关。^[47]不过，尽管移民的增多导致了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但这也只是压低低技能工人工资的诸多因素中的一个。正如谢尔登·丹齐格(Sheldon Danziger)和彼得·戈特沙尔克(Peter Gottschalk)就这个方面所指出的，“移民大量集中在少数几个州，比如加利福尼亚州和佛罗里达州……在这些州，不平等确实增加了，但不平等在绝大部分地区都增加了，即便是那些移民很少的地区”。^[48]

失业和工作降低也攸关于近期聚居区贫困的增长。聚居区贫困最急剧的增长发生在1970至1980年间，而且基本上局限在东北部和中西

部的大工业都市区，这些地区在这个十年期间经历了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 and 蓝领工作岗位的流失。^[49]但聚居区贫困的增长并非唯一的问题。产业结构调整对这些地区众多的内城区居民点的社会组织，也有毁灭性的影响。芝加哥西区北郎代尔黑人社区的命运，生动地说明了席卷芝加哥内城区的经济和社会紊乱的累积过程。

35 在经历了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持续衰退之后，北郎代尔就像一片交战地带。自1960年以来，渐近一半的住宅消失了，剩下的单元，差不多要么破败，要么荒废。在其美好时光，两家大工厂稳定这个西区居民点的经济——雇用了超过4.3万人的西部电气公司的霍桑工厂，以及一家拥有1.4万工人的国际收割机械公司的工厂。西尔斯罗巴克公司的世界总部亦设立于此，另外提供了1万个工作岗位。这个居民点还有一家哥本哈根灯花厂、一家杉客制衣厂、一家真力时工厂、一个戴尔农产品市场、一家奥尔登样品商店和一家美国邮局服务站。但情况迅速改变。国际收割机械公司在1960年代晚期将工厂关门；西尔斯在1973年将绝大部分办公机构迁到芝加哥市中心的卢普区；雇用了3千名工人的样品配送中心原先还留在此地，但1987年迁移出了伊利诺伊州。霍桑工厂逐步缩减业务，最终在1984年关闭。

大工厂的离去，导致了小商店、银行和其他生意——它们依赖于大工厂支付的工资——的没落或退出。“让事情更为糟糕的是，紧接着1968年马丁·路德·金博士被暗杀之后席卷整个芝加哥西区的骚乱，许多商店在保险公司的胁迫之下，要么关门大吉，要么迁移出去。其他的干脆被烧掉或被抛弃。据估计，仅从1960年到1970年，这个社区丧失了75%的商业机构。”^[50]1986年，拥有超过6.6万人的北郎代尔区，只有一家银行和一家超市。但它还有48家州彩票代理点，55家货币兑换处和99家有执照的酒类商店和酒吧。

产业结构调整对内城区就业的冲击，在都市黑人身上体现得非常清楚。UPFLS调查中提出了下述问题：“在过去的五年或十年里，你有多少朋友因他们工作的地方关闭而失去了他们的工作？你的回答是：没

有，很少，有些或者绝大多数。”在我们的样本中，仅有26%的黑人居民回答说没有朋友因为他们的工作场所关闭而失去工作。事实上，黑人，无论男女，要比我们研究中的墨西哥人或其他族群更有可能回答说他们的朋友因为工厂关闭而失去工作。此外，UPFLS调查中，接近一半的就业的黑人父亲和母亲，声称因为工厂关闭，他们面临着失去工作的高风险。西班牙裔和白人父母有这种感觉的，明显要少得多。^[51]

有些内城区居民点要比其他居民点经历更为明显的失业。但内城区的居民非常强烈地意识到工作机会的迅速减少。一位33岁的未婚黑人男性，来自北郎代尔，从事着一份办公室文员的工作，如是说道：“因为经济结构调整，我们正在失去更多的工作。芝加哥是成千成千地失去工作。这里不再有什么新开办的公司，现在要找一份工作，可比几年前难多了。”

36

一位也是来自北郎代尔的41岁黑人女性，从事护士助理工作，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芝加哥真的是人满为患。所有人都不能找到一份好工作。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好岗位提供给所有的人。我不认为他们有足够的就业岗位……所有的工厂和地方，它们都关门了，迁出这个城市了，诸如此类，你知道的。我猜这就是现在没有那么多好岗位的原因之一，因为现在许多工作、工厂和业务，它们都迁移出去了。这样一来，就人多岗位少了。

来自其他居民点的回答者，也提到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冲击。根据南区一位33岁的保安所说：

机器正让很多人失去工作。我为《时代》杂志工作了七年，负责高速阴极射线印刷机，后来他们使用了阿贝迪克印刷机（Abedic printer），这花了他们50万美元：它们只用一半的时间

就完成了我们所做的事情，淘汰了两个班组。

“过去工作岗位很多啊”，一位 29 岁的失业黑人男性说，他生活在南区最贫穷的居民点之一，

你只要走出家门，就能找到一份工作。也许不是特别合你的意，但你能找到一份活儿。现在，你什么也找不到了。这个居民点，很多人都想工作，但他们找不到啊。也有，但很少很少，他们就是不想工作。绝大多数人想要工作，但他们找不到工作！

最后，一位 41 岁的医院工人，来自南区另外一个衰落的居民点，将就业机会的减少同技能水平的降低联系起来：

37

是啊，大多数工作岗位都迁出了芝加哥。工厂的岗位迁出了，这里没有什么岗位了。不像二三十年前啦。而且，人们也没有足够的技能来胜任现在这里的岗位。就是没有技能足够好和受过足够教育的人来填充这些职位啊。

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而来的，是就业的日益郊区化，而这进一步恶化了内城区失业和工作机会有限的问题。“都市地区占据了全国就业增长中的将近 90%；增长中的大部分，发生在大都市边缘地带急速发展的‘边缘城市’（edge cities）。到 1990 年，这些‘边缘城市’中许多已经拥有比大都市中心商业区更多的办公空间和零售商业。”^[52]在过去二十年中，芝加哥大都市区新增工作的 60%，位于库克县和杜佩琪县的西北郊。在这些地区，非裔美国人所占人口比例不足 2%。^[53]

在《真正的穷人》中，我坚持认为，上述诸种变迁对于众多都市黑

人的后果之一，就是就业的郊区位置与少数民族在内城区居住之间的错配。^[54]虽然基于1970年之前所收集数据的研究显示，这种空间错配的后果，对黑人就业并无一致的或令人信服的影响，但自那时起，内城区黑人的就业相较于郊区黑人发生了明显恶化。^[55]近期主要是由都市和劳动经济学家完成的研究，则强有力地表明，就业的非中心化仍在持续，制造业中的就业，其中绝大部分已经郊区化，在内城区已经降低，特别是在东北部和中西部。^[56]正如一位经济和统计顾问法雷尔·布洛克(Farrell Bloch)所指出的，“不仅是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数字减少了，而且新工厂现在也倾向于坐落在郊区，以利用廉价的土地、接近高速公路和低犯罪率的优势。此外，商业企业避开都市位置，可以避免从不同业主手上购买土地、支付高昂代价拆除旧建筑以及为雇员和客户安排停车场所”。^[57]

根据人均工作岗位的比率和上下班的平均路途时间来衡量，生活在中心城市的黑人要比中心城市的白人，更少机会就业。还有，不像其他绝大多数跨越城区和郊区分野的工人群体，教育程度较低的中心城市黑人，要比具有类似教育水平的郊区黑人，获得更低的工作。中心城市黑人收入的降低，跟大都市地区的就业非中心化——即工作岗位从城市迁移到郊区——有关。

38

然而，城市黑人和郊区黑人之间的就业差异，主要是因为工作地点变化的结果吗？还有可能是这样，即近年来黑人向郊区的移民，要比早些年来得更有选择性，以至于归结于工作地点的变化，实际上是由这种选择性移民导致的。^[58]1970年代黑人向郊区移民的模式，类似于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白人模式，也就是说，主要集中在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城市居民。不过，在1970年代，这对黑人来说尤为如此，于是就造成了这种情况，即城市黑人与郊区黑人之间的教育和收入差距似乎在扩大，而与此同时，城市白人和郊区白人之间的差距似乎在缩小。相应的，如果考虑到教育、家庭背景之类的差异，城市和郊区之间的就业差距又能剩下多少呢？

这个问题在芝加哥高特罗计划(Gautreaux Program)中的一项研究里得到了回应。^[59]高特罗计划是根据1976年的一项法庭命令创立的，而这项命令的出台，是因为法庭发现芝加哥公共住房计划中普遍存在着歧视。高特罗计划将来自公共住房的超过4000名居民，重新安置到遍布大芝加哥区居民点里得到补贴的住房之中。这项计划的设计，让研究者们——詹姆斯·罗森鲍姆(James E. Rosenbaum)和苏珊·波普金(Susan J. Popkin)——可以系统地比较两组人的就业经验，一组是被分配到郊区私人公寓的低收入黑人，另外一个控制组则是具有类似特征和历史的但被分配到城市私人公寓的黑人。他们的发现，支持了空间错配假说。在考虑到回答者的个人特征(包括家庭背景、家庭环境、人力资本水平、动机、回答者首次加入特高罗计划以来的时间长度)之后，罗森鲍姆和波普金发现，那些移居到郊区公寓的人，要比安置在城市的人，明显更有可能在移居之后找到一份工作。当被问到在郊区何以更容易获得就业时，几乎所有的郊区回答者都提到有更多的工作岗位。

39

在UPFLS中被调查到的非裔美国人，清楚地认识到工作岗位的空间错配。无论是黑人男性还是黑人女性，都认为在城市之外会有更好的工作前景。例如，仅有三分之一的来自贫困率至少30%的地区黑人父亲，报告说他们最好的就业机会可以在城市里找到。而生活在类似居民点的接近三分之二的白人和波多黎各人以及超过一半的墨西哥人，会有同样的感受。对于UPFLS调查中的失业个体来说，得到一份郊区工作尤为困难，因为仅有28%的人使用汽车。这一比例在那些生活于聚居区的人中间，更是降到了18%。

在拥有两部汽车的中产阶级和富裕家庭中间，通勤已被接受为一种生活现实。但这都发生在如下情境之中：孩子有安全的学校环境，更多可进入的日托机构以及更高的收入，以支持流动的离家的生活方式。在一种多层体系的工作市场中，参与其中需要相当的资源，而绝大多数内城区少数民族必须依赖公共交通系统，但公共交通鲜能快捷抵达郊区

位置。一位 32 岁失业的南区福利母亲如是描述了这个问题：

没有足够的工作岗位啊。我想芝加哥是唯一的内部没有很多机会的城市。没有足够的工厂，没有足够的工作。几乎所有好的工作都在郊区。有时，对于生活在城里的人来说，到郊区去还是挺难的事儿，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车啊，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开车啊。

一位 29 岁失业的南区黑人父亲，在评论了他所生活的地区缺少工作岗位之后，继续说道：

你必须到郊区去，但我到不了那儿呀。是有汽车可以到达那儿，但你不会想搭乘汽车去的，因为一趟就要两个小时啊。如果你必须八点到岗，那就意味着你不得不六点就出发赶去上班，这也就意味着你得五点起床去赶八点的班。如果是大冬天的，你想多麻烦啊！

另外一位失业的南区黑人男性这样说：“绝大多数情况下……地方 40 太远，你需要有交通工具，而我现在没有啊。如果我有话，很有可能就能够找到一份活儿了。如果我有辆汽车，就能到郊区去，因为在城里根本就没有工作。”这一感知，得到了一位 18 岁失业的西区黑人男性的呼应：

最有可能雇人的地方在郊区。最近，我想大概两年之前，我找到过一份工作，但他们说我需要交通工具，而且他们说郊区的公交只在特定的时段才有。结果，我只好放弃了这份工作，因为我没有交通工具啊。

一位来自西区的有两个小孩的失业未婚福利母亲说：

嗯，我要告诉你，绝不多数工作，绝大多数工作是在郊区。好工作，好事儿，都在那里呢，但你必须有交通工具抵达那里啊，到郊区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些人根本不知道郊区在哪儿，有些人在那里就迷路了。这真的很难，但也有人在努力着。

一位来自西区的工人，在一家工厂上夜班，如是描述了这种情况：

从我来说，我想，你知道，很难在中心城市找到一份好工作，因为许多人，你知道，都在往外迁，往西到郊区，甚至到其他州……有些人不得不回绝工作，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到那里去啊……我也看到有人去工作了——他们似乎是那种习以为常的人了——他们从城市赶来，一路赶到郊区，你知道，你能看到他们成群结队地簇拥着，从这趟公交去赶下一趟公交。他们已经习惯这样匆忙赶路了。

但这个问题，并不简单地是一个交通和通勤时间长度的问题。还有交通成本的问题，即从挣得的收入来看，长途跋涉到郊区实际上是否值得的问题——毕竟，拥有一辆汽车的开销远超过购买价格，包括保险，对于城市居住者来说，保险的费用要多于郊区开车人。“如果你在郊区工作，就必须有一辆车，”一位生活在芝加哥西区有三个孩子的未婚福利母亲说，“然后你必须购买汽油。你到郊区工作，要花更多的钱，比你挣的还要多，所以，你哪儿也去不了。”

事实上，一位36岁的来自芝加哥西区的失业黑人男性，就是因为交通问题而放弃了郊区的工作。“到内珀维尔(Naperville)去工作，花费太多了，交通啊加上其他所有开销，就不值当了。……为了去工作，

我所花的钱超过了我从工作中挣得的钱。”

交通问题，如果说给那些不得不从中心城市通勤到郊区工作的带来了一个难题，也阻碍了贫困聚居区的居民哪怕是到郊区寻找就业机会。例如，一位生活在南区的失业男性，刚刚到奥黑尔机场去找工作，结果没有运气。他抱怨道：“昨天我花的钱，我本来可以不花的，可以不花的。因为，你知道，我不得不花掉七块钱左右。我本来可以不花的。”

最后，除了忍受找工作和上班的开销外，内城区黑人工人在进入城郊社区时，经常也面临着种族骚扰的问题。一位38岁的来自南区的有两个孩子的离异母亲，在一家宾馆当收银员，描述了她儿子及其同事在一个芝加哥郊区的遭遇：

我儿子他们，在卡罗尔溪(Carol Stream)——那个社区全是白人——工作，他们已被警察拦下过两次或三次，问他们为何到这个社区来。其实他们正在去上班。他们希望所有人都待在他们自己的地方。这就是社会想要的状态。他们只不过是遵循这个原则以确保如此。因为这是一个全白人的居民点。但在黑人居民点没有工作啊。他们必须走出去找到一份活儿呀。

上述有关前往郊区工作的困难和代价的非正式观察，与近期一项劳动经济学家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这项研究是由哈里·霍尔泽(Harry J. Holzer)、基斯·伊兰德菲特(Keith R. Ihlandfeldt)和戴维·肖奎斯特(David L. Sjoquist)完成的，他们除了发现内城区黑人因为缺乏汽车而明显导致他们的低工资和低就业率之外，还报告说非裔美国人“要比白人花费更多的时间赶去上班”，“对黑人来说，每公里行程的时间成本更高”，结果就是黑人的工作所得相对较少。^[60]总体而言，他们的发现表明，相较于内城区黑人在郊区的低技能工作岗位上的实际收入，花费在通勤上的大量时间和金钱，阻碍了穷人远离他们的居住地去寻求就

业。霍尔泽及其同事认为，对于黑人来说，在评估自身在工作市场上的地位的时候，拒绝这种远程搜寻和旅行的选择是理性的。

产业和职业结构的变化，包括工作岗位从都市中心向郊区走廊的转移，代表着加剧内城区黑人失业的外部因素。但内城区本身重大的社会和人口变迁，也与居民点的高失业率有关，我们下面就来讨论它们。

内城区成年人失业比例的攀升，也与此类居民点的阶级、种族和年龄构成的变化有关，这些变化导致贫困更为集中。集中贫困与失业是正相关的，也就是说，当前者出现的时候，后者也会接踵而至。正如上文所言，如今的穷人要比以前更有可能失业或者退出劳动力大军。在《真正的穷人》中，我认为除了失业的影响之外，内城区也由于多种原因而经历了贫困的日益集中。^[61] 这些原因包括：(1)非贫困黑人家庭的迁出；(2)非贫困的白人和其他非黑人家庭的大量离去；(3)变得贫困同时又继续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居民人数的上升。有关集中贫困的增长的其他研究还提示了另外一个因素：贫困人口迁入一个居民点。还有一个因素应当加入到这个混合体：社区年龄结构的变化。

43 我相信，在解释非贫困个体和家庭的比例减少时，任何一个因素重要与否，取决于这个居民点在特定时点的贫困水平和种族构成。正如在《真正的穷人》中所指出的一个例证，1970到1980年间芝加哥经历了最大量的白人外迁的社区，在1980年具有中等程度的家庭贫困率（在20%到29%之间）。今天，此类社区中已有四个主要是黑人，其中仅有一个，即大渡口(Greater Grand Crossing)社区，是新的贫困区。跟1980年贫困率在20%左右的其他三个黑人社区不同，大渡口社区从1970到1990年基本上都是黑人。在1970年，大渡口社区中的成年人多数(61%)都有工作。相应地，这个居民点转化为新贫困区(1990年成年人中仅有44%在典型的一周就业)，不能同白人民居的外迁联系起来。

考虑到贫困与失业之间的紧密联系，大渡口社区成年失业比例的急

剧上升，应与两个因素有关：非贫困家庭的外迁，以及更为重要的，贫困家庭数量的增加，后者可能要归咎于迁入。从1970到1990年，大渡口社区人口尽管减少了29%（从54 414到38 644），但生活在贫困水平或以下的个体的数量，却增加了一半以上（从7 058到11 073）。

在1950到1960年间，大渡口社区经历了一场巨变，从94%的白人变为86%的黑人。因为到1960年仅有少数白人生活在这个居民点，也因为非裔美国人面临着更大的失业风险，大渡口社区变为新贫困区的机会也就增大了。换言之，即便白人外迁并未直接导致大渡口社区在1970至1990年间趋于衰败，1950年到1960年间白人移出居民点，已使这个社区无力应对1970年以后的经济变化。

在芝加哥其他14个新贫困区中，5个——包括位于道格拉斯、格兰大道和华盛顿公园的3个布朗兹威尔居民点——自1950年以来就主要是黑人。因此，非裔美国人社区中的经济和人口变化，导致这些居民点变为新的贫困区。^[62]

其中一个重要的人口变化——这个变化对于失业率上升具有影响——是内城聚居区的年龄结构。让我们再来看看位于道格拉斯、格兰大道和华盛顿公园的3个布朗兹威尔居民点。如表2.1所示，从年龄分组来看，大致接近壮年劳动力（20—64）的人的比例，自1950年以来在3个居民点都出现了下降，而65岁及以上的比例则升高了。从1950到1990年，年龄在20岁及以上属于壮男范畴的成年人的比例，格兰大道社区下降了17%，道格拉斯社区下降了16%，华盛顿公园社区下降了12%。壮年阶段的成年人在人口中所占比例越小，可能就业的居民的比例也就越低。从1950到1990年间，5到19岁之间的居民的比例，在每个居民点都急剧增长，这意味着，青少年比例的增高，也导致失业率的上升。不过，如果我们考虑到下述事实，即在那些居民点男性就业于1950到1990年间下降了惊人的46%，那么，上述人口结构上的变化显然仅能说明此类地区成年人高失业率的一部分，尽管是值得注意的一部分。^[63]

44

45 表 2.1 道格拉斯、格兰大道、华盛顿公园三个社区的人口变化(1950—1990)

道格拉斯(DOUGLAS)					
	1990	1980	1970	1960	1950
总人口	30 652	35 700	41 276	52 325	78 745
%女性	58.3	57.6	55.1	52.2	52.3
%男性	41.7	42.4	44.9	47.8	47.7
%年龄 0—4	10.5	9.0	10.2	15.1	11.0
%年龄 5—19	24.5	26.2	33.3	29.9	21.7
%年龄 20—44	34.8	36.4	32.0	33.0	43.3
%年龄 45—64	15.6	16.5	16.8	15.9	18.7
%年龄 65+	14.7	11.9	7.7	6.1	5.3
格兰大道(GRAND BOULEVARD)					
	1990	1980	1970	1960	1950
总人口	35 897	58 741	80 150	80 036	114 557
%女性	55.9	54.4	53.8	52.3	52.7
%男性	44.1	45.6	46.2	47.7	47.3
%年龄 0—4	11.4	9.5	9.4	11.7	8.3
%年龄 5—19	30.0	31.5	36.4	21.3	16.8
%年龄 20—44	30.3	27.9	24.8	32.6	45.3
%年龄 45—64	14.0	17.5	18.4	25.0	24.0
%年龄 65+	14.3	13.6	11.0	9.4	5.6
华盛顿公园(WASHINGTON PARK)					
	1990	1980	1970	1960	1950
总人口	19 425	31 935	46 024	43 690	56 865
%女性	54.5	54.7	53.0	52.0	52.5
%男性	45.5	45.3	47.0	48.0	46.8
%年龄 0—4	11.8	9.9	9.0	9.7	7.2
%年龄 5—19	28.8	30.8	31.8	18.1	15.7
%年龄 20—44	33.7	28.5	28.5	34.9	47.0
%年龄 45—64	14.9	18.8	20.3	27.6	24.5
%年龄 65+	10.8	12.0	10.4	9.4	5.6

来源：1990年人口与住房统计资料，档案编号为 STF3A1，以及《芝加哥大都市区——地方社区统计资料》(Local Community Fact Book-Chicago Metropolitan Area)。

布朗兹威尔居民区失业成年人比例的上升，还伴随着不可思议的人口下降——三个居民点合计下降了66%——而这放大了新贫困居民点的问题。当人口下降，而失业的成年人比例上升，居民点的基本机构也

就更难维持：商店、银行、信用机构、餐馆、干洗店、加油站、医生之类就失去了固定的和潜在的顾客。教会的信徒在减少，资源在萎缩；娱乐设施、街道俱乐部、社区群体和其他非正式组织也日益萧条。而这些组织一旦衰落，居民点中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手段，也就渐趋弱化。结果就是犯罪和街头暴力增多，导致居民点的进一步恶化。

居民点恶化得越快，机构投资减少越多。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凡存在弃离状态严重的居民点，经常遭遇到“红线歧视”（也就是被认定为不应接受或推荐抵押贷款或保险的地区），而这就使住房市场陷入瘫痪，财产价值贬值，并诱发了进一步的房主抛弃现象。在1970年代，联邦和州有关社区再投资立法的颁布，抑制了公开的红线歧视做法。虽然如此，“谨慎的贷款人在放出抵押贷款时会加倍小心，特别是针对存在着业主缩减投资和先前抛弃的强烈信号的居民点”。^[64]

46

一旦居民点分崩离析，能够离开的人就会纷纷搬离，其中多是有工作的中产阶层家庭。而越来越低的人口密度，反过来又产生了其他问题。被抛弃的建筑增多了，它们经常成为贩毒吸毒和其他非法勾当的天堂，并给犯罪分子在社区中提供了立足处。密度的急剧下降，也使社区归属感难以维持或形成。人多势众的感觉，在这种居民点中是完全没有的。

虽然经济变迁(产业结构调整 and 重组)和内城聚居区的阶级、种族和人口构成的变化，是自1970年以来造成从制度聚居区向失业聚居区转变的重要因素，但我们不应忽视下述事实，即这一过程实际上紧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开始了。

联邦政府通过不给抵押资本、让城市地区的家庭难以保有或购买自己的住宅而导致了内城区早期的衰落。受到大萧条期间大量抵押贷款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刺激，联邦政府在1940年代开始为抵押贷款担保，以让市民能够成为房屋拥有者。但是，联邦房屋管理局以选择性的方式来执行抵押贷款计划，凡被认为存在风险的城市居民点都受到红

线歧视，这种做法，实质上排除了所有的黑人居民点以及许多住有相当数量欧洲移民的居民点。一直到1960年代，联邦房屋管理局方才中止了抵押贷款上的种族限制。

通过操纵市场诱因，联邦政府将中产阶级白人引向郊区，但事实上也将黑人困在了内城区。^[65]自1950年代始，中产阶级的郊区化还受到联邦交通和公路政策的推动，包括穿越许多城市中心的高速公路网的建设、为退伍军人提供抵押贷款、抵押贷款利息免税以及大量成片住宅的迅捷而廉价的生产。^[66]

47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城市往往以提供市政服务为诱因来吞并它们的郊区。但是，随着贫穷移民一个世纪的涌入，他们需要昂贵的服务，但在税收上的回报相对来说微不足道，于是在美国城市与郊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当郊区开始成功抵制合并之风，吞并基本上在20世纪中期就结束了。郊区的社区，也通过区划法(zoning laws)和歧视性土地利用控制及选址的操纵，让内城区少数民族难以渗透进来，从而扎紧了自己的边界。

作为单独的政治管辖范围，郊区可在它们的分区、土地使用政策、立约和使用限制权上行使更大的自主性。面对着1960年代不断上升的整合压力，“郊区选择了种族多样化而不是阶级多样化。它们保留了分区规划和其他限制，只允许富裕的黑人(有时犹太人)进来，从而强化了城区穷人的集中和孤立”。^[67]

其他政府政策，也直接和间接导致了失业聚居区的增多。许多黑人社区被城市更新和强制迁移连根拔起。1950年代建造穿越许多城市中心的高速公路网络，造成了最为急剧的变化，当时众多尚能维持的低收入社区遭到摧毁。这些网络不仅促成了从城市向郊区的迁移，“而且也在城市的不同部分之间建立屏障，把贫穷和少数民族的居民点同中心商业区阻隔开来。跟城市更新一样，高速公路和快速通道的建设也将众多穷人驱离他们的家园”。^[68]

联邦政府的住房政策也促成了向失业聚居区的渐变。事实上，由

于联邦政府未曾采取行动以坚决反对城市住房市场中对非裔美国人的广泛隔离，也默认了有组织的邻里群体反对在他们的社区中建设公共住房，结果导致了大量隔离性的住房项目。联邦政府的公共住房项目经历了两个政策阶段，代表了两种不同的风格。1937年的“瓦格纳住房法案”开启了第一阶段。由于考虑到公共房屋的建设可能压低私人房租水平，诸如美国建筑与贷款联盟、全国房地产协会之类的群体，成功游说了国会，以法律的形式要求：凡建成一个新的公共房屋单元，就要摧毁一个“不安全或不卫生”的公共房屋单元。正如马克·康登(Mark Condon)指出的，“这一政策增加了城市建筑市场的就业，保护了私人房租水平不受影响，但也阻止了现有住房存量向低收入家庭的扩展”。^[69]

48

实施公共房屋项目的早期，产生了积极的后果。最初，这个项目主要服务于因大萧条而暂时流离失所的完整家庭或者二战结束时需要住房的完整家庭。对于此类家庭中的许多而言，公共房屋是走向经济复苏的第一步。他们在其中居住的时间相对较短。这些家庭的经济流动“促成了首批公共房屋社区的社会稳定，也解释了这一项目的最初成功”。^[70]

1949年“住房法案”的通过，标志着第二个政策阶段的开始。它将旨在根除城市贫民窟的都市更新计划制度化了，并提供了资金。“公共住房现在意味着收容贫民窟居民，他们因城市更新推土机的到来而无家可归。”^[71]联邦公共住房管理局为公共住房居住权设定了一个新的低收入上限，凡是收入高于这个上限的家庭则依法收回房屋，因此将获得公共住房的机会限定在人口中经济上最为弱势的部分。

联邦住房政策的这一变化，与非裔美国人从南部农村向东北部和中西部城市大量移民的过程同时发生。因为较小的郊区社区拒绝允许建造公共住房，于是公共住房的单元绝大多数集中在人口拥挤和正趋恶化的内城聚居区——城市和都市地区中最为贫穷也是社会组织化程度最低的部分。“人数上增多但政治上弱小的城市穷人，没有能力抵制善于发声的中产和工薪阶层想要隔离性住房——即把黑人挡在白人居民点之

外——的愿望。”^[72]简言之，公共住房代表了一种受到联邦政府资助的体制，数十年来通过种族和阶级将不同家庭区别对待，从而导致近年来失业家庭在内城聚居区日益集中。^[73]

49 自1980年，也是联邦政府在基础城市项目支持上的一次重大改变，加重了新贫困居民点的失业和社会组织问题。^[74]倡导新联邦主义的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大幅减少直接资助城市的支出，包括一般收入分享、城市公共交通、公众服务工作和职业培训、补偿教育(compensatory education)^①、社会服务划区专项财政补贴、地区小型工程、经济发展资助和城市发展行动拨款。1980年，联邦政府对城市预算的贡献是18%，而到1990年，则下降到6.4%。此外，始于1989年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初期的东北部的经济不景气，急剧减少了城市本身产生的税收收入，因此导致了预算赤字，而这又进一步造成了基本服务和项目的削减以及地方税赋的升高。

对于许多城市而言，尤其是东部和中西部比较老的城市，新联邦主义与经济不景气的混合，导致了自大萧条时期以来最为糟糕的财政和服务危机。城市的服务变得日益不足，许多城市已经走到破产的边缘。因此，它们也就没有能力有效地应对自1980年以来出现或者变得突出的三种不健康的社会状况：(1)吸毒成瘾及其相连的暴力犯罪的盛行；(2)艾滋病的迅速传播以及逐步上升的公共卫生费用；(3)无家可归人口的大幅上升，不仅是个人，也有整个家庭。

虽然吸毒成瘾及其伴随的暴力犯罪，艾滋病及其对公共卫生资源的不利影响，还有无家可归现象，在许多美国社区都能发现，但它们对于聚居区的冲击却极为深刻。在这些社区中，居民都已被驱逐到社会的边缘，几乎没有什么资源可以用来抵御1980年代出现的这些社会疾病。财政上捉襟见肘的城市，只能眼睁睁无助地看着这些问题——新贫困、失业居民点中社会组织的衰落以及社会服务的削减又使这些问题

^① 旨在提高贫苦儿童教育水平的教育工作。——译者注

加剧和恶化——使整个城市成为一个危险的所在，变成生活的险境。相应的，工薪阶层和中产阶层继续移居郊区。因此，当失业及其伴随的社会问题在内城区居民点不断上升的时候，尤其是在那些代表了新贫困区域的地方，所在的城市却越来越缺少资源来减轻它们。

最后，决策者间接造成了失业聚居区的出现，因为他们的决策减少了薪水微薄岗位的吸引力和加速了低收入工人工资的相对下降。特别是，由于缺少有效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他们容忍破坏工人安全感的行业做法，比如减少福利，增加非自愿的非全日制就业以及他们“允许最低工资降至40年来在购买力上第二个最低的水平”。^[75]在根据通货膨胀调整之后，“最低工资要比1970年代的平均水平低了26%”。^[76]此外，他们基本上取消了对母亲至少半工半薪的家庭的子女资助。在1970年代初期，有两个孩子的就业母亲，如果工资达到贫困线水平的75%，在49个州可以领到对有子女家庭补助的福利，以作为对工资的补充；而到1995年，仅在3个州还可以。^[77]正如第八章将要讨论的，即便随着薪资所得税款抵扣（对就业穷人的一种工资补贴）的扩展，这种政策还是让贫穷的工人难以养家糊口和保护他们的孩子。工资和福利的减少，迫使内城区的许多低收入工人开始申请福利或者继续依赖福利。

注释：

[1] Topel(1993) and Juhn, Murphy, and Topel(1991).

[2] Juhn, Murphy, and Topel(1991).还可参见 Juhn, Murphy, and Pierce(1991 and 1993) and Topel(1993)。

[3] Juhn, Murphy, and Topel(1991).

[4] Blank(1994).

[5] Rose(1994) and Nasar(1994).

[6] Rose(1994).

[7] Nasar(1994).

[8] Rose(1994) and Nasar(1994).

[9] Rose(1994).

[10] Buron, Haveman, and O'Donnell(1994).

[11] Marshall(1994).还可参见 Rifkin(1995).

[12] Nasar(1994), Freeman(1994), and Holzer(1995).

[13] McKinsey & Co.(1994).

- [14] Lerman and Rein(forthcoming).
- [15] Nasar(1994).
- [16] Lerman and Rein(forthcoming).
- [17] Lerman and Rein(forthcoming).
- [18] Blank(1994).
- [19] Blank(1994).
- [20] Blank(1994).
- [21] Freeman and Katz(1994), p.46.
- [22] Blank(1994), p.17.
- [23] Marhsall(1994).
- [24] 在 1980 年代的十年中, 十个月至少工作八个月的人数比例, 从 1970 年代的 77% 上升到了 79%。参见 Rose(1994) and Nasar(1994)。
- [25] Lieberston(1980).
- [26] Bound and Holzer(1993), p.395.还可参见 Bound and Freeman(1992); Acs and Danziger(1993); 和 Johnson and Oliver(1992)有关制造业衰落对于黑人男性收入而不是就业状况的影响, 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有关研究指出, 跟对黑人就业状况的影响不同, 制造业衰落对于黑人收入的影响并不具有同样的消极作用。参见 Bartik(forthcoming) and Danziger and Gottschalk(1993)。
- [27] Bluestone, Stevenson, and Tilly(1991), p.25.
- [28] Kasarda(1995).
- [29] Gittleman and Howell(1993).
- [30] Testa and Krogh(1989), p.77.
- [31] 有关这些发现的讨论, 参见 Krogh(1993)。
- [32] Kasarda(1995), p.239.
- [33] Sum and Fogg(1990).
- [34] Sum and Fogg(1990), p.51.
- [35] Kasarda(1995).
- [36] Kasarda(1995).九个北部城市包括巴尔的摩、波士顿、芝加哥、克利夫兰、底特律、纽约、费城、圣路易斯、华盛顿特区。
- [37] 在 1980 到 1990 年之间, 中学毕业生从事的工作岗位在这九座城市中减少了 25%, 其中, 在底特律和圣路易斯两座城市减少了 50% 以上, 在克利夫兰和巴尔的摩两座城市减少了将近 50%。另一方面, 大学毕业生可从事的工作岗位则至少增加了 40%; 其中底特律和克利夫兰除外, 在这两个城市中, 相应的比例分别为 12% 和 33%。参见 Kasarda(1995)。
- [38] Kasarda(1995), pp.247, 250.
- [39] Kasarda(1995), p.250.
- [40] Lerman and Rein(forthcoming)。
- [41] 1989 年, 在社会服务部门就业的比例仅仅为 17%。参见 Lerman and Rein(forthcoming)。
- [42] Lerman and Rein(forthcoming)。
- [43] Lerman and Rein(forthcoming)。
- [44] 农业工人们的工资降低幅度也极为明显, 尽管有些群体比另一些群体的工资降低得更多。正如威廉·奥黑尔(William O'Hare)和安妮·波蒂(Anne Pauti)所指出的, “男人、黑人、兼职人员比女人、白人 or 全职人员的工资降得更多。青年农业工人在每个产业中的工资都降低了, 而在农、渔、矿等天然生产业、制造业、外贸产业中, 其收入降低幅度最大。除了新英格兰地区外, 全国其他地区都出现了青年农业工人的工资降低问题”(1990, p.5)。
- [45] Freeman and Katz(1994), p.47.
- [46] Freeman and Katz(1994)。
- [47] Freeman and Katz(1994), and Bojas, Freeman and Katz(1992)。
- [48] Danziger and Gottschalk(1995), p.133.还可参见 Topel(1994)。
- [49] Jargowsky and Bane(1991)。
- [50] Wacquant and Wilson(1989), pp.91—92.有关北朗代尔区所发生变化的描述, 是

以《芝加哥论坛报》(Tribune, 1986)的报道为基础的。

[51] 只有三分之一的西班牙裔就业父母、四分之一的白人父亲、五分之一的白人母亲觉得,他们是因为工厂关闭而失业的。

[52] Kasarda(1995), pp.215—216.

[53] Reardon(1991).

[54] 约翰·凯恩(John Kain)在他1968年的经典论文中首次提出了这一论点。参见Kain(1968)。

[55] Holzer(1991)有研究以更早的数据为基础,参见Ellwood(1986b)。

[56] Holzer(1991)还可参见Holzer, Ihlanfeldt, and Sjoquist(1994); Ihlanfeldt, Keith, and Sjoquist(1994); Ihlanfeldt, Keith, and Sjoquist(1991); Fernandez(1991); and Zax and Kain(1992)。

[57] Bloch(1994), p.124.

[58] Holzer(1991), Jencks and Mayer(1989b), Frey(1985), and Grier and Grier(1988)。

[59] Rosenbaum and Popkin(1991)。

[60] Ihlanfeldt, Keith, and Sjoquist(1994), pp.323, 343.

[61] 研究发现,非贫困家庭从内城聚居区迁走所造成的影响是多重的。参见附录A对该项研究的讨论。

[62] 相反,在其他的9个新的贫困社区中,白人人口却急剧减少;经历了1950年代白人人口的突然减少后,到1960年,有3个社区(比如大渡口社区)几乎已经全是黑人。同一时期,有一个社区从主要是黑人变为全部是黑人;1960年到1970年,有一个社区从全是白人变为全是黑人,有两个社区从主要是黑人变为全部是黑人;1970年到1980年,有一个社区从主要是白人变为全部是黑人。此外,1970年代以来,还有一个社区的黑人人口数虽然也有所减少,但是黑人仍然是多数,该社区在1950、1970、1990三个年份的黑人比例分别为59%、72%、67%。

[63] 在布朗兹威尔居民区,女性人口的比例有所增加,而男性比例则有所下降,且变化都较为稳定。表2.1的数据并未标出拥有孩子的母亲的比例,这些人口中的儿童比例并未发生任何明显变化。因此,很难确定这些性别差异对于就业率的降低是否具有真实的或直接的意义。

[64] Bach and West(1993), Sugrue(1993), and Kelley(1993)。

[65] Katz(1993)。

[66] Sampson and Wilson(1995)。

[67] Katz(1993), pp.461—462.有关美国郊区的历史,可参见Jackson(1985)。有关住房歧视对于生活状况、教育、城市少数民族裔的就业等方面的影响,可参见Yinger(1995)。

[68] Katz(1993), p.462.还可参见Baetelt(1993), Sugrue(1993), and Anderson(1964)。

[69] Condon(1991), pp.2—3.

[70] Condon(1991), p.3.

[71] Condon(1991), p.4.

[72] Condon(1991), p.4.

[73] Sampson and Wilson(1995).还可参见Sugrue(1993), Bartelt(1993), Kelly(1993), Hirsch(1983), and Bauman et al.(1991)。

[74] Caraley(1992)。

[75]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1995a), p.1.

[76]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1995b), p.3.

[77]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1995b)。

第三章

51 聚居区行为模式与机会结构

1990年，生活在大都市地区的聚居区中的人，八个里面有七个是少数民族成员，他们大都是非裔美国人。但这一数字中也包括了相当的西班牙裔美国人，不过，这并非是一个单一的社会经济群体，其中包含了新世界中所有说西班牙语的文化群体，相互之间千差万别。例如，墨西哥裔和波多黎各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就截然不同，后者基本上集中在纽约市，就贫困的集中程度而言，要比墨西哥裔更为接近非裔美国人。

如果单纯比较美国两个最大的少数民族群体，即非裔美国人和墨西哥裔，一些重要的居民点差异就变得清楚了。在“都市贫困和家庭生活研究”中，内城区墨西哥裔随机样本中的85%是第一代移民。不过，他们的居民点平均而言没有芝加哥内城区非裔美国人的居民点那么贫穷。在1980年，黑人中有21%、但所有墨西哥移民中仅7.9%生活在贫困率处在30%到39%的地段。^[1]五分之一的黑人——但仅有2%的墨西哥移民——生活在贫民窟。因此，在程度已到极度集中的贫困地区，内城区非裔美国人的数量远超比例，而内城区的墨西哥移民则大都生活在中等贫困的地区。更为重要的是，墨西哥移民在内城区的居民点，较之于非裔美国人居民点，失业水平要低而社会组织程度要高。

52 正如UPFLS民族志研究小组成员玛莎·范·赫茨玛指出的，“生活在芝加哥贫困地区的墨西哥移民，很可能是栖居于拥挤而破旧的建筑，但他们周围满是当地的小微企业，其中很多是带有墨西哥渊源的人拥有和

经营的。他们周围也不乏以墨西哥裔为目标的社会服务机构。同墨西哥移民相比，贫困地带的黑人要更加远离工作岗位和就业的邻居”。^[2]

正如我们在下文很快就会看到的，这些失业的黑人贫困地区，在他们日常生活的选择上面临着种种社会限制。这些限制，加之在社会上机会渺茫，导致了与聚居区相关的行为和态度——亦即，在聚居区居民点寻常可见的行为和态度，而这种行为和态度即便是在适度水平的贫困和就业程度的居民点也很罕见。与聚居区相关的行为和态度，经常强化了失业聚居区居民的经济边缘地位。

我选择“与聚居区有关”(ghetto-related)一词，以区别于“聚居区特有的”(ghetto-specific)，旨在强调以下观点：虽然以下将要表述和分析的行为，其中许多确实根源于内城聚居区特有的环境(比如，集中失业和贫困的极高比例)，但它们在一般社会中也相当普遍。换言之，这些行为并非聚居区特有的，正如“聚居区特有的”一词所意指的；但它们确实是在聚居区发生的频率更高。

如果居民点提供极少的合法就业机会、缺乏有效的就业信息网络、学校破旧，那么，势必导致工作的消失。^[3]也就是说，如果工作岗位稀少，如果人们极少有机会帮助他们的朋友和邻居找到工作，如果据称可以帮助年轻人最终加入劳动大军的学校生活乱七八糟，那么许多人最后就会失去在正式经济活动中的关联感，他们不复将工作视为他们生活中一种常规性的和调节性的力量。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也许会在一种缺少工作理念的环境中长大，不认为工作是成年生活的核心体验，因为他们很少有或者干脆没有什么劳动情怀。这种环境还增加了下述可能，即居民将依赖于非法的收入来源，而这又进一步弱化了他们同合法的劳动力市场的联系。

53

另一方面，许多内城聚居区居民，继续保持着跟正式劳动力市场的联系，大都就业于低薪的岗位，克服种种困难以维持着工作。^[4]尽管缺乏这个国家绝大多数就业人口所依赖的工作支持网络(合伙用车、非

正式的工作信息网络)、机构(好的学校和培训计划)和体系(保育和交通体系),他们仍然排除万难,稳定地工作。此外,交通成本、保育成本和其他与就业有关的开销,占到了他们本已微薄的收入中的相当部分。换言之,为了充分理解内城聚居区工人所面临的就业问题,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里既有一个独特的工作现实的问题(见第二章),也有一个工作文化的问题(见以下部分)。

相应地,本章中我们在研究聚居区居民对持续失业的适应和反应时,应当突出一点,即,在众多内城区居民点,工作的消失,是超出他们控制的一系列因素作用的结果。而在目前关于福利改革的公共政策争论中,有关行为和社会责任的讨论,太过经常地忽视了贫困和福利的结构基础。焦点大都聚集在个体和家庭的缺点上,而不是放在一般社会的结构变迁上。正是社会结构的变迁,让众多内城聚居区居民的生活陷入悲惨境地,或者久而久之导致他们产生特定的反应和行为模式。在下文我将讨论此类反应和行为模式,不是孤立地看待它们,而是联系到塑造和提供了此类行动之背景的各种限制和机会来考察它们。

第一章和第二章已经强调的几点,在此应当予以重申,以为本章随后的讨论做好准备。读者应当铭记于心的是,现在的失业境况,是从一系列的环境因素中演化而来。为理解聚居区中对长年累月的悲惨处境的特殊适应方式,这一点必须要搞清楚,并一再予以强调。内城聚居区并不总是受到低水平就业及其相关问题的困扰。在1950年代,就业率很高。人们贫穷,但他们还在工作。聚居区居民点也如今日一样受到高度隔离,但人们有工作。

众多内城聚居区工作的消失,在一定程度上跟全国范围内低技能工人的时运不济有关。新全球经济体系中的根本性结构变迁,包括工作岗位分布的变化和获得就业所需教育水平的变化,导致了低技能工人失业增加和实际工资降低的同时发生。大规模生产体系的衰落,低技能蓝领工作岗位的减少,以及在高增长产业中培训和教育的日益重要,都对低技能黑人工人的就业率和收入带来了不利影响,而许多低技能黑人

工人集中在内城聚居区。工作岗位的日益郊区化，也加剧了内城区贫困工人的就业痛苦。绝大多数聚居区居民买不起汽车，因此不得不依赖于公共交通系统，这就使得往来于内城区居民点和郊区工作地点之间变得困难而耗时。

读者也需铭记于心的是，内城区居民点的阶级、种族和人口构成方面的变化，也导致了继续生活于此的失业成年人比例的提高。非贫困家庭和就业的壮年成人的比例降低了。而今，失业与贫困之间的关联要强于以前。面对着日益增长和旷日持久的失业，非贫困家庭比例的降低和总体人口的急剧减少，使维持基本的居民点机构或者达到足够的社会组织水平，都变得难上加难。有工作的和中产阶级的黑人越来越少，这也使聚居区居民点丧失了关键的资源，包括结构性的资源（比如居民有收入来维持居民点服务）和文化性资源（比如居民点孩子的传统角色榜样）。因此，聚居区穷人经济上的边缘地位，受到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居民点状况的极大强化。

最后，应该关注如下一点。除了经济体系的变迁和内城聚居区居民点的阶级、种族和人口构成的变化之外，某些政府计划和政策，也在过去五十多年中，对失业聚居区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联邦住房管理局的早期行动，即拒绝给予内城区居民点抵押资本，操纵了市场诱因，从而将黑人困在了内城区，并诱使中产阶级白人迁往郊区；在内城区居民点大规模实行联邦住宅计划；以及自1980年起新联邦主义思路盛行，极力主张对社会问题作地方化反应，结果导致城市基础计划的大幅削减。就在失业居民点的社会断裂问题渐趋严重的时候，城市却越来越缺乏应对它们的资源。

55

鉴于目前政策争论中将责任和失败归咎于个人缺点的倾向（见第六章），当我们讨论内城聚居区对长年累月的困境的反应和适应——包括已然形成文化模式——时，读者诸君应将上述几点牢记于心。在本章和下一章中所要讨论的社会行动——包括行为、习惯、技能、风格、取向、态度，不应这样来分析，即与长期以来的一般性的机会和限制结构

无关。当然，这并不是说个体和群体缺乏作出自身选择、采取特定行动和形成特定风格与取向的自由，毋宁是说这些决策和行动发生在一个包含了种种限制和机会的背景之中，而其中的限制和机会，截然不同于中产阶级社会里的情形。

许多内城聚居区居民，清楚地看到了生活在一个高失业率和破败的居民点的社会和文化后果。一位17岁的黑人男性，兼职工作，正读大学，居住在西区一个聚居贫困居民点，如是说道：

好吧，基本上我感到，如果你在这样一个居民点长大，整天看到的都是消极的事情，那么你也会消极起来，因为你看不到任何积极的事情啊………伙伴们和黑人男性，在街头随处可以看到毒贩子，看他们开着豪车，挣着快钱，不免会思量：“嘿，如果我也去贩毒，我就能跟他一样了。”

在数周之后的访谈中，他继续说道：

56 你知道，我在想，那里的孩子，他们能看到什么呢？他们看到那些吸毒成瘾者，他们还能看到其他什么呢？噢，他们看到暴徒，你知道，他们看到流氓团伙。因此，他们日后会模仿谁呢？谁是他们的角色榜样？没有其他人，他们只有模仿流民恶棍。因此，你知道，他们最终会沦落为什么………他们（居民点的孩子们）打交道的唯一男性角色榜样，他们大部分时间所能看到的，无非是皮条客，毒贩子，他们能做啥呢？他们仿效这些人。这倒不是故意要如此，你知道，如果这种人是你周围唯一的男性角色，是你唯一能够亲密接触的，你会不由自主地希望成为这种人。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年轻的贩毒者的原因！

一位25岁的西区居民，两个孩子的父亲，打两份工以养家糊口，对某些内城区黑人男性也持有相似的观点：

他们试图找到捷径，哦，久而久之，可以说，就变得懒惰了。嗯，没有动力了，你知道，他们所置身其中的社会，真的不鼓励勤奋工作，或努力奋斗以实现自己的目标，比如接受教育之类的事情。他们目睹了周围的一切，你知道的，然后遵循同样的模式。社会说：“好，你可以卖毒品。你可以做这个。你可以做那个。”他们中间有些人，甚至愿意为自己可能做的事情在牢里待上几年……他们没有看到有人清晨很早起床，总是按时上班或上学。这帮人——他们周围的人都不那么做……因为这就是你选择的人群，是啊，这就是你的邻里呈现给你的一切。

一位居住在芝加哥南郊贫困地区的失业黑人男性，在描述孩子们在混乱的居民点如何染上毒品和酗酒时说道：

他们就是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之中，要么极度亢奋，要么萎靡不振。你知道我说的意思吗？如果你不是因为吸毒酗酒而极度亢奋……那么，你知道的，孩子们总得找到乐子，碰到什么算什么……我已经观察了好几代人了——我在这儿已经61年了！我注意观察孩子们，我看到他们的父亲毁掉了，我看到他们长大了又做同样的事情……这里的孩子们啊，他们没有任何娱乐方式，除了后院，街头，其他什么都没有……如果孩子们有点事情做，他们或许会好一点，但现在这个情况，周围的环境，注定要么成为酒鬼，要么成为吸毒成瘾者。

57

有些回答者，则将孩子们所面临的问题，同高失业率居民点有限的

机会结构联系起来。“这里机会太少啦：整个儿就没有工作！孩子们不去学校，你知道的，他们不接受什么教育，街上到处都是毒品。所以，你看，恶劣的环境，糟糕的交往”，一位40岁的母亲如此说道，她有六个孩子，生活在南区的一个聚居贫困区。

所以啊，你必须处在不同的环境中，你知道的，在那种环境下，孩子更愿意去上学，去接受教育，而不是像我们这里，辍学出来卖毒品，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朋友在街角挣钱呢：挣大钱呢，你知道，钱包都鼓鼓的。结果就是孩子们整天在这里转悠，都是十来岁的小孩在卖毒品啊！

根据一位来自南区37岁的失业黑人男性，这种情景对于男性的影响要不同于女性。他说：

有些孩子就是看上去根本不想学习，但是有些孩子，他们坚持学习。特别是女孩子，她们坚持学习。男孩子就不同了——他们看到的是街头生活。他们看到伙伴们在那儿挣大钱，开着炫车，戴着珠宝之类的东西，他们试图去效仿啊。你知道，这就是我们的问题。男孩子，他们特别容易受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辍学……他们看到自己的同辈人在这里逛荡，他们不想去学校了，他们要过这种生活。但他们选择了错误的生活。

58 近年以来，内城区居民点衰败的过程，已被清楚地同内城区毒品业的增长联系起来。内城区居民中合法就业机会的减少，增加了贩卖毒品的诱因。当被问到在芝加哥最好的出人头地的方法时，一位29岁的未婚的厨师兼洗碗工——来自一个仅有四分之一成人就业的贫困黑人聚居区——在1990年如此说道：“我恨我这样说，但在我看来就是贩卖毒

品，因为这些家伙就凭这个挣钱。这是错的，但你知道，他们挣很多钱，快钱。”

一位35岁的失业男性，来自附近一个具有类似失业率的居民点，则断然地为自己从事毒品买卖进行辩解：

我现在在干什么？我是一个可卡因贩子啊——因为我他妈的不能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啊。你说，我能有其他什么选择吗？我得养家糊口啊……我工作过吗？我当然工作过，别跟我扯那些没用的废话！我从15岁就开始工作了！我必须工作，挣钱养我父母和我的姐妹。你瞧，没有人有资格跟我扯那个废话，说我不在找一份工作！

一位来自南区贫困居民点的33岁的看门人提到，当他们居民点的人缺钱用的时候，他们“情绪低落，酗酒，吸毒，闯入其他人家。借贷，求助，卖淫——这意味着做妓女啊”。

一位来自芝加哥一个大公共住房区的28岁的福利母亲，也解释了当邻居们没有钱用的时候的应急对策：

狗屁！接客啦，贩毒啦，任何事情——和所有的事情，都来啦。告诉你，并不是每个男人都持枪抢劫，但你知道，任何事和所有事！我自己卖过大麻，我不是一个贩毒者，我只是试图勉强糊口——我得让桌上有面包啊——我有两个小孩。

因为不能成功找到一份全职工作，来自西区一个高失业率居民点的一位25岁的未婚父亲，不得不通过贩毒来补充他靠打零工获得的收入：

四年了，我一直在努力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在这些临时工

作之间来来回回倒腾，不是回事儿呀。你知道的，你得拿出钱来家用啊，你知道，你得买衣服啊，而且一个大人的衣服还特别花钱。再说我女儿吧，再说食物吧，你知道的，样样要钱……好吧，我刚才说过我试着弄点外快，什么事都行。我最近卖过毒品，在下班以后，啊，还不错，一切顺利……我还说过，卖毒品要比工作挣钱多，谁都这样。不仅是我，谁都这样，其实很简单，如果你有好的顾客和好的毒品，一些好的可卡因或者其他什么，就会来钱，人们就会跑到你这里来……我可以带你到一个地方，那里就像这儿整天车来车往，川流不息，就跟买卖一样。人太多了，好多人还去凑热闹，有人叫来警察，警察就将整个地方监视起来，突击搜查这个地方和所有这一类的东西。

贩毒活动在一个居民点的频发是社会组织问题的一个象征。高失业率触发了居民点的其他问题，包括毒品交易、犯罪和帮派暴力，而它们对社会组织产生不利影响。

目今的毒品问题，肇始于1980年代早期，当时快克(crack)——一种极易成瘾、相对便宜、可以点燃抽吸的可卡因——在美国许多城市的街头被毒贩广泛推销，特别是在都市聚居区。快克成瘾在1980年代中期极为流行。毫不奇怪，因毒品贩卖罪而被捕的比例随之升高，“尤其是对非白人(主要是非裔美国人)来说，在1980年代早期开始上升，在1985年以后更是疾速蹿升”。^[5]到1990年，快克可卡因的分销和消费，已经遍布芝加哥聚居居民点。在1994年，消费水平渐趋平稳，“因为海洛因东山再起”。^[6]

在我们1993年对芝加哥南区的两个高失业率居民点的调查(见附录B)中，回答者们透露，毒品交易的增多强化了这种感觉，即他们的居民点已经变得更为危险。结果，许多居民退回到家里以策安全。“更多的人死去和被杀”，一位回答者报告说，“这里天天卖很多毒品。太不安

全了，你甚至不能走出家门，因为害怕被枪打中。”另外一位则说：“我基本上都待在家里。街上非常危险。砍砍杀杀太可怕了。毒品让人们变得疯狂！”其他深陷其中的居民也表达了类似的感受，其中有一个这样说：“看到这些人都胆战心惊。我害怕走出家门。我知道那些出去工作的人，日夜都放着音乐。”

记者伊莎贝尔·威尔克森(Isabel Wilkerson)指出：“对于已然深受磨难的社区来说，快克好比是一道枪伤。即便子弹能被安全地拔出，但这些居民点已留下了永久性伤害的痕迹。”^[7]与快克可卡因流行相连的最为明显的问题，或许就是威尔克森的观察所总结的：枪支的泛滥——“快克贩卖者开始随身携带枪支，就跟会计携带计算器一样”。这些武器再流入到青少年的手中，并不断地流转。“这阵快克风潮过去了”，犯罪学家杰弗瑞·费根(Jeffrey Fagan)说，“枪支却留下来来了。”^[8]

当快克渗透到一个居民点的时候，其后果是毁灭性的。威尔克森如此描述这些后果：

这种毒品带来的稍纵即逝的快乐和漫长而凄苦的情绪低落，让吸食者极为抓狂，他们只得一次又一次回来购买更多的毒品。在一片混乱中，不成气候的毒贩其实可以到处开业，而且他们确实如此。十来岁的青少年，原本可能就干点诈骗或者商店偷窃的勾当，现在突然有出息，可以干大买卖了。当原先的头目跟爆发的新人争夺最佳地段时，要靠暴力来解决争端。随着出现在街头的枪支的增多，谋杀也在攀升。

无论是什么城市，谋杀的数据图表讲述了同样的故事。无论快克是在哪年渗透进来，无论是在纽约、华盛顿、洛杉矶还是芝加哥，谋杀率都会飞升。在上述城市，谋杀率已经趋于平缓，但伤亡人数远比快克到来之前要高，因为即便快克衰落了，但枪支留下来。而且幸存者发现，快克已经将他们居民点的社会秩序颠倒

过来了。持有枪械的青少年控制了街道，居民们说。由他们来决定谁能够在人行道散步或者谁能够进入一座公寓楼，而大人们害怕孩子，甚或为了毒品而依赖他们。

带枪的青少年，尤其是带有速射攻击型武器的青少年，增加了这些居民点的危险。相较于成熟的成年人，青少年一般很少自我克制。既有致命的武器在手，年轻人自然容易受到诱惑，即以永久的方式来解决临时的问题。青少年男性谋杀受害者的数量的急剧增长，直接相关于年轻男性谋杀者数量的突然增多。1984年，年龄在15到19岁的每10万黑人男性中，谋杀死亡略多于80，而到1992年，这一数字已经膨胀到每10万人就有180多死于谋杀。^[9]

必须强调的是，聚居区居民点中毒品业的规范和行动，也会影响到那些并未直接卷入的人。^[10]例如，贩毒者大都拥有枪支，因此居民点中武器的可得性就提高了，进而促使其他人开始武装自己。有些人获得武器是为了自我保护，有些人是为了解决跟毒品无关的纷争，还有人可能只是为了让居民点里的伙伴和熟人尊重自己。国家司法研究所曾经在加利福尼亚、伊利诺伊、新泽西和路易斯安那的10所内城区公立高中抽取了758名男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22%的学生拥有枪支”，12%一直或大部分时候随身携带，“另有23%时不时地带着枪”。在这项调查中，学生们还反映他们近期获得枪支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防身。^[11]

随着拥有枪支和吸毒的增多，陷入困境的居民点中的居民，也就更加害怕出门了。这种恐惧降低了他们在志愿组织中的介入程度，也削弱了非正式的社会控制网络，而这些对于维持居民点的社会组织是必不可少的。一位从一个危险的公共住宅小区搬迁到附近一个更为安全地区的居民，描绘了邻里之间非正式互动的区别：

好吧，通常，你知道的……就我住在这里以后，我知道不少人……在一起商量……看看如何把居民点凝聚起来……我也没

有看到多少人,你知道的,在街上晃悠,因酗酒或吸毒而极度兴奋,就像我原来那个小区那样。我过去整天都能看到,在这儿,我极少看到。

社会组织水平很高——即通过广泛的义务、期望和社会网络而将成人整合起来的居民点——的居民点,可以更好地控制和监管孩子们的活动和行为。^[12]年轻人知道他们要为个人和群体的行动负责;同时,他们知道他们可以依靠居民点里成人的支持和指导。就社会组织水平而言,芝加哥的黑人工人和中产阶级居民点与新贫困居民点正好形成了鲜明对照。来自1989—1990年的调查(见附录B)显示,除了比新贫困居民点失业水平更低之外,黑人工人和中产阶级居民点还有更高的社会控制和凝聚、组织服务和社会支持水平。

在兴盛的居民点,社会网络的连通性和稳定性超越了家庭,因为邻近街坊有可能留心察看、告知和评论孩子们在不同情境下的行为。^[13]这些网络强化了孩子在家里所接受的纪律,因为邻近街坊承担了维护公共或社会行为标准的责任,即便是对并非他们自己的孩子也是如此。正如法兰克·弗斯滕伯格(Frank Furstenberg)所说:“一般的父母,如果他们住在视抚育孩子为集体责任、并有健全机构来支持父母努力的社区,更有可能成功地培养孩子。”^[14]

加诸孩子的规范和监督,如果体现了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 Coleman)所谓的“代际闭合”(intergenerational closure)——亦即在一个居民点中青年和成人的社会网络交叉重叠——则会最为有效。^[15]在绝大多数父母不仅认识他们孩子的朋友,而且也认识这些朋友的父母的居民点,代际闭合就呈现出来了。通常而言,父母与居民点其他人的社会整合所产生的资源交换,可让青少年直接受益。

不过,如果生活在这样的居民点,即个体和家庭均高度介入越轨行为,那么,社会整合并不能造福于青少年。“虽然我们往往将社会整合视为一种值得向往的状态”,劳伦斯·斯坦伯格(Laurence Steinberg)及

其同事写道，“但是否值得向往，还取决于整合让怎样的人相互接触。当前美国，在不少社区中，父母在社会上孤立可能要比社会整合更加具有适应性。事实上，法兰克·弗斯滕伯格近期有关费城内城区家庭生活的著作表明，许多生活在危险居民点的父母，经常刻意选择社会孤立以作为一种适应策略。”^[16]

在丹佛的一个人口密集的公共住宅小区所从事的一项民族志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17]在这个住宅小区中，有些父母对安全的担忧，影响到他们与邻居的交往或互动程度。这些父母对小区中其他父母和年轻人充满了疑虑，因此也就拒绝与邻居随便接触，几乎交不到什么朋友，也不愿介入居民点的问题。而且，他们也积极对积极交往的邻居及其非传统的行为(喝酒和“晃荡”)表达了负面的看法。在“城市贫困与家庭生活研究”中一些父母持有类似观点。正如来自南区一个贫困聚居区的一位42岁已婚父亲所说：“街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没有什么区别，你不必跟这里周围的人进行交往，这是你个人爱好。”

根据芝加哥大学城市不平等研究中心有关高风险地区青少年成功发展的研究，情况似乎是这样：众多凋敝而危险的居民点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即社会整合程度相对较高(局部邻里之间关系紧密，而相对孤立于一般的主流社会)，而非正式社会控制的程度很低(感到对自己的直接环境失去控制，包括环境对他们孩子的负面影响)。在这种地区，孩子们不仅因为缺乏非正式的社会控制而面临危险，而且因为邻里之间社会交往的局限——即他们所能交往的人，其技能、风格、取向和习惯，不能像更为稳定的居民点的人那样，有助于促成积极的社会后果，比如学业成就、亲社会行为等等——而大为不利。在这种地区中，邻里之间的密切往来，虽然可能在制定策略、散布信息和形成在聚居区环境中管用的行为风格(教会孩子避免跟陌生人目光接触，在公共场所要举止粗暴以求自我保护)上不无帮助，但对提高孩子在一般社会中的福利难有成效。

尽管社会整合程度很高，芝加哥聚居区居民点的居民普遍都有这种

感觉，他们在自身环境中对孩子几乎没有非正式的社会控制。一个主要原因是缺乏强大的组织能力或制度性资源基地——它们本应为居民点提供额外一层的社会组织。当拥有一个强大的制度性资源基地，当诸如教堂、学校、政治组织、企业和市民俱乐部之类的社区机构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的时候，父母控制孩子在居民点的行为就容易多了。正式组织的密度和稳定性越高，诸如毒品交易、犯罪、卖淫和黑帮之类的非法活动就越是不可可能在居民点扎根。高失业率内城区居民点不同于稳定的中产和工人阶级地区的关键，就在脆弱的制度性资源基地。正如芝加哥南区一个高失业率居民点的一位居民所言：“我们的孩子，你知道，似乎要比其他的孩子更多地处在危险之中，因为他们没有图书馆可去，也没有活动中心可去，也没有运动场所可去。什么也没有，一无所有！”

高失业率居民点的父母，在控制他们未成年孩子的行为上，在防止他们卷入有碍于亲社会发展的活动上，困难重重。在缺乏组织力量，只有微弱制度基础的情况下，有些父母选择孤立于居民点的活动以保护自己的孩子，包括避免与邻近家庭接触和交往。只要有可能——考虑到交通问题和有限的经济资源，经常是非常困难——他们就努力与居民点之外的个人、家庭和机构建立和培养关系，比如宗教群体、学校和社区娱乐项目。

因此，谈到社会孤立，应在两种家庭之间作出区分，一种是因生活在危险居民点而刻意将自己同其他家庭隔离开来的家庭，一种是同代表主流社会的机构、家庭和个人缺乏联系或长期交往的家庭。

正如我早前指出的，最为败落的内城区居民点经受了工人和中产阶级家庭比例的下降，因此增强了这些居民点中剩下的居民的社会孤立，即失去了同社会中地位更为优越的成员的联系方式。来自 UPFLS 的数据显示，在这个意义上，内城区失业的穷人要比工作的穷人体验到更多的社会孤立。

失业的黑人男女，一直要比其他阶级和族群“较少可能参与到地方

机构和交到主流的朋友(也就是正在工作的朋友,受过一点大学教育,已经结婚)”。^[18]不过,芝加哥内城区居民点中失业贫困黑人的人际关系结构,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失业的黑人女性(基本上是依赖福利的母亲)要比失业的黑人男性,更为明显地孤立于主流的个体和家庭。福利母亲与其他福利母亲交往。“不仅是贫困让妇女陷入孤立,没有工作进一步增加了孤立。这就使得隔绝于他人的 AFDC(Aid for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 有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妇女的形象更为可信。”^[19]总体而言,黑人(无论男女)的个人朋友网络更为孤立,要比墨西哥裔移民更不可能拥有至少一个就业的亲密朋友。

在内城黑人聚居区普遍存在的这种形式的社会孤立,是无法获取由稳定的就业居民所提供的资源的结果。这种资源包括非正式的职业网络。对 UPFLS 民族志数据的分析显示:“社会接触对于获得非正式工作非常有用——这有利于收支相抵——但对稳定就业不太管用;网络也许存在,但大都缺乏将居民提升到正式劳动市场的能力。”^[20]

此外,UPFLS 有关求职行为的数据表明,内城区的黑人男女,要比墨西哥裔移民更少报告说在获取目前的工作上,他们得到了来自朋友或者亲属的帮助。在 UPFLS 中一位两个孩子的 35 岁的母亲,认识到非正式职业网络体系的重要性,如此说道:“不少人找到好工作,是因为他们认识朋友,他们在那里工作。如果你知道有人在一家已经稳固发展的公司工作了很长时间,并且叫你加入,去填一张申请表,然后你就能得到一份工作。”不过,内城区黑人居民最常报告使用的求职策略,是找家工作场所填写一份申请表和在职业介绍所寻求帮助。^[21]还有,黑人男性和女性要比墨西哥裔更常使用公共交通上下班,后者则更多地依靠合伙用车,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网络活动。^[22]

简言之,社会孤立不仅剥夺了内城区居民传统的角色榜样——他们的强大存在曾经缓冲了失业对居民点的不良影响——也剥夺了主流社会网络提供的社会资源(包括社会接触),而此类资源有助于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的社会和经济进步。这种形式的社会孤立,也导致了与聚居区有

关的文化特质和行为的形成与定型，这将是下面所要讨论的主题。

“文化”可以界定为在一个共同体内分享的行为模式和观念。^[23]对于文化的研究，涉及对于文化如何在共同体中代代相传和如何通过社会互动而得到维持的分析。根据一个人的文化来行事——无论是通过非言语形式的行动，包括从事或者抑制某些行为，还是以言语来表达有关规范、价值或信念的意见或态度——就是遵循一个人的内在倾向来行事，这种内在倾向要么是受到所属或者认同的共同体其他成员的影响而形成的，要么就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

一个社会中所有的共同体都分享着共同的行为模式和观念。然后，不同共同体在观念和行为上会存在着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群体在一般社会中的社会孤立程度、他们所控制的物质资产或资源、他们从这些资源中获得的好处和特权、他们身处历史和现行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安排而累积起来的文化体验，以及由于这些制度安排他们所能产生的影响。

由于上述原因，我们不难预料社会中不同群体的文化变异，即便他们的文化库存中的许多要素是相似的。现有的研究表明，内城聚居区的总体文化，既包含了与聚居区有关的要素，也包含了主流文化要素的优势。^[24]许多媒体在讨论“底层阶级”时，经常低估或者忽视这些主流文化要素。实际上，从它们的讨论中，我们会产生这种特别的印象：内城聚居区人们的价值观念，引用《时代》杂志的话说，“经常与绝大多数人——甚至是绝大多数穷人的价值观念相左”。^[25]但“城市贫困与家庭生活研究”表明，内城区居民的信念截然不同于这种描述。

尽管身陷贫困之中，但内城聚居区的黑人居民在言论上，是强化而非削弱了有关个人进取心的基本美国价值观。譬如，“城市贫困与家庭生活研究”中的大型调查就发现，几乎所有的黑人居民都感到，勤奋刻苦的工作对于个人成功而言，要么是极重要，要么是很重要。实际上，来自聚居区的贫困黑人回答者中，仅有不到3%的人否认勤奋刻苦

的工作对于个人在社会中获得成功的重要性，66%的人都认为这非常重要。

不过，就内城区居民点的人们所面对的外在限制和有限机会而言，我们确实有理由假定，其中许多服膺这种价值观的人，最终会发现很难践行它们。中产阶级群体普遍地视为理所当然的环境，在内城聚居区则经常是必须予以克服的主要障碍。我们可以来自南区高失业率居民点的一位29岁黑人男子为例，他所就业的岗位，根本就没有绝大多数稳定就业的工人所享有的附加福利，比如带薪病假。“城市贫困与家庭生活研究”课题组的一位成员在田野笔记中如此描述了他的处境：

克利福德(Clifford)是一位29岁的黑人男子，他在11年级就退学了，现在芝加哥西部郊区干着一份夜班工作，当“洗碟工和厨子帮手”。他在这个城市已经生活了16年，在目前的居民点住了两年。他跟操持家务的52岁的母亲、23岁的妹妹、18岁的小妹妹和一个12岁的小弟弟住在一起。克利福德从未结婚，也没孩子。尽管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得到过福利支持，但他本人从未接受过公共救济。

68

克利福德为不同的雇主做洗碟工已有好多年了。他现在烹调、拖地、洗碟子，每小时可以挣4.85美元。自1985年2月起，他就干这份活了，一天假期也没歇过。他的主管说得非常清楚，他可能随时被炒掉，如果他要有太多的（实际上也就是任何的）假期，他们不会为他保留这个位置。就在接受访谈的那天，他刚拔了一个白齿，非常疼痛（这部分要归咎于下述事实，即没钱，他已经靠借钱来支付拔牙的费用了，就没买医生开的止痛药）；但即便如此，他也不愿给老板打个电话请一个晚上的假。

当我问他是否期望尽快找个更好的工作时，他大笑：“我不知道：这要取决于雇主，如果他们愿意雇用我。”如果他能找到

一个工作,估计那也是“在餐饮业,医院,或者宾馆之类的地方洗洗碟子”。

他从未为进一步的教育或培训做过任何尝试,这主要是因为他的工作日程和缺乏资源,它们使这种计划基本上不可能实现。但他显然非常希望得到更多的教育和培训,这样他“能让自己生活得更好一点”,他一边说,一边理了理腋下的衬衣,摸着自己的腹部,躺在长沙发上叹了口气……以他现在的工资,他不能存任何钱(“你不可能,嘿[轻笑着]我过一天算一天。你不可能。挣得不够”)。

结果,他经常发现自己身无分文。“哎,就像今天。我必须把牙拔掉,我得出去找人借钱。”每当这种情况发生,他就从朋友和伙伴那里借上一小笔钱(大概 20 美元左右):“我只是努力坚持下去,尽己所能吧。”这个居民点的人们经常发现自己身无分文,于是非法活动就司空见惯:“噢,兄弟,他们有些人偷,有些,嗯……真的很难说,兄弟,他们为了弄一块钱,可能什么都干。抢劫,卖淫,贩卖毒品,任何事情。呵,好家伙!”就在访谈的这个当口,克利福德用手捂着腮帮,痛苦地呻吟着……在访谈结束的时候,我解释道,我只能给他汇票,因为我们身上没带现金。“我不会因为没带钱到这儿来而怪你们。我不怪你们。我以前就被抢过。”^[26]

69

在内城聚居区,还有许多像克利福德这样的人,他们以巨大的个人牺牲来克服困难,来努力实现可接受的主流规范和观念。例如,一位生活在南区的一个新贫困居民点的妇女,描述了她丈夫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

我丈夫就在社区工作。他今年 33 岁。他从 15 岁起就在一站式商店干活了。他现在是工资最高的人之一——他是一个屠

夫——他是一站式商店工资最高的屠夫之一。他在那里已经15年了——差不多18年了，他现在一小时只挣9块钱。他为自己所得的低工资而哀求过，吵闹过，放弃过，起诉过。他就拿那么多。有时他回到家里，坐在那儿，只是哭。他说：“如果不是为了孩子和家庭，我肯定辞职不干了。”你知道，这太糟糕了，要不他也不会沾上毒品，卖那东西，你知道，他自己不吸。他就是那种人，想要勤奋工作，回到家时感觉很好。他说，有时看到那个15岁的小伙子开着一辆新车从门前过去，他会感觉非常难受。他说：“我甚至不能支付汽车账单。我担心他们会收走我的车。”

在内城聚居区有很多人（就像克利福德和这位屠夫），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下勤奋工作，勉强度日。有些人能够顶住相当的压力，维持着自己的工作岗位，而有些人则因为经济环境的关系，有时被迫以与聚居区有关的方式去谋生——例如，很长时间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或者追逐非法的挣钱手段。他们也许强烈认可主流社会对于无法接受的行为的判断，但又感到完全为环境所限，被迫以破坏主流规范的方式去行事。局外人可能看到他们的外在行为，错误地以为他们会把这种非法收入看作是正当的。

因此，在有些情况下，与聚居区有关的行为可能根本就不反映内化的价值观念。人们只不过是在适应困难的处境。除了缺乏带来特权和影响力的组织渠道的限制之外，对于他们的行为选择还有其他的限制，因为他们没有主流的信息来源，而这种信息对于作出负责和可取的决策是必不可少的。^[27]譬如，在芝加哥内城区一家中学所做的研究表明，许多高中生都有可以实现的目标，如果他们得到足够的信息、指导和资源，他们完全可以在中学毕业后顺利走上工作岗位。此外，这所中学的每一个辅导员都说，他或她缺乏必要的信息资料、时间和训练，以为学生们提供有效的职业辅导。

在另外的情况下，人们决定以与聚居区有关的方式来行事，虽说并

不必然反映了内化的价值观念，但确实可说是跟文化有关。一个社区中某种行为，比如追逐非法收入，越是经常发生，这个社区中的一些居民越是可能心安理得地发现，这种行为“不仅是方便可行，而且在道德上也是适当的”。^[28]他们也许会抽象地肯定主流规范反对这种行为，但随即为这种行为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和辩解，既然他们社区中的环境如此恶劣。^[29]

就行为而言，一个合情合理的假设应该是：在稳定的居民点，经济上处于边缘地位并努力维持收支相抵的人，要比处在带有社会组织问题和聚居区适应模式的高失业居民点的类似人群，更有可能受到约束而以主流的方式行事。前者固然可能以一系列的非或不受欢迎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但社区中普遍坚持的道德观念，加之维持社区稳定的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强化，给他们以强大压力，迫使他们抑制此类活动。而生活在凋敝社区的个体，则更有可能追逐此类活动，因为在他们邻里——他们也在拼命努力以勉强度日——的公开行为中，此类活动随处可见且受到容许。在这种情况下，与聚居区有关的文化，“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是适应性的，因为适合情境的行为模式不仅是作为技术而备用，而且往往也被赋予了十分显而易见的正当性”。^[30]

内城聚居区的个体，在与社区中其他人的日常互动和交往中，几乎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各种经常发生的与聚居区有关的公开行为。^[31]因此，他们有机会熟悉一系列的行为模式，其中既有主流社会的，也有聚居区的。在任何特定环境中，接触文化上传承的行为模式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介入或选择的社会网络，包括朋友和亲属网络。经由文化传承，个体形成了一套文化剧目，其中包括相关于特定情境的不相关联的因素。譬如，接受源于缺乏稳定就业的文化传承的失业个体，或许发现有些传承来的要素——比如街头乞讨——非常贴近他们的处境。正如乌尔夫·汉纳兹(Ulf Hannerz)指出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文化要素应当视为“情境适应性的”(situationally adaptive)，亦即，它们为群体成员提供了适用于这个共同体所独有的情境的行为模式。^[32]

不过，汉纳兹同时注意到，并非文化遗产的所有方面，都涉及就一个人的文化剧目中哪个方面相关于特定情境的理性抉择。^[33]也有偶然发生的或者潜意识的文化遗产的现象——亦即所谓通过准则的传承——也就是说，一个人接触某些态度和行动是如此的频繁，以致它们成为他或她自身观念的构成部分，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并不涉及选择性地运用于特定情境。角色榜样所体现的文化分享可谓这一过程的缩影。“当一种行为模式经常可以不期而遇，且体现在诸多不同人身上”，那么，这种行为模式更有可能通过准则而传承。^[34]公开强调性欲、闲散和聚众酗酒之类与聚居区有关的实践，在内城区聚居区居民点“并非无人指责”。^[35]但是社会组织力量的失败，容许此类实践比在中产阶级社会更常发生，因此此类行为模式得以通过准则而传承，就像在角色榜样中一样，更易受到助长。正如社会学家安·斯威德勒(Ann Swidler)注意到的：

72

人们可能分享共同的抱负，但他们的文化在组织他们总体行为模式上的方式却可能截然不同……当我们从一个文化共同体到另外一个共同体时，行动并不取决于一个人的价值观念。相反，行动和价值观念会被融合起来以利用文化能力……文化研究者一直在探寻文化价值，以便解释群体或社会的行为的独特之处，而忽视了另外的独特文化现象，它们更有希望解释清楚行动模式。此类因素最好称之为文化形成的技能、习惯和风格，而不是价值或偏好。^[36]

技能、习惯和风格经常是由它们在自身共同体中出现的频率塑造的。正如德博拉·普罗斯罗-斯蒂斯(Deborah Prothrow-Stith)博士在《致命后果》一书中非常清楚地表明的，内城区聚居区居民点中的年轻人，要比其他孩子更有可能视暴力为一种生活方式。他们更有可能目睹暴力

行为,更有可能遇到无法有效控制自身暴力冲动或抑制自身怒火的角色榜样。^[37]偶然发生的文化遗产,也能在不同的人产生于共同经验的观念或信念的形成和定型中发现。伊莱贾·安德森(Elijah Anderson)指出,从同伴、熟人和陌生人那里获得尊重,在内城区青少年中是极被看重的事情,因为他们在主流社会中的地位日益遭到否定。^[38]当一个人随身携带并乐意使用一件攻击性武器时,经常就受到尊重。相应地,既然手枪、刀具和其他武器唾手可得,青少年的攻击性行为实验,经常就会产生致命后果。

简言之,无论文化遗产的模式如何,与聚居区相关的行为,经常体现了对内城区和整体社会环境中机会的系统堵塞的独特文化适应。这种适应就反映在天长日久所形成的习惯、技能、风格和态度。这一观点在不少作者——比如肯尼思·克拉克(Kenneth B.Clark)、乌尔夫·汉纳兹、李·雷恩沃特(Lee Rainwater)——基于1960年代研究的开创性著作中已经清晰地表达出来。^[39]这些作者已经充分表明,在承认宏观结构限制的重要性的前提下(也就是避免“贫困文化”的极端观念),仍然可以看到“一种更为微妙的有关贫困生活的文化分析的优点”。^[40]这一点或许在对持久失业的影响的分析上,可以得到最为清楚的证明。

我相信存在着这样的区别:一方面,是流动机会受到经济系统中的限制所阻碍的失业家庭,生活在一个就业率相对较高的居民点;另一方面则是生活在新贫困居民点的失业家庭,不仅受到同样限制的影响,而且也受到居民点其他失业家庭的行为和观点的影响。

73

正如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表明的,工作不仅是谋生的手段,是支持自身家庭的方式,而且也构成了日常行为的框架和互动的模式,因为工作强调纪律和循规蹈矩。^[41]因此,缺乏正规的就业,一个人不仅是缺乏工作的地方和无法获得常规性的收入,而且也是缺乏对目前生活的连贯组织——亦即一个具体的期待和目标的系统。正规就业为日常生活提供了空间和时间方面的支柱,决定了你将去哪里

和何时到达那里。而在缺乏正规就业的情况下，生活，包括家庭生活，会变得不连贯。持续的失业和非正规的就业阻碍了日常生活中的理性规划，而这是适应工业经济的必要条件。

最早考察持续失业的效应的研究之一，是五十多年前由马里·加达(Marie Jahoda)、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F.Lazarsfeld)和汉斯·蔡塞尔(Hans Zeisel)在马林塔尔(Marienthal)做的。马林塔尔是奥地利的一个工业小区，当时正处在“一个萧条时期，比美国所经历的任何时候都要萧条”。在研究期间，整个马林塔尔小区全部失业。“马林塔尔研究的主要论题之一，就是旷日持久的失业导致一种漠然的状态，处于这种状态的受害者甚至不复利用所剩无几的机会。”^[42]

在这场经济萧条之前，当社区的人们都还工作的时候，政治组织也颇为活跃。镇上的人读书看报，“热烈地进行讨论，积极地组织一系列的活动”。工厂位于这个生机勃勃小区的中心。它“不只是一个工作的地方，也是社会生活的中心”。而当工厂关闭之后，一切都消失了。在描述1930年他们从事田野研究期间的情形时，作者们如此写道：

在丢掉了工作和失去与外界的联系之后，马林塔尔的工人也没有了充分利用他们的时间的物质和道德诱因。现在他们无事一身轻，也不愿尝试新的事情，于是逐渐地就从一种井然有序的存在滑向了一种任性而空虚的生活。在回顾这段自由时光的任何时期，他们都想不起任何值得一提的事情。

连续数小时，男人们或独自或三五成群，倚着房子的墙壁或者桥上的护墙，懒散地消磨时间。当有车辆驶过村子的时候，他们微微地转头瞥上一眼；有几个人抽着烟筒。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横竖有花不完的时间。没有什么事情再是急迫的了，他们已经忘记如何急速做事了。

马林塔尔所发生的因失业而导致的懒散，同如今内城区居民点中与

失业有关的懒散，并无二致。一位 25 岁的未婚父亲，有一个孩子，从事着两份全职工作，跟一位 UPFLS 研究者谈起自己作为一个就业工人的生活，以及曾经的失业和吸毒的体验：

我那些邻居们，几年前当我吸毒的时候，我经常跟他们混在一起。但一旦我停止吸毒，退出了这个圈子，我发现我所谓的朋友，我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毒品。而一旦我不再吸毒了，我们变得无话可谈，因为我正努力要做的事情，比如按时上班，在工作日的夜晚不可能在外边待到两点，因为早上我必须起来以保证准时上班，这不是他们所关心的事情！因为他们没有工作，工作的事情早被他们丢到爪哇国去了。

读者诸君应该清楚，当我谈到失业或工作的消失的时候，我指的是在正式劳动力市场中的介入的减少，或者缺乏对正式劳动力市场的留恋。或许可以这样说，“失业”，在其一般的意义上，并不必然意味着“不工作”。根据官方口径的失业或者处在劳动力市场之外，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完全脱离了所有形式的工作活动。许多正式失业的人，可能卷入非正式的工作活动，其范围可以从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到提供收入的非正式或非法经济活动。

家务劳动是工作，照料孩子是工作，甚至贩卖毒品也是工作。不过，正规经济活动中的工作区别于不正规和非法经济活动中的工作的地方，就在于正规经济活动中的工作，在日程安排和工作时间上带有更为规则和连贯的特点。对于纪律的要求也更为严格。当然，确实也有一些正规经济活动之外的工作要求遵守纪律和正规的日常安排。已有数项研究表明，毒品业的社会组织讲究纪律和工作伦理，尽管是一种反常的伦理。^[43]但通常来说，不正规和非法经济活动中的工作，不大受鼓励纪律和规则的规范或期待的约束。同时，这种活动受到政府当局的消极制裁，因此也就不可能鼓励公开和持续的参与。综上所述，当我

75

说到工作的消失时，我指的是正式经济活动中的工作，为日常行为提供框架的工作，因为这种工作强调纪律和规则。

与工作缺失相关的问题，对低就业率居民点中的失业家庭来说最为严重，因为通过偶发的或无意识的文化传承过程，他们更有可能相互感染，受到居民点中其他家庭的强化。他们可能共同分享的问题之一，就是缺乏自我效能感。

根据社会认知理论，感受到的自我效能，是指在特定的情境中对采取必要的步骤以实现目标的自身能力的信念。这种信念影响到一个人感觉到的自己所能应对的挑战的水平、在特定冒险尝试中所付出的努力程度，以及遭遇困难时的坚毅程度。正如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所言，“无力掌控明显影响自己生活的事件和社会条件，会导致徒劳和失望的感觉，也会带来焦虑”。^[44]在自我效能理论中区分了徒劳感的两种根源：人们可能(1)严重怀疑他们完成所预期的任务的能力，或者(2)对能力感到有信心，但因他们相信由于缺乏同情心的、充满歧视的或者带有惩罚性的环境会使他们的努力最终付诸东流而放弃尝试。“人们所期待的结果的类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于他们在特定情境中能有多好的表现的判断。”^[45]

我可以假设，不稳定的工作和低收入，会降低一个人的自我效能感。近期一项研究，有关经济压力对心理健康和父母行为的不利影响，是在费城抽取的样本，包括内城区的黑人和白人父母，为这个观点提供了一些支持。^[46]此项研究表明，由于不稳定的工作和低收入带来的不断上升的经济压力，导致了情绪的压抑感，由此往往又降低了父母的效能感，即让他们益发感到无法影响自己的孩子，对孩子所处的环境也感到无能为力。牢固的婚姻，无论是哪个族群，可以有效地将对父母行为的不利效应降至最低，而充满冲突的婚姻或者单亲家庭则会使这种不利效应加剧。

因此，我们可以合理预期，在聚居区居民点——其特征是不充分就业、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脆弱的婚姻和单亲家庭——比在相对繁荣

的居民点，自我效能感水平要低。考虑到文化学习和影响的重要作用，我们也可以预期，那些面对同样的困难但生活于劳动阶级和中产阶级居民点的个体，相较于生活在聚居区居民点的人来说，自我效能感要来得高。

在社会孤立更为突出的聚居区居民点，亲属、朋友和伙伴网络，更有可能包含了更高比例的失意者，因为他们极端的经济边缘性体验，使得他们往往怀疑自己能够达致社会赞同的目标。这种自我怀疑，可能因两个缘由而存在：这些人可能怀疑自身的能力或准备程度，或者，他们可能感觉到怀有敌意的环境已经强加给他们苛刻的限制。

失业状态越是旷日持久，自我怀疑越是可能生根发芽。因此，我们可以合乎情理地假设，失业和自我效能之间的联系与日俱增，一个居民点越是长期受困于低就业率，这种联系也就越是紧密。这个假说无法直接验证，但我们的假设是：如今内城区的自我效能感，要远低于绝大多数成人都有工作且介入非正式职业网络的以往岁月。

因为失业影响到新贫困居民点的大多数成年人，我们认为自我效能的问题可能更多地来源于所感受到的环境限制，而非对于个人能力的怀疑。相比之下，就生活在中等程度或者高就业率居民点的失业家庭而言，我们假设，他们的自我效能感问题可能更多地受害于个人能力低下的感受，因为居民点中大多数家庭有工作而他们没有。

77

UPFLS 调查中许多回答者都表达了这种看法：在贫困中长大，生活于饱受失业和其他问题困扰的环境之中，使人难以维持奋发向上的动力。一位 28 岁有两个孩子的未婚福利母亲，生活在一个大公共住宅区，如此说道：

我要说，因为灰心丧气——不管你已努力前行多远，灰心丧气会让你半途而废。因为你必须重新找回自尊，你知道的，你得找到动力啊。在我看来，这个居民点的人，毁就毁在这一点啊。他们已经放弃了……我原本以为这个住宅区就像一块垫脚石，你

来到这里，可以攒下一点钱。但我一个子儿也没攒下！我不知道谁攒下什么钱了，或者谁想过能攒下什么东西。你知道，在我的公共救助金申请上，他们真的问我是否有一个储蓄存款账户！我怎么可能有的，我拿来存什么呀？

另外一位 35 岁的有三个孩子的未婚福利母亲，生活在南区一个贫困居民点，这样说道：

有时你可能努力尝试，然后你会说：“我已经厌倦尝试了。”我确曾如此过。你竭尽全力尝试了，但就在你似乎即将站起来的时候，突然有东西将你击倒，然后你只好算了。我尝试过太多次了！

UPFLS 的开放式调查表明，虽有一些回答者相对来说颇有抱负，并展示出对获得成功的能力的信心，但其他许多人非常沮丧，对于他们成功的能力也很是悲观。他们坚持认为，尽管机会似乎对不少人敞开，但他们注定要身陷贫困，生活在问题重重的居民点。回答者强调，内城区黑人不可能获得进步，因为劣质的教育已将他们置于不利的境地。他们归咎于美国的种族歧视和日益增多的移民，视之为他们无法改善生活处境的主要原因。求职过程的毫无所获，让他们备受挫折。有些人将他们的就业困难归咎于外国人的竞争；有些人觉得问题源自工作岗位的稀缺，政府没有为其公民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他们相信，由于可得的工作岗位数量有限，更有资格的工人从资格较差的工人那里拿走了职位。还有人觉得现有的工作岗位薪酬太低，不足以支撑家庭，像样的工作岗位都只能在郊区找到，城里根本没有。许多女性觉得她们不能找到工作，是因为她们必须照料自己的孩子。最后，也有不少回答者强调，种族偏见是他们求职困难的主要原因，绝大多数好的工作岗位都被白人拿走了。

一个人自我效能低下的感觉，源自于不稳定的工作和低收入的经营

历，并受到分享着居民点的条件和文化的其他人类感觉和观点的强化。这体现了附属性的文化传承过程，即个体如此频繁地暴露在特定态度和行动之下，以至于它们事实上成为他或她自身视角的部分。最终结果就是，借用班杜拉著作中的一个术语，内城聚居区的更低的集体效能感。^[47]有关这种观点和情感的传承的研究，其实就是一种有关贫困生活的文化分析。心理学的自我效能理论在这里并非是孤立地使用，而是关联于与劳动力市场的脆弱联系——也就是说，在劳动力市场中，一些人由于结构性限制或者有限的机会（包括他们直接环境中的限制或机会）所导致的边缘性经济地位（不稳定的工作、失业和低收入）——的结构问题，也关联于居民点中自我和集体信念的传承的文化问题。

不过，在解释工作不稳定和低收入的人群的决策时，我并不想过分强调个体和集体信念的文化传承的重要性。芝加哥大学城市不平等研究中心的研究非常清楚地表明，内城区居民时常反省他们所面对的经济约束和受限的机会，经常是基于他们所能有的选择而作出理性决策，无论这种决策是否受到自我效能低下的个人感受的影响。

79

例如，一位生活在南区一个新贫困居民点的福利母亲，这样解释了她继续依赖福利的决策，尽管她更愿意“离开这个地方去找一份工作”：

我以前工作的，那时我有两个孩子。我现在仍在奋斗啊。我以前每小时差不多能挣7块钱呢……但我得支付临时保姆的工资啊。那时我一到家就要照料孩子啊。我甚至付不起医疗保险……当我的孩子生病或有其他事情的时候，我担心极了……因为曾经由于我没有医疗卡，我被一家医院拒之门外。我现在真不喜欢依靠公共救助金之类的玩意儿。但是……如果我的孩子生病了我拿孩子怎么办？

一位31岁的福利母亲，三个孩子，与丈夫分居，住在南区一个贫困居民点，提供了另外一个经济约束迫使妇女依赖福利的例证：

就像我一搬家就要捉襟见肘。电话啊，迁移费用啊。就像一个月的租金作为保证金，电话公司还有其他各种小账单，搞得我入不敷出。我不得不靠两条腿慢慢走回家，省点钱哪。我从来就不喜欢公共救助金。我现在是依赖公共救助金。我跟女儿已经断断续续领取了11年，跟女儿就得依赖这个。我也试图弄清楚为什么会失业。我也曾努力去找工作，这样就可以彻底离开这个鬼地方，但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因为你可能失去你的工作。我必须做点什么，好让孩子们过日子啊，要是我一个人生活，我可以做点其他小事情，你知道，因为我不能看着自己在街上厮混哪。我不能眼睁睁地干这个呀。我真受不了。

凯瑟琳·埃丁(Kathryn Edin)的研究提供了最为清晰的证据，表明许多处于不利境地的妇女，都是基于理性的决策，要么继续依靠福利救济，要么申请福利救济，而不是去寻求低工资的就业。“一旦我们去看看单亲家庭的预算，她们宁可不工作的理由就变得极为清楚”，埃丁说道，“在最无技能或半熟练工的单亲母亲所需挣得的收入与她们在劳动力市场所能期待获得的收入之间的鸿沟，是她们领取 AFDC 的主要原因。” [48]

埃丁指出，我们经常注意不到“各州所设定的 AFDC 津贴标准过低，不能赖以为生。因为这一简单事实，女性必须要么通过未报告的工作要么通过来自男朋友或其他亲友不公开的捐助，来补充福利收入的不足”。此外，我们还经常忽略了下述事实，即“低薪的工作也不足以支撑一个家庭的开销，也不大可能让人有机会去找一份更好的工作”。事实上，埃丁发现，“那些离开福利而去工作的人，在第二年离开福利之后要比第一年还接受福利时更有可能变得贫困”。让我们简要地来检视一番基于这项研究的一些重要结论，以牢固确立这个观点：就她们所面临的既有限制和有限机会来说，许多福利母亲所做出的不工作的决定，反映了向她们敞开的理性而现实的选项。

埃丁及其同事在美国四个城市访谈了 214 名 AFDC 接受者, 以及 165 名单身母亲, “她们工作所得薪酬, 相当于福利母亲报告的过去所得”。AFDC 母亲平均每月有 307 美元的现金收入和 222 美元的食物券。但是, 根据她们的预算, 平均每月需要 876 美元的开销。因此, 现在 AFDC 的津贴水平并不足以支付她们的生活费用。

在拉登娜·帕威提(LaDonna Pavetti)所做的一项研究中也报告了类似的结果。^[49] 她发现, 许多福利接受者尝试着摆脱福利去就业, 但最后都无法离开福利, 因为这样做在经济上并不可行。她们通常找到酒吧招待、女侍者、汽车调度员和保姆之类的工作, 时薪大概 5 美元, 没有保健福利金。但这些母亲们感到, 为了维持收支平衡, 包括支付医疗保健和保育费用, 她们需要时薪在 8 到 9 美元的工作, 并提供保健福利金。

UPFLS 的回答者也指出了依靠福利为生的困难。^[50] 一位来自西区贫困居民点的 41 岁已婚母亲, 两个孩子, 与丈夫分居, 在做护士助理, 描绘了自己在女儿怀孕之后申请 AFDC 救助的财务挣扎:

81

我女儿……怀孕了, 当时她 21 岁, 好吗? 她已经中学毕业了, 并且上了一年大学。而在她怀孕之后, 她确实没在多少地方工作, 你知道, 因为她有孩子了, 没法正常工作了。因此她去申请公共救济, 你知道, 他们当然不愿意给她公共救济金, 因为她在家跟我住在一起, 但我认为他们这样做是错误的: 嘿, 她已经 21 岁了, 她还有孩子……我还真挣不了足够多的钱来资助她, 她还有她的孩子。因此, 他们最初给了她大概……80 块钱。就 80 一个月, 好不好? 我只好去问他, 那个社会工作者或者其他什么, 我说: “为什么你想给一个孩子 80 块钱?” 他则说: “好吧, 无论怎样, 你是母亲, 并且你有工作啊。”我说: “是啊, 但我只能带回家大概……如果她们要依靠我, 我只能带回家 600 块左右啊, 每个月 600 块出

不了多少头。你怎么可以期望我照顾两个孩子和一个婴儿呢？我的意思是，两个长大了，你知道，两个成人和一个小孩子，还有我自己，每个月房租就要300块，你知道。我的意思是，靠我？得了吧。”他只好说：“那我看看，能不能安排一下。”后来我就给了他我的社会保险号，我还得跑过去，签署了一堆文件，他们也只给了她250块，你知道。因此，250块加上我的收入，我们的全部收入，大概是800块，850块。850块要养四个人，真的没钱了。特别是你要付房租啊，你要支付水电和煤气，还要买吃的呢。

埃丁指出，为了让家庭能够在一起，福利母亲必须补充AFDC支票的不足。^[51]有些人通过计件工作——在家缝制或编织——及其他工作来获得额外收入，有些人从她们的男朋友或者她们孩子的父亲那里拿到些钱。理论上，福利母亲必须申报她们的额外收入，而这会导致她们福利支票相等数量的减少。因为额外收入实乃维持家用之必需，这项规则通常也就被忽略了。

如果福利母亲通过弥补收入仍然不能维持收支平衡，她们通常搬去跟亲戚或朋友同住。在UPFLS中一位来自西区贫困居民点的妇女如此评论这种处境：

他们真该创建工作岗位，创建房屋或者建筑让人能够居住。经常会有三四家人挤在一起，因为他们找不到地方住或者他们付不起房租。没有办法啦，他们只能挤在一起。这样你就好歹居有定所，为了拿到支票，可以给人家一个地址啊。他们不理解，租金那么高，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跟其他人住在一起。“好吧，你们既然住在一起，同在一个屋檐下，你们肯定是要尽可能地多弄些钱。”他们其实不懂实际是个什么情况。

如果没有亲戚朋友可以搬去同住，如果他们不能住进补贴住房，福利母亲的处境就是要么不得不拆散家庭，要么搬到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对于许多家庭来说，收容所为他们提供了厮守一处的最后机会。^[52]

严峻的经济问题并不仅限于福利接受者。有工作但收入类似的母亲，在很多情况下甚至面临更大的困难。何以如此？非常简单，因为许多低薪工作并不提供医保福利，而且绝大多数有工作的母亲必须支付交通费用，在照看孩子上花费更多，还必须购置更好的衣着。有工作的母亲在住房上也需要付出更多，因为对她们来说，不大可能有资格申请住房补贴。既然存在这些额外的支出，埃丁发现，有工作而低收入额的母亲，为了维持同样水准的生活，比福利母亲平均每月要多花费 317 美元。埃丁说道：

这些数据意味着，平均而言，离开福利而去全职工作的母亲，将面临着在她所能预期挣到的钱与她为偿付开支所需挣到的钱之间至少 33% 的差距。从她的工作中所能获得的任何收益，将被因离开福利去工作所导致的额外花费而耗光，亦即，她必须继续寻求大量的额外收入。然而，因为从事着全职的工作，她可以用来这样做的时间却少得多了。

83

埃丁的研究表明，因为有工作的母亲不能仅靠她们全职的低薪工作的收入而维持生计，她们不得不弄来相当的额外收入以使收支相抵，包括来自加班时数和第二职业的收入、薪资所得税款抵扣、食物券、社会保障保险以及来自亲友的资助。

因此，毫不奇怪，许多依赖福利为生的母亲选择不进入正式的劳动力市场。因为选择进入，并不符合她们最佳的经济利益。就这种经济现实而言，也不奇怪的是，许多在低薪工作岗位的人决定依赖福利或者重回福利。

“女性不仅要算计着她们的收入同她们的福利收益相比如何，还要

算计着她们在住房补贴上可能损失多少”，埃丁写道，“对于生活在带有补贴的住宅中的女性而言，工作意味着对于收入的双重课税。住房补贴是以现金收入为基础来决定多少。对于福利母亲来说，只有她们 AFDC 中的现金款项（不含她们的食物券收益）会被用来计算她们的补贴。这意味着，即便一位母亲获得了一份能够挣到正好等于 AFDC 和食物券相加的净收益的工作，她也会因为得到更少的补贴从而支付更多的房租。” [53]

归根结底，一位典型的非熟练工或半熟练工的单身母亲，惟有在她的工作提供了全部的家庭保健收益，她没有或者只有极少的保育花费，以及她的其他生活开销相对较低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从福利依赖向独立自主的转变。正是认识到这一问题，伊利诺伊州在 1993 年底引进了一个所谓“酬勤”（Work Pays）的计划。这项计划旨在鼓励福利接受者朝向独立自主努力，允许他们在打一份工的同时，不仅可以保留一小部分的现金援助，而且还有资格申请食物券、医疗保险和保育款项。不过，这项计划仅对已经领取福利的人开放。因此，尽管可让福利接受者在接受合法就业的时候不用承受严重的财务后果，但它并未解决有工作而未领取福利的母亲们的困难。此外，无论这个还是其他政府计划，只要低薪部门的工作岗位收入低微和不包含健康保险，就不能使母亲们离开福利。

因为永久依赖福利对于绝大多数接受救济的母亲来说是一个可恶的想法，所以典型的 AFDC 接受者都这样盘算着：只要她的孩子照料和其他安排，包括就业培训，能使她用自己所得足以支付基本的生活费用，就会退出福利而去工作。 [54]

考虑到低薪就业的经济限制，为理解低技能单身女性倾向于依靠福利的理性选择，我们倒不一定非要得出偶发文化传承的结论。如上文所言，正是因为他们的经济处境，许多内城区的人经常被迫以与聚居区有关的方式行事——譬如，进入一段没有稳定工作的闲散时期，或者卷入中产阶级社会鄙夷的活动以获取收入。他们可能高度赞同主流社会

对于此类行为的判断，但同时又感到为环境所迫不得不去违反主流社会的规范性期待。中产阶层的白人和其他人，他们未曾置身于社会边缘，没有陷入于社会支持的进退维谷的困境，也许可以轻易地评判那些接受福利并动用非法手段以获得收入的聚居区居民。

但是，如果将这种行为描述为纯粹情境性的，也是一个错误。正如我前面所说，经济上处在边缘地位的人，如果来自稳定的居民点，在努力让收支相抵时，要比来自高失业率居民点——这种居民点社会组织问题突出，与聚居区有关的态度和行为盛行——的人感受到更多的按照主流方式行事的道德压力。因此，尽管内城聚居区的许多福利母亲，面对着低薪就业的困境，作出了保留或依靠福利的理性而现实的选择，但她们的决定也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而显得更为容易：居民点中其他母亲作出类似决策的频率更高，以及邻里对待福利接受的态度更为宽容。

内城区黑人母亲相对暗淡的社会经济处境，或许也能说明她们何以形成了迥异于其他母亲的一些态度。在 UPFLS 中，内城区非裔母亲，85 无论她们是否福利接受者，都要比内城区白人母亲或西班牙裔母亲，更为强烈地反对这种说法，即政府在福利上花费太多。但正如玛尔塔·廷达(Marta Tienda)、海雅·斯蒂尔(Haya Stier)所主张的，对待福利的态度的族群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感知的和实际的机会差异，而非对待福利的不同价值观念”。^[55]当被问及，高度依赖公共救济究竟是因为个人拒绝工作还是因为缺少“体面的”工作岗位，80%的曾经接受过 AFDC 的黑人母亲——相比之下，曾经接受过 AFDC 的三分之二的白人和波多黎各母亲和一半的墨西哥裔母亲——回答说是因为工作岗位的短缺。

对许多黑人单身母亲来说，接受福利并非一种值得向往的选择。正如一位来自西区一个破败居民点的 27 岁、3 个孩子的福利母亲所说：“我想要工作；我没有工作，但我想要工作。我不想仅靠公共救济。”一位来自南区居民点的 32 岁、5 个孩子的福利母亲，已经领取了超过 13 年的 AFDC，也谈到自己对福利的厌恶：

如果我有文凭，能够参加一个培训计划，让我找到一个工作，肯定自我感觉要好很多啊。我已经厌倦于依赖救济了，厌倦于等待了。你知道，你不能得到什么呀，糊口已而。不依靠救济，就要有工作。我的母亲父亲都工作，还照顾我，我也同样能这样做啊，工作并照顾我的家庭。你知道，救济，当你依赖救济的时候——一旦他们开始每月给你送这个钱，你就开始依赖它了，每个月！我要说，这会让你变懒！我以前是喜欢这个，但我现在有点厌倦了。

86 尽管有些文化传承的行为是偶然发生的，正如上文关于角色榜样的讨论中已经提到过的，但其中有些行为可以视为是情境适应性的，因为人们是从被认为切合于他们生活处境的文化剧目中抽取出了这些要素。换言之，就内城区的母亲们来说，为防止她们的家庭滑向贫困的深渊，她们选择了福利而不是低薪的工作，这种选择不仅是理性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都会这样选择，不管依靠福利这种做法是否受到社区的认可。当然，在贫困社区中，其他人不仅视福利为正当的，而且有些人甚至认为是道德上合适的。此类与聚居区有关的态度，属于文化剧目的构成部分，居民们以此来解释福利依赖在居民点中的盛行，并为之辩护。它们随时日而演变，反映了感知的和真实的机会差异。

注释：

[1] Van Haitsma(1992).

[2] Van Haitsma(1992).

[3] 越来越多的研究文献都支持和强调了居住社区对于内城区居民的重要意义。这些研究都说明了居住社区对于失业、福利获得、辍学率和上学年限、儿童养育、单亲家庭、年收入水平、政治参与、青少年犯罪和犯罪等都具有重要影响。比如，在一项从匹兹堡市公立学校随机抽取了506名男孩的研究中，费斯·皮尔普斯(Faith Peebles)和罗夫·洛伯(Rolf Loeber)发现，如果不考虑居住地因素，黑人青少年的犯罪和严重侵权行为为白人青少年要频繁得多。然而，有41%的非裔美国青少年和2%的白人青少年居住在“底层”社区(可根据如下六个变量所构成的指标进行测量：家庭贫困、公共救助、单亲母亲家庭、家庭失业、婚外生育、男性失业)。于是，若将黑人青少年跟并未住在“底层”社区的白人青少年进行比较的话，就会发现，他们的犯罪行为是类似的。有关居住社区重要影响的其他研究，还可以参见Crane(1989)；Mayer(1989)；Osterman(1990)；

Hogan and Kitagawa(1985), Brooks-Gunn, Duncan, Klebanow, and Sealand(1993), Datcher(1982), Corcoran, Gordon, Laren, and Solon(1989), Peebles and Loeber(1994), Case and Katz(1990), Duncan and Laren(1990), and Elliott et al.(forthcoming).

- [4] Newman(1996).
- [5] Blumstein(1994), p.15.
- [6] Wilkerson(1994).
- [7] Wilkerson(1994).
- [8] 转引自 Wilkerson(1994).
- [9] Blumstein(1994).
- [10] Blumstein(1994).
- [11] Sheley and Wright(1993), p.1.
- [12] Sampson(1992b).
- [13] Sampson(1992b).
- [14] Furstenberg(1993).
- [15] Coleman(1990).
- [16] Steinberg et al.(1995).有关人际沟通网络的重要理论讨论, 请参见 Putnum(1993).
- [17] Elliott et al.(forthcoming).
- [18] Fernandez and Harris(1991).
- [19] Fernandez and Harris(1991), p.18.
- [20] Pedder(1991), p.37.
- [21] Laseter(1994).
- [22] Van Haitsma(1992).
- [23] Hannerz(1969).下面的很多讨论, 受益于 Hannerz(1969)。
- [24] Clark(1965), Hannerz(1969), Rainwater(1970), and Anderson(1991).
- [25] *Time*(1977), p.14.
- [26] 这一民族志笔记是华康德于 1988 年 3 月写的。
- [27] 在此, 我要感谢劳拉·柯尼(Laura Coyne)有关信息匮乏问题的思考。这一研究受到了芝加哥普尔曼基金会和城市不平等研究中心的共同资助, 正是她指导了这项研究的开展。
- [28] Hannerz(1969), p.187.
- [29] Hannerz(1969).
- [30] Hannerz(1969), p.188.
- [31] Hannerz(1969).
- [32] Hannerz(1969).
- [33] Hannerz(1969).
- [34] Hannerz(1969), p.185.
- [35] Hannerz(1969), p.187.
- [36] Swidler(1986), p.122.
- [37] Prothrow-Stith(1991).
- [38] Anderson(1994).
- [39] Clark(1965), Hannerz(1969), Rainwater(1970).
- [40] Hannerz(1969), p.182.
- [41] Bourdieu(1965).
- [42] Jahoda, Lazarsfeld, Zeisel(1972), pp.vii, 66.
- [43] 比如, Bourgois(1995) and Venkatesh(1996)。
- [44] Bandura(1982), p.140.
- [45] Bandura(1982), p.140.
- [46] Elder et al.(1995).
- [47] Bandura(1982).
- [48] Edin(1994), pp.2—3.这是埃丁于 1990 年在芝加哥进行的访谈, 但她在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圣安东尼奥(得克萨斯州)、查理斯敦(南卡罗莱纳州)的访谈却是在 1992 年进行的。
- [49] Pavetti(1993).

[50] 一位生活在贫困的曼哈顿西区的女人指出，福利水平并不能使一位无业的、无子女的人满足基本生活要求。“他们让你去找份工作，但问题是根本没有工作机会。他们说你有一份固定所得，但是他们却并不知道，给孩子买食物和衣服就需要花掉很多。即使那些没有孩子的人，虽然也会获得同样的固定所得——但租金至少就要 200 美元。他们给他救助，每月给他 158 美元加 70 或 80 美元的食物券。可如果租金至少就要 200 美元，这些钱又怎么够生活呢？”

[51] Edin(1994).

[52] Edin(1994).

[53] Edin(1994), pp.11, 15.

[54] Edin(1994).

[55] Tienda and Stier(1991).

第四章

内城区家庭的衰落

87

正如工作的消失已然成为内城聚居区的一个特征，传统的已婚配偶家庭的消失，也成为了聚居区的一个特征。在如今的芝加哥内城聚居区，孩子生活在一起的黑人家庭，仅有四分之一是夫妻家庭，而相比之下，内城区墨西哥裔家庭是四分之三，白人家庭是二分之一以上，波多黎各家庭接近二分之一（见图 4.1）。在贫困率至少 40% 的人口普查带，有孩子同住的黑人家庭仅有 16.5% 是夫妻家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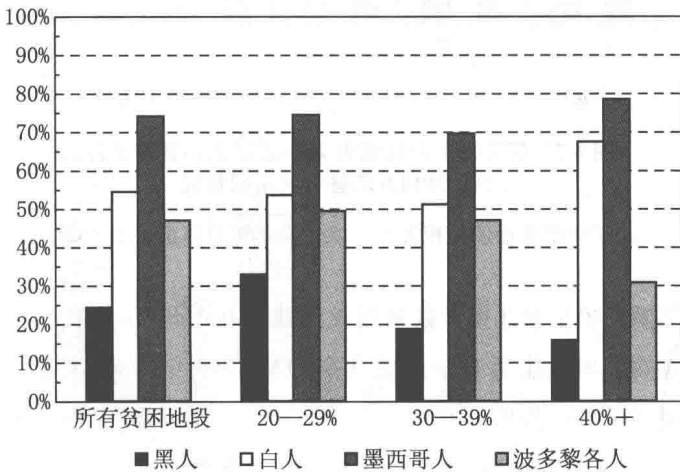


图 4.1 在贫困家庭比例为 20% 及以上的普查地段，跟配偶和子女一起生活的 UPFLS 家庭比例

* 以普查地段为单位的所有父母应答者 (parent respondents) 百分比，都经过了加权处理。

内城聚居区家庭结构的变迁，尽管导致了夫妻家庭的急剧下降，但却是现已影响到美国所有种族和族群的过程的一部分。^[1]从全国来看，未婚妇女的生育率急速上升。不过，这一上升主要是由白人所致。在1980至1992年间，婚外生育率全国上升了54%，白人上升了94%，而黑人仅上升了9%。1993年，所有18岁以下的儿童中，27%与单亲生活在一起。这一数字包括了全部黑人儿童的57%，所有西班牙裔儿童的32%以及所有白人儿童的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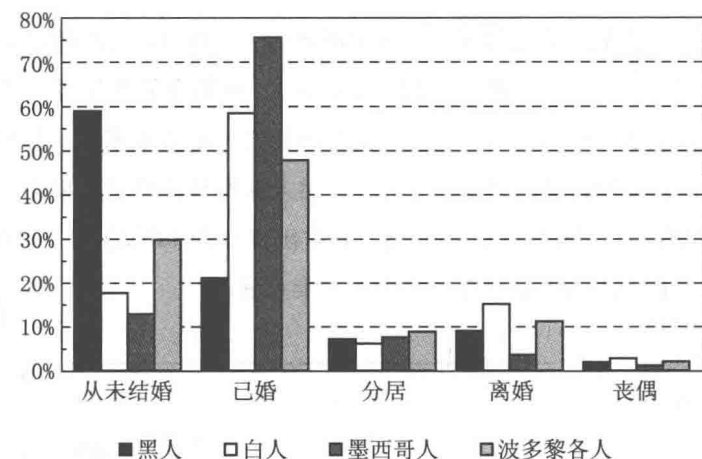


图 4.2 在贫困家庭比例为 20% 及以上的普查地段，所有 UPFLS 应答者的婚姻状况

* 已经对百分比进行了加权处理，以使其接近总体的人口参数。

88 虽然婚外出生婴儿每年数量增长的速度在 1980 年代有所放缓，但与从未结婚的单亲生活在一起的儿童却从 1960 年的 24.3 万，增加到 1983 年的 370 万，然后到 1993 年的 630 万。^[2]就 1993 年的情形来说，所有 18 岁以下的儿童中，9% 与从未结婚的父母生活在一起。其中包括 31% 的黑人儿童，13% 的西班牙裔儿童和 5% 的白人儿童。

在非裔美国人社区中，结婚率与教育程度呈正相关。^[3]受过良好教育的黑人女性，要比教育程度较差的黑人女性更有可能结婚。而在

白人女性中,这种比率正好相反,教育程度差的女性结婚率更高。此外,受过更高程度教育的非裔美国女性离异和分居之后,要比那些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更有可能再婚。而对白人女性来说,教育程度无关于离婚和分居之后是否再婚的问题。^[4]在非裔美国人中教育与婚姻之间的正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归结于教育程度较差的黑人的结婚率极低,而他们大都集中在内城区居民点。^[5]

如图 4.2 所示,在芝加哥内城区居民点,年龄在 18 至 44 岁的成年黑人中几近 60% 的人从未结婚。此外,图 4.3 表明,年龄在 18 至 44 岁的非裔美国人父母中,仅有 28% 的人目前已婚。而相比之下,同样年龄组,墨西哥裔父母是 75%,白人父母是 61%,波多黎各父母是 45%。生活于贫困率至少是 40% 的人口普查地段的黑人父母,仅有 15.6% 的父母是已婚的。还有,芝加哥内城区的黑人父母中 47% 从未结婚,相比之下,墨西哥裔父母是 14%,白人父母是 18%,波多黎各父母是 30%。而生活在贫困率达到或高于 40% 的居民点中的黑人父母,超过一半(56%)从未结婚。

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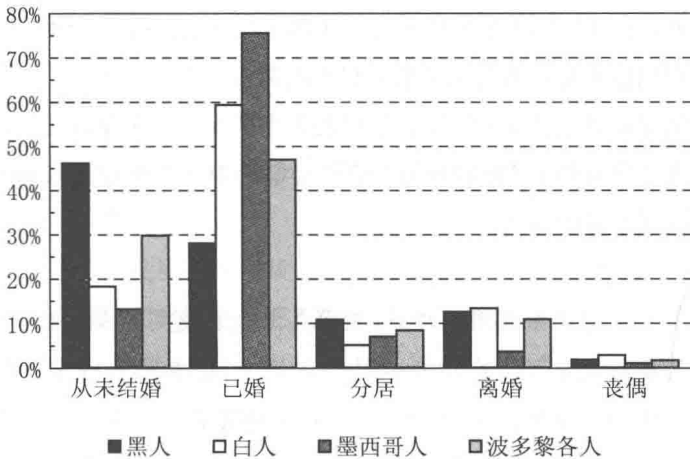


图 4.3 在贫困家庭比例为 20% 及以上的普查地段, 所有 UPFLS 父母的婚姻状况

* 已经对百分比进行了加权处理, 以使其接近总体的人口参数。

90 在分析了城市贫困和家庭生活研究的数据之后，马克·泰斯塔（Mark Testa）——城市贫困和家庭生活研究小组的一位成员——估算，内城区黑人单身准爸爸中仅有6%会在产前阶段（从怀孕到分娩）——这个阶段俗称“奉子成婚”（shotgun wedding）区间——结婚。^[6] 泰斯塔还发现，如果考虑到阶级背景和经济地位，内城区的墨西哥裔和非西班牙裔白人单身父亲，在他们第一个孩子出生以后结婚的可能性，分别是相同情况黑人的2.6倍和3倍。芝加哥内城区居民点的黑人父亲在婚姻方面的这种变化，尽管表现得非常极端，但也代表了个国家的一种历史趋势。

91 “出生于1940年代早期的黑人男性，在特定年龄结婚的比率，是1950年代晚期出生的黑人男性的两倍，这一比率在后‘婴儿潮’同期群持续下降，”泰斯塔报告道，“随着越来越少的黑人男性在他们的伴侣怀孕之前结婚，这就使得婚内出生的婴儿的比例日益下降。结果就是，尽管未婚生育率（即每千未婚妇女的生育数字）几近不变，但在非裔美国人中婚外生育率却在1980年代攀升了50%。”^[7] 在芝加哥内城区，二战期间或者二战之后不久出生的单身黑人男性，不管他们的经济和教育背景如何，在伴侣怀上他们的孩子之后就结婚的比例，是1950年晚期出生且在相似年龄成为父亲的黑人男性的两倍。^[8]

已婚父母家庭比例的下降，不仅表现在黑人中，在国内其他群体里亦然，这已成为有关“家庭价值”的政治争论中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根据一位观察者的看法：

自从单亲家庭增多之后，久而久之也就有司空见惯的倾向，视之为正常现象了。有太多的社会评论家，把非婚生育当做“常态”的一部分。抛弃孩子的行径——通常是父亲这样做——似乎越来越被接受，而且不受任何惩罚，大家都无动于衷，除了无人关心的孩子。有太多的社会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贬低双亲家庭的优点，甚至有人将之视为一种过时的中产阶级理想而予以嘲弄。^[9]

结婚率急剧下降之所以让人忧心的一个原因，是生活在单亲家庭的美国孩子，特别是那些父母从未结婚的家庭，要比生活在已婚父母家庭的孩子，遭受更多的不利之处。一项依靠纵向数据(对一个特定群体长期收集的数据)的研究发现，美国社会中持续贫困的家庭(界定为在一个10年中至少有8年家庭收入低于贫困线)往往以女性作户主，在所有持续贫困的家庭中有31%以非年长的黑人女性为户主。^[10]可要知道，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非裔美国人占到整个美国人口的12%以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正如凯瑟琳·埃丁所指出的：“自林登·约翰逊总统30年前向贫困宣战以来，如今陷入贫困的儿童比任何时候都要多。生活在由单身母亲充当户主的家庭中的儿童，是美国最为贫困的人口统计群体。这一事实并不令人吃惊，因为参加工作的单身母亲极少能挣到足够的收入以使家庭摆脱贫困，而且她们中绝大多数不能领到子女抚养费、医疗津贴、住房补助或者获得廉价的保育服务”。^[11]

92

1993年已婚夫妇家庭的中位收入是43 578美元，母亲离异的单亲家庭的中位收入是17 014美元。^[12]母亲从未结婚的家庭，中位收入是9 272美元。类似的，夫妻家庭中的儿童仅有十分之一生活在贫困线之下，而与离异母亲生活在一起的儿童三分之一以上处在贫困之中，与从未结婚的母亲生活在一起儿童则三分之二处境贫困。最后，纵向研究也表明，从未结婚的母亲比分居或离异的母亲接受AFDC的时间要长得多!^[13]

除了单亲与贫困和福利接受之间存在紧密关联之外，现有的研究还显示，来自单亲家庭的孩子更有可能辍学，在成年初期收入更低，更有可能成为福利接受者。^[14]此外，在黑人单亲家庭成长起来的女儿，要比在已婚配偶家庭中抚养起来的女儿，更有可能自己也建立单亲家庭。^[15]还有，单亲家庭对青少年行为的控制，往往也不到位。在综述了他们的研究发现之后，桑福德·多恩布施(Sanford Dornbusch)及其同事得出如下结论：

我们不知道是否因为缺少监督，缺乏恰当的教养，或者单亲缺乏社会支持，导致了仅有母亲的家庭对青少年（特别是男性）控制的减少。但我们确实知道，而且这也影响深远，就是在仅有母亲的家庭，任何一个成年人的在场，都会使控制水平接近于双亲家庭对孩子的控制，对于青少年的抚养，实在不是单凭母亲一人即可胜任的事情。^[16]

有关非婚生育的统计，虽让我们对母亲单独抚育孩子的情况有所了解，但 UPFLS 的数据显示，内城区父母持续关系的衰落程度，远未达到非婚生育统计数字所暗示的程度。首先，一定比例的父母在他们非婚生育的孩子出生以后就结婚了（产后结婚）。在 UPFLS 的回答者中，凡第一个孩子是非婚生育的，接近三分之一的人在他们接受访谈的时候已经结婚了。第二，过去三十年来已婚父母比例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被未婚但维持一种关系的父母的比例的增加抵消了，这种关系可能是同居的伴侣，也可能是经常探望的伴侣。出生于 1940 年代的父母，在他们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已经结婚的比例，相较于出生于 1960 年代的父母，下降了 61%，但同样的年龄组相比，维持一种关系的父母的比例仅下降了 27%。

不过，尽管同居和探望的伴侣关系抵消了已婚配偶家庭的下降，内城区黑人母亲要比其他族群的母亲，更有可能生活在没有其他成年人的家庭之中，因而在抚养孩子上面临更大的挑战。^[17]在芝加哥内城区，与孩子一起生活的黑人妇女中，44%在家庭中没有其他成年人，而可比的墨西哥裔妇女是她们家庭中唯一成年人的比例仅为 6.5%。还有，生活在唯一成年人家庭中的内城区黑人妇女，孩子在 12 岁以下的可能性，是同样处境的墨西哥裔妇女的 8 倍。

在分析了来自 UPFLS 的数据之后，玛莎·范·赫茨玛发现：“社会网络的差异转化为孩子抚育的差异。带有小孩的墨西哥裔妇女要比同样的黑人妇女，更有可能获得来自朋友或亲属经常性的照顾孩子。”^[18]墨

西哥裔家庭大都是两个成年人，父亲有工作，特别是移民大都如此，这就使得墨西哥裔母亲更有可能从社会网络中获得照顾孩子的机会。

此外，与年幼的孩子生活在唯一成年人家庭的黑人母亲的比例之高，也与劳动力市场联系问题有关。^[19]芝加哥内城区的单身母亲，如果生活在同居的家庭——亦即一家至少包括两位成年人——之中并得到非正式的孩子抚育方面的支持，就会显著地提高她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在内城区的母亲中，凡是不接受 AFDC，生活在同居家庭之中并得到非正式的照顾孩子的支持，参加工作的几率非常高(90%)！另一方面，那些生活在唯一成年人家庭和得不到非正式的照顾孩子的支持的单身母亲，则极大地(60%)降低了工作的几率。在依靠 AFDC 为生的内城区妇女中，有 12%的人坦率地报告说她们至少兼职工作(很有可能是在非正规经济活动中)，而在她们中，生活在同居家庭并且得到非正式的照顾孩子的帮助的人，出来工作的可能性，是那些生活在唯一成年人家庭且没有得到照顾孩子的非正式帮助的人的 5 倍。^[20]

94

结婚率的急剧下降和单亲家庭的疾速上升，涉及众多因素。在公共争论中最常听到的解释，是将非婚生育和单亲家庭的增加与福利联系起来，认为福利收益水平和年轻女子婚外抚育小孩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事实上，这种解释在一般公众中颇有市场，也体现在近来许多有关福利改革的提议之中。

然而，科学证据并不支持这种看法，即 AFDC 的福利待遇在提高非婚生育上起到重要作用。^[21]旨在探究福利待遇的慷慨与非婚生育和少女怀孕之间关系的研究表明，福利待遇水平对于非裔美国女孩和妇女非婚生育没有显著影响；类似的，福利率对于白人婚外生育的可能性，也没有显著影响或者仅有较小影响。没有证据表明，福利是导致婚外生育上升的一个主要因素。^[22]

自 1975 年以来，婚外少女怀孕的比率已经接近翻倍了，尽管在此期间，把通货膨胀因素考虑进来，AFDC、食品券和医疗补助的实际价

值已经降低。而且，婚外生育数量增加最小的情况，并未发生在扣除通胀因素之后 AFDC 福利价值下降最大的州。事实上，在过去 20 年中，现金福利津贴的实际价值暴跌，而非婚生育不仅增加了，且产后结婚（即在孩子出生以后结婚）也减少了。

95 在《真正的穷人》中，我曾提出了这种看法，即自 1970 年以来，黑人男性失业率的剧增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单亲家庭比率的上升，同时，因为内城聚居区的失业率最高，所以那里的单亲家庭比率也最高。但是，近来有关就业与婚姻和单亲家庭之间关系的研究，却将二者混合起来了。有些研究显示，一个人的就业状况同其婚外生育的可能性之间没有关系。^[23]例如，一项基于州层面的数据（各州分别收集的数据）的全国性研究报告说，单身就业男性相对于同一种族单身女性的比率，与从未结婚的女性到 19 岁成为母亲的可能性之间，毫无关联。^[24]

然而，如果研究的关注点从非婚生育转移到父母随后步入婚姻的可能性上，男性的就业状况就变成一个重要的因素。来自 UPFLS 的数据表明，尽管男性的就业状况无关于其成为未婚父亲的风险，但我们马上在下文即可看到，对于年轻的黑人父亲来说，就业状况紧密相关于在孩子出生以后其是否步入婚姻。^[25]

安德·鲁萨姆(Andrew Sum)和尼尔·福格(Neal Fogg)基于全国数据的一项研究表明，年轻黑人男性的年收入与他们的婚姻状况紧密相关。^[26]他们发现，在 1987 年，年收入在 2 万美元以上的年轻黑人男性（18 到 29 岁）中超过一半的人已经结婚，而年收入低于这个水平的人的结婚比率逐步降低——年收入在 1.5 万到 2 万美元之间的为 39%，年收入在 1 万到 1.5 万美元的为 29%，年收入在 1 千到 5 千美元的为 7%，而没有报告收入的仅为 3%。

尽管结婚率与就业状况和收入在任何时点都存在着紧密的关联，但全国范围的纵向研究表明，就非裔美国人总体的结婚率下降而言，这些因素仅能说明其中相对较小的部分。克里斯托弗·詹克斯(Christopher Jencks)指出，已婚并与妻子生活在一起的美国黑人男性的比例的下

降,跟一般黑人男性中以前数年一直拥有工作的人的比例的下降,幅度一样巨大。^[27]还有,罗伯特·梅尔(Robert Mare)和克里斯托弗·温希普(Christopher Winship)发现,对于将贫困单亲家庭的急剧增多与年轻黑人男性就业率下降联系起来的假说,仅有中等程度的数据支持。在仔细研究了两组全国数据之后,他们得出结论,年轻黑人男性就业的变化,可以解释自1960年以来他们结婚率下降的将近五分之一。^[28]一项由索尔·霍夫曼(Saul Hoffman)、格雷格·邓肯(Greg Duncan)和罗纳德·明希(Ronald Mincy)完成的研究则报告说,24到26岁年轻黑人女性结婚率的降低,其中大概四分之一可以通过年轻黑人男性收入的降低来解释。^[29]最后,戴维·埃尔伍德(David Ellewood)和戴维·罗达(David Rodda)发现,在他们观察的两个时期,即1967至1971年间和1980至1986年间,工作和收入对婚姻的相对影响并无实质性的变化。^[30]

96

然而,上述这些研究都是基于全国性的数据。内城区黑人结婚率的下降,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黑人男性失业率的升高来解释? UPFLS不是一项纵向的研究,但它确实收集了回顾性的(或生活史)婚姻和就业方面的数据,可以用来估算变动的趋向。有一项对回答者的回顾性数据的分析,比较了不同年龄群(同期群)的就业经验,结果显示,失业的黑人父亲的结婚率比之就业的黑人父亲,下降幅度要大得多。但这一下降情况,仅适用于更为年轻的同期群。马克·泰斯塔(Mark Testa)和玛丽莲·柯劳格(Marilyn Krogh)发现,就业情况对于UPFLS调查中涉及的年龄在32到44岁的单身父亲最终是否结婚,并无显著的影响,但对于年龄在18到31岁的单身父亲而言,则使结婚的可能性增加了8倍!^[31]

特斯塔和克罗分析了来自UPFLS调查的结果。尽管UPFLS大型调查中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官方划定的贫困线以上,也尽管样本中包含了不少中产阶级家庭,但这些结果都只能推广到内城区,而不能推广到全体城市人口。换言之,这一样本是从城市贫困或内城区居民点抽取出来的。近年来,大量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家庭从这些居民点迁

出。“因为迁出的可能性最有可能随年龄而增长，”特斯塔和克罗说，“结婚且就业的黑人男性在(UPFLS)样本中年龄较长的同期群里的代表性，就可能系统性地偏低。所以，我们有关就业对年龄较长同期群的影响的估算，很有可能欺骗性地偏小。”如果年龄较长同期群的外迁，导致内城区中年龄较小同期群中失业与结婚率下降之间相关程度的大幅提高，那么，这是内城区特有的一种现象。此外，即便对黑人男性而言，失业是他们延迟步入婚姻和奉子成婚比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仅能说明内城区结婚率——包括产后结婚——下降中的一部分。

在内城区聚居社区中，支持夫妻家庭和反对非婚生育的规范，不仅因社会上的大势所趋而变得弱化，且也随着内城区经济状况的恶化(包括失业率的急剧上升和实际收入的降低)而渐趋解体。社会制裁的弱化，对失业者影响最为严重，但对许多就业的人也会有影响，特别是对那些工作不太稳定的人，和/或那些实际收入下降的人。内城区黑人父母结婚率的下降，并非仅是经济上日趋边缘的结果，亦非仅是对待性和婚姻的态度改变的结果，正如特斯塔所言，而是“物质限制和文化限制交互作用”的结果。应当强调的一点是，“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对于婚前性行为、非婚怀孕和非婚生育的道德评价的变异，影响到一个人在结婚决定上经济考量的重要性”。^[32]反对婚前性行为、婚外怀孕和非婚生育的规范越是微弱，经济方面的考量越是可能影响结婚与否的决定。

内城区中黑人、白人和西班牙裔之间非婚生育的某些差别，可以通过黑人社区失业率居高不下和集中贫困来解释。但是，即便考虑到工作活动、贫困集中、教育和家庭结构方面的族群差异，内城区黑人与其他群体特别是墨西哥裔之间的显著差异仍然存在。^[33]因此，考虑是否将文化变量放入说明这些差异的相互关联的要素之中，就颇有道理。

98 从家庭的角度，对内城区黑人和内城区墨西哥裔(其中不少是移民)进行简要比较，即可发现这些文化差异的若干证据。理查德·陶布(Richard Taub)——也是UPFLS研究小组的一位成员——指出，婚姻和

家庭纽带，是墨西哥裔移民“频繁而热烈的交谈”的话题。来到美国的墨西哥人，都有一个明确的传统家庭单位的观念，认为男人就是挣钱养家的人。尽管男人搞婚外恋会被容忍，但“一个怀孕的未婚妇女，却是羞耻、苦恼或担忧的根源。”^[34]来自双方父母家族的压力，会使他们步入婚姻的殿堂。

而内城区黑人居民点的家庭规范和行为，则与之形成鲜明对照。夫—妻关系所受到的支持甚为微弱。UPFLS的民族志资料表明，内城区黑人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已婚还是非婚，经常是暴躁易怒，充满敌意。内城区的黑人女性通常会说，她们不信任男人，而且强烈感受到黑人男性缺乏对家庭的奉献精神。她们认为，黑人男性无论是做丈夫还是做父亲，都不可救药，他们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街头而不是家里。一位女性，来自南区新贫困居民点带有三个孩子的福利母亲，如此说道：“绝大多数男人没有工作……如果其他方面都行，那倒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是不是？我的意思是，如果在一起就都好说，但现在是在过不到一块儿，怎么都过不到一块儿……结果就是，即便他们能够找到工作，他们也会出去，一醉方休或者干点别的。”当被问到是否因为这个她才没有结婚，她说：

我并不想结婚，不过……你知道，你是在假设要跟一个人，这纯属幻想。你要知道，与一个人厮守终身，谈何容易。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你遇到过吗？……如果他们已婚并有孩子了，然后孩子要带过来，而你花时间照顾孩子，又可能冷落男人，让他们醋意大发。好吧，他们随时可能起身而去。而一个女的，就不得不一直呆着这里，因为她得照顾他们留下的孩子啊。

内城区的女性往往认为，黑人男性跟女人搞到一起，主要是为了性或钱；而这些目标一旦到手，女人也就会被抛弃。例如，来自芝加哥西区贫困居民点的一位女性，在被问到她是否还能看到她孩子的父亲

时，如此说道：“在孩子出生前，他就离开了。当时我怀孕两周了，他说他不想被烦到，我就说：‘好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另外一位21岁的女性，生活在西区贫困居民点，两个孩子的未婚妈妈，也道出了对男性的这种抱怨：

有些男人甚至不跟女的说话，有些男人可能试图强迫她们做那事儿，因此，你都不能相信，作为女人必须小心，真的要小心。她必须弄清楚，这个男人是否真的在乎她，是不是说到做到，是不是言行一致，是不是靠谱，你知道的。因此，你知道的，因为他们别无所图，就是想从一个女的那里获得性满足。

内城区妇女中普遍存在着这种感觉，即黑人男性同时可能与不止一个女性有关系。此外，因为有些年轻男性只要女朋友一怀孕，马上就离开她们，所以下述情形并不罕见，即一个黑人男性可能是三个不同母亲所生小孩的父亲。尽管此类男女关系问题重重，但内城区黑人青少年中性行为盛行。在UPFLS的民族志研究阶段，回答者报告说，性是男女关系中必须的和预期的方面。男性尤其感受到同侪的压力，要求在性方面积极活跃。他们说，他们同辈网络的成员会吹嘘他们的性体验，他们觉得有义务讲述自己在性方面的英勇事迹。至于性事对于长期关系的影响或后果，则鲜有考虑。

一方面是女性为不良的两性关系在谴责男性，而另一方面男性认为女性才是麻烦的根源。男性们抱怨，要对付女性对他们行为和意图的猜疑，太不容易了。他们还感到，女性特别容易被物质资源所吸引，因此也就难觅真心善待清贫伙伴的女性。

100 这些敌对性的关系，影响到男男女女对于婚姻的看法。民族志资料显示，在内城聚居区的黑人男性中间，对于婚姻制度的支持尤为微弱。对于许多男性来说，婚姻太束缚人了，让人失去自由。“婚姻？可不能结婚，一结婚你就不能做你想做的事情了”，一位来自西区贫困居

民点 21 岁的未婚待业父亲，如此说道。

她(配偶)可能想要你某个时间待在家里，甚至要你一直待在家里，总有这种事情。所以，你知道的，一结婚就不能随便出去闲逛了。你结婚了，就得跟她在一起……你知道，我喜欢跟我的朋友一起打发时间，打发一半的时间，然后在我愿意的时候回家去……依我看来，这(婚姻)是一种坏东西，就像争吵，离婚。

一位 27 岁的未婚父亲，有一个孩子，有工作，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婚姻“减少掉许多你过去经常做的事情，比方说在外面待到很晚，比方说跟伙伴们整天闲逛，等等，现在你可以随心所欲，想做什么做什么，但当你一结婚，有了家庭，这类事情就减少了许多”。

内城区的男人们都普遍感到，维持一种非婚关系，对各方都有好处，说散就散了，否则结婚之后还得折腾着离婚。一位来自西区的 25 岁的未婚居民，是一个孩子的父亲，表达了下述观点：

好吧，绝大多数黑人男性现在觉得，当一个家伙可以有 6 到 7 个女人，真的，那还为什么要结婚？你知道的，因为这里的女人要比男人多得多啊。因为这里的男人，就跟傻子一样，为了毒品或其他什么东西，相互残杀。要是你看起来不那么坏，不像一个混蛋，你知道，会有许多女人喜欢你的。所以，既然你可以这么拈花惹草，尽情地游戏情场，你还结什么婚呀？对不对？

一位 18 岁的高三学生，也是一个 5 周大的男孩的父亲，这样描述了他不准备结婚的理由：

我并不认为我现在结婚是对的，但我认为到了一定年龄我可

101 能会想结婚，跟我真正爱的人结婚。我或许会在 25 岁结婚，但现在，结婚还没有进入我的意识。对于未来，我会深思熟虑，但在结婚问题上我没有明确的打算，但就像我说过的，到了一定年龄我也许会决定结婚。

但现在，我不想结婚。人们也告诉我不要结婚，因为你一旦跟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你可能会开始遇到各种麻烦。我认识好多男友和女友，你知道的，当他们一结婚，问题就来了，所以我不认为结婚是好事。我只是觉得跟她有了一个孩子，我会继续努力，抚育这个孩子，至于结婚嘛，我现在真的没有考虑过。

一位 25 岁的临时工，有一个 7 岁大的女儿，如此解释了在孩子出生以后他何以避免结婚的缘由：

多年来，我也目睹了其他人的婚姻生活。他们都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丈夫要么虐待家庭，要么忽视家庭，或者妻子做同样的事情，啊，他们都错过了一些重要的因素。我答应跟她结婚，真的是为了取悦别人。我妈妈希望我结婚；她父母希望我们结婚。将他们有关这种情况的建议和意见同我自己的一权衡，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这些决策还得我自己来做，我意识到他们希望这场婚姻持续 20 年、40 年，而我估量了一下我的感觉，得出了一个诚实的结论：这对我不合适，对的，不合适。因此我决定孩子是要的，我可以做一个父亲，但不必生活在那里。

其他人从经济理由谈到了避免或延迟结婚。“因为我们有了一个孩子，就要像其他人一样去结婚，这实在没有道理”，一位 18 岁的未婚父亲，儿子两周大，如此说道：“如果我不能照料我的家庭，为什么要结婚？”

因此，婚姻“并不是男人关注的重点”。^[35]在 UPFLS 中，年轻单

身黑人父亲的主导性态度是：“将来我不再玩耍了并找到一份工作或者一份更好的工作，我就会结婚。”^[36]婚姻限制了他们与其他女人约会或者一帮男伙伴“闲逛”的可能性。民族志资料清晰地显示，孩子的出生并未产生一种结婚的责任感，绝大多数年轻父亲感受不到什么压力，无论是他们的家庭还是他们伴侣的家庭，都没有逼迫他们结婚。生孩子和结婚之间通常并无关联。

尽管对于内城区有关家庭的规范和约束的变化鲜有研究，但确有征兆表明规范已然发生改变。法兰克·弗斯滕伯格(Frank Furstenberg)在一项有关内城区父亲角色的研究——基于对同一群调查对象在数年期间的一系列访谈——中注意到：

我没有办法确切地知道，但我确实觉得，家庭现在对要求男人尽责施加的压力，要比以前小得多。譬如，我从未发现有家庭催促他们的孩子结婚甚或生活在一起，而在1960年代中期我研究被调查者父母一代的时候，这是常见的。^[37]

但是，来自UPFLS的数据显示，年轻男性确实“感觉到该对他们的孩子有所支持，以尽到一份责任”。^[38]不过，经济支持的水平很低，而且经常是不稳定的，从偶尔买些一次性尿布到每个月给上几百美元，各种各样的都有。正如法兰克·弗斯滕伯格指出的：

对缺少足够物质资源来应对计划外的生儿育女的男性而言，当不稳定的伴侣关系出现不合时宜的怀孕时，至少对年轻父亲承担义务的能力构成了挑战。对那些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从未习得过为父之道的男性来说，往往力不从心，即便他们强烈感受到应该为自己的孩子多点支持。（在内城区）为父之事所发生于其中的文化氛围，就是在良好的心愿与良好的表现之间存在着巨大

的鸿沟，而且大家都心知肚明。^[39]

103 内城区的黑人女性，则对结婚抱有更大的兴趣，但她们对婚姻生活的期待很低，而且对于她们遇到的男人也评价不高。女性们觉得，即便她们结婚了，也不大可能过上成功的家庭生活。她们认为，丈夫们不再像上几代人那样一心关照他们的妻子，因此，即使她们结婚了，也不大可能依靠她们的丈夫。

来自芝加哥西区一个新贫困居民点的年轻福利母亲，有三个孩子，说出了如下一番话：

好吧，我有些记得，20年前，那时我只有7岁……是的，20年前，男人要是让女人怀孕了，即便他们不结婚，也会守在她们身边，并照料孩子。而今天呢？当一个男人让你怀孕了，他们马上就失去兴趣，抛下你，一走了之，毫不在乎。还有……还有，嗯，20年前，我发现结婚的人更多，而且他们一结婚就生活在一起。今天呢？我发现有那么几对，他们是结婚了，但那么快就离婚了。我自己也曾经多次想过结婚，嗯，但如今，似乎我一谈婚论嫁，别人都不以为然。至少我谈的几个男的是这样。对了，还有，20年前，我认为家庭更加亲密（警笛声）。我发现如今的家庭渐渐疏远，不如20年前那样充满爱了。我发现，如今不少家庭，更容易伤害你而不是帮助你。

一位来自南区新贫困居民点的31岁的离婚者，福利母亲，有四个孩子，表达了福利可让一些女性避免结婚的观点：

我还要说，我不会结婚。你知道的，就像有些人所说的，很多老年人特别喜欢这样说：“最好让孩子跟爸爸姓，这样做最好。”但

是我觉得,通过领取公共救济,即便你不巧生了好多孩子,只要你能够自力更生,最好还是不要结婚。因为一个未婚的依赖福利的女人与一个未婚的依赖福利的男人之间的实际地位,在他们是孩子还是没孩子时,差别还是挺大的。如果你有孩子,你会说:“好啊,无论怎样,他会因为我而做得更好”,因此我们就结婚,改换孩子的姓名。然后呢?“我没有工作,他们不是我的孩子。”而如果你没有跟那个人结婚,你可以说:“不是你的孩子?那你滚吧!”但如果你跟他结婚了,你只能说:“能不能请你滚啊?”你知道的,你开始不停地抱怨,而他们说:“我哪儿也不去。”你就会说:“好啊,我要赶你出去。”但你不能赶他们走,束手无策。你跟他们绑在一块了,就像陷入在婚姻中的所有人一样。我想最好就是,当你有了一个家庭,你如果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原来也不想好好读书,就不要结婚了,结婚不好。我再也不会做的一件事,就是结婚……我认为最好就是不要结婚。除非你非常肯定那个人会真心照料你。

104

最后,一位27岁的单身妇女(没有孩子,读过四年大学,有一份客户服务代表的工作,生活在南区一个新的贫苦居民点),联系自身的个人处境,谈到了家庭结构的变化。她说:

就父亲母亲要一起生活而言,家庭结构确实发生了变化。现在的情形是,你会发现很多单身母亲带着孩子过,而不完全依靠父亲来支撑家庭。我知道在我的朋友圈子里已经有变化了,她们带着孩子,父亲不跟她们在一起。她们不再完全依靠他了。而他们也外面坐着自己的事情。……你必须自己找到这样或那样的出路,你不能依赖他来渡过难关,甚至也不能期待困难的时候他在你身边。是有一些人还在寻找能够相伴的人,但如果他能够

来到身边固然是好，如果不来呢？因为我总是说，等我到30岁了，如果我还没有结婚，我知道至少还有一个孩子陪着我。但我将不再迷恋于这种想法，即有人陪伴在身边。我大概不会跟一个我能看到的人生孩子。我可能通过精子库。我想在经济上我能做到，但在照看小孩之类的事情上我还是需要帮助。

105 民族志资料显示，内城区的黑人男性和女性都相信，既然绝大部分婚姻最终会破裂，而且婚姻也不复代表有意义的关系，那么，可取的做法就是彻底避免婚姻生活的纠缠。对许多内城区的单身母亲来说，不结婚比结婚是一种更为合理的家庭构成策略。单身母亲认为她们孩子的父亲是不可靠的或者财政手段极为有限，那么她们选择独自抚养孩子显然是合理的。从日常生存的角度来看，独自抚养孩子减少了情感负担，并可使她们免遭那种经常伴随着分享生活设施和有限资源而来的压榨。男女之间极端地相互猜忌，从经济负担到忠贞，无不令人担忧。正是因为如此，他们经常说，除非确信有解决之道，否则他们不想结婚。

家庭构成模式的改变，并不限于内城区的黑人社区。正如本章上文所言，它们是当前一种社会性趋势的体现。在美国，对传统夫妻家庭的信奉和承诺，以及与非婚生育、分居和离婚有关的污名，都已显著减弱。“维持‘男人挣钱养家’家庭的劳动力市场条件，差不多已经消失不见。”^[40]这就逐渐导致了一种新的价值取向的形成，即对婚姻不那么重视了，拒绝视男人支配为成功夫妻家庭的标准。^[41]

在这一部分我们提出的主要观点是，内城区黑人单身父母，较之类似的墨西哥裔移民，更少感受到压力要去结婚。他们强调自由的丧失、对伴侣忠贞的缺失，以及在认真考虑婚姻生活之前获得稳定的工作和经济保障。他们确实不会认真考虑单亲生活的后果，因为无论是否结婚，他们社会和经济流动的前景都严重受限。此类反应，标志着新的结构现实、变动的规范与演化的文化模式之间的一种关联。新的结构现实，可从低技能工人就业机会的减少中略窥一斑。批量生产体系

的衰落，以及高新技术全球经济体系中要求培训和教育的新岗位的增多，都严重限制了内城区工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可能。

当就业前景黯淡的时候，稳定关系的基础也日益变得脆弱。诸如婚姻之类的持久关系，让位于临时性的私通，而这导致关系的破裂、非婚怀孕和生育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导致分居和离婚。而一般社会中有关婚姻规范的变化，强化了内城区临时私通的趋向，也因此婚姻决策中经济的考量越来越占上风。演化的文化模式，可从内城区关于婚姻和男女关系的共同的负面看法中略窥一斑。此类看法的形成，无疑受到一种饱受持续失业困扰的环境的影响。众多因素的混合作用，增加了非婚生育，弱化了家庭结构，扩展了福利依赖，结果导致内城区贫困黑人日益脱离就业市场，阻止了他们在劳动力中发挥作用。 106

随着墨西哥裔移民在美国居留的时间越长，越来越多地接触到男女之间美国式的规范、行为模式和机会结构的变动，他们对于婚姻纽带的强烈认同，也就很有可能衰退。不过，文化约定反映了结构现实。相较于内城区的非裔美国人，墨西哥裔移民与劳动力市场具有更强的联系，他们也有更强的家庭支持、社会网络和邻里关系。因此，只要这些差异存在，内城区黑人和墨西哥裔移民对待家庭和家庭构成的态度，就会显著不同。

社会限制与文化态度和行为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随着时间的流逝，不仅弱化了内城区黑人的家庭结构，也降低了家庭在抚育孩子以让他们为未来的社会参与做好准备上的成效。脆弱的家庭没有为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做好准备。这种情形，在家庭管理（即父母采取步骤监管和控制他们孩子的行为）受到邻里影响的破坏而非强化的居民点，尤为明显。

例如，一个年轻人，如果成长在一个有稳定的挣钱养家者的家庭，生活在一个大多数成年人都就业的社区，往往能够形成一些与稳定就业有关的遵守纪律的习惯——这些习惯反映在其父母的行为中，也体现在社区其他成年人的行为中。^[42]这些习惯，可能包括依照一套常规来行

107 事，承认绝大多数工作场所都会有的等级制度，通过对钱财有条不紊的管理而获得的个人效能感，认可一套个人的和物质的酬赏体系以奖励可靠性和责任感，等等。相应地，当这个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候，他或她将会比成长在一个没有稳定的挣钱养家者的家庭和不是围绕着工作组织起来的社区——换言之，成长在一种更有可能接触到与零星工作相关的纪律松弛的习惯的环境——中的年轻人，具有一种独到的优势。

随着近期单亲家庭的急剧增多，生活在内城区居民点的黑人儿童，由于两个主要的原因而不能在一种工作环境中得到社会化。他们的母亲，因为背负着照料孩子的责任，为防止在贫困的深渊进一步下滑，可能接受福利而不是低薪就业，特别是如果这种就业不带有医疗保险。他们的父亲，远离了家庭的责任和义务，面对着极为有限的就业机会，更有可能变得懒散，而这进一步弱化了他们在家庭中的影响和减少了他们同家庭的联系。

如果年轻人没有理由相信他们拥有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包括稳定的工作和稳定的婚姻，如果缺少强大的规范压力通过婚姻来解决非婚怀孕的问题，在这样的社区中，势必导致单亲家庭的激增。在这样的社区中，青少年和年轻的成年人，更有可能卷入到损害他们社会和经济流动机会的行为之中。譬如，最有可能生下一个孩子的青少年，是那些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青少年。“年轻人如果在成长的过程中觉得人生还有机会，并能非常现实地描述出一幅更好的生活图景，往往可以成功地避免为街头文化所吸引，”伊莱贾·安德森(Elijah Anderson)注意到，“对女孩子来说，如果相信自己可以在更广泛的社会中获得成功，就有可能抵御住通过在15岁生个孩子来获得承认的诱惑。”^[43]但在内城聚居区，太少的女孩子能够实现这种梦想。对她们来说，生孩子证明了她们魅力，能够吸引“称心的(长相好看)男人。来自同辈群体的这种承认，加之成熟妇女的地位，都促使她要成为一个母亲，这也经

常是她最大的希望所在”。

一位来自芝加哥南区一个破败居民点的带有两个孩子的30岁福利母亲，如此说道：“她们中许多人生孩子，是因为她们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我现在一个孩子13岁，一个8岁。我在16岁的时候就有了自己的孩子。我生孩子是因为我好奇。我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08

30年前，肯尼思·克拉克(Kenneth B.Clark)在区分贫困黑人聚居区居民和中产阶级黑人处置性问题的不同方式时，精准地指出这个问题。克拉克指出，中产阶级黑人家庭对待性的态度，截然不同于聚居区穷人。对于中产阶级的非裔女孩来说，就跟类似地位的中产白人女孩一样，性是与抱负和地位联系在一起的。“她希望缔结一桩好的婚姻……因此避免非婚怀孕的动机非常强大。”^[44]另一方面，内城聚居区的年轻人，卷入了试探性和间断性的关系，要比其他居民点的年轻人更加不顾一切地追求接受、爱和情感。对许多人来说，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可以补偿社会的拒绝。内城聚居区的男孩女孩“被迫将他们的需求压缩在非常基础的方面，性对他们来说变得更加重要，甚至超过了他们所意识到的程度”，克拉克说，“他们对自己的风流韵事采取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装出一副非常随意和漠然处之的样子，但实际上非常清楚，此类行为受到他们需求的复杂性的支配。”

聚居区里无论女孩还是男孩，都不再存在什么幻想。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女孩也不指望紧紧地抓住男孩。“性对她是重要的，但不像在中产阶级社会，性是一种地位的符号，可以用来跻身于更好的家庭阶级或者更高的收入档次。”^[45]相反，性被用来获得个人肯定。“有人想跟她上床，这差不多就足够了。”如果这种关系导致了非婚生育，孩子的接受不成问题。一个非婚生育的孩子，在聚居区不算什么丑事。不像1960年代可以在较好的居民点中看到的，现在这里没有终极耻辱，没有堕胎的要求，没有将孩子送到收养机构的压力。中产阶级里非婚生育的污名，源自于个人和家庭的抱负。而来自内城聚居区贫困家庭的女孩子，生下一个非婚孩子，仅需牺牲她那已经极为有限的选

择中的一些而已。正如克拉克所说，“她既不准备缔结一桩‘好姻缘’，也不想改善她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相反，孩子是她已是一个女人的象征，她可以从中自得其乐”。类似地，男孩成为非婚生育孩子的父亲，也没有多少可以失去的，因为他的社会和经济流动的前景极为黯淡或者根本就不存在。在思考聚居区非婚生育盛行的原因时，克拉克写道：

对于聚居区的非婚生育问题，不能根据惩罚性的敌意来理解或处置，就像有人建议凡未婚母亲再次非婚生育一律取消福利。此类方法，以空洞的有时是伪善的道德说教，掩盖了年轻人对于接受和认同的极度渴望，他们需要成为对其他人有意义的人，哪怕是一瞬间，而不求永恒的忠贞和不可的誓言。如果当女孩怀孕了，男孩抛弃她或拒绝跟她结婚，经常是因为双方都无法维持一种亲密关系。在直接的满足之后，双方都没有能力继续相互关爱。双方都清楚地知道，哪怕是无意识的，必须接受这种事实，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若是期待更多，要求更多，将使自己面对不可避免的拒绝、伤害和挫折。^[46]

肯尼思·克拉克 30 年前富有洞见的有关性与社会地位之间关系的分析，于今或许更为适当。非常明显的是，与聚居区中男女关系有关联的许多问题，在新贫困居民点都已加剧。现在在讨论中用以解释聚居区经验的概念，譬如“社会孤立”，当然也适用于早前有关内城区生活的描述，包括在克拉克《黑暗聚居区》中详细描述的男子两性关系。所不同的，是在像纽约和芝加哥之类大型中心城市的聚居区居民点，因为一般经济变迁而导致失业率更加居高不下。此外，失业对居民点的冲击更大，因为那里非贫困家庭的比例更小，难以吸纳或缓解经济冲击。自 1970 年以来，经济变迁，加上许多工人阶层和中产阶层的家庭

搬离内城聚居区,使那里的失业率急剧增高,社会组织问题急剧恶化,而它们又使克拉克准确描述过的本已脆弱的两性关系更趋恶化。

接下来我们需要处理的问题是,主流社会有关这些环境影响的解释,如何影响到雇用决定? 这些决定可能强化或加剧内城区黑人的经济边缘性,包括他们居高不下的失业率。

注释:

[1]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1994 and 1995) and U.S.Bureau of the Census(1993).在1970年到1993年期间,美国未婚成人的数量从3750万攀升到了7260万,几乎增加了一倍。在未婚群体中,有58%的人从未结婚,离婚人数从1970年的430万攀升到了1993年的1670万,几乎增加了两倍。1993年,初婚男性的年龄中位数是26.5,初婚女性的年龄中位数是24.5,这是1890年以来的最高数字。黑人的婚姻延迟得最晚。从未结婚者在未婚群体中的比例,在西班牙裔女性和白人女性中分别是9%和7%,但在黑人女性中却占到了22%。

[2]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1994 and 1995) and U.S.Bureau of the Census(1993).

[3] Bennett, Bloon, and Craig(1989), and Franklin and Smith(1991).需要指出的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黑人女性比相应的白人女性具有更低的婚姻比例。在下文的讨论中,我分析了内城区非裔美国人的婚姻比例与“适婚”男性(也即有工作)的人数之间的关联。班尼特(Bennett)、布鲁姆(Bloon)和克雷格(Craig)指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黑人女性,面临着跟低教育程度的黑人女性颇为类似的问题。“只要择偶重点是需要具有同等教育程度的话,那么,对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黑人女性来说,她们可能就会缺乏“恰当的对象。”(1989, p.715)

[4] Smock(1990).

[5] Bennett, Bloon, and Craig(1989), and Franklin and Smith(1991).

[6] Testa(1991).

[7] Testa(1991), p.27.

[8] Testa(1991).

[9] Hechiinger(1992).

[10] Duncan(1984).还可参见 Ellwood(1986 and 1989).

[11] Edin(1994), p.29.

[12] U.S.Bureau of the Census(1994).还可参见 Holmes(1994).

[13] Bane and Ellwood(1983a) and O'Neil et al.(1984).

[14] Krein and Beller(1988), McLanahan and Garfinkel(1989), and Franklin and Smith(1991).

[15] McLanahan and Bumpass(1988).

[16] Dornbusch et al.(1985), p.340.

[17] Lundgren-Gaveras(1991).

[18] Haitisma(1991), p.19.

[19] Lundgren-Gaveras(1991).

[20] Lundgren-Gaveras(1991).

[21] 可参见 Duncan(1994); Hoffman, Duncan, and Mincy(1991); Duncan and Hoffman(1991), and Bane and Ellwood(1983a).

[22] Duncan(1994).

[23] 参见 Testa(1991)对这些研究的评述。

[24] Plotnick(1990).

[25] Testa(1991) and Testa and Krogh(1995).

[26] Sum and Fogg(1990).

[27] Jencks(1991).勒曼(Lerman, 1989)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的方法是对受过大学、非大学教育的单身男性和没有受过教育的单身男性这两者的人数增加比例进行比较。

[28] Mare and Winship(1991).

[29] Hoffman, Duncan, and Mincy(1991).

[30] Ellwood and Rodda(1991).

[31] Testa and Krogh(1995).

[32] Testa(1991), p.16.

[33] Testa(1991), Testa and Krogh(1995), and Van Haitsman(1991).

[34] Taub(1991), p.6.

[35] Taub(1991), p.9.

[36] Laseter(1994), p.195.

[37] Furstenberg(1994), p.15.

[38] Laseter(1994), p.40.

[39] Furstenberg(1994), p.29.

[40] Breslau(1991), p.11.

[41] Taub(1991).

[42] 最近有研究发现,黑人男性的失业也许跟他们是否成长于工薪社区有关。科克伦和亚当指出:“跟在男性失业率较低的社区中长大的黑人青少年相比,那些在男性失业率极高的社区中长大的黑人青少年在成年之后工作的时间都更少。其成长社区中的黑人男性失业率每增加1%,成年男性的工作时间就将减少2%。”(p.20)这项研究的数据源自密歇根大学收入动态追踪研究项目(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s 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 PSID),从1968年起,该项目每年都会对5 000个家庭进行持续的追踪调查。考虑到过密采样,对样本进行了加权调整。科克伦和亚当所使用的样本包括1 347名男性(559名黑人和788名非黑人),1988年时他们的年龄在25—35岁之间。1968年时,这些人都还是所追踪家庭中的孩子,年龄在5—15岁之间。“被抽到样本中的人,当他们的年龄为5—17岁的孩子时,每三年至少被调查一次,当他们在24岁后成为户主后,至少每年报告一次收入情况。”(Corcoran and Adam[1993b], p.9)

[43] Anderson(1991), p.397.

[44] Clark(1965), pp.71—72.

[45] Clark(1965), p.72.

[46] Clark(1965), p.73.

第五章

种族的意义和重要性： 雇主与内城区雇员

111

跟内城区中其他少数民族和种族群体相比，生活在内城聚居区、忙于社会交往和家庭事务等因素，更不利于黑人们外出就业。在芝加哥大都市区的雇主看来，正是这些差异导致内城区黑人的就业意愿都不太强烈，因而很多雇主也不愿意雇佣他们。我们很难确定，这种认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种族偏见，或者说是对于工人资格能力的客观评价。尽管有关种族与雇主态度的经验研究很是有限，但已有的研究确实表明，在雇主对于雇员的资格能力及其工作伦理的认知中，他们对非裔美国人的评价要比其他任何种族群体和少数族裔更为消极。^[1]

从城市贫困与家庭生活研究中芝加哥地区的雇主样本中(参加附录B)可以看出，很多雇主将内城区工人(尤其是年轻的黑人男性)视为是缺乏教育、工作不稳定、不愿与人合作、不诚实的人。而且，在其工厂中只有较低比例黑人的雇主，尤其是蓝领雇主，具有更强烈的种族刻板印象，他们更为强调素质的重要性，比如工作态度，而这些素质在就业面试中却是难以测量的。^[2]

该项调查对于从提供初级工作岗位的179家企业中抽出的雇主代表们进行了访谈，这些企业都位于芝加哥市和郊区的库克县(Cook County)。所抽取样本代表了该县就业人口在产业和企业规模方面的分布状况。该调查包括了一些有关雇主如何看待内城区工人的开放性问

112

题，从而可以了解雇主对工人的工作技能、基本技能、工作伦理、可靠性、态度、人际交往能力等方面做出的评价。在对上述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做出评价的170名雇主中，有126人(74%)对于内城区黑人的意见可以编码为“消极”——也就是说，无论是由于环境影响、居住区影响、家庭影响还是人格特征，他们都坚持认为，内城区黑人工人，尤其是黑人男性，将那些对工作业绩具有消极影响的不利特质，包括培训和教育水平，都带到了工作场所之中。

当问及白人、黑人、西班牙裔在工作伦理方面是否具有差异时，一家汽车运输公司的董事长，以十分肯定的口吻说：

绝对有！无需思考，我就知道答案。我在三十多年中，一直都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差异。我这里所说的肯定是正确的。基本上，东方人比西班牙裔更具有进取心，更为聪明好学。至于西班牙裔，当然除了古巴人之外，他们很有工作伦理(work ethic) [原文如此]。西班牙裔一直都是 *mañana*、*mañana*、*mañana*——明天，明天，明天。

访问员：你谈到本地生的黑人？

应答者：他们都是一群懒鬼。

访问员：这跟你之前认为他们缺乏可靠性的看法是相互联系的。你觉得原因是什么呢？

应答者：他们的父母就一直是那么做的，他们压根儿就没有为子女树立良好的学习榜样，这是原因之一。

一家郊区面包坊的人事经理认为：“我们用黑人经常会出现很多问题……我发现，黑人没有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或任何其他种族的人那么勤奋工作。他们的工作伦理相当不同，他们对此十分自豪。黑人的工作伦理，是一种你亏欠我的态度。”访谈的另一位雇主、一家内城区酒

店的总经理也指出：

我很不愿意承认，但事实确实如此。我看到很多很多的黑人都认为，即使他们不做任何事情，雇主都有义务给予其报酬。虽然也有白人会这么想，但这么想的黑人人数要远远多于白人。这么想的西班牙裔人口也绝没有黑人多。这种想法也影响着我的黑人客房主管。他们为什么会认为，只要他们过来坐一坐，上帝知道他们做了什么，我们就应该给予其报酬呢？ 113

访问员：你觉得白人的工作伦理有发生变化吗？

应答者：是的。你知道的，在过去的十年中，也有变化。我不得不说不说，有些黑人的态度正在腐蚀着白人，这就是我的看法。

一位制造商通过作出阶层区分，直率地评价了黑人内部在工作伦理上的差异：“至于黑人工作伦理，他们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工作伦理。至少，那些无技术的黑人没有任何工作伦理。我觉得那些技术工人应该有工作伦理……随着你在技术上的提高，情况会变得很不一样。”内城区的一家人力资源企业的经理，对于根据经济上的阶层地位来认识黑人内部的不同工作伦理，进行了更微妙的讨论：

问题在于，是否存在工作伦理上的差异？……我发现，不同收入群体在工作伦理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就是问题所在，你知道的，如果我们一个来自中产阶级、成功处境中的黑人，我想，他的工作伦理可能就跟具有同样背景的白人是一样的。当然，在现实中，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黑人都来自于另一种环境，但我不知道，我是在回答问题还是在回避问题。我真的不认为这是一项跟种族性有关的事情。

如果说有些雇主只是认为内城区黑人的工作伦理很成问题的话，那么，则有更多雇主都表达了他们对于黑人的诚实、文化态度、可靠性等素质的关注，人们经常会将这些素质跟黑人所居住的聚居区联系起来。一位郊区零售药店的经理指出，他不愿意雇佣那些来自贫穷内城区的人。“你很担心，他们可能会偷窃你的财物，”他继续说道，“他们从小就那么长大[大笑]。他们从小就不诚实，我猜你也同样会感到，他们怎么可能来到这里就会变诚实呢？”对于盗窃的担心，也为供电服务企业的一位雇主提供了特有的理由，来解释他为何不雇佣内城聚居区的居民。

114

如果在一个白人生活区，你有一个制造企业，一个贫困聚居区的人来这里应聘，不管他是什么肤色都无关紧要……要是你知道一个人来自哪里，你就可以从他身上知道不少事情。所以，问题在于，如果你在这给他提供工作，他将会受到难以置信的压力，不得不将很多信息告诉他在贫民聚居区中的同辈群体，无论是有关安保系统的信息，还是有关这里贵重物品的进出，以便从这里偷窃出去。他不是个骗子。他也不想从这里拿走什么。但是，他生活在贫民区，如果他不能向周围的那些人提供信息的话，他可能就会面临物质上的或生命上的危险。作为一个经理，我很了解这些事情。我并不是因为他的肤色才不雇佣他的。我并未因为他是黑人就歧视他，但是，我会因为他可能给我带来的问题而歧视他。于是，他是黑人，恰巧他周围的人也都是黑人，只是由于这二者的重合才造成问题。在华沙，有很多犹太人，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一家内城区制造业企业的总经理，对于是否雇佣内城贫民区居民的问题，则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如果有人把他们的地址给我，比如在卡布里尼—格林公租房区域(Cabrini Green)，我可能会不可避免地对他们多一些关注。

访问员：你可能会关心什么呢？

应答者：那些贫困者可能经常不能按时来上班，跟其他人相比，我可能会更加仔细地注意他们，尽管这是不公平的。虽然我知道我应该做的事情是，承认这个伙计是一个正在努力走出困境的人，而且可能会比那些已经走出贫民区的其他人更努力工作，他很可能会成为这里最好的员工。但是，我想，我不得不挣扎着去接受最初的那个前提。

黑人在雇佣问题上遭遇的灾难，有时也跟人们所假定的生活在内城区就一定会受到某种文化及家庭的影响有关。一位雇主指出：“烙印在他们内心里的某些文化成分，使他们认为，最好是去接受福利救济，让国家来照顾他们。”另一位雇主则认为，贫民区的黑人“在文化上尚未为工作做好准备”。内城区一家健康服务公司的副总经理，将内城区的高失业率跟弱就业史家庭(families that have weak employment histories)在数量上的不成比例联系在一起：

115

我认为，这在于此前的世代……在于家庭成员是否曾经工作，他们曾经从事何种工作，他们的工作曾经有多么成功，等等。我想，这就是差异所在……我想，统计分析可以表明，在你的黑人和西班牙人生活区域，不工作的人数肯定极大，所以，未来一代的工作伦理也会较为薄弱。

芝加哥一家水暖企业的劳资关系经理具有类似的观点：

我觉得这是因为……因为那些孩子从小就未培养出某些价

价值观或缺乏某些价值观……他们没有理解为何要每天都去工作，或者，你为何不得不去工作。他们是在看着那些不工作的人长大的，将其视为是榜样，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工作并未成为其生活的一部分。你知道的，我长大的环境是……我父亲——他每天都去工作。他工作累得半死，你知道的，你难以完全认识到那些灌输到你身上的那些价值。那些孩子并未获得这些益处，他们是在糟糕的环境中长大的……这也成为了我们雇主的问题，因为我们不是社会慈善机构。

雇主们最常见的信念是，认为内城区的社会紊乱主要是受到黑人居环境的影响。正如一位饮食零售服务商所言，“我和你在成长中，可以上学、回家，期待着回家或去看场电影。而在内城聚居区，他们并不期待着去上学，因为街道很不安全，学校也不安全。他们也并不想回家，因为对他们来说，家基本上就安在大街上。这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内城区某企业的工厂经理进一步讲道：

116

对于工作来说，他们的生活区是一个相当恶劣的地方，有很多外在压力迫使他们不去工作，我相信很多雇主都会看重这些人的过去，但如今你却很难看出一个雇员的真实背景。

对于内城区环境的某些方面的特定关注，经常成为雇主不雇佣来自那些环境中的人的专门理由。内城区一家广告机构的雇主说道：

仅仅根据某人的居住地址是否位于卡布里尼—格林公租房区域，我肯定不能说我就不雇佣他，但是，如果可以明说的话，我想我是不愿意雇佣他的。因为这反映了你的可靠性。如果你来自某个内城聚居区，到这里找我进行这次调查，我不确

定我是否还愿意回答你的问题。我可能会对你的可靠性产生怀疑。

有些雇主指出，应该避免雇佣来自内城区中某些特定聚居区的人。比如，有一位雇主说：

在我担任这一职位之前，芝加哥西部地区的人也会被雇用，有些雇员来自那些地区……但我们的黑人管理人员，他们对于那些地区很了解，他们告诉我说：“不！请远离那个地区！那是很坏的地区。来自那一地区的任何人都……”后来确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或迟或晚地不得不停止招聘来自那里的人，你知道，因为偷窃问题，或者是比出勤更严重的其他问题，诸如酗酒等等，所以，他们之前说的话可能是很有道理的。

除了对于内城区居住者的工作伦理、性格特征、家庭影响、文化性情、居住环境等方面的疑虑之外，雇主们还经常提及他们对于求职者的语言技能和教育培训背景的担忧。一位蓝领雇主表达了如下观察意见：

我猜测，他们的问题跟教育程度有关。我想，即使最低要求的工作，你知道，其中一些工作也需要具有一点数学背景，比如对于机器的某些操作。如果你缺乏应该具有的某些基本技能，即使被雇用了，你也很难做好工作，因为你甚至缺乏最最基本的技能，这是问题的一方面。 117

一家芝加哥电脑软件公司的雇主认为：“对于很多事务来说，面见公众的能力是极为重要的，你不能用街头俚语跟购物大众进行交流。

但几乎所有接受福利的黑人，却都是用街头俚语进行对话的。他们中有谁可以请顾客坐下来，并改变他们的说话方式？”一位芝加哥房地产经纪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我曾对黑人求职者进行过很多次面试，他们都是底层阶级的人……他们一过来，我就感到不能雇用他们，因为他们的语言太差劲了。首先，他们的语音是很不准的……他们几乎没有文字表达能力……你知道的，他们都不知道如何发音，他们经常将“salesmen”说成“salesmens”，而这就是问题所在……他们不知道如何运用标点符号，他们不懂得如何正确地运用语法，他们也不会拼写。我肯定不能雇用他们。此外，让我感到伤心的是，我认为，造成他们如此不足的原因可能是芝加哥公共学校体系。

有的雇主按照求职者在电话中对于“语法和英语”的运用情况，来筛掉多数求职者。在为其方法进行辩护时，一位应答者认为：

我完全有权利认为，这是工作的特定要求。我不管你肤色是粉红色、黑色、绿色，还是黄色或橘黄色，我需要的是一位语言表达很好的员工。如果你认为我是一个顽固者，很好，你叫我老顽固好了。我一听电话就可以知道是黑人，你们甚至都听不出他们是不是黑人。你也是如此。

最后，一位内城区的银行家认为，聚居区的很多黑人“几乎没有阅读能力。当你谈论我们这一行的事务时，他们的这一不足立刻就会表现出来。我们这里的所有工作，没有哪一项是不需要最低限度的阅读和写作技能的”。

表 5.1 有关内城区黑人男性为何难以找到工作或维持工作的看法

原 因	根据雇主职业计算百分比(%)				
	顾客服务业	文职工作	手工业	蓝 领	所有雇主
缺乏就业技能	9.0	7.1	12.5	17.6	11.7
缺乏基本技能	44.5	37.5	37.5	36.8	38.5
缺乏工作伦理	25.0	48.0	25.0	52.9	36.9
缺乏可靠性	13.6	14.3	12.5	22.0	16.8
态度恶劣	15.9	16.1	25.0	19.1	17.3
缺乏人际沟通能力	18.2	10.7	0	3.0	8.9
种族歧视	15.9	14.3	0	13.2	13.4
未加权的频数	44	56	8	68	179

数据来源：作为城市贫困与家庭生活研究一部分的 1988 年雇主调查。

很多雇主的消极意见，只是反映了他们对于内城区黑人的总体批评。如果将性别因素考虑进来的话，就可以看出，他们批评的火力主要还是对准了黑人男性。确实，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跟黑人男性相比，雇主们对于黑人女性表现出了更多的偏爱。绝大多数雇主都认为，先前的经验对他们有关内城区黑人男性就业者的意见起到了恶化作用。正如表 5.1 所表明的，无论何种职业类型，大多数雇主都感到，缺乏基本技能和工作伦理是导致内城区黑人找工作或维持工作变得困难的两个主要原因。

118

在一所两年制城郊学院任职的雇主，对内城区黑人男性的就业灾难，给予了这样的解释：

如果他们获得了工作，大概在最初的一两周内，一切似乎都很好，或者甚至可以维持 90 天，但是，当他们度过了最初这段时期后，你将会看到完全不同的状况……他们总是会趁机偷懒，或是不干正事。我曾一再地看到这一模式不断上演，你知道的。我认为，人们都很愿意给他们机会，他们也确实获得了给他们的机会，然而他们似乎很不愿意工作。

一家芝加哥胶版印刷企业的副总经理说道：

119

我曾在军队跟他们一起共过事，一旦有机会，他们就会懈怠，他们不想去工作，他们感到他们不用必须工作，因为他们是少数民族裔。他们总想受到表扬和嫁祸于人。就像那个电梯操作伙计[一个在大楼中操作电梯运行的青年黑人男性]，他就是这样子的。他们总是拖延。其中，也有一些人会尝试改变。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会表现更好，但是他们大多数人都未受到很好教育。

一位城郊的雇主，根据其先前的经验，为内城区黑人男性为何难以找到工作这一问题给出了如下理由：

虽然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但我的经验总是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不愿意改变自己，不能 100%的努力工作以便在公司内得到长期发展。我跟他们接触的经验使我觉得，他们形成了很坏的习惯，我想，这是对他们生活的最恰当描述了。他们总是不及时出勤，经常缺席。在今后，他们也难以形成良好的工作习惯。

内城区企业的雇主们，对于内城区男性黑人的批评尤其严厉。比如，有雇主说道：“仅就我个人而言，我过去跟他们的接触曾遇到很多问题……他们似乎同时面临很多相互关联的问题，无论是个人问题、婚姻问题还是其他问题，都是他们难以每天都按时工作……这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准时上班问题。”一个生产工具、印模、钢铁模具的内城区制造商，引用他过去对求职者进行的面试经验，来讨论他为何会不喜欢黑人男性：

让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我刚刚检查完电焊机后，去面试了

三十多名求职者，多数都是黑人，面试效果很糟糕。是的，我想说的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没有一个稳定的就业历史。你知道，你只需通过谈话，就可以看出他的态度。尽管很主观，但这却是我30年的面试经验。而我则可以完全坚持我的主张、我的信誉，我能稳定地做到这些。在面试中，有人穿着剪短的裤子来求职，我肯定不会雇用他们。

芝加哥的一位酒店经理指出，他曾经有过成功雇佣黑人男性的事例，但是，之所以有那么多人黑人找不到工作，原因之一是黑人求职者的工作更换实在过于频繁。他认为，当问到他们为何会放弃他们先前的工作时，

120

他们在求职时却只是说，是因为诸如“跟主管关系不好”之类的事情。于是对于下一个工作的离职理由，也是“跟主管关系不好”，再下一次，离职理由也许是“不喜欢这份工作”。他们在6或8个月内，大都将更换3到4份工作，于是，他们也并不会理解，我们这里为何没有雇用他们。

一位城郊雇主补充道：“当他们来面试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如何穿着打扮。他们甚至会带着14名伙伴来面试。”

迟到和旷工是也是不少雇主的担心所在。“我们以前也曾雇用过黑人伙计，他们都不露面，只是通过电话请病假”，内城区一家酒店的总经理如是说。一家汽车运输服务公司的总裁表达了类似的抱怨，当问到为何内城区黑人男性找不到工作时，他说：

首先……他们很不可靠。他们从不知道，当你找到一份工作时，你不得不在特定时间准时上班，并需要一直待到下班。他们

经常不准时上班。他们总是会消失1小时或2小时。他们有时会打电话给你，告诉你，“啊哈，我今天不来上班啦”，有时甚至都不给你打电话。

访问员：所以，第一点是，因为他们是不可靠的。

应答者：第二点是偷窃问题。

另一位雇主，通过以过去雇用过的一位黑人工人为例，并结合他的经历，表达了他对于内城区黑人男性的疑虑。他承认歧视可能会在雇主雇用黑人时发挥作用，然后他继续解释了为何如此：

我以完全坦诚的态度说，原因之一是我们在这种事情上有过很糟糕的经历……相信我，我对这些事已经很厌烦。正如我说过的，如果我找到……无论他是黑人或白人，只要他很好，你知道的，我一定就会雇用他。我们并非专门排斥黑人。但是，我不得不说，我们的经历都太糟糕了。在过去的这么多年中，我们遇到的不好的黑人员工要远远多于好的黑人员工……我们曾雇用一位年轻的黑人[作为仓库管理员]，他却完全憎恶那些告诉他该如何做的人。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批评他、命令他或教授他什么时，他都绝对会愤怒至极。后来，他开始跟其他的一群员工打架……有一位女员工后来说，你看，我需要这个、这个或这个，但他却什么都不去做，并都不去拿它们。当时，有群员工在等待着供应订货，他却无视他们，当他们对他有所抱怨时，他变得十分动怒，开始辱骂他们。你知道的，总是有这种事情，你实在是很难忍受。他是少数几个我们辞退的员工之一。相信我，我用一只手就可以数出来，在过去这么多年里，有多少员工应该被辞退。但是，我们不能不加分辨地轻易辞退他们……

访问员：所以，你认为，因为有诸如此类的经历，与白人相比，

当有一个黑人来到这里时，你会更加心存戒备？

应答者：是的，坦白讲，我可能是这么认为……但是，如我所说，只要他是一个难能可贵之人，我都可以雇用。

其他一些雇主的意见，则是从跟工作相关的技能方面，对内城区黑人男性进行了评价。他们“只是缺乏语言技能”，一位郊区雇主这样说。一位内城区广告公司的董事长，强调了黑人的拼写问题。

一两个月之前，我需要一名临时工，他们介绍来一名黑人。我让他写一封信，我口述，他速记，这样会比较好。就是写一些很简单的内容，诸如“尊敬的某某先生，我写信是要向您咨询，您的事情进展如何”。他去打字用了很长时间，不是因为他是一名黑人，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为何要用这么久。但我阅读了他写的信，是这么写的：“我写信来 ax 你的事情。”于是，你就可以看出，他们说的完全是另一种语言，他们说的 ax 就是 ask 的意思。我不关心他是不是黑人，但是我不说 ax，我说 ask。

有些蓝领工人的雇主，会将内城区黑人男性的失业问题跟黑人求职者难以通过药物检测联系起来。比如，一家玻璃容器制造企业的经理指出，

我们面对的令人遗憾的状况是，在我们的药物检测和体检 122
中，有 30% 的人都不合格。通过药物检测程序，他们中的 30% 都会被筛选出去。我想这是令人羞耻之事，我觉得这是犯罪，这是我们社会的耻辱，而且就我而言，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予以反对和谴责的众多事情之一。

一家内城区汽车运输公司的总经理，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你将会发现，在进行药物检测后——我们将药物检测作为体检的一部分，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吸食毒品。我们是海关保税运输商，我们需要对他们进行测谎，我们发现，在测谎中，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小偷。”

虽然很多雇主缺乏前述这些第一手的亲身经历，但是他们还是形成了对于黑人男性的消极意见。一位制造商解释说，没有人愿意雇用内城区黑人男性，因为大家的刻板印象是，

他们不愿意工作，他们不愿意做任何事情。我想这是有关他们刻板印象的一部分。我想，虽然不是每个人都会承认这一点，但是，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他们是无知的，不工作，也不想工作……他们受到了很差的指责……任何人，我认为，不是任何人都会公开表态承认这一点，但是，我想这却是他们在面对一名黑人求职者时首先考虑的事情。

城市贫困与家庭生活研究项目所进行的雇主调查清楚地表明，尽管黑人女性也遭受着雇主们的消极态度及其恶果，但是，在黑人男性和黑人女性进行比较的绝大多数情况下，雇主们都更加偏向于黑人女性。当问及内城区黑人男性跟女性的处境有何不同时，几乎有一半的雇主都认为，内城区黑人在求职成功和维持就业方面存在性别差异。只有14%的雇主表示，内城区黑人的求职经历不存在性别差异，还有不少人(43%)不置可否，然而，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跟黑人、黑人男性或黑人女性缺乏任何直接的就业相关经历。

123 正如表 5.2 所表明的，在认为内城区黑人的就业处境存在性别差异的应答者中，几乎有 78% 的人都感到，在求职和维持就业方面，黑人女性具有更好的机会，因为她们更有责任感和决心，或者她们有更好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伦理。

表 5.2 雇主们对于内城区黑人在找工作和维持工作的能力方面
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的看法

对黑人就业机会的看法	根据雇主职业计算百分比(%)				
	顾客服务业	文职工作	手工业	蓝领	合计
对女性的积极态度	61.1	93.1	100	71.4	77.9
对女性的消极态度*	5.6	3.4	0	18.6	13.0
未加权的频数	18	29	2	18	77

* 雇主们对于女性就业机会的消极感受，体现了他们对于儿童照顾和其他家庭责任的关注。

数据来源：作为城市贫困与家庭生活研究一部分的 1988 年雇主调查。

“就我们的发现而言，我想，她们[内城区黑人女性]可能更有责任感，”一家行李箱零售店的总经理这么说，“你将会发现，现在有很多单亲家庭，她们不得不从事两份工作，以便维持家庭开销。你老是会发现这种情况。在很多、很多情况下，她们经常都是养着四个孩子，至于丈夫在哪里，我们则不得而知。”

一家内城区健康服务公司的副总裁讲道：“我想，很可能是因为在雇主们的经历中，就基本方面而言——出勤、工作效率、工作伦理等，在长期的经历中，雇主们对于黑人女性或少数族裔女性具有比少数族裔男性更好的印象，所以，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雇用黑人女性。”一家州际运输公司的副总裁表达了这样的意见：“不，我认为，因为她们更关心家庭，工作对她们更为重要，于是她们在工作中也会相对较为稳定。”根据内城区医疗服务公司的一位副总裁的意见，人们对于黑人女性的印象完全不同于黑人男性。他指出：

我想，总体上，对于黑人女性，人们具有一种不同的认识。我想，人们对黑人女性的认识——无论是正确或错误，也许是这样的，她们很可能是家庭的支柱，很可能是承担照顾孩子这一责任的人，于是，根据她们的可靠性等方面来看，她们也很可能会在工作环境中更为稳定一些。

内城区黑人女性“需要去工作”，一位芝加哥的雇主如是说：“我认为，在很多情况下，她需要首先转变为一个非常负责的员工。当然，教育可能仍然是一大问题，但是她们肯定不会遭遇黑人男性找工作时的很多问题，比如跟他们有关的犯罪、帮伙、缺乏责任感等污名。”

内城区一家电脑技术公司的经理指出：

我认为，黑人女性在家庭里具有如此大的责任——你知道的，很多白人现在也有很多外出工作的单亲母亲，黑人单亲家庭的母亲也经常遭受着同样的事情。她可能需要外出照顾别人的孩子，自己家里却没有人来照顾她的孩子，或者，你知道的，她常常需要照顾多个家庭，不只是她自己的家庭，还有她的子女的家庭，她经常是处在多个家庭之中。所以，由于个人问题，她也许会出勤不准时，或不能一直都集中精神进行工作——我想，很多问题都正在发生在白人女性身上，但是，在过去，我想这些事情更多是跟黑人女性有关。白人女性正在开始了解，她们遭遇到的都是哪些问題。

有少数应答者认为，黑人男性之所以没有黑人女性成功，是因为他们对于雇主构成了更多的威胁。一位雇用了黑人职员的应答者说：

黑人男性经常会做出威胁白人男性的举止。我想，白人都很害怕黑人男性。我认为，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他们使用的也是不同的交往方式，我觉得跟他们进行沟通的过程总是充满了危险。对于黑人男性来说，他们需要确认自己，这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他在所处的环境中感到备受折磨，他的男子气概会遭遇挫折或受到威胁，或者，从白人男性角度对他进行的使他变得柔性化的努力，都会激发起他的抱怨和愤怒。我想，他们面临

着巨大的沟通障碍，因为在白人与黑人男性的沟通中，双方都感到彼此受到了威胁和恐吓。所以，很多时候，我在想，当公司雇用黑人男性时，应该雇用那些较为满足的、较少攻击性的、没有黑人男子气概的人，因为这样的人不会去做出疯狂之事。而那些容易成为好战者的那类人，如果被录用，则会在公司到处闲逛，寻衅滋事。雇主们应该雇用那些最令人接受的人，虽然他们有时不是最有前途的或最有能力的。

一家内城区慈善机构的执行主管具有类似的想法：

人们害怕黑人。如果一项工作可以在一名黑人男性和女性之间进行选择的话，我想雇主很可能会选择黑人女性。所以，如果我要雇用员工时，我就会优先选择黑人女性，而不是黑人男性。因为这种情况，我们并不怕黑人女性。我想说的是，他可能已经有过犯罪记录，但他以后也可能犯罪——或者，我可能有些过于忧虑了。

虽然有少数应答者(12.9%)认为内城区黑人女性在求职和维持就业方面比黑人男性更加困难，但是他们中的多数都认为，这是因为女性所承担的家庭重担和儿童照顾责任。正如一位雇主所言：

我想还是有一点不同。我认为，在多数情况下，或者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或者在有些情况下，我们会遇到一些问题……虽然我们有过成功的情况。最大的问题是孩子，孩子的照顾问题。我的意思是说，内城区女性不仅要处理工作中的各种事情，面对工作中的所有变化，学习所有的新规定等各种事情；她们还要担心她们的孩子在哪里，谁在照顾她们的孩子，是外祖

126 母来照顾孩子还是姐妹或其他什么人恰巧在照顾她的孩子。我认为，正是这些重担，使她们外出工作变得困难。我想，在有些情况下，这一定会使她们倍感沮丧……无论她们如何努力，总有一些事情在阻碍着她们。我是说，几乎所有事情都在迫使她们留在家里，阻止她们外出工作。

最后，有一位城郊的雇主，明确地表达了他对于内城区女性的消极看法：

你想一下那些内城区女人的生活处境，事实上，她们自己并不能养活那么多的孩子。无论她们是否有丈夫，都不会有任何区别。她们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孩子，因为她们接受的福利救济会越来越多。她们将会抛弃他们……那些坏女人会抛弃他们……她们没有任何想要找工作的意愿。她们会尽一切努力做到需要她们做到的事情，以使她们看起来像是我们认为的样子，她们的意愿是尽可能生育更多孩子，这样才能养活她们自己……男人不能这样做，不能说“我要有更多孩子，以便养活我自己”。男人不可以，但女人可以。这是她的一项选择。于是，跟男人相比，这会使她们在寻找工作上更不努力。

这种看法是否代表了雇主们当前的态度转变，或者，这种看法是否是雇主对于内城区居民的一种长期性的消极观点，这还很难确定。若与此相联系起来考虑雇主们对于内城区黑人男性的强烈否定观点，则将十分有趣。过去多年中，黑人男性在制造业和其他蓝领岗位上取得了成功，这表明上述观点可能是最近才出现的。如果你检视一下城市贫困与家庭生活研究项目有关 1941—1955 年出生（1941—1955 出生组）的内城区黑人父亲就业方式的调查资料，你将会发现，他们在制造业中工作

的比例要多于内城区的拉丁裔父亲们，稍微低于1978年内城区的白人父亲。^[3]对于1956—1969出生组的人来说，在这些产业中就业的黑人父亲的比例，跟内城区墨西哥裔父亲在这些产业中的就业比例相当，也是稍微低于1978年内城区白人和波多黎各人父亲的就业比例。然而，127到1987年，黑人父亲在这些制造业中的就业比例，却开始大幅低于内城区白人父亲和拉丁裔父亲在这些产业中的就业比例（参见附录C）。

不管雇主们对于黑人的态度是否发生了转变，种族显然都一直是影响他们当前决定的重要因素。然而，问题却复杂得多，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还原为雇主们的种族主义观念。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雇主们自己是以什么方式来认识偏见和歧视问题的，然后再来检视黑人雇主如何看待内城区的工人。

如果说歧视是内城区黑人就业灾难的重要影响因素的话，那么，至少在該次调查中，绝大多数雇主们却并不这么认为。当问及芝加哥内城聚居区高失业率的原因时，在179名应答者之中，只有4%的人提及了歧视问题。^[4]确实，雇主们倾向于避免受到歧视的谴责，尽管他们的某些说法确实表明了存在着一点歧视。

当问及歧视问题与内城区黑人就业经历之间的关联时，一家芝加哥百货公司的人事主管这样说：“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歧视经常被用来当借口。在这里工作的经历确实让我觉得，歧视是少数族裔可以运用的最方便借口，作为一名雇主，我对此是非常沮丧的。”

其他的一些雇主也对黑人工种的种族歧视指责给予了抱怨。“如果我雇用了一名黑人男性，由于某些原因，他未能做好工作，或者，让他在试用期或试用期刚过后离开”，内城区一家折扣百货店的雇主如是说，“他们就会提出歧视指责，无论其指责是否有依据，这似乎都是一项必然发生的事情。”内城区一家市场开发与促销公司的总经理指出，一旦雇用了少数族裔女性员工，“如果她们做得不好，你就面临着一个巨大问题，你不能开除她们。你要结束对她们的雇用就会变得困难，因为你将会面临诸如种族歧视等事情”。

一位内城区雇主表达了同样的感受：

128 我们的一些经理害怕雇用他们的原因之一是，如果不得不解雇他们的时候，就会面临问题。我也许不应该说这些，但是，这确实是很多管理者的担心所在，因为他们是一个相对受到保护的群体。

访问员：于是可能会因歧视而遭到控诉？

应答者：是的。

芝加哥一家医院的人事经理，也许最好地把握住了很多雇主们的感情：“人们都十分关注自己的权利，而他们中的很多人却滥用其权利。提出很多轻浮而轻率的要求。很多不公正的指控……这是一大问题。”

除了很多雇主们认为工作场所中的歧视指控是不公正的之外，应答者之中还充满着一种感受：如果某位雇主避免雇用内城区工人，这主要是出于工作业绩和安全的考虑，而不是由于某人肤色而持有的偏见。正如一位内城区雇主所言：

我并不相信这是源于公然的种族主义。我绝不相信。我认为，这是雇主群体们过往经历的结果。

访问员：你说你不认为这是公然的种族主义？

应答者：你是在问我，这个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是种族歧视吗？

访问员：如果种族歧视确实发挥影响的话，那么，种族歧视到底有多大程度，或者，它发挥了多大作用？

应答者：是的，它确实在起作用。我觉得，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很大程度上，我们大多数人害怕的是黑人与黑人之间总体上的暴力和犯罪活动……我想，现实的情况是，很多白人不理解他们为何如此暴力，因而会很担心安全和保障问题。尤其是当我

们谈论年轻的男性黑人时。现在，人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在担心安全和保障问题，又在多大程度上确实是种族歧视问题，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区分二者。我当然认为，城市里的黑人小孩……黑人男性受到了歧视……但我更相信，关键在于担心安全问题而不是肤色问题。

但是，也有少数雇主坦白地承认，种族偏见确实是大芝加哥地区雇用过程的影响因素之一。内城区的一位制造商同情性地表达了这样的感情：

我不知道他们具有多大的能力能够保住其工作或维持其工作，但是，他们获得工作的能力却很可能在于这样的事实。现在，我又想起了20年前的情况，我认为，对于黑人男性的态度，如今比20年前充满了更多的偏见和歧视。在20年前、15年前、10年前，我觉得，像我一样的白人雇主都愿意为任何人、所有人提供就业机会，这不只是因为法律规定，而是因为这是一件因其正确而应该做的事情，而如今，我却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偏见和种族歧视。不是在这里，但我们的员工可以证实，当我们听到一些雇主们的谈话时，可以了解到，他们优先选择的是西班牙裔和东方人……我后面会进一步描述这两种人，西班牙人，墨西哥人，以及任何东方人，他们几乎主要都用这些人，他们喜欢在不同人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

最后，位于内城区的一家包装及装配公司的经理指出，某些经济学家可能会将此描述为一种微妙形式的统计歧视(*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也即，经常都很难判断求职者的工作效率，或者即使可以判断出，其成本也很昂贵，而根据其种族、族群背景或阶级归属来进行判断则十分便

利。“我的亲身经验是，工作能力很少会伴随着黑人。但是，我在怀疑，也许你在雇佣程序中并未进行什么测试，而只是在简单地消除你长期形成的感知，你之前也许雇用了某人，而后来证明他的工作能力非常缺乏。”

有关偏见和歧视在劳动力市场中作用的结论，通常都是通过分析白人雇主和少数族裔雇员之间的互动而得出的。很多读者会认为，雇主的消极评价体现了美国社会中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问题。于是，专门分析我们在调查中访谈的非裔美国人雇主对于内城区黑人的看法，将会十分富有意义。他们的应答都表明，将我们社会中雇主们的整体看法都归结为种族主义也许是错误的，尽管有些说法中也含有种族主义情绪。确实，特别关注这项调查中的 15 位非裔美国人雇主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我们的开放性问题的回应中，其中 12 人表达了他们对于内城区黑人的看法，对其编码的总体结果是消极的。只有 2 位黑人雇主的看法可以被视为是正面的，还有一位的态度是中立性的。于是，在被调查的所有白人雇主中，有 74% 的人对内城区黑人工作素质持有消极看法，而在黑人雇主中，这一比例则是 80%。

内城区一家批发公司的黑人董事长，描述了他认为生活在高度贫困聚集区会导致的后果：

于是，你将一群穷人聚集在一起，我并非是在诅咒，而是说，无论你是白人、绿人或灰白色人，你将他们都聚集在一起后都有一个悲惨的命运。你正在创造犯罪，以及天底下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吸毒。任何时候，你将类似的人聚集在一起——尤其是那些层次较低的人们，你实际上就是在毁他们。他们并不会像你所期望的那样，像一朵花似的在那里绽放？他自己找不到可以让自己像花一样绽放的理由。当他早上起床，他看到的就是人们都在无所事事地玩乐。他晚上睡觉时，仍然是这类事情。他们所想的事情只是，我是否要吃完饭后睡觉？

访问者：所以，你很理解有些雇主的小心警惕？

应答者：当然。

一位商业学校的主管，对阶级和种族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了如下复杂的解释：

我认为，人们的工作伦理是不同的，这取决于你从哪里可以发现他们的价值所在，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社会性的。你会发现，中产阶级黑人在美国白人的价值线上下浮动，你几乎可以发现存在一种具有可替换性的价值系列。但是，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你将会发现，他们中的少数人，因为失业的无底深渊和生活在黑人社区中的苦难是如此地广泛，以至于会使人们的生活降到最低点，于是就形成了这种奇怪的行为方式，并从中滋生出了一种不同的价值系列。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正是这些亚文化后果导致了所有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的发生。只要有些人的生活正在变成这样子，那么，我们就可以清晰地地区分出两群人的不同工作伦理，有一群人面临着生存问题，另一群则无需面对生存问题……这其实是一种经济价值而不是种族价值。

131

当问及黑人男性为何难以找到工作时，一家食物及药物零售店的黑人人事经理说道：“我认为，这其实是文化问题。我想，很多黑人男性对某些工作的态度是，他们感觉这些工作降低了他们的尊严而不是接受这些工作，他们宁愿混在失业大军之中。”芝加哥一家保险公司的黑人雇主指出：

人们通常认为，你的多数伙计都是黑人，他们并不具备恰当的技能……他们不知道如何写作。他们不知道如何说话。他们

不能以商业方式行事或穿着……以商业人群的那样子做事。他们也并未感觉到，他们需要逐渐地变成一名有素质的雇员……

访问员：你是否认为——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认识或其中是否有……？

应答者：我想其中包含了一定的事实。

在回答同样的问题时，另一位黑人雇主做出了如下消极应答：

态度。恶劣的态度。对此，我相当地直言不讳。他们很懒，很多人都这样。你知道的，当你深陷其中的时候，你认识到你陷入了不幸之中时，你却并不努力进行改变，那你将一直陷在其中。如果你开始进入福利模式，那将成为奴隶。如果这就是你想要的，但是，我们应该成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奴隶。我要去工作。这主要是态度问题，这就是我可以告诉你的，也是我所知道的，我就生活在他们周围，我知道正在发生什么。

132

最后，一家安保公司的黑人人事经理这样来反驳就业歧视问题：“对我来说，它就是一种神话，它是我们社会现在持续不断地灌输到很多人心中的东西，他们对它的依赖就像拄着拐杖一样。当你将其当做拐杖一样很好地依赖它的时候，你怎么还会让自己脱离它或让自己去干其他事情呢？所以，是不会的。我们应该将歧视这个拐杖扔出窗外”。

尽管雇主的批评既针对内城区的黑人男性，也针对黑人女性，但是黑人男性却受到了最严厉的、最频繁的批评。从雇主对于内城区黑人的意见中可以看出存在大量的抱怨，比如断言他们是不准时工作的、懒惰的、好斗的、危险的，经常拖延和缺勤，他们在就业史不断频繁地更换工作，常常难以通过药物检测。

他们的很多看法都清楚地表明，他们对于内城区黑人劳动力素质的评价跟他们的雇人策略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联。如果他们不愿意或不想雇用内城区黑人的话，他们可以用很多方式来否决黑人的工作状况或求职机会。雇主们在未经思考就完全拒绝黑人求职者时，或者并不认真对待黑人求职者时，显然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歧视，但只有很少的雇主承认这一点。其他一些雇主虽然会考虑黑人求职者，但是却经常将他们筛选出去，因为他们的求职能力并不强，或者他们并未在面试过程中留下很好印象，或者因为他们未能通过就业测试或技能测试。

求职面试为求职者提供了挑战雇主所形成的刻板印象的机会。然而，正如凯瑟琳·内克曼(Kathryn Neckerman)和乔琳·基尔申曼(Joleen Kirschenman)(他们是进行雇主调查的6位研究员中的2位)所指出的：

内城区黑人求职者的工作经历很有限，对白人世界、中产阶级世界又缺乏了解，这很可能会加大他们在通常的面试中的难度。有污点的工作记录也不得不得到纠正；误解和猜疑也许会削弱紧密关系的建立，阻碍沟通的进行。然而，即使内城区黑人具备了工作的客观资格，他们还是很可能会在面试中有关工作效率的主观性“测试”中败下阵来。^[5]

在通常的面试中，相对于主观评价而言，技能测试更为客观中立。有数据显示，跟那些不进行技能测试的城市雇主(也就是那些公司位于芝加哥市的雇主)相比，在进行技能测试的城市雇主的公司里，有着更高比例的黑人初级员工，即使将企业规模、职业、聚居区黑人比例等因素考虑在内后，结果仍然如此。

然而，参与招聘活动的很多芝加哥雇主，自动地削减或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那些可以申请他们公司初级工作的内城区求职者人数。通过各种方式限制求职候选人的选择性招聘，是本次调查中很多芝加哥雇主们

广泛采取的措施。尽管有些雇主从可行性和高效性方面为这些措施进行了辩解，但需要注意的是，他们依靠雇员推荐而不是对通过报纸广告而来的大量求职者进行筛选，以节省时间和金钱，多数人指出这可以找到更高素质的求职者。〔6〕

尽管求职者素质的形式标准不是以种族和阶级为基础的，但是各种招聘措施的设计却是为了吸引高素质的求职者。如果雇主将其招聘仅限于特定的社区或机构，并主要将招聘广告等刊登在族裔性的或社区性的报纸上，那么，内城区人口将会经常遭到忽视。确实，雇主们的招聘措施反映了他们对于内城区工人素质的认识。

对求职大军进行筛选的一种有效方式，是避免在芝加哥的各种报纸上刊登招聘广告。超过40%的芝加哥雇主，都没有将其初级工招聘广告公开登在报纸上。虽然很多雇主在地方性报纸上刊登了广告，但是，他们却主要是通过非正式的员工推荐网络来确定数量有限的求职者。而且，几乎有三分之二的城市雇主都将其广告刊登在族裔性、社区性、城郊性的报纸上，而不是刊登在大都市的报纸上。

134 在社区性、族裔性的报纸（“地方性”报纸）上登出职位空缺，方便了特定的目标群体，主要是西班牙裔和当代东欧移民中的白人（也包括“少数族裔”）。市中心一家法律事务所的合伙人指出，他们公司“会将招聘广告登在城市的北部地区”，因为那里的居民具有“更好的工作伦理”。他认为：“你知道的，那里是一个波兰人〔聚居区〕，那里的人都很有强烈的工作伦理。这不是歧视，我也在努力做到不歧视任何人。但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也有少数蓝领雇主会将招聘广告登在《卫报》（*Defender*）这份黑人报纸上，但这是出于雇用黑人的承诺或是为了遵循平权行动准则（affirmative action guidelines）。那些只是将招聘广告登在社区性或地方性报刊上的城市雇主，其企业在内城区居民中的传播也很有限，在这些企业从事初级工作中的人中只有16%是黑人，而那些将招聘广告登在大都市报刊上的企业，其黑人初级工的比例则是32%。

辨别学校教育的地点和素质，则是雇主们的另一种筛选方式。很多雇主提到了芝加哥公共学校的教育，几乎受此教育的都是黑人，所以公共学校教育就成为一项消极的符号，很多雇主都会忽视那些来自公共学校教育系统的大量求职者，更倾向于接受那些来自天主教学校或城郊学校的求职者。正如内城区一家批发零售店的雇主所言：“我为什么会愿意雇用那些来自芝加哥公共学校的人呢？因为我认为他们都没有好好学习。这是否是偏见呢？至少，这不是种族偏见，而是有关他们所接受的教育背景的偏见。”

一家蓝领企业的雇主对教育系统具有如下看法：

我们都会发现，从这种学校中出来的人，都不是我们想要的。教育系统没有使那些人做好从事这类工作的准备。

访问员：你认为，它应该如何为他们做好准备？

应答者：我也不确定，究竟如何可以让公共学校教育更好。我只是看到很多批评意见，因为他们那些人都不能胜任我们认为他们应该学会做的特定工作，尤其是计算工作，这在我们的事务中是很重要的事情。要有计算能力，阅读能力，读懂刻度表，要真正地去读懂它们。

在那些自动谈到他们从中雇用员工的学校的雇主们，他们通常所提到的特定学校都是天主教学校或芝加哥北部白人地区的学校。尽管雇主们更可能会雇用那些毕业于天主教学校的白人，但是，毕业于天主教的黑人还是会比来自公共学校的黑人更受青睐。比如，郊区一家百货店的雇主指出，跟白人学生相比，虽然少数族裔学生经常都通不过技能测试，但是，“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的少数族裔学生的技能测试成绩却跟白人学生相当。他们来到这里时，穿着很好，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做法。于是，我就发现，在教会学校和公共学校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

当雇主不喜欢雇用那些毕业于芝加哥公共学校的大量黑人时，他们

还会鄙视那些接受福利项目和国家就业扶持项目的人。城市贫困与家庭生活研究项目的雇主调查表明，只有16%的城市雇主雇用了来自福利机构的人，只有三分之一的城市雇主雇用了来自国家就业扶持机构的人。^[7]这些项目主要是提供给内城区黑人的，而雇主们却觉得，参加这些项目的人都是不合格或不恰当的求职者。正如一位雇主所言：

无论何时，当我接受国家机构、城市机构或福利机构的推荐时，我确实发现，那些人都还没准备好按时工作，还没准备好去看看新工作是如何做好或完成的。我的意思是说，这些人似乎都没有某种工作伦理。

对于内城聚居区的很多城市雇主来说，他们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选择性招聘。^[8]他们很少将招聘广告登在地方性报纸上或从学校招人，他们主要依赖的是非正式的员工网络。一家内城区医院就决定不刊登招聘广告，而是通过社区就业项目和非正式员工网络来进行招聘。正如这家医院的负责人所言：“如果你只是一个冷漠而孤僻的求职者，那你几乎就不会有任何找到工作的机会。”

内城区的一位零售商对年轻工人的不敬行为和偷窃倾向颇有抱怨，她曾从年轻人就业指导项目中雇用过一些人，她说：“我认为，我在尽最大努力地从中选择员工……我了解加油站的某个伙计，某个经营汉堡王的伙计，我们在一起都谈论的是这些事情。”

136 从这次雇主调查可以看出，很多城市雇主所进行的选择性招聘，其导致的结果是将大量的芝加哥内城区黑人系统性地排斥到了就业体系之外。鉴于雇主们对于内城区工人总体上的消极看法，我们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尽管雇主们觉得为了招到更高素质的工人而必须采取这些措施，但是，他们事实上却有意地、精心地将内城区黑人排斥到了求职候选库(applicant pool)之外。

我们该如何解释雇主们的消极态度和行动呢？这些消极态度和行

动究竟在何种程度上代表了对于黑人本身的嫌恶？又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雇主们在不断变动的劳动力市场中对内城区黑人在工作技能和培训水平等方面的评价？正如前述所论，非裔美国人雇主对于内城区黑人求职资格的认识，跟白人雇主几乎没有多大差异。这就提出了种族在特定情况下具有多大意义、有何种重要性的问题——换句话说，种族是如何与其他因素相互作用的。人们通常持有的一个核心假定是，鉴于经济状况在当代发生的变化，雇主们主要寻找的是具有多种能力的员工：包括“硬”技能（文字能力、算术能力、基本的机器操作能力以及其他可测量的素质）和“软”技能（跟工作环境比较符合的人格特征、良好的穿着打扮、合群的工作行为等）。^[9]硬技能主要是教育和培训的结果——这一好处显然是内城区各学校中比较缺乏的，软技能则很大程度上跟文化有关，于是主要是被内城聚居区的恶劣环境所塑造而成的。如果雇主们确实根据白人和黑人求职者之间的技能差异进行决策的话，那也很难辨别雇主们的真实动机：他们之所以拒绝内城区黑人求职者，究竟是出于公然的种族歧视还是由于客观的资格能力？就二者关系而言，洛杉矶的一项研究发现，即使将教育、收入、家庭背景、居住地等因素考虑在内后，跟浅肤色的黑人男性相比，深肤色的黑人男性仍然有52%的可能找不到工作。^[10]尽管这项研究强烈地表明，种族歧视确实对黑人的高失业率有重要影响，但是该研究却并未清楚地分析雇主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将肤色的深浅程度跟内城聚居区的社会及文化环境联系了起来。

然而，很多选择性招聘措施又确实代表着经济学家所说的统计歧视：雇主们在总体上对内城区黑人持有某种假定，并且在尚未有机会对个体求职者的资格能力进行系统性评价之前，就以此假定为基础进行了

137

同样背景的西班牙人和白人工人相比，选择性招聘模式有效地排除了非常多的黑人工人。但是，种族一直是一大影响因素，即使对于那些以能力测验和客观评价为基础而否决内城区黑人工作的决策，种族因素也在发挥着作用。内城区黑人的硬技能和软技能不符合劳动力市场的当前需求，这主要是种族性的隔离居所导致的后果，被隔离的种族社区在历史上就一直受到广泛的社会限制和机会限制。

很多内城区居民也感受到了雇主们经常给予他们的消极评价。一位来自南部贫困聚居区的33岁门卫这样说道：“当我去找工作时，有两个接待员偷偷告诉我：‘你知道招聘过后他们是如何处理那些黑人的申请材料的吗？’他们说‘我们会撕掉它们，将其扔到垃圾桶里’。”一些内城区居民除了担心因为种族问题而被拒绝之外，还会担心仅仅因为他们的内城区或聚居区地址难以找到而遭到拒绝。居住在公共廉住房中的一位福利母亲这样说道：

老实讲，我坚信他们会很看重你的地址，你知道的，你的态度、你的地址、你的邻里、你的环境跟你的就业地位具有很大的联系。居住地很好的人也会有很好的就业机会，我是这么觉得的。

居住在南部聚居区、有两个孩子的另一位福利母亲，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138

我认为，这里的很多人之所以没有找到工作，是因为他们居住在公租房内。他们会仅仅因为“你仅仅居住在公租房内，就觉得你不好。是的，我就是这么认为的！我感觉就是这样！我觉得，很多人都是根据你居住在公租房这一点来评价你。你知道的，当你提交一份求职申请时，他们很可能不会雇用你，因为你居住在这里”。

一位34岁仍然单身、失业的黑人男性这样说道：“如果你来自一个很好的生活区，我相信，你找工作会变得很容易。我曾经去找工作，听到人们是这样看待我的：‘我怀疑他是否是我们需要的那种人，因为他居住在聚居区’。”

尽管雇主们对于内城区工人的消极感知，使低收入黑人找工作或维持工作变得困难，但是，值得注意的有趣之处是，雇主们的认识和内城区居民的看法在某些地方具有一定的一致性——也即，他们对于内城区黑人男性的态度。内城区居民也都注意到了他们聚居区内的男性失业问题。比如，城市贫困与家庭生活研究项目的调查表明，有超过一半的居住在贫困率至少为40%的聚居区中的黑人应答者认为，他们聚居区中的男人很少或者几乎都没有稳定的工作。而对于居住在贫困率至少为30%的聚居区中的黑人应答者来说，则有三分之一的人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所有生活在聚居区中的黑人应答者中，有40%的人感到男性就业人数在过去的多年中正在稳步降低。然而，从社会机会调查中开放性问题的回答情况和民族志访谈资料来看，应答者们对于内城区黑人男性具有某种持始终如一的消极性观点，尤其是对于年轻的黑人男性。

有一些解释承认了黑人男性所面临的一些限制，比如，一位住在北朗代尔并处于工作状态的25岁未婚父亲讲道：

我知道我这个年纪的很多人都不去工作，我知道有些人只是干干临时工，但是他们都想去工作，只是找不到工作。你知道的，他们获得了高中文凭……但是，关键在于，这些工作经常要求有工作经验。但是，如果你从没有机会去获得任何工作，那你又怎么可能会获得工作经验？

然而，还有一些内城区黑人表达了跟雇主们类似的观点。比如，一位有三个孩子的30岁已婚父亲，他生活在北朗代尔，在一个工厂值

夜班，他说：

我觉得，有 65% 的黑人都不愿意工作，当我说他们不愿意工作的时候，我指的是他们不愿意勤奋工作，他们其实想要的是一个很轻松但却可以赚大钱的工作，明白吗？当你说努力工作、通过辛勤劳动赚钱或至少偶尔要辛苦一些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不认为他们会愿意付出额外的辛苦，他们不愿意那么做。于是，他们经常不去干稳定的工作，或者不是按时上下班，就是到工厂闲坐着，总是喜欢到处晃悠或愉快地打发时间。

一位住在芝加哥南部英格伍德(Englewood)社区、有 8 个孩子的 35 岁福利母亲也说道：

我是说，你可以看到，那些家伙们到处闲逛，他们不去工作，甚至不去尝试，他们不想去工作。你知道我自己的想法，我想去工作，但却没有工作。你看到过这个社区中的人早起去干点什么呢？他们什么都不想干——他们真的不愿意去做任何事情。

黑人男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恶化，也许是导致雇主和内城区居民对他们持有消极看法的原因。这些消极看法仅仅是刻板印象，还是说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呢？城市贫困与家庭生活研究项目的调查数据表明，跟测量个体态度的各个变量相比，社会背景变量(聚居区、社会网络、家庭)的差异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黑人和墨西哥人之间的就业率差距。^[11]调查数据还表明，失业的黑人男性比其他少数族裔的失业男性具有较低的“保留工资”(reservation wage)。^[12]他们愿意接受低于每
140 小时 6 美元的工资标准，而失业男性中的墨西哥人和波多黎各人则对其工资的预期分别为每小时 6.20 美元和 7.20 美元，这一预期工资是他们

的工作条件。白人男性的预期工资，则是每小时9美元。我们通常将黑人男性概化为“无所事事但却想要报酬”、坚持要求高工资，上述数据使这种概化变得有些可疑。

但是，社会调查或许不是了解潜在态度和价值的最佳方式。于是，为了更好地把握文化问题，城市贫困与家庭生活研究项目的民族志研究者跟聚居区的人们建立了长期联系，并对几个聚居区的居民进行了深入访谈。理查德·陶布(Richard Taub)指出：

研究美国人中的亚群体的任何人都知道，不同的亚群体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模式，并会导致一定的社会后果。对于那些关注贫困和文化因素的人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将文化安排跟宏大的结构性现实联系起来，从而去理解结构性位置所导致的后果跟群体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尤其重要的是要理解这种影响的双向性。文化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对结构性环境和物质性环境的适应为基础的。^[13]

对民族志资料的分析表明，在内城区少数族裔群体中存在着可辨识的、持续性的态度与信念模式。陶布对这些资料的系统分析表明，在对于低工资工作的态度方面，黑人男性比墨西哥男性更加充满敌意，更不愿意灵活地去完成原本不属于其工作范围的工作安排或工作任务，更不愿意为同样多的低工资而努力工作。两个群体在行为上的反差是很明显的，因为被访的很多墨西哥人都是最近的移民。

“移民，尤其是第三世界的移民”，经常“能够容忍恶劣的条件、较低的工资、较少的升迁渠道以及其他一些使本土工人不愿从事某件工作的因素，于是，他们比其他人就表现出了更佳的‘工作伦理’”。^[14]民族志资料表明，墨西哥移民大都工作很努力，因为他们“来自极端贫困的地区，即使再枯燥、辛苦和无前途的工作，对他们来说，都比原先的

生活要好很多”。^[15]他们还会害怕因为自己的失业而被驱逐出境。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在我们的民族志样本中，黑人和墨西哥人之间的反差之所以如此之大，是因为后者主要是刚来的移民。我们的民族志研究主要是在内城区的黑人聚居区和拉丁裔聚居区进行的，因而可以在有关墨西哥男人和非裔美国男人的深入访谈基础上，以充分的民族志资料来对这两个群体的工作态度进行系统比较。然而，正如前面曾指出的，城市贫困与家庭生活研究项目的大型调查表明，内城区的白人男性比非裔和拉丁裔的内城区黑人男性具有较高的保留工资。于是，我们也就没有理由认为，他们对于无前途的卑微工作的态度会比黑人男性更不消极。

由于我们的样本主要是取自贫困地区，其中不成比例地访谈了大量移民，他们最初都主要居住在贫困地区。正如前述研究一直表明的，移民离开原先的贫困经济而进入到一个发展程度更高的经济体中时，为了改善他们的生活标准，他们愿意接受本土工人厌恶或拒绝的那些工作。于是，我们可以合理地假定，他们越是变得“美国化”，他们就会越不愿意接受低工资的卑微工作和危险工作。

跟墨西哥男人相比，内城区黑人男性会抱怨，分配给他们的都是最重的、最脏的工作任务，而他们却最经常受到忽视，支付给他们的报酬都没有其他族裔高。他们强烈地感到，他们是歧视的牺牲品。“墨西哥裔美国人同样也认为他们受到了剥削”，陶布说，“但是，这在一定程度上跟所处区域有关。”陶布指出，内城区黑人男性具有相对更强的“荣誉”感，他们经常将工作、工资和老板的对待视为是侵犯和贬损。于是，对于剥削的高度敏感经常会加剧他们的愤怒，并会导致“盲目离职”趋势。

为了理解这些态度及其形成原因，我们必须去探寻黑人男性被逐渐排斥到制造业及其他产业中高工资的蓝领工作之外的过程，以及他们被
142 逐渐限制在低收入服务性工作中的过程。可以想见，很多低收入工作经常都只有很低的保持率(retention rate)。比如，雇主调查中的一位应

答者指出，他所在企业的工作更换率甚至超过了50%。^[16]当问及他是否考虑过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时，该雇主坦诚，他们公司出于理性选择会容忍较高的工作更换率，而不是通过提高起始工资、改善工作条件来吸引那些高能力的工人：“我们采取的措施之一是不断地进行招聘，希望其中会有一两人能够最终留下来，这就已经很不错了。”

正如凯瑟琳·内克曼(Kathryn Neckerman)所指出的：“这位雇主和其他的类似雇主们，之所以能够负担这么高的工作更换率，是因为工作内容很简单，任何人在一两天内就可以学会。平均而言，低于每小时5美元或6美元的工作都会有很高的离职率。相反，对高收入工作而言，每年离职职员的比例则低于20%。”^[17]然而，我们的调查数据却表明，跟拉丁裔和白人相比，内城区黑人男性占据高收入蓝领工作岗位的比例发生了急剧的下降(参加附录C)。内城区黑人男性被逐渐地转移出了制造业，而被日益限制在低收入的服务性工作中。在芝加哥，即使不考虑雇员的种族和族裔差异，每年低收入服务性工作的工作更换率都在50%以上。^[18]

于是，很多内城区黑人男性对于其工作和工作前景所表达的态度，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在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跌落。他们越是抱怨和表达不满，他们似乎就越是不被雇主所青睐。因而，在找工作时，他们就会经历越来越多的拒绝；当努力维持其工作时，他们就会跟主管发生更多的冲突。

居住在高度集中的贫困聚居区，则加剧了黑人男性作为弱劳动力的归属感。缺乏有效的非正式求职网络，经常从事非法活动，又日益加剧了他们的非主流行为，如欺诈。正如城市贫困与家庭生活研究项目的另一位成员莎伦·希克斯-巴特莱特(Sharon Hicks-Bartlett)所指出的：“所谓欺诈，就是为了金钱而不择手段地从事任何事情，只要能够达到目的。它既可能是合法的，也可能是违法的；既可能发生在正式经济中，也可能发生在非正式经济中。虽然男性和女性都会进行欺诈，但是男性更显著地从事非法的欺诈活动。”^[19]

143 在对黑人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经历进行文献评述时，菲利普·莫斯(Philip Moss)和克里斯多弗·蒂利(Christopher Tilly)指出，由于合法工作机会的缺乏，城市地区越来越充满了各种犯罪活动。他们提到的一项在波士顿开展的研究表明，“原先波士顿黑人青年中通过工作赚钱跟在街头弄钱的人数比例差不多是各占一半，但到1989年时，这一比例却变成了3:1，多数黑人青年都说他们在街头弄到的钱要多于工作赚的钱”。^[20]

经济重组会继续加剧人们对于内城区黑人男性的通常认识及其消极后果。因为内城区黑人逐渐被移出制造业，被转移到了服务业内，而服务业的雇主们又认为，他们所最需要的是那些能够有效地为消费者提供服务、跟消费者建立良好关系的员工，人们通常并不认为内城区黑人男性具备这些素质。^[21]

城市经济的重组，还会继续加剧对内城区黑人女性已有认识的负面效应。内克曼指出，跟经济转型相伴随的工作文化的变化，会导致劳动力市场上新旧两种成功方式的难以衔接。^[22]换句话说，蓝领工人雇主、服务业雇主跟白领工人雇主会在实际措施上存在越来越大的差异。而在评估内城区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成功与否时，这种不匹配或不衔接就变得极为重要。

内城区的低技术人们，会逐渐变成蓝领工人或服务员工，于是，他们的工作经验很大程度上都被限制在蓝领工作和服务工作之中。但是，“已经在蓝领工作或服务业中社会化地习惯其工作方式和职业生涯的职员们，一旦进入到白领世界时”，该怎么办呢？^[23]雇主调查表明，蓝领工人和服务员工在最初找工作时，他们最初工资很低，但会在工作中进行所有必要的技能培训，并且会随着资格和业绩的提升而获得更多福利、更高职位。^[24]但是，在白领工作环境中，内城区黑人将面对的初级岗位则需要进行更多的、更持续的培训，因而雇主更倾向于雇用那些精力充沛的、聪明的、掌握良好语言能力的人。白领世界中的职位晋升，也很少会以资历为基础。于是，“他们的发展也许将以

相当微妙的评估标准为基础，而在从事蓝领工作或服务工作中时，以此标准为基础的行为很可能是跟工作无关的，或者是会受到消极惩罚的”。^[25]对内城区工人进行的访谈表明，多数人都认识到了劳动力市场的性质变化，为了取得成功，他们将越来越多的额外费用花在了教育和培训上，但很多人“事实上却十分赞同蓝领工人的不断进取方式”。^[26]

144

总之，不能简单地将劳动力市场中的种族问题归结为歧视问题。尽管我们的数据显示，内城区黑人（尤其是非裔男性美国人）在劳动力市场上正遭受到越来越多的问题，但是我们应该深入到各种因素相互作用所构成的复杂网络中寻找问题的原因，其中也包括那些跟种族无关的因素。

传统的制造业工作及其他蓝领工作在芝加哥的减少，导致了内城区黑人男性失业率的日益增加，他们越来越集中到了收入很低、更换频繁的服务业工作中。在贫困聚居区中，社会网络和家庭关系并不有助于就业，内城区黑人跟同样背景的西班牙人、白人之间的差距日益拉大，尤其是当劳动力市场萧条之时。西班牙裔美国人“在持续地向制造业集中，因为跟黑人相比，雇主们更青睐西班牙人，他们更喜欢通过当前员工的推荐来雇用新员工，由于西班牙人所嵌入其中的移民网络，他们将更加容易获得推荐”。^[27]面对这种就业前景，内城区黑人男性会更加充满痛苦和怨恨，并经常在他们的恶劣的、缺乏人性化的、低工资的工作环境中表达和发泄出这些感受。

他们的态度和行动，以及他们不断频繁更换工作的、不稳定的职业生涯，经常会使人们认为他们并非是合适的求职者和员工。这种概化感知又会进一步成为雇主们采取消极雇佣决策的基础，当经济状况不良时，雇主们采取消极雇佣决策的可能性会更大。对于内城区黑人男性的拒绝，之所以会在长时期内日益严重，不只是因为雇主们越来越转向雇用日益增加的移民和女性劳动力，而且还因为需要跟大众进行接触的岗位数量在持续增多。

内城区黑人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同样也面临着问题。贫困聚居区

的高度社会隔离，很不利于她们的就业前景。尽管跟内城区黑人男性相比，她们会受到芝加哥雇主们相对较多的青睐，但是，她们的社会隔离很可能会增强她们对于工作文化的投入，而这会阻碍她们顺利地转向白领世界。此外，贫困聚居区、关系薄弱的社会网络、贫乏的家庭支持等因素都会影响他们的语言能力的发展，以及在日益要求员工能够跟大众进行有效交流的新经济中所必需具备的跟工作有关的其他技能的提升。

除了雇主的态度之外，如果美国经济可以在较长时间内维持较高就业水平的话，内城聚居区的高失业率将会逐渐降低。在萧条的劳动力市场中，也即在一个伴随着高失业率的劳动力市场中，雇主们在雇用新职员和晋升老职员时就会具有很大的选择性，这确实也能够做到。于是，他们强调工作的前提条件，夸大工作经验的价值。^[28]在这种经济氛围中，贫困的少数族裔人口遭受着不成比例的巨大不幸，雇主们对少数族裔的歧视程度也会日益严重。而在供不应求的劳动力市场中，将会存在大量的岗位空缺，失业仅仅是暂时的，工资也相对较高。而且，在供不应求的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也会急剧增多，因为日益增加的就业机会不仅会减少失业，而且会使那些原先因为就业前景黯淡而完全脱离劳动力市场的人们，重新加入劳动力大军。跟劳动力市场萧条时的情况相反，在供不应求的劳动力市场中，因为失业率低、工资高、工作好，所以，包括那些少数族裔贫困人口在内的所有工人的地位都会有所改善。

1990年代前半段时期的经济复苏，已经在总体上降低了黑人的失业率。在过去20年中，非裔美国人的失业率第一次降到了比1994年的10%还要低的水平。^[29]确实，“跟成年白人相比，成年黑人失业率在1994年降得非常快”。^[30]这部分是因为制造业岗位在短期内的增多。相反，在1980年代的经济复苏时期，制造业工作岗位日益减少。在1989年1月到1993年9月期间，减少了超过1500万个工作岗位。

然而，在接下来的16个月中，却又创造出了3.1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显著地缓解了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中的黑人工人的困境。

但是，失业率只是代表着工人在劳动力大军（也即那些在积极寻找工作的人）中的比例。更为重要的测量方法是就业人口跟总人口的比率，这相当于年龄在16岁及以上的、正在工作的成年人比例。比如，1994年12月，年龄在16岁及以上的黑人青年的失业率是34.6%，相对的白人青年的失业率是14.7%；在所有黑人青年中，只有23.9%的人处于实际工作状态，而相应的白人青年的比例则是48.5%。^[31]在前些年，由于受到财政及货币政策的刺激，劳动力市场需求不仅消化了那些技术性失业者（也即那些正式劳动力中的失业者），而且扩大了就业范围，将那些原本不在劳动力市场之中或已经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黑人都吸收了进来。^[32]如今，不在劳动力大军中的内城区居民问题，开始日益超出货币及财政政策的调控范围。最近这些年的问题是，供不应求的劳动力市场的持续时间是相对短暂的，并且经常伴随着经济衰退，而这不是会摧毁很多工人之前的所得，就是会使其他人难以从先前的经济停滞时期中恢复过来。在很多年内，应该继续保持劳动力市场的供不应求，以便将那些脱离劳动力大军的、感到气馁的内城区工人完全吸引回来，他们中的有些人可能已经脱离劳动力市场很久了。工作机会在内城聚居区中的减少和消失，向我们的社会提出了十分严峻的挑战。失业问题的后果不仅限于内城聚居区，而且还影响着整个芝加哥市的生活质量和种族关系。

146

注释：

[1] 内克曼和基尔申曼的两项研究是对城市贫困与家庭生活研究项目中雇主调查数据进行的最早分析，参见 Kirschenman and Neckermann (1991) and Neckermann and Kirschenman (1991)；还可以参见 Braddock and McPartland (1987)，Braddock et al. (1986)，Culp and Dunson (1986) and Holzer (1995)。

[2] 参见 Neckermann and Kirschenman (1991)。

[3] Krogh (1993)。

[4] 33%的雇主认为缺乏工作机会是芝加哥内城区高失业率的影响因素之一，21%的雇主提到培训和教育的缺乏。18%的雇主提到工作伦理是原因之一，15%的雇主提到了

福利体系，14%提到了技能不匹配，12%的雇主提到了缺乏工作动力，10%的雇主提到了缺乏便利的交通。

[5] 引用自 Neckermann and Kirschenman(1991), p.445. 这两位研究者最先撰写了有关城市贫困与家庭生活研究项目雇主调查的研究论文，并指出了这里提及的雇主们经常使用的招人策略。在此有关招人策略的分析，我很大程度上受惠于她们。有关雇主招人策略的研究，还可参见 Braddock and McPartland(1987), Cross et al.(1986), Culp and Dunson(1986)。

[6] Neckermann and Kirschenman(1991).

[7] Neckermann and Kirschenman(1991).

[8] Neckermann and Kirschenman(1991).

[9] Ferguson(1993)和 Holzer(1995).

[10] Johnson et al.(1996).

[11] Van Haitsma(1991).

[12] Tienda and Stier(1991), p.19.

[13] Taub(1991), p.1.

[14] Aponte(1991), p.41.

[15] Taub(1991), p.14.

[16] Neckermann(1993).

[17] Neckermann(1991), p.8.

[18] Neckermann(1991).

[19] Hicks-Bartlett(1991), p.33.

[20] Moss and Tilly(1991), p.7.

[21] Kirschenman(1991).

[22] Neckermann(1991).

[23] Neckermann(1991), p.27.

[24] Neckermann(1991).

[25] Neckermann(1991), p.27.

[26] Neckermann(1991), p.27.

[27] Krogh(1993), p.12.

[28] Tobin(1965).

[29] Holmes(1995).

[30] Holmes(1995).

[31] Holmes(1995).

[32] 在此，我要多谢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James S.Tobin)在跟我进行私人沟通时所提出的意见。

第二部分

对社会政策的挑战

第六章

美国有关贫困与福利的信念体系

149

从历史上看，欧洲与美国在城市不平等的性质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没有哪个欧洲城市，具有过美国大都市的典型特征：贫困的高度集中、种族及族群的隔离。没有哪个欧洲城市，曾经存在过诸如美国内城聚居区这样的区域：空间孤立、生活环境恶化、暴力倾向严重。^[1]总之，欧洲历史上并未出现过类似于美国内城聚居区困境的问题。然而，欧洲的境况却开始发生急剧变化。欧洲城市也开始面临曾经困扰着美国城市的很多社会紊乱问题：失业人口的不断增长、贫困的集中化、种族及族群之间的冲突。

就种族及族群问题的根源而言，欧洲城市之间各不相同。随着苏维埃帝国的崩溃，东欧族群冲突日益增多，这是由于民族主义者在民主化时期进行的政治斗争，而不是由于移民问题。然而，除了东欧与西欧的差异外，即使在西欧各国之间也存在着极大的不同。从1960年代晚期开始，北欧在经济发展中接纳了很多工人，他们主要来自土耳其、西北非地区的马格里布联盟诸国、北非地区、中东地区以及前英国、荷兰和法国的殖民地。这些移民的流入，使欧洲各民族的文化体验得了很大扩展；外来移民与本土人口之间的差异，对传统上以同质性为基础的共同体也构成了挑战。

在探讨城市贫困与种族矛盾时，经常被用来跟美国进行对比的欧洲国家主要是英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这些国家都曾经是殖民强国，来自其前殖民地的移民在其当代移民人口中占有很大比重。诸如

150

瑞士、挪威、瑞典和德国等国家也曾吸纳大量移民，但主要是来自南欧的劳动力和来自欧洲以外的难民。最后，在 20 世纪中叶几乎一直都是“输出国”的欧洲南部地区，现在也开始出现外来移民的快速增长，这些移民主要来自非洲西北地区的马格里布联盟诸国。

流入到这些国家的外来移民都不同比例地分散在各个高失业率地区。尽管跟困扰着美国内城聚居区的社会紊乱及其严重性、深层性相比，这些地区还不能与之匹敌，但是，在法国、荷兰等国家中，内城区、位于郊区的城外公共住房区跟主流的劳动市场体制和非正式的求职网络已经断绝了联系，于是造成了恶性循环：弱势劳动力的福利依赖、社会排斥的增强、矛盾的增加。

虽然这些欧洲内城区仍然住着很多本地居民，因而在人口上比几乎完全由黑人构成的美国内城聚居区更为混杂，但它却总是不同比例地将第一代和第二代的移民不断吸纳进来。从一些欧洲国家的发展趋势中可以看出，有的欧洲城市正开始走向某种社会极化 (social polarization)，而这曾是美国大都市的典型特征。

然而，更重要的是，欧洲经济及工业的重组，包括传统制造业地区的逐渐衰落，使其对非技术移民的需求逐渐降低。在国内劳动力短缺时期雇佣的大量外来移民，现在却开始被大量解雇。以后几十年尽管也会产生大量新工作，但都将需要一定的培训等级和教育程度，而这却超出了多数移民人口的水平。作为被最后雇佣但却最先被解雇的人口，少数族裔移民的失业率在 1970 年代、1980 年代持续高升，其失业率从 25% 一直上升到 50%，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高失业率。这跟美国内城聚居区人口所面临的境况极为不同，但由于这些问题的经济根源都很类似，因而值得对其予以深入探究。

我们必须认识到，美国内城区无业人口的急剧增多和欧洲及加拿大失业率的增长，主要都是由于全球经济所发生的快速技术变革造成的。首先是批量生产的逐渐降低。^[2]在美国经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变化的后果，因为过去的美国经济曾得益于生产率和生活标准的快速提

升。正如本书第二章所指出的，批量生产体系主要得力于大量的廉价自然资源、规模经济以及通过在不同市场力量之间进行转换来实现高生产率、通过某一产业的改进而导致其他产业也得以发展的市场过程。

批量生产体系的技术要求，在教育学习体系中得到具体反映。美国公共学校主要针对的是收入较低的美国本土学生和移民学生，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基本的读写和运算能力，这些正是在批量生产的制造厂、服务业和农场中进行日常工作所必需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父母从事管理工作或更为职业化、技术化的家庭，会将其子女送入公立或私立的学校接受更精英化的教育，并利用家庭联系和父母经验的优势，为子女以后从事高收入职业提前做好准备。“从学校到工作的转换过程是非正式的，很大程度上与家庭具有紧密关联，但通过正式的教育体系，这一非正式的转换却得到了固定化和永久化。”^[3]

如今，技术与国家竞争之间的紧密关联，侵蚀掉了有关批量生产体系的各种基本制度。在最近的几十年中，几乎所有生产改进都跟技术和人力资本有关，从而使体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的重要性急剧下降。而且，在传统的批量生产体系中，只需要少数教育程度较高、职业化、技术化、管理性的工人，因为多数工作“都是惯例性的，那些具有基本读写和运算能力的工人就可以做好”。^[4]相应的，从国际比较和历史比较可以看出，那些教育程度有限的工人所获得的实得工资也相对较高。“在19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之后尤其如此，因为那些不愿意工作、集体要求提高工人对整体性体制收益的分享率的人们开始享受社会保障，货币和财政政策也有助于批量生产体系在相对低失业率条件下的运行。”^[5]

152

尽管技术变革的同时也创造出很多新工作^[6]，但却也使很多其他工作遭到淘汰。从机器人的发明到信息高速公路的发展，这些技术变革使工作场所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教育和培训变得日益重要，这使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确实，由于教育水平过低，无论在美国还是欧洲，越来越多的非技术工人不是失业就是工资很低。随着教育程度较高的工人从这场快速技术变革中不断获益^[7]，那

些缺乏技术的工人，比如那些生活在内城区居民点的人们，不得不面临日益严重的裁员危险。例如，各种计算机化操作工具的发展，更加需要高技术的设计师、工程师和计算机操作员，这一发展同时也就使那些原先的手工作业和流水线工作被淘汰。而且，文字处理工具的发展，使不仅知道如何打字而且清楚如何操作专业化软件的职员更加受到青睐；同时，对于传统打字员和秘书的需求，也就日益减少。

国际竞争又进一步加剧了技术变革的影响。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技术和市场，竞争体系也不得不变得越来越灵活多变。为了在国际市场中更具竞争力，很多公司都开始改进生产及产品质量或降低工人工资。相对而言，低工资策略是最容易的方式，也是美国企业最常见的市场选择。卡特总统执政时期的美国劳工处秘书长雷·马歇尔(Ray Marshall)曾言：“多数其他工业国都拒绝这一策略，因为这意味着低水平的、更不平等的工资，并可能伴随着严重的政治、社会及经济后果。”^[8]为了激励企业采取高工资策略，欧洲和日本已经开始采取各种措施。^[9]首先，政府必须致力于在经济恢复战略上达成全国共识——这也许是走向有效变革的最重要一步。于是，各个企业不得不在某种政治性的、监管性的环境下采取高工资策略，政府监管的内容主要包括将资源投入到高生产率的经济活动中、贸易及工业政策、工资监管政策、153 相对慷慨的家庭支持体系及失业补助、全民健康保障。但是，随着当前失业率的急剧上升，欧洲国家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因而倾向于采取原先美国所进行的低工资策略。

在几年前的全球经济衰退时期，当所有主要的工业化民主国家的失业率都急剧上升时，“常见的看法都认为商业周期的情况好转，将有助于解决多数问题”。^[10]当美国在1990年代进入经济恢复阶段、欧洲最糟糕的经济衰退也已经结束之时，新的高工资职业在大西洋两岸都仍然较为稀少，这反而使人们担心这种短缺状况可能会持续很久。

在如今这个高度一体化的全球市场之中，经济能够不断增长，股票市场持续高升，公司盈利猛增，然而，很多工人却一直处于无业或失业

状态。这是为何？因为“现在的资本和技术是如此具有灵活多变性，以至于它们并不会经常在它们的后院中创造出很好的就业机会”。^[11]公司不断进行削减，努力在全球经济中使其运作更合理化，这进一步加剧了很多工人的失业灾难。总之，如今的经济增长并不必然会导致更好的就业。

我们可以通过比较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来从不同方面看待就业问题。欧洲和加拿大在持续地增加工人的工资和其他福利，但其代价却是较高的失业率，因为较为丰厚的失业保险可以使很多工人免于经济困境。1994年，11%的欧洲劳动力或1 800万人口都处于失业之中。相比而言，更早走出经济衰退期的美国，主要通过让工人们接受较低工资而确保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其结果是，这导致美国高收入工人和低收入工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因为欧洲提供了相对丰厚的社会保障，于是很多人都不愿去做美国低技术工人所从事的那些报酬较少的工作。他们更倾向于依赖相对丰厚的失业补助。“在多数欧洲国家，每位失业工人每个月大概可以领到1 000美元。此外，在监管严格的欧洲就业市场中，解雇员工是极其困难的，这使雇方不会轻易地提供更多就业机会。”^[12]这不仅导致失业人口和工资及社会保障缴款额度的稳步增长，而且还导致欧洲市场越来越缺乏竞争。

在1973年到1991年期间，美国经济创造了3 500万个就业机会。^[13]同期的欧洲则只增加了800万个岗位，人口却增加了三分之一。正如第二章指出的，美国的绝大多数新工作都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包括那些由教育程度和技能培训都很缺乏的工人从事的工作，女性在其中占有不同的比例。服务业就业人口的增加，缓解但却并未完全消除美国城市中心的低教育程度工人所面临的就业机会不断减少的困境。确实，多数就业机会的增长都主要发生在城市中心以外。^[14]

在更为灵活的美国劳动力市场中，实际工资会以低于5%的比例逐年增长，而欧洲每年实际工资的增长则高达三倍。“在欧洲，最低工资标准

相对较高，因为生活成本的上升，以及还必须确保四周年假。”^[15]在美国，自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制造业工人的全部收入——包括工资、健康保险、年假，既未猛增也未降低；而在欧洲，从事相应工作的工人，其收入则增长了40%。^[16]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收入是每小时16美元，德国工人则是26美元。在1980年代，在消除通货膨胀因素以后，缺乏任何大学教育的美国低收入工人的工资下降了15%，相应的欧洲工人的工资则增长了15%至20%。

为了在全球市场中变得更具竞争力，欧洲国家的调适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17]有些欧洲观察家指出，必须大量缩减欧洲大陆的劳动力。其他人则强调，将生产活动转向世界上工资低的地区。这两种策略都将导致更高的失业率。还有人指出，战胜失业问题（包括美国经济所面临的那些源自产业成本缩减所产生的失业问题）的方式之一，是发展服务业，尽管服务业的工资水平较低。如果这样的话，就不得不放松有关区划法（zoning law）和店铺开业时间的很多限制。此外，还将需要通过降低税收和非工资收入来改变福利国家政策，其中非工资收入是导致劳动成本上升的重要因素。

155 当前的一份以访谈主要的政府官员、企业经理、经济学家和欧盟领导人为基础的报告表明，这些人对于未来是否能够解决全球竞争问题的前景感到悲观。^[18]这些领导人感到欧洲既缺乏时间也缺乏政治意愿去彻底改变社会及政治惯性，以使私有部门能够在全全球经济中更好地进行竞争，从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解决失业问题。“多数人都一致认为，应该大幅削减支撑着欧洲社会保障项目的繁文缛节、税收及非工资劳动成本，但是很少有人相信这将会在未来得以实现。”^[19]

欧洲福利国家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并使其呼吁削减福利分配来解决失业问题；但除此之外，美国和欧洲在贫困及不平等问题上的程度所存在的显著差异也得到了关注。相对于多数欧洲国家来说，美国并未建立全面的保障项目以提升美国公民的社会权利（social rights），即使反

贫困项目也是很分散的，并且只是针对范围很小的特定对象。

跟多数欧洲国家和加拿大相比，美国的社会资格权利 (social citizenship rights) 的发展程度很低，社会资格权利跟政治资格权利和公民资格权利 (political and civil citizenship rights) 的关联也很小。尽管在二战后，美国的社会资格权利得到了提升，但却远未达到欧洲人所享有的水平。比如，提倡家庭自有住房 (home ownership) 的美国住房政策，更有利于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而不是穷人。“给予低收入家庭直接的财政补助是欧洲福利国家的常见做法，它很少在美国得到实行。”^[20] 提供给穷人的住房仅限于数量较少的公共住房项目，这些公共住房都不成比例地主要集中于内城区，因而离就业机会及非正式信息网络都比较远。而且，欧洲社会经常具有更为全面的失业保障项目，自从里根执政早期美国此类项目的落后开始，美国和欧洲的差距就在逐年扩大。确实，“在 1984 年到 1988 年期间的每一年中，每月的失业保险额度都创造了历史新低。在此，有很多因素起到了作用，包括符合要求的失业工人的低申请率，但至关重要是联邦及各州对这一项目的削减”。^[21]

156

最后，在欧洲国家中，诸如医疗照顾等服务也被视为是基本的公共物品，犹如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一样，穷人也可以享受同样的全面性医疗保险项目。然而，在美国，一个联邦咨询委员会最近报告说，对于同样的医疗服务，针对穷人的医疗补助项目 (Medicaid) 支付给医生的费用，既低于富人的私人健康保险，也低于主要针对中产阶级的医疗保险项目 (Medicare)。于是，很多医生拒绝接收参加医疗补助的病人。

那些身处美国阶级体系最底层的人们，经常遭受着严重的经济剥夺和工作不稳定。^[22] 美国福利项目中支出额增长最快的是普遍权益项目，如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这些项目的最早受益者主要是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

最近几年，尽管也开始实施一些救济项目和只针对穷人的项目，但是这些项目对于穷人生活的缓解程度很有限，它们不能防止穷人滑入甚

至跌入贫困的深渊。1975年，美国社会中有30%的穷人，其收入都低于官方制定的贫困线的50%；1992年，则是40%的穷人。在黑人中，这一数字的上升更快，从1975年的32%上升到了1992年的49%（将近一半）。^[23]而且，1978年以后，整体的贫困率都不断上升。这些令人失望的数据跟如下因素有关：“总体上的经济不景气、私有部门中低技术工人工资的降低（扣除物价因素后，1989年平均每小时的实际工资甚至低于1970年以来的所有年份）、单亲母亲为户主的家庭在比例上的增加、各州在有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AFDC）上所提供额度的大幅度降低。”^[24]

食品券、医疗补助、补充性保障收入（SSI）等项目确实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解作用，但是正如通常所指出的那样，这些项目对于那些非老年人中持续上升的贫困率却并未起到任何作用。总之，美国针对穷人的保障项目，甚至都并未开始去真正面对社会阶级体系中的不平等问题。这些项目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将穷人整合到主流社会的经济及社会生活之中——使他们“资本化”为一个不同的教育阶层或住房阶层，正如军人安置法案（GI bill）和战后的联邦按揭贷款项目对工人阶级和白人中产阶级所起到的作用那样，相反，它们却倾向于对穷人们起到污名化和隔离化的效果。^[25]

当前欧洲的经济危机，使那些以实现普惠而全面的社会资格权利（social citizenship rights）为目的的福利项目都很难得以维系。随着失业人口的大量增加和欧洲劳动力市场的碎片化，福利国家政策的各项好处都面临越来越大的削减压力。种族及族群多样性的增加，也促使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二战以后有关普惠福利项目和社会融入的信念基础——这一信念的最初基础是资格权利观念（conceptions of citizenship），而资格权利观念则意味着相当程度的文化同质性。

当前的一些挑战，是对经常反映着种族偏见的社会福利信念的严重质疑。欧洲城市中最近发生的经济及社会变迁，已经造成了对种族主义和反移民情绪进行煽动性动员的有利处境。随着经济状况的恶化，

绝大多数白人都开始将少数族裔人口的增长视为问题所在。停滞的经济和萧条的劳动力市场对福利国家政策构成强大压力之时，也正是移民人口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失业问题因而更加依赖公共援助来维持生计之时。

当欧洲经济处于劳动力市场人才紧缺、经济积极增长的状态时，福利国家政策在财政上不难得到实施；于是，受到大众强烈支持的福利项目不是维持现状就是不断增长。然而，随着经济停滞和1980年代两大发展的影响，削减福利项目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这两大发展主要是指，社会福利项目的花费成本及高失业率、低公共税收时期符合要求的人数都日益猛增，英国保守主义政府的逐渐掌权，其有关福利缩减的观点受到了在美国最具政治优势的里根主义的支持。

在欧洲的很多地方，族群和种族对立都日益严重。在多个法国城市中，阿尔及利亚人和非洲黑人都受到了攻击；令法国进步人士感到沮丧的是，让-玛丽·勒庞(Jean-Marie Le Pen)领导的具有反移民倾向的民族阵线运动(National Front movement)惊奇地取得了选举成功。多个英国黑人社区中也发生了骚乱。一些意大利城市中的非洲移民也遭到了攻击。在几个荷兰城市中，基督徒和穆斯林、占人口少数的种族和白人之间的紧张也逐渐明显。不幸的是，鉴于欧洲日益增加的经济及社会紊乱状况，如果我所指出的经济及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公然的种族主义(无论是自发的还是有组织的种族主义)将会更加严重。在很多方面，我们如今所了解的“战后”欧洲都不同于从20世纪迈向21世纪时我们将看到的欧洲。

158

当西欧经济越来越不确定、贫困问题及其集中化日益严重、失业不断加剧的时候，那些仍然希望在民主国家中继续保持社会资格权利的人们，应该多多关注一下美国城市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之所以这么说，部分地是由于欧洲大众中的一些成员对少数族裔和移民人口的日益明显、越趋恶化的经济及社会境况所做出的特定反应。尽管表现出种族对立的社会状况已经日趋严重，但官方和学术界对于欧洲富人和穷人之

间差距的解释，仍然主要关注的是宏观的社会变迁和不平等，而不是个体及其行为的不足。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公共修辞有关社会资格权利的意识形态起到了支持作用。而且，各种福利项目的受益对象很是广泛，儿童照顾、儿童补助（每位儿童每年领取一次）、住房补贴、教育补助、医疗照顾、失业保险等项目在很多欧洲民主国家已经被坚实地予以制度化。为解决严峻的失业问题而努力削减这些项目，将不仅威胁到穷人的生活，而且还会受到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强烈抵制。

然而，美国则并非如此，不但有助于穷人的各项福利项目缺乏任何制度保障，而且正如我们马上就会谈到的那样，有关贫困性质及原因的基本信念体系，也主要是从个体方面来理解各种经济及社会后果的。这就使那些保守的知识分子和政策制定者，通过利用这一主导性美国信念体系中的个体化和道德化的内容，来主要强调持续失业和接受福利的消极意义。根据此种论调，社会问题的悲剧性质和社会根源也就最终予以消除，因为大众普遍认为，真正的弱势群体应该对其自身困境负起主要责任，比如内城区黑人。

对社会后果的此种公共理解具有深刻的意涵，它不只会影响学者在研究诸如聚居区中失业、贫困等敏感性问题分析取向^[26]，而且还会影响社会成员为解决这些问题而提出的各种措施。将失业和贫困主要归咎于个体缺陷的美国信念体系，不会对旨在消除不平等的社会项目起到强烈支持作用。对于这一观念的理解而言，没有谁能与英国社会科学家 T·H·马歇尔(T.H.Marshall)匹敌。若遵循他有关资格权利(citizenship)之发展的经典论述^[27]，我们就会看到，如果贫困与社会阶级、种族结构紧密关联这一根本原则在西方社会可以得到承认和公认的话，对市民权利的关注重心将超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从而将社会权利含括进来——社会权利，也即“从享受一定经济福利和经济保障的权利，到充分共享社会遗产(social heritage)和根据所处社会之基本标准过上文明人生活的权利的整个范围”。^[28]

然而，美国道路的批评家们对贫困和福利的研究已经一再表明，在

美国，对公民权利在民权与政治层面的关注已经盖过了对它在社会层面（就业、经济保障、教育和医保权利）的关注，因为有一种坚实的信仰体系，使得贫困和福利的社会起源与社会意义变得不再重要。

詹姆斯·柯吕格尔(James Kluegel)和艾略特·史密斯(Eliot Smith)在对1969年和1980年的全国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后指出：“多数美国人都坚信，经济发展的机会到处可见，但经济后果则主要取决于个体的努力和能力(或缺陷)，因而经济不平等在总体上是相对公平的。”^[29]确实，从人们对这两次全国性调查的回答中可以看出，对贫困的个体化解释(能力不足或努力不够、道德素质低下、工作技能太差)要远远超过结构化解释(缺乏足够的教育培训、工资过低、就业机会过少等等)。在调查中，人们选择频率最高的选项是“不够节俭或缺乏恰当的收入管理技能”、“不够努力”、“能力或天赋不足”、阻碍社会流动的家庭背景对生活态度的影响、“社会未能提供足够的良好教育”、“道德素质低下并经常醉酒”。除了“社会未能提供足够的良好教育”这一选项外，其他选项都是有关贫困原因的个体化理解。被调查的美国人大都认为，诸如“工资过低”、“市场未能提供足够多的就业机会”、“种族歧视”等结构性因素不是那么重要。从1969年到1980年，美国人对这些因素之间的排序几乎并未发生任何变化。^[30]

160

1990年的一次运用了同样题目的调查表明，将贫困跟制度和结构联系起来的人数稍有提升，尤其是选择“市场未能提供足够多的就业机会”这一项的人有所增多。^[31]不将这一项视为是贫困原因的美国成人人数，从1969年的三分之一，降低到了1990年的五分之一。然而，除了对贫困原因之结构性解释的支持稍有提升之外，美国人仍然强烈地坚信个体应该对自己的经济状况负主要责任。在这三次调查中，“穷人自己不够努力”都是选择频率最高的选项。在1969年到1990年期间，超过十分之九的美国成人感到不够努力是最为重要或比较重要的贫困原因。^[32]只有不到1%的人认为，个体努力对贫困来说并不重要。

上述发现跟有些学者1990年在欧洲的12个国家进行的类似调查形

成了鲜明对比，这 12 个国家是英国、爱尔兰、法国、丹麦、比利时、荷兰、西班牙、德国、希腊、卢森堡、葡萄牙、意大利。^[33]这些国家的人民对贫困的结构解释的青睐，要大大超过对贫困的个体化解释。三分之二的欧洲人不是将贫困跟社会正义、不幸灾祸联系起来，就是将其与现代世界的变革联系起来。只有 17% 的人认为，贫困主要是懒惰和缺乏意志的结果。考虑到欧洲经济的渐趋不确定和族群及种族对立的日益严重，我们并不确定欧洲人的此种态度是否会变得跟美国人类似。但至少就当前而言，欧洲人在解释贫困的时候，无论是普通市民的态度还是公共修辞，都是更为重视社会整体的变化和不平等，而不是个体及其行为的不足。

161 1978 年，法国社会科学家罗伯特·卡斯特尔(Robert Castel)指出，在富裕的美国社会中，其贫困悖论主要在于如下观念：“穷人应该对其处境担负主要责任。于是，福利政治(the politics of welfare)的中心任务主要是处理个体缺陷。”从 19 世纪晚期的救济院建设到约翰逊总统的向贫困开战，美国人一直都未强调穷人的社会权利，而“对此种权利的解释应该独立于以实施援助为职责的各种机构的看法”。^[34]

公共舆论调查的数据也支持上述观点，舆论调查表明，美国人更为关心穷人(尤其是接受福利的穷人)的责任和社会义务，而不是他们作为美国市民的社会权利。从罗斯福新政时期开始，美国人就围绕接受福利者是否应该工作展开了持久的争论。过去的舆论调查表明，人们坚持认为依赖福利生活者必须去工作。比如，1972 年，哈里斯民意调查(Harris poll)显示，89% 的回答者都支持“让依赖福利生活者去工作”。^[35]1977 年，全美广播公司调查(NBC poll)表明，93% 的应答者都感到，应该要求身体健全的福利接受者去从事公共服务工作。

调查数据还表明，在过去的几年中，公众中的反福利情绪日益升高。在一次全国调查中，同意“我们国家在福利项目上花费过多”这一反福利陈述的应答者比例，从 1969 年的 61% 上升到了 1980 年的 81%；同意“多数获得福利者都不是真的需要福利接济”这一陈述的人

数比例，从1969年的71%上升到了1980年的77%；最后，对于“多数能够正常工作的福利依赖者都会努力求职以自力更生”这一给予福利以正面评价的陈述，同意者比例从1969年的47%下降到了1980年的31%。^[36]“在1980年代以后，对于增加福利支出的支持人数有了微小但却真实的上升。很多人将其解释为是对里根时代削减福利项目的某种反弹。”^[37]但是，绝大多数美国人仍然反对增加福利支出。

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大众中的这种势不可挡的反福利情绪，源自于美国人的顽固信念：个体的道德特征而不是社会及经济结构的不平等才是各种问题的根由。确实，这一调查表明，大众广泛地同意如下观点：多数福利接受者都不跟大众一样地认为勤奋工作具有很大的重要性。这次研究所调查的多数白人，都不同意如下这一给予福利以正面评价的陈述：“多数福利接受者确实需要帮助，如果没有福利，他们的生活将难以维持。”^[38]人们都群情激奋地认为，用应答者的一句话说来，福利改革“应该激励人们努力工作并将此纳入社会体系之中”。最后，这一研究强调，“正如多年以来一样，现在的人们仍然总体同意（包括白人和非白人）：很多福利接受者可以自己工作，很多福利接受者都不诚实，在为穷人花费的钱中，至少有一半都被白白浪费掉了。”^[39]

162

我们不应将公众对于“福利”这一标签的反应，理解为是人们支持帮助穷人。^[40]“‘福利’这一词语已经变成一面红旗，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它象征着浪费、欺骗、滥用。”^[41]此外，福利观念还往往会唤起人们的种族情绪。最近，一项有关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对于贫穷之态度的研究表明，当考虑到穷人的种族因素时，未婚生育的黑人女性形象总是会唤起白人的消极反应。年轻的黑人女性应该对其困境负有主要责任，政府给予未婚黑人母亲的支持不应该超过给予未婚白人母亲的支持。^[42]

然而，美国人实际上很想帮助那些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比如，从1983年到1991年，美国舆论研究中心开展的综合社会调查(GSS)表明，多数美国人都认为用于帮助穷人的支出实在过少，但是，在每年

份中却只有刚刚超过 20% 的人认为，用于帮助福利接受者的开支有些过少。^[43] 颇具悖谬的是，似乎帮助穷人是一件好事，而通过制度化渠道（也即福利项目）来帮助他们则是坏事。

过于强调穷人的个体特质和福利接受者的责任或社会义务，不仅是普通公众的看法。这一“常见智慧”（common wisdom）还被很多贫困学者不假思索地吸收到了他们的研究之中。在整个 1960、1970 年代，美国贫困研究者队伍不仅得到扩大，而且他们都把相当大的精力都聚焦在个体的工作态度上，或者是关注穷人的工作伦理与收入维持计划（income maintenance program）之间的关联。^[44] 然而，这些贫困研究者始终都忽视了基本的经济转型及周期性过程对于穷人的工作经验和生活前景的影响。

163 从欧洲视角出发，来重新思考美国取向的贫困研究，将是一件饶有趣味之事。瑞典学者瓦尔特·科尔皮（Walter Korpi）曾指出：“在美国，对于贫困和不平等的解释……似乎主要是根据穷人的个人特征来进行的。”虽然美国的贫困研究者对于穷人的工作动机、人力资本问题（如果不是将贫穷简化为也是将其解释为缺乏教育和职业技能问题）、收入维持计划对于劳动力供给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他们却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从二战后开始就一直困扰着美国穷人的极高失业率的影响。1980 年，当欧洲还未面临高失业率之时，科尔皮就写道：“在失业率还很低的欧洲，政治家和研究者就对失业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似乎存在这样一种学术悖谬：生活在失业海洋之中的美国研究者，其研究兴趣却主要是穷人的工作动机”^[45]，而不是美国社会中周期性的失业问题。

另一个颇为反讽的现象是，那些美国贫困研究者的关注焦点虽然如此狭隘，但是，他们不断揭示出的经验证据却在削弱而非支持着大众的观点：福利对于个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具有消极影响。^[46] 可是，政策制定者们仍然顽固地坚持着这些大众观点，“身处普遍繁荣时期却面临持续的高贫困率，这一悖论促使福利改革逐渐成为当前的普遍共识。”^[47] 似乎这些政策制定者们并未注意到有关福利影响效果的大量经验研究，然

而，作为国会调查机构的美国审计总署(GAO)，早在1987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中就指出，并没有结论性的证据可以支持普遍盛行的大众信念：福利会消除人们的工作动力、破坏双亲家庭或影响未婚母亲甚至青年未婚母亲的儿童养育率。^[48]

美国审计总署是经过仔细研究后得出这些结论的，它们评述了自1975年以来完成的有关福利影响效果的一百多项经验研究，分析了四个州中接受公共援助的一千二百多个家庭案例，访谈了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中的相关官员。尽管这些结论并不会令那些熟悉经验资料的贫困研究者感到惊讶，但是，它们却应该对那些国会成员们起到唤醒作用，因为多数国会议员都深受保守主义学者们的畅销书的影响，而诸如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查尔斯·穆雷(Charles Murray)、劳伦斯·米德(Lawrence Mead)等保守主义学者，往往在缺乏直接经验证据的前提下，就将持续贫困和其他社会紊乱归咎于福利的消极影响。^[49]

164

但是，通过系统的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跟美国社会中盛行的这一信念体系并不一致：显然，美国审计总署的报告并未显著地改变国会议员们的观点。内城区穷人生活中的社会紊乱和持续的高失业率、高贫困率，使政策制定者们认为必须对福利体系进行改革，因为他们认为正是福利制度造成了市民规范在福利接受者中的崩溃。确实，最近逐渐形成了有关福利改革的某种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共识，其主要内容包括两项：(1)接受福利意味着相互负责，社会有责任帮助福利申请者，而福利申请者也有义务按照社会规范行事；(2)福利接受者中身体健全的成人必须做好工作准备，积极求职，一旦有工作机会就努力争取。1988年，美国国会在通过家庭支持法案时，就对上述各项协定都进行了讨论。从那时起，在有关福利改革的大量公共讨论中，这两项内容就一直是讨论的焦点。

这两项内容的潜在基础似乎都假定了某种神秘的“福利伦理”(welfare ethos)的存在，正是这一“福利伦理”促使公共援助的接受者在逃避他们作为市民而具有的接受教育、努力工作、养家爱子、遵守

法律等社会义务。若用一句跟主导性美国信念体系相一致的话来说，则是，“正是个体的道德素质，而不是整体性的社会及经济结构，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50]各州对有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AFDC)的支持之所以大幅度降低，正是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这一信念体系的影响。

有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一项联合项目，旨在为符合要求的贫困且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提供现金补助。^[51]联邦政府负担项目运行成本的50%至75%，各州政府确定最终的资助金额和应该享受的具体补助标准。通过现金补助使符合要求的家庭能够满
165 足基本生活需要——居住、食物、穿衣、家庭及个人的日常必需品。符合有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的家庭，还有资格获得食物券，从而减少其食物成本。正如随后将讨论的那样，1995年国会立法将有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完全转变为一项金额固定的联邦补助金。

在1993年这个财政年度中，接受有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援助的人数，平均每月有500万个家庭及其中的950万名儿童(总计有1430万的儿童和成人)。^[52]然而，在该财政年度中，接受援助的家庭总数是730万。由于在全年中都有新的家庭参与进来，每月也会有接受援助的家庭离开，因而每年的受助家庭总数会超过每月都接受援助的家庭数之和。

跟此前12年中接受公共援助的家庭相比，1995年接受有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援助的家庭，其生活状况变得更糟糕了许多。在1975年到1995年期间，消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援助水平在每个州都有明显下降，全国范围内有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的实际援助水平在这一时期平均跌落了37%。虽然食物券福利的增加可以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但是远远不能抵消有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援助额度的降低以及相应的家庭购买能力的下降。“从1972年7月到1992年，有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和食物券对于一个无甚收入的三口之家的综合价值平均降低了26%，从1972年7月的874美元(以1992年美元的价值来计算)降

到了1992年7月的649美元。”^[53]

1991年之后，有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援助额度的下降犹如山崩一样。在1991年到1994年期间，只有6个州（阿拉巴马、亚利桑那、夏威夷、蒙大拿、新墨西哥、南达科塔）的援助水平得以维持或有所提升。援助水平在9个州中都明显下降，甚至不只一次降低，在其余州中即时没有显著下降，但援助水平也并不能跟上通货膨胀的速度。“在过去的25年中，甚至也许在这一项目的历史上，从未有哪个时期，有如此多的州在如此短的时间中都大大削减了对于这么多家庭的援助水平”。^[54]

当国会启动立法程序将有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转变为联邦援助项目时，为了评估有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所援助之家庭的困境，也许最好将其受援助水平跟住房成本联系起来进行对比。在几乎每个州，有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的每月资助额并不足以抵消“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所认定的‘合适的、安全的、卫生的’‘现代’住房”成本。社会福利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发现，在全美95个样本地区中的78个地区中，两居室住房的公平市场租金(FMR)都超过了有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给予三口之家的总体援助金额。“在纽瓦克、芝加哥、费城、丹佛、亚特兰大、新奥尔良、圣路易斯、孟菲斯等城市中，有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的援助额度甚至低于两居室住房市场租金的三分之二。”^[55]住房补贴并不能抵消有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的援助额度的不足。1992年，在有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所援助的家庭中，收到一定形式的住房补贴或生活在公共住房中的家庭比例，实际上只有23%。

166

有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对符合要求之家庭的援助额度的降低，跟人们有关福利性质和福利家庭的根本假定有关，比如人们都认为，有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的长期受助者是多数福利家庭和具有很多儿童的黑人女性。但是，在分析福利数据（包括谁每月收到多少福利的月度数据）之后，这些根本假定都将面临挑战。其实，在1995年中，受到

有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援助的非裔美国人所占比例很小，福利家庭的平均儿童数量比非福利家庭的平均儿童数量还要少一点。而且，基于月度数据的研究还表明，福利人口是动态的——也即，它们是经常变动的。

人们时常会在短时期内参加或退出福利项目，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们接受福利援助的次数都超过了一次。^[56]有一半的福利接受者会在第一年内就退出福利援助，有将近四分之三的人会在两年内退出。但是，那些在第一年就很快退出的人，也经常很快就会再次接受福利援助。正如本书第三章指出的，人们经常会在福利和工作之间不断变动。很多母亲会进入低工资就业状态而不再依赖福利生活，但当她们不能成功地实现目标时，她们还会再次接受福利援助。其中有些人会不断地重复这一模式。此外，正如第三章指出的，这些母亲之所以依然依赖福利或再次接受福利，并不是因为她们缺乏工作伦理。相反，她们不仅不愿接受福利而是更喜欢去工作，而且还对长期接受福利感到深恶痛绝。^[57]

随着失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增加，现存福利项目的援助率必然下降。^[58]并不令人惊奇的是，从技术和培训角度来看，那些最不具有就业可能的人，往往最难逃避福利援助的命运。一位母亲脱离福利依赖的时间越久，她再次接受福利依赖的可能性越小。一项有关多次接受福利的研究讨论了高变动率问题。在有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所援助的人中，30%的人不会超过两年，50%的人不会超过四年。¹⁶⁷其中，还包括了在这时期内脱离福利后又再次返回的那些人。只有15%的人，持续接受福利超过了五年。在这些长期接受福利的母亲中，她们的主要特征是少数族裔、从未结婚、高辍学率、缺乏就业经验。“总体而言，有一群人仅仅在相对很短的时期内接受福利。还有一群人在接受福利和脱离福利之间不断循环，有时是短期，有时是长期，但都不会超过五年。第三群人，也是人数最少的一群人，则长期地依赖福利生活。”^[59]

有些自由主义者利用这些数据来说明长期的福利依赖是一种迷思。^[60]然而,尽管福利接受者的多数持续时期经常是相对短暂的,但是,在任何特定时点,那些在接受福利与脱离福利之间不断循环的福利接受者中,都有65%的人是长期依赖福利生活的。“因为那些长期接受福利的人,在任何特定时间都依赖福利的可能性,必然会大于那些短期依赖福利的人。”^[61]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曾用下面这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假定一所医院有13张床位,其中的12张床位在全年中都被12位长期病人占据着;而剩下的1张床位则分别被52位病人使用过,每人的使用时间都未超过一周。在这一年的任何一天去对医院床位进行统计的话,其结果都是有85%的病人(12/13)是长期住院。然而,如果从这一年的过程来看,这些床位则是以短期使用为主:在该医院接受过医疗服务的84位病人中,大约80%(52/64)的病病人的住院时间都是仅仅一周而已。^[62]

对于福利接受者的某些刻板印象已经成为主导性美国信念体系的一部分,为了消除这些刻板印象,自由主义者经常强调,在有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的所有受助者中,非裔美国人只占少数。尽管这一点确定无疑,但是他们却正中保守主义者的下怀,因为他们忽视了如下事实:在1995年,有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受助者中非裔美国人的比例(39.2%),大致等同于非西班牙裔白人的比例(39.9%),要知道黑人事事实上只占全国人口的12.4%。除了进行此类统计工作外,战胜有关福利之刻板印象的最佳方式,是强调内城聚居区的严酷现实和宏观社会对福利接受者的巨大影响。这样也许可以更为有效地对那些潜在假定构成挑战,正是这些潜在假定促使人们呼吁着进行福利改革,甚至已经导致很多严厉措施的出台,这些措施不是大幅削减福利水平就是将福利项目彻底取消。

在1990年代中期，有关福利改革问题，逐渐形成两种彼此对立的取向。第一种取向认为，尽管福利并非是城市社会紊乱的主要原因，但还是应该努力实现福利向工作的转变，这主要基于如下理由：如果福利接受者不是依赖福利而是更喜欢去工作、更容易就业，那他们将不会陷入贫困的境地；如果不去工作，无论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家庭生活都会渐渐地受到不利影响；如果长期生活在很少有人工作或无人工作的环境中，孩子们也可能会变坏。因而福利改革不应该孤立地进行，而应该跟为弱势群体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联系起来。福利改革还应该伴随着全民健康保险制度的建立，以确保那些“出去工作”的福利接受者，不会面临诸如一位芝加哥福利母亲这样的困境：“其实，我并不喜欢依靠公共援助生活。但是，如果没有这张医保卡，当我的孩子生病时，我该怎么办呢？”^[63]

这一取向假定福利母亲更喜欢工作而不是依赖福利，其倡导者最有可能满怀激情地支持那些以“以工代赈”（make work pay）为宗旨的各种社会改革项目，这些项目主要是通过提高收入所得税抵免（EITC）、建立全民健康保险、发展儿童照顾项目、确立儿童物资供给制度等方式，来确保那些缺席父母做出其应有的贡献。

1993年，克林顿和他的顾问们所讨论的最初计划中，已包含了所有这些旨在让低工资工作者来支付花费的补助和福利项目。^[64]于是，福利改革就成为更广泛的社会改革议程中的一部分。他们还提出，为了使福利向工作的转变更为容易，在私有部门工作机会不足时，有必要帮助地方政府去创造更多公共部门的就业机会，并将福利机构转变为“过渡性的”职业培训和就业安置中心，更重要的是，建立全面健康保险项目以使福利改革更为切实可行。

然而，在克林顿总统的改革计划中，有一点确实反映了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有关相互义务的共识——也即，在两年内，最终结束福利依赖。在最初的克林顿计划中，福利接受者需要在两年内完成职业培训并到私有部门去就业。如果私有部门提供的就业机会不足时，那就需要创造出

一些公共部门的就业机会。正如乔尔·汉德勒(Joel F.Handler)恰当地指出的那样,保守主义者和这个国家的很多其他人都“只是抓住了这一时间限制,对于其他各项实际内容则只是空口应酬”。^[65]在两年期满之后,尽管人们还不断地谈论着为工作做好准备,但确保就业和儿童支持的所有重要内容却几乎不再被人提及。

随着共和党在1994年国会选举中的大胜,有关福利改革的讨论,开始更多地反映出多数美国人所持有的有关贫困和福利的个体主义信念。这些讨论代表了看待福利改革的第二种取向,这一取向尤其体现在1994年共和党在参加国会选举时提出的“与美国订立契约”(Contract with America)这一施政纲领中的个人责任法案(the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ct)之中。

跟克林顿的计划和此前其他的要求或允许各州为到达规定时间的福利接受者提供工作岗位的法案(包括共和党曾提出的为两年后仍未就业者提供工作福利的法规)不同,个人责任法案(PRC)则是完全取消为福利接受者提供现金资助和工作岗位。^[66]在一生中累计接受有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援助达五年的母亲,无论她们是否能够实现就业,都将被永久地取消其获得现金资助和工作岗位资格。除了时间限制外,该法案还否决了对那些年龄未满18岁的或未婚的母亲所生孩子的现金资助,有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给予有两个以上儿童的福利母亲的援助水平也不再有任何增加。1995年春天,这一福利改革举措在众议院得到了通过。

这一法案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是,将有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从当前的联邦及各州共同资助体系,改变为联邦固定拨款,“在接下来的五年中,联邦政府需给予各州固定资金,以用于对福利接受者的现金资助和从福利转换到工作的各种项目(welfare-to-work programs)。该项拨款被规定为1540万美元,且无需在通胀方面进行调整”。^[67]根据位于华盛顿的预算与优先政策研究中心的观点,联邦政府固定拨款——及其不可轻易改变的资助要求,可能会使有些州出现较为严重的问题。

如果贫困家庭的数量不断增加,各州将会面临一些不得不做出的无奈选择,比如完全由州政府出资来满足额外的需求、取消新的穷人进入福利项目的资格、建立排队等待清单、在后面的财政年度中全面削减福利水平。其中,造成打击最大的因素,可能是有工作而不用给予现金资助的家庭在经济萧条状况下的失业,因而需要暂时的帮助。规模相当大的此类家庭,都将在经济下跌时期申请福利援助。^[68]

无需过多的想象,我们便可以看出,一旦“与美国订立契约”这一施政计划转变为法律规定,那将对依靠福利生活的穷人造成极大的恶性后果。1994年,有450万的儿童,生活在累计接受有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援助达五年之久的家庭中。如果强行将时间限定为五年,那么,将有几百万的贫苦儿童失去接受援助的资格。^[69]这些母亲和孩子不得不无家可归地进入收容所,而业已超负荷运作的收养照顾体系也将不得不寻找“更多寄养点和替代性机构,以养育那些因为母亲过于贫穷而不得不抛弃的大量孩子”。^[70]

参议院出台的福利改革,在1995年得到通过。不像众议院的举措,参议院的措施相对不很严厉,因而受到两党的共同支持。其改革措施并未拒绝增加对有两个孩子并接受福利的母亲的援助水平和对年龄少于18岁的或未婚的母亲的穷苦儿童的现金资助。然而,跟众议院一样,参议院的改革措施也将废除作为一项基本权利的有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并将其改为联邦全额出资项目,于是各州开支的多少就完全取决于其对贫困家庭的资助意愿的大小了。据估计,众议院的福利法案可能会使原本并不贫穷的210万儿童陷入贫困境地,而参议院的法案则可能会使贫困儿童增加120万。^[71]对于那些已经身处贫困之中的家庭来说,“参议院的福利法案可能会使四分之一的有儿童的贫困家庭更加贫困,而众议院的福利法案则可能会使一半有儿童的贫困家庭更加贫

困”。^[72]面对此种立法，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指出：“‘福利改革’事实上意味着福利废除。也即，废除社会保障法案第四章第一款(Title IV—A of Social Security Act)。每个人都该为这一骗局负责，每个人都是同谋。”^[73]

171

众议院和参议员的一份折中方案(会议协定)，尽管在议会通过，但克林顿总统却于1996年将其予以否决。^[74]该会议协定包括削减对根据经济状况确定享有福利权利的各种项目(means-tested entitlement programs)的开支，在过去七年中，这些项目的花费接近八千万美元。据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MB)估计，这些削减将会使贫困儿童增加150万，使儿童贫困程度增加三分之一(也就是使那些原本贫困的儿童更加贫困)。在写作本书的同时，议会领导人正打算提交另一份改革法案，让总统签署，这一份法案几乎接近于参议院的法案。

我相信，福利母亲们遭到的越来越多的抨击，只是人们对美国内城区日益严峻之问题所作出的各种反应的一部分。很多人一想到福利，他们就会想起那些年轻未婚但却已有孩子的黑人女性。1995年，尽管在有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的受助者中白人跟黑人一样多，在福利名单上有相当多的西班牙裔美国人，但是人们头脑中的上述意象还是那么强烈。然而，黑人被不成比例地代表了太多东西。有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中黑人受助者数量的增多，被视为是诸如家庭价值衰落、家庭解体等宏大问题的征兆。很多人认为，是福利接受者导致或加剧了这些问题。通过强制人们承担起个人责任和家庭责任从而终结福利制度，被认为是可以扭转包括失业在内的内城区社会紊乱日益加剧之趋势的方法。

多年来有关这些问题的公共对话，无疑是单方面的，实际上不过对有关贫困和福利的美国信念体系的基本假定，起到了美化作用。这些公共对话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对保守主义者和一些自由主义者描述和讨论各种问题的方式。保守主义者强调的是个体和家庭的不足，但却忽视了环境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虽然有些自由主义者聚焦于环境的重

要方面并提出了结构性解释，但也有些自由主义者通过强调内城区家庭本身的优势和积极性来反对主导性的美国信念体系。他们甚至批评那些试图将内城区社会紊乱跟环境方面联系起来的自由主义者。

172 这些趋势影响着有关公共政策问题的讨论。它们使人们的关注焦点偏离了最根本的问题：在内城区这一社会环境中，**结构性和文化性约束因素的相互作用所造成的不利影响。**

1960年代晚期的两大发展，对有关聚居区贫困问题之原因和解决方案的讨论，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是围绕莫伊尼汉有关黑人家庭的报告而展开的激烈争论，该报告题为《黑人家庭：国家行动的理由》^[75]；二是在非裔美国人社区中，开始极为强调黑人视角在分析种族相关问题上的重要性。

跟很多争论一样，有关莫伊尼汉报告的争论极为激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观点的被误传和被扭曲，尤其是被大众媒体所误传和扭曲。莫伊尼汉强调，美国的社会经济体系应该为这些不稳定的贫困黑人家庭负最终责任，反过来说，这种不稳定性“正是各种异常行为、违规行为、反社会行为的根源，这些行为虽并非贫困及匮乏循环的原因但却起到了使之永久化的作用”。^[76]然而，随后的很多批判性评论，都忽视了莫伊尼汉报告的第一部分，于是造成了一种错误的印象：他只是将黑人的社会紊乱归咎于黑人家庭的不稳定性。如果这只是妨碍了人们对莫伊尼汉报告的真正接受的话，那么，黑人共同体中变化莫测的政治氛围则继续加剧了人们对莫伊尼汉报告的错误认识。更具体地说，有些黑人对莫伊尼汉报告过于强调聚居区中的社会病态这一点给予了严厉批判，而不管这些社会病态的根源究竟是什么。^[77]这一点之所以受到如此责难，不只是因为它潜在地使黑人感到难堪，而且还因为它与如下信念相悖：黑人正在努力发展出自身的共同体的力量基础（community power base），并使之成为美国社会的中坚力量，它将反映出非裔美国人社区的优势和活力。

这些批判反映了随着 1960 年代晚期黑人权力运动(the Black Power movement)的出现而形成的有关黑人处境的新的界定、描述和解释。这种被称为“黑人视角”的新取向,体现了从种族平等主义向种族团结的意识形态转变。这一取向首先于 1960 年代晚期在激进的黑人代言者中得到盛行,并于 1970 年代早期逐渐成为黑人学者和黑人知识分子在著述中不断论及的主题。^[78]尽管“黑人视角”包括了有关种族问题的各种不同观点和争论,但是有关这一主题的所有著述和演讲都对种族骄傲(racial pride)和自我肯认(self-affirmation)起到了宣传作用。 173

对种族平等主义的支持逐渐降低而更为强调种族团结,是 1960 年代的典型模式;在多族群社会中的主导群体与从属群体之间的关系的历史上,这一模式得到了不断地重演。也许,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的观点是对这一转变的最佳理论解释:“当一个曾经身处无权地位的集体获得了某种其权力正在逐渐增强的感觉且该感觉在社会交往中得到相互确证时,这一集体的成员们将会体验到对于自我肯定的强烈需要。在此种情况下,集体性的自我赞美(self-glorification)将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所有群体之中,并成为对长期被外人轻视而做出的可预期的、强烈的逆反应。”^[79]

正是在这种种族沙文主义的氛围中,出现了很多自认为秉承着黑人视角的一系列学术研究。这些研究得出的各种论点,清楚地说明了无论在语气上还是关注焦点上有关种族关系的研究都发生了相当大的根本转变。随着更为强调对黑人的美化及其自我肯认,认为聚居区生活的某些方面是病态的论点被完全拒绝——甚至包括认为种族孤立和阶级附属迫使人们更为适应黑人聚居区生活因而使他们在其他社区中生活的能力得到损害的自由主义立场,那些强调黑人社区优势的观点得到更多青睐。那些认为贫困黑人家庭境况恶化的论点几乎无人问津,鼓吹黑人家庭之“美德”和“优势”的观点甚嚣尘上。有学者认为是具有破坏性的那些行为,却被黑人视角的提倡者重新解释为是黑人的创造性——黑人以此展现出了他们的顽强的生存力量,即使在聚居区这样恶劣的环

境中也可以繁荣发展。聚居区的家庭被描述为具有极强的适应性，它们被富有想象力地视为是对压制性种族社会进行适应的结果。

黑人视角提倡者的论点很有趣，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承认聚居区中存在着破坏性行为。这实际上体现了对有关贫困根源和福利制度之美国信念体系的某种独特回应。该取向的学者不是去挑战美国信念体系之下的基本假定的有效性，而是通过否认内城区社会紊乱意味着特定问题，完全避开了对基本假定之有效性的质疑。那些强调这些社会紊乱的研究者，甚至那些由于聚焦于这些问题的结构性根源而拒绝“谴责受害者”的学者，都会受到抨击。正是由于这些发展，使1970年代早期的学者们，很少有人提出一项研究议程，去探寻聚居区社会紊乱的结构性根源。辛辣的攻击、尖锐的激辩作为这场争论的基本特征，对学者们（尤其是自由主义学者）构成了很大威胁。确实，在这场争论过后，为了使其著述不至于受到以种族主义或“谴责受害者”为名的攻击，自由主义社会科学家都在尽量避免谈论那些可能不讨少数族裔喜欢的话题，尽量避免描述那些可能被视为对少数族裔进行污名化的任何行为。于是，在好多年内，甚至在这一争论逐渐退却之后，内城聚居区的社会紊乱问题仍然未受到严谨的学术研究的关注。直到1980年代中期，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缺席，才开始部分地被一些记者所填补，但记者们所得出的有关内城区居民行为的结论却过于简单，都未能运用系统的结构性框架来对贫困和失业的动力机制进行解释。

1970年代早期，当有关聚居区的严谨学术研究突然止步之后，莫伊尼汉曾经担心的那些趋势却日益凸显。首先，贫困在城市变得更为严重、更为集中化、更加地根植于大城市之中，尤其是那些拥有高度隔离的大量黑人和西班牙裔人口的老工业城市。

在这一时期内，尽管有关聚居区生活的严谨研究极为有限^[80]，但正如媒体的偶尔报道那样，人们普遍感到聚居区生活每况愈下。比如，在众人皆知的纽约市电力短缺事件（偶尔伴随着大范围抢劫）之后，《时代》杂志在1977年8月策划的封面故事，便报道了芝加哥和纽约两

座城市中聚居区的悲剧境况。这篇题为“美国底层阶级：少数人中的少数人”的报道，之所以具有开创性，不只是因为它首次向大众报道了“底层阶级”的那些显著特征，而且还因为它奠定了以后各媒体报道底层世界时的基调。《时代》杂志在报道中说：“富人对于这一世界知之甚少，除非绝望使底层世界突然成为爆炸性的首页头条或七点钟新闻。在这堵坍塌的绝望之墙背后还生活着大量人们，他们的生活几乎比任何人的想象还要更难以维持、更被社会性地疏离、更充满敌意。他们是我们难以了解的一群人：美国底层阶级。”《时代》杂志的这篇文章还指出，“底层阶级”这一概念的首次使用是在“充满阶级的欧洲”，“瑞典经济学家纳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和一些其他学者在1960年代将其运用到美国社会”，它“逐渐成为—一个相当常见的词汇，用来描述那些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永久地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们”。该文继续讲道：

175

尽管其成员来自各个种族、生活在各个不同地方，但底层阶级的主要构成却是贫困的城市黑人，他们仍然在遭受着奴役和歧视等旧习之苦。他们在恶劣的生活环境中所形成的价值，迥然不同于多数人的价值——甚至不同于多数穷人的价值。于是，作为少数人的底层阶级却在全国制造出了大量的亲少年犯罪、辍学、毒品上瘾、福利母亲等问题，以及很多的成年人犯罪、家庭破裂、城市衰败、需要公共性支出等问题。^[81]

然而，直到1980年代早期，随着一些保守主义分析家所撰述的一系列畅销书的出版，《时代》杂志这篇文章中所提出的观点才在各大媒体中得到广泛传播。在里根政权第一任期内所形成的政治氛围中，有关贫困和福利的主流意识形态得到强化，于是保守主义分析家纷纷撰文解释如下悖论：为何在建立了大规模的反贫困和反歧视法规之后[这些工作始于约翰逊总统执政时期的伟大社会计划(Great Society Programs)

和市民权利立法工作]，内城区社会紊乱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不断剧增。

176 这些分析家的观点都潜在地以贫困文化为基本前提，在被占据政治优势的里根主义推到了政策辩论前台之后，他们都认为1960年代中期以来的自由主义社会政策加重而非缓解了跟聚居区联系紧密的各种文化倾向。诸如乔治·吉尔德的《财富与贫困》（1981）、查尔斯·穆雷的《重挫》（1984）、劳伦斯·米德的《超越权利》（1986）等被广泛阅读的新保守主义著作，提出了一系列论点来说明自由主义社会政策对城市底层阶级及其行为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82]于是，伟大社会计划和其他自由主义项目都被视为是适得其反的举措，因为它们忽视了底层阶级的各种行为问题，从而导致特困人口缺乏自立能力，增加了他们的失业率，提高了他们的婚外生育率，增强了女性当家而非有工作的、从事生产活动的丈夫或父亲当家的趋势。尽管这些观点并未得到任何严格科学证据的支持，但对他们来说，这似乎无关紧要。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已经从有关内城聚居区社会紊乱的讨论中退出，因而他们难以提出跟保守主义不同的其他解释。这就使保守主义分析家在1980年代的前五年中一直主导着有关这一主题的公共话语。大众媒体有关美国底层阶级的一系列报道也在不断附和着他们的论题，因而现在主要隐蔽在“底层阶级”这一名号之下的贫困文化论^[83]，在当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媒体支持。

1986年7月，《新共和》（*New Republic*）杂志发表了题为“工作伦理国”（*The Work-Ethic State*）^①的一篇文章，作者米奇·考斯（Mickey Kaus）指出：“有关黑人的文章和报道日益增多，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有关黑人家庭衰落的‘CBS报道’^②，莱昂·丹斯（Leon Dash）在《华盛顿邮报》上对黑人女青年怀孕的系列报道，尼古拉斯·莱曼（Nicholas Lemann）在最近一期《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底层阶级的

① 与之相对的是福利国家（*The Welfare State*）。——译者注

② “CBS报道”（*CBS Reports*）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推出的一档电视节目的名称。——译者注

诸多来源’一文，肯·奥莱塔(Ken Auletta)有关这一话题的著作。任何一位哪怕仅仅读过上述著述中某一篇的人，都绝不会否认贫困文化的存在，不会否认贫困文化有其自身的发展过程。”^[84]然而，这些传媒式解读的不足之处在于，它们难以为事实上忽视了结构性因素的贫困文化论，确立某种令人信服的论据。

考斯准确地指出：“莱曼强调，在南部佃农体系中工作的黑人和经过向北部大迁移之后而在聚居区中生活的底层阶级之间具有相当大的直接关联。”确实，在他的这篇视角独特的文章中，莱曼还继续指出：“聚居区中底层阶级文化的每一方面，都直接地源自于其在南部的根源。”^[85]然而，有关贫困和城市移民的系统研究(包括从1975年以来的三项主要研究)都一致表明，跟北部黑人相比，出生于南部而迁到北部的黑人具有较低的失业率、较高的劳动就业率、较低的福利救济率。^[86]

考斯参引丹斯的文章，来说明内城聚居区的青少年女孩“经常会受到其他女孩子的取笑，如果她们一直保持贞洁到青年期的话”。考斯指出：“一旦有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的资助额度达到使贫困的单身母亲得以维持生活的特定水平，底层阶级文化就会得以滋生，因为这会使很多女性出于各种各样的非福利理由而生育孩子。”^[87]这一论述完全忽视了如下事实：1983年黑人青少年生育率(即每一千位女性中的婴儿出生数量)是35%，低于1970年的40%，而后者又低于1960年的生育率。有关黑人青少年分娩的贫困文化论，如何解释上述事实呢？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问题不是青少年分娩率，而是婚外的青少年生育率的实质增加。正如第四章中所讨论的那样，结构性因素跟长期处于次属地位而形成的文化反应之间所具有的强烈的相互作用，导致了较高的婚外生育率。

1986年，美国公共电视台(PBS)上播出一期题为“联邦街区的危机”(The Crisis on Federal Street)的纪录片，将聚居区青年男女的惨淡就业前景跟工业部门中就业机会的骤降紧密地联系起来。然而，比

尔·莫耶在1985年有关黑人家庭衰落的“CBS报道”中，主要强调的是个人的性格不足，比如“蒂莫西”(Timothy)，他是多个非婚生孩子的父亲。肯·奥莱塔对底层阶级的研究，尽管相对平衡地涉及有关内城区社会紊乱的诸种可能解释^[88]，但他的研究缺乏一种可以将行为和文文化跟机会结构联系起来的清晰框架，这与李·雷恩沃特(Lee Rainwater)、肯尼思·克拉克(Kenneth Clark)、艾略特·列堡(Elliot Liebow)、乌尔夫·汉纳兹(Ulf Hannerz)等人的早期民族志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89]

然而，考斯的文章和他所提及的著述，都还只是有关聚居区穷人的诸多客观新闻报道中的一小部分。其他一系列报道中对贫困文化的可怕描述，不禁令人想起1977年《时代》杂志上的那篇文章。比如，在《财富》杂志的一篇文章中，米隆·马格尼特(Myron Magnet)指出，美国底层阶级的基本特征“与其说是他们的贫困或种族，不如说是他们的行为——长期的无法无纪、吸食毒品、福利依赖和学业失败。‘底层阶级’这一概念描述的是一种心理状态和一种生活方式。它不仅是一种经济状况，也是一种文化形式”。^[90]《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的一篇文章，可以看作是对上述观点的呼应：

底层阶级的成员们并不享有各种传统价值，也即有关工作、金钱、教育、家庭甚至也许生活本身的诸多传统价值。在美国富人眼中，这个不适合社会的阶级，不是犯罪统计中的罪犯就是牺牲者。在美国过去的25年中，这一群人具有逐渐变得自我永固的倾向。他们毁灭着旨在解决其问题的任何努力，抵制所有或简单或复杂的解决方案，耗费着远多于他们应当享受之份额的福利，制造着远大于其人口比例的各种社会及政治混乱。^[91]

在《绅士》(*Esquire*)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彼得·哈密尔(Peter Hamill)认为，

问题的关键是所谓的底层阶级的持续存在和不断扩大……[他们]陷入如下恶性循环之中：福利依赖、毒品吸食、酗酒、犯罪、违法、疾病、生活在世界上某些最富裕城市中最无序、最凶残的孤立聚居区里。作为一名记者，我这在二三十年中始终在报道着他们的不幸……而在最近十年里，我看到这群美国公民变得越来越固化和结晶化，越来越远离了人类生活的基本要求：工作、家庭、安全、法律。^[92]

有人按耐不住地大声疾呼：“够了！够了！”

有趣的是，媒体对“底层阶级”价值和态度的认识跟内城聚居区居民们自己实际表达的看法极为不同，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比如，一位生活在芝加哥市某大型公共住宅内、育有两个孩子的28岁未婚福利母亲，向城市贫困与家庭生活研究项目(UPFLS)的访谈员讲道，媒体如何将生活在公共住宅内的人们都塑造成了坏人、瘾君子、杀人犯等不良形象：

好吧！我并不知道你住在哪里，但你只要阅读报纸……他们都在说：“哎！卡布里尼小区！那里很多犯罪团伙……南部全是犯罪团伙。”但是，媒体和……我猜和大众一起，你知道的，它们一起制造出了这种夸大的坏印象。我的意思是说，好像每个人都是坏人一样。难道你路过这里的时候，每个人都冒犯你了吗？你是白人，你是白人，于是这里没人认识你，但是你会阅读报纸，你的父母会跟你说“女孩子家千万别去那里！”每次我在报纸上读到他们这么说的时侯，你知道的，我感觉他们就像是杀害黑人一

179

使我们看起来都是一样的人，我们都是坏人……但是，这不是事实。

生活在南部另一个公共住宅区里的一位 28 岁福利母亲，提出了类似的看法：

因为有很多人见了我，他们都会问“你住在公共住宅小区？”我回答说“是的。”“可是，你看着不像是住在那里的人啊！”“一个人应该被看作是什么样子呢？”你知道的，就像我告诉他们的一样，公共住宅区并不会使谁怎么样，而是你自己让你成为你自己。现在，如果你从公共住宅区走出来，携带着跟那个小区名字相配的特征，显得粗暴、吵闹、邋遢、无礼，你看，这才是下层阶级的人！“你看着不像是住在那里的人啊！”“一个人应该被看作是什么样子呢？”我只是生活在共住宅区，这并不意味着我就出去的时候就一定要看着像个乞丐嘛。因为我本身也不是啊！但是，他们都觉得，他们都喜欢说：“在生活在共住宅区的人中你显得太好了！”你知道，有时我感到很愤怒……这真的让我感到心烦。你知道的，不是住所使你成为什么样子，而是你让你成为你自己！你知道的，你在你自己家啊！而看看那些拥有好莱坞孩子(Hollywood kids)的那些人，常因吸食可卡因过量而崩溃，你知道的，他们究竟又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的研究表明，内城聚居区居民的实际信念跟不分青红皂白的笼统性媒体报道之间很少一致，这些媒体都断言，贫困的内城生活中各种价值都在衰落，或者认为，内城区的人们具有某种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最异乎寻常的是，尽管内城聚居区中的黑人居民们面临着势不可挡的失业和贫困大潮，但是他们竟然在口头上都支持而不是反对强调个

体积极性的美国价值。

比如，在针对芝加哥市贫困生活区居民进行的大型调查中，几乎所有的回答者都认为，辛勤工作不是最为重要的便是比较重要的（参见附录 C 中的表格 4）。在城市贫困与家庭生活研究项目的研究团队进行的一系列开放式访谈中，被访者几乎全都支持有关贫困的美国主流信念体系。那些住在最贫困生活区中的人们的观点，尤其具有启发性。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同意，美国是一个机会之国，任何人都可以取得进步，人们都能够获得他们应当拥有的很多东西。

180

有一位 34 岁的黑人男性，他生活在芝加哥南部贫困区域（29% 的人口处于赤贫状态，75% 的家庭的收入都低于贫困线），他的话颇具典型：“每个人都会获得很多他应当获得的东西，因为如果每个人都想要做得更好，他就应该去努力尝试。如果他们不去尝试，那他们就不会成功。”同样生活在南部贫困区域的另一位黑人男性指出，“对有些人来说，美国是一个机会之国，但是你不能等待机会来敲门，你必须大步向前、奋力争取。”居住在芝加哥西部贫困聚居区域（将近一半的人口都处于赤贫状态）中的一位 31 岁的失业黑人男性，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生活是你所努力获得的……如果你想要从生活中得到什么，那你就必须去努力为其奋斗。每个人都可以追求得到它，你知道的，但是，没有人会在因你无所事事而给予你什么：你必须为你想要的东西而工作。”

一位育有 5 个孩子的 33 岁福利母亲，生活在一个公共住宅区，而在该住宅区所在的人口地段中，61% 的人口处于赤贫状态；她在对类似观点表示支持的同时还引入了一点通俗的心理学知识：“我想，每个人都有提升或进步的机会，但是，这还只是你头脑中的位置：你应该升至什么位置，取决于你的自尊——自尊跟你想要取得的进步紧密相关。如果你没有任何自尊，那你就难以取得进步。如果说没有人告诉你机会就在那里的话——我想，只有他们愿意，每个人都具有平等的提升的机会。”最后，有一位育有 5 个孩子的南部福利母亲，生活在一个几乎三分之一人口都处于赤贫状态的聚居区贫困居民点；她将她的个人处境

跟对社会发展的这种典型的美国解释联系起来：“是的，机会就在那里，你能否把握住机会，取决于你是否愿意去做该做的事。我没有很好地做好我应该能做好或能够做好的所有事情，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我所处的位置都完全取决于我自己。”

一位带有5个孩子的离异母亲，曾接受过两年大学教育，还做过电话调度员，也生活在南部居民区；在谈论她需要顽强毅力的过程中，描述了她自己的经验：

181

我基本上认为，如果你迈出去并推自己一把，那机会就是你的。但是，如果你只是坐在家里，等待谁来给你什么，那你将什么都得不到。我记得，我在一个临时机构工作的四年中，我接受了所有我应该进行的培训。于是，有一天，我才敢于到一家电话公司去提交工作申请。那位女士告诉我，要每隔30天打一次电话，以便让他们了解我是否还想调换工作……我不只每30天打一次电话，我每两周打一次，以便让他们知道我对电话公司的这份工作非常有兴趣、非常想得到这份工作。要确保我的名字还在上面。我从未放弃。

这些谈话跟城市贫困与家庭生活调查中有关工作价值诸问题所得到的回答都表明，内城聚居区居民们已经内化了基本的美国信念，认为只要努力，人们就能获得跃升。尽管他们对于这一抽象的美国信念的支持，和他们对于阻碍内城聚居区居民们社会进步的各种社会障碍的感知和非凡描述之间，并不经常保持一致。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些支持以及在大规模的城市贫困与家庭生活调查中被调查者们的看法，都跟内城区居民并不享有主流社会之价值和志向的这种迷思是相互矛盾的。

然而，内城区居民所遭遇的社会及文化约束，将会导致他们中很多支持美国主流价值的人们最终走向失败。正如在媒体报告中反映的那样，身处主流社会的美国人经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内城聚居区的人们

在行为上偏离主流的、常规的期望的程度，主要是他们所具有的不同价值系统的结果。从我们的研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内城区居民所享有的是将美国各群体隔离开的价值。在这些报告中，对如下事实很少做出解释：面对中产阶级和黑人都不知晓的各种约束因素，当内城区居民们努力遵从主流社会的基本价值时，他们经常会体验到巨大的困难。我们只是需要提醒的是，在很多内城聚居区居民点中，强有力的制度性资源基础(institutional resource base)的缺失，削弱了父母对于子女行为的控制程度，因而要实现使儿童向亲社会方向发展的家庭价值，就变得极其困难。内城聚居区居民点中的制度性资源基础，经常会弱于中产阶级社会。现在，它变得更为薄弱，这主要是由于全球经济的根本变革所导致的失业率的惊人增加，而这一变革深刻影响着美国和欧洲所有公民的就业前景和收入状况。 182

全社会对于困扰着内城聚居区居民们的各种问题的缺乏鉴识和理解，潜在地影响着城市中的种族关系状况和人们对于以种族为基础的社会政策的支持程度。

注释：

[1] Weir(1993a).

[2] 后面有关批量生产体系向高技术化全球经济体系转变的讨论，我主要受益于 Marshall(1994)。

[3] Marshall(1994), p.5.

[4] Marshall(1994), p.4.

[5] Marshall(1994), p.4.

[6] Friedman(1994b) and Rifkin(1995).

[7] Friedman(1994b) and Rifkin(1995).

[8] Marshall(1994), p.5.

[9] Marshall(1994).

[10] Friedman(1994a).

[11] Friedman(1994a).

[12] Friedman(1994a).

[13] Friedman(1994a).

[14] Kasarda(1995).

[15] Friedman(1994a).

[16] Friedman(1994a).

[17] Friedman(1994a).

[18] Friedman(1994a).

[19] Friedman(1994a).

- [20] Schmitter-Heisler(1991).
- [21] Greenstein(1991), p.442.
- [22] Schmitter-Heisler(1991).
- [23] U.S.Bureau of the Census(1992).
- [24] Greenstein(1991), p.439—40.
- [25] Schmitter-Heisler(1991).
- [26] 美国式取向的贫困和福利研究, 不断受到批评, 比如 Castel(1978).
- [27] Marshall(1964).
- [28] Marshall(1964), p.78.
- [29] Kluegel and Smith(1986), p.37.
- [30] 有关此类研究的更早讨论, 可参见 Patterson(1981)。还可参见 Williamson(1974a, 1974b, 1974c)和 Lauer(1981)。
- [31] Davis and Smith(1994) and Bobo and Kluegel(1994).
- [32] Bobo and Kluegel(1994).
- [33]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1990).
- [34] Castel(1978), p.47. Also see Susser and Kreniski(1987).
- [35] Melville and Doble(1988).
- [36] Kluegel and Smith(1983).
- [37] Bobo and Kluegel(1994), p.372. Also see Shapiro and Young(1989).
- [38] Melville and Doble(1988).
- [39] Melville and Doble(1988).
- [40] Bobo and Smith(1994).
- [41] Bobo and Smith(1994), p.372.
- [42] Iyengar(1990).还可参见 Bobo and Smith(1994).
- [43] Bobo and Smith(1994).
- [44] Kerbo and Tompkins(1970).
- [45] Korpi(1980), p.305.
- [46] Wilson(1987).
- [47] Melville and Doble(1988), p.1.
- [48]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1987).
- [49] Gilder(1981), Murry(1984), Mead(1986).
- [50] Wacquant and Wilson(1989), p.99.
- [51] See the reports by the Center on Social Welfare Policy and Law(1994).
- [52] Center on Social Welfare Policy and Law(1994).
- [53] Center on Social Welfare Policy and Law(1994), p.10.
- [54] Center on Social Welfare Policy and Law(1994), p.11.
- [55] Center on Social Welfare Policy and Law(1994), p.11.
- [56] Handler(1994).
- [57] Edin(1994).
- [58] Handler(1994).
- [59] Handler(1994), p.32.
- [60] 比如 Greenberg(1993).
- [61] Handler(1994), p.33.亦可参见 Bane and Ellwood(1983b).
- [62] Committee on Ways and Means(1993), p.686.
- [63] 摘引自有关奥克兰和伍德朗两个居民点研究项目中的访谈内容(参见附录 B)。
- [64] Handler(1994).
- [65] Handler(1994), p.91.
- [66] Bazie and Shapiro(1994).
- [67] Parrott(1995), p.4.
- [68] Parrott(1995), p.4.
- [69] Parrott(1995).
- [70] Bazie and Shapiro(1994), p.3. Also see Peterson(1995), Vroman(1995), Pavetti(1995), Zedlewski and Sawhill(1995), and Danziger(1995).

- [71]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1995c).
- [72]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1995c), p.1.
- [73] Moynihan(1996), p.33.
- [74]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1995d).
- [75] Moynihan(1965).
- [76] Moynihan(1965), p.30.
- [77] Rainwater and Yancey(1967).
- [78] 比如,可参见 Ladner(1973), Hill(1972), Hare(1969), Alkalimat(1969), and Staples(1970 and 1971).
- [79] Merton(1972), p.18—19.
- [80] 其中,最明显的例外是 1970 年代出版的一项研究,参见 Anderson(1978).
- [81] *Time*(1977), p.14—27.
- [82] Gilder(1981), Murray(1984), and Mead(1986).
- [83] 1987 年,我的《真正的穷人》一书出版后,很多社会科学家都开始研究聚居区贫困的各个不同方面——他们中的多数都是要验证我在《真正的穷人》这本书中提出的理论假定。随着对进城聚居区诸问题的重新关注,围绕“底层阶级”这一概念的运用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根据对于他们事业(包括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有用程度来选择性地运用这一概念的政治人物和记者们,则为这一争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他们在如此做时,实际上忽视了有关美国穷人的各项基本事实。有关“底层阶级”概念在学者中的讨论和争论,可参见 Gans(1900 and 1995), Wilson(1991a), Hochschild(1993), Ricketts and Sawhill(1986), Ricketts and Mincy(1986), and Jencks(1991).
- [84] Kaus(1986), p.22.
- [85] Lemann(1986), p.35. Also see Lemann(1991).
- [86] Long(1974), Long and Heltman(1975), and Ritchey(1974).
- [87] Kaus(1986), p.24.
- [88] Auletta(1982).
- [89] Rainwater(1970), Clark(1965), Liebow(1967), Hannerz(1969).
- [90] Magnet(1987), p.130.
- [91] *Chicago Tribune*(1986), p.3—4.
- [92] Hamill(1988), p.92.

第七章

183 种族对立和基于种族的社会政策

新的贫困居民点不断增加所导致的后果之一，是城市中种族关系的恶化。人们普遍感到，与高失业率和社会组织衰落紧密关联的各种问题（比如个人犯罪、欺诈活动、团伙暴力），已经从内城聚居区流布到了城市其他地区。这不仅使激烈的阶级对立，在那些与环境恶化的黑人街区相毗邻的高收入黑人社区中逐渐形成；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这还导致了人们对于黑人所产生的高度的种族憎恶，尤其是在那些住在失业居民点附近的低收入白人群体和拉丁裔群体中。

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去理解使这些张力得以加剧、使种族问题在美国人意识中得以夸大的各种潜在因素。我将通过分析政治政策和经济及社会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美国城市中的种族对立，来说明这一最为重要的关键问题。

诸如安德鲁·海克尔(Andrew Hacker)的《两个民族：相互隔离、敌意和不平等的黑人和白人》(1992)和德里克·贝尔(Derrick Bell)的《井底黑脸：持久的种族主义》(1992)等当代著作都指出，种族对立是多么根深蒂固、多么具有原生性，以证明人们对于美国克服种族主义情绪和行为的可能所抱的悲观主义有其正当性。^[1]对诸多轰动性的种族攻击所给予的媒体报道，则进一步强化了此种悲观感受。很多最为悲惨的事件都发生纽约这个大都市。比如，一个白人慢跑者在中央公园遭到一群黑人及拉丁裔青年暴徒的强奸和残酷毒打。一个名为尤赛夫·霍金

斯(Yusef Hawkins)的黑人青年,被一群来自班森贺街区(Bensonhurst)的白人青年暴徒追打至死。一个名为迈克尔·格里芬(Michael Griffin)的黑人,在皇后区环公园大道上被一辆汽车撞死,而在附近的霍华德海滩打棒球的一群白人却赶紧逃散而去。一个名为塔瓦娜·布罗莉(Tawana Brawley)的黑人女青年,谎称她受到一群白人男性的绑架和性侵。

全国范围内有关驱车枪战和汽车劫持的媒体报道,不断地在为种族憎恶和恐惧添油加醋,比如罪犯大都被认为是内城区的黑人男性。而且,媒体对于外国白人游客在佛罗里达遇到内城区黑人多次攻击的报道,继续加剧了人们对于随时可能发生之暴力的关注,进一步恶化了种族关系的氛围。尽管大多数谋杀案和其他暴力犯罪都主要发生在熟人之间,但人们仍然觉得这些犯罪都是在无需任何激怒下对陌生人施加的,这使大众中的焦虑和恐惧感继续攀升。当有人被陌生人杀害时,青年人更有可能被视为是嫌疑犯。“在1976年至1991年期间,只有20%的杀害案发生在陌生人之间;在青少年男性犯罪的杀害案中,有34%发生在陌生人之间”,阿尔弗雷德·布鲁姆斯坦(Alfred Blumstein)继续指出,“于是,受害者与罪犯之间关系性质的不同,使人们有关杀害案随时可能发生的感觉得到了强化。”^[2]

最后,近期在洛杉矶发生的反抗活动(这是美国历史上最恶劣的种族骚动)以及相关事件,继续加剧着已经很糟糕的美国种族关系状况和内城区中的各种问题,这比其他所有事件一起造成的影响还有大。然而,在当前的舆论氛围中,种族意识不断强化的同时,我们却遗忘或忽视了如下事实:种族对立是各种境况的产物——经济境况、政治境况和社会境况。

为了理解特定时期种族对立的表现,必须从分析和政策的双重视角,去把握当时种族对立得到强化或减弱的各种境况。有关这一观点的思考,将使我深入到群际关系的脉络之中去探寻种族问题和城市新贫困问题。而且我将以此为基础去讨论各种社会政策选择。下面,我将

首先从有关种族对立和人口变迁的思考开始着手。

185

从1960年开始，白人在城市中心区域的比例逐步降低，少数族裔的比例则不断上升。1960年，全国人口在城市、郊区和农村地区的分布是基本平均的。^[3]但到了1990年，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都下降很多，因而郊区人口几乎占全国人口的一半。1990年，城市居民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下降到了31%。随着城市人口的减少，城市也变得越来越穷困，在种族和族裔构成上变得日益黑化。于是，在多数主流白人的眼中，少数族裔人口象征着落后而脏乱的城市景象。如今，郊区与城市的分化在很多方面都主要是种族区隔。比如，1990年，芝加哥市区的居民中有63%都是少数族裔（黑人、西班牙裔、亚裔），芝加哥都市区域的郊区居民中有83%都是白人。1990年，全国范围内有四分之三的白人都生活在郊区和农业地区，多数黑人和拉丁裔则生活在城市地区。^[4]

此种人口变化跟美国城市的影响力日益式微有关，这也为新联邦主义(New Federalism)奠定了基础，而新联邦主义是使种族在都市区域的意义得到强化的一项重要政治举措。从1980年开始，联邦政府急剧降低了对于城市基础项目的支持力度。此外，当前的经济不景气又使内城上缴的城市税收不断减少，于是导致财政赤字，这又需要额外地削减基本服务和基本项目、增加市政税。^[5]

新联邦主义和经济萧条的共同影响，导致很多城市发生了财政和服务危机，尤其是东部和中西部的老城市。当贫困和失业问题在内城区成倍增长时，当无家可归人口日益增多时，当和贫困及失业问题相关的毒品上瘾、暴力犯罪等罪恶大潮到处肆虐时，深陷财政危机中的城市，除了无助地观望外，简直束手无策。这些问题都使城市中心作为宜居场所的吸引力日益减少。于是，很多拥有经济能力移居他处的城市居民，都从城市中心搬到了郊区或其他地区，这进一步减少了城市的课税基础，降低了城市的公共税收。

人口的逐渐郊区化，影响着政治家们对于联邦政府斥资援助大型城

市和穷人这一举措的支持程度。确实，我们可以看到，1980年代以来联邦政府对于基本城市项目的支持力度的骤降，跟各城市政治影响力的降低、郊区选举联盟影响力的上升具有紧密联系。在1968年的总统选举中，郊区投出了36%的选票；1988年，郊区投出了48%的选票；1992年，大多数选票都是郊区投出的。〔6〕

在1992年以前的三次总统竞选中，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赢得了大城市中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但是选举结果却都是共和党取胜，因为共和党获得了这些大城市在各州的郊区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大量选票。〔7〕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不仅在城市中心和郊区之间存在着界限分明的种族隔离，而且整个都市地区的种族紧张都在持续地向城市中心聚集。这对于黑人、其他少数族裔、仍然留下来的城市白人（尤其是低收入白人）之间的交往模式起到了很大影响。

就像内城区的少数族裔一样，低收入的白人也深受美国城市财政危机的巨大影响。而且，低收入白人比那些留下来的中产阶级，更因出于经济拮据而留在城市中心，于是不得不遭受各种困难：犯罪、高税收、少服务、质量差的公共学校等。另外，不像那些较为富裕的白人，他们选择生活在城市中心较为富裕的地段；作为穷人或工人阶级的白人，却难以将子女送往私立学校，而不得不让他们在差劲的公共学校学习；教会学校（罗马天主教）在美国的数量急剧减少，进一步恶化了穷人的教育问题。

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最初在工作场所附近购买了相对便宜的房子。可是，由于产业的分散化、毗邻社区中种族构成的变化、生活区犯罪率的升高、由于人口郊区化所导致的城市中心住房的过剩，他们所在生活区的房价实在难以追上郊区房价。随时他们工作其中的产业公司逐步搬到郊区和更偏僻的农村地区，生活在城市中心的低收入白人们，越来越陷入到双重困境之中。他们所拥有的贬值房产难以卖出可以让他们购置得起郊区住房的价格，同时他们跟工作地和新机会的距离也日益拉远。这一境况潜在地加大了种族张力，因为他们不得不跟黑人和快速

187 增多的拉丁裔人口进行竞争，以获得和控制城市中心残留下来的相对较好的学校、住房和生活区。

于是，为了争夺城市中心的权力和特权而展开的种族斗争，基本上是一种零和之战；比如，为了努力并入到诸如芝加哥南部的马凯特公园（Marquette Park）这类工人阶级族群社区之中，黑人与白人之间所形成的摩擦；为了控制当地公共学校，在1970年代，围绕从波士顿的罗克斯伯利（Roxbury）和多尔切斯特（Dorchester）两个聚居区到波士顿南部和查尔斯顿（Charleston）的工人阶级生活区的黑人学生校车接送问题，爆发了严重的种族暴力；为了获得对城市中心的政治控制权，就像最近这些年来芝加哥、纽瓦克、克利夫兰、纽约等城市所发生的那样，市长竞选中充满了种族对立和恐惧。

新贫困居民点或高失业率居民点中的各种问题，也导致了种族对立在城市中某些高收入群体中的形成。聚居区各居民点的高失业率，削弱了当地商业发展和其他制度的活力，导致影剧院、保龄球馆、饭店、公园、运动场及其他娱乐设施的日益减少和破旧不堪。因而，内城区居民点的居民更多地跑到城市其他区域去进行休闲活动，于是在这些其他区域中，他们跟种族及阶级背景都显著不同的市民之间就有了短暂的接触。文化风格和互动模式的显著差异，反映出了穷人居民点和中产阶级生活区之间的社会孤立，而这经常导致他们之间冲突不断。

内城聚居区居民点中的居民们的某些行为，经常会被其他群体（尤其是作为中产阶级成员的白人和黑人）视为是不礼貌的、甚至是冒犯性的，比如，他们倾向于不停地跟朋友或亲人谈话来分享某部电影，或者对于银幕上的景象经常做出不加限制的反应。任何不满的表达，无论是公开的谈论还是敌意的一瞥，都可能引发内城聚居区居民们的好斗反应，于是他们又有意地强化了那些激怒他们的行为。随之，电影观众中的白人甚至那些作为中产阶级的黑人就会做出退出的选择，用阿尔伯特·赫希曼的话来讲，他们通过光顾别处，以表达其不满和离开时体验到的强烈种族情绪或阶级对立。^[8]

中产阶级以这种方式放弃的区域，就会逐渐成为内城聚居区居民们的领地。相应的，这些地区中较为昂贵的饭店和其他服务于高收入群体的机构，就会渐渐失去其主顾，很快就会关闭，并被替代为连锁快餐店或其他旨在迎合或反映新顾客之经济及文化资源状况的地方商业。白人和黑人中产阶级会特别尖刻地嘲讽，随着聚居区居民的流入，曾经多么便利的城市中心地区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于是逐步成为他们的“禁地”。

尽管很多种族张力的焦点是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很多城市居民点中的事件都还涉及到拉丁裔人口。城市贫困与家庭生活研究项目中的民族志研究表明，对内城区黑人的对立，经常发生在邻近新贫困地区的拉丁裔生活区之中。比如，一位助理研究员的田野笔记中记录的一个例子：

我问他们就总体上的安全而言，这个生活区如何。他们说，只要你晚上不出去，你就不会有事。他们晚上都不会出去。他们说，那些犯罪事件都是黑人干的。当她的去买缝纫机的时候，曾被一个黑人抢走了钱包。她说，黑人们经常跨越他们的生活区，甚至进入某所房子生活一段时间。她说，周围都是黑人居民点，这里一点也不安全。我问他们这个地区是否也有墨西哥帮派，他们说他们对此知道得很少，但是，这里的很多问题肯定是黑人们导致的。

同住这一生活区的一位拉丁男人，也表达了他对于毗邻社区中的无业黑人人们的怨恨：

黑人呢，黑人只是少数人……他们在芝加哥工作。有些人工作很好、也很体面，但是有些人却不去工作，那么，对于这些人，你

必须躲开他们。芝加哥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都是纯粹的黑人，就像南部那样，你知道他们怎么样。这种情况很难改变，除非黑人开始遵纪守法或好好工作……黑人已经抢劫过我两次……他们用一根棒球不断拍打我，他们还强奸了一个女孩。如果他们竟做出这种事情的话，谁愿意跟他们一起出去呢？……他们从不尊重人，他们从不改变自己的性子。大家在晚上都很怕他们。大家都很难痛苦，我们绝不会跟他们一起生活或相处。

根据一些人口预测，拉丁裔人口将会在1997年至2005年间取代非裔美国人，从而成为美国最大的少数族裔群体；仅1990年，美国的拉丁裔人口就增加了2200万。在休斯敦和洛杉矶，拉丁裔人口的数量已经超过了非裔美国人；在达拉斯和纽约，他们的人数也即将接近黑人的数量。^[9]在跟休斯敦、洛杉矶、费城不太相同的其他城市中，“黑人和西班牙裔市民之间围绕立法选区(legislative district)的划分和席位的分配而展开的斗争也开始日趋激烈”。^[10]在那些人口变动较大的区域中，越来越多的拉丁裔居民抱怨说，当前在任的黑人公务人员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和忧虑。举例来说，在迈阿密，黑人与拉丁裔居民之间的紧张，已经逐渐变成为了就业机会、政府合同(government contract)、政治权力之分配、公共服务而进行的竞争。^[11]

然而，如果仅仅从种族肤色角度来看待这两个群体之间的接触，那将是一大错误。在戴德县(Dade county)，作为黑人的古巴人、多米尼加人、波多黎各人、巴拿马人已经逐渐开始从语言和文化角度来界定他们自己，而不只是根据他们的肤色。^[12]确实，很大程度上由于西班牙裔白人和西班牙裔黑人愿意住在一起，以及跟海地人和其他加勒比海地区黑人之间的交往，使他们之间相对较少产生种族张力，所以戴德县正在发生着全国最快速的住房去隔离化(desegregation of housing)。

相比之下，那些美国本土出生的、说英语的非裔美国人，则一直是迈阿密最为隔离的群体。^[13]他们聚居在以极高失业率为主要特点的生

活区中，深受戴德县北部地区贫困带的困扰。^[14] 尽管最近几年中，住在这些生活区中的高收入群体也发起过一些运动，但贫困黑人才是最可能深陷其中的群体，因为极端的经济边缘化和居住隔离化使他们变得最为脆弱。

也许，在少数族裔群体中，最强烈的种族张力发生在内城区黑人和韩国裔商人之间。美国于1965年对移民法进行重新修订之后，包括韩国移民在内的亚洲移民开始急剧增加。随着韩国裔人口在美国的增多，韩国企业也逐渐开到了内城聚居区。内城居民跟韩国店主之间的关系就变得越来越紧张。

在流入美国之前，很多韩国移民已经完成大学学业，并从事过职业化的、技术化的或行政管理类的工作。^[15] 然而，他们在韩国的教育经历和职业经历，都是不被美国劳动力市场所承认的。^[16] 到美国后，他们都面临两种选择：或者从事低工资的手工工作、服务工作，或者自营小商业，多数人都选择了后者。比如，据估计，在洛杉矶的成人韩国移民中，有60%都是自己经营小店铺。^[17]

但是，“对于很多韩国移民来说，自营小商业往往是苦乐参半，他们必须付出大量的体力、心力、家庭及社会成本，以获得中等收入”。^[18] 其中，失业人口众多的内城生活区中的持久的种族张力，便是其社会成本之一。最为极端的例子是，1992年洛杉矶大混乱期间，韩国裔小店主们的不幸遭遇。作为全国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骚乱，洛杉矶混战中，有58人死亡，23 883人受伤，17 000人被捕。据估计，被毁财物的价值在7.85亿至10亿美元之间。将近有4 500家店铺被部分地或全部地毁坏。而有一半被毁店铺(2 300家)都是韩国人所有或韩国人经营的，它们主要位于洛杉矶南区和韩国城附近。^[19]

法院判决殴打罗德尼·金(Rodney King)的白人警察无罪释放，这激起了很多黑人的愤怒抗议，于是洛杉矶南区的黑人们开始烧毁和洗劫当地财物。西班牙裔移民和身份不明的工人们随之加入了进来，但他们主要参与的是洗劫店铺。^[20] 有多种原因促使韩国店铺成为当地居民

发泄愤怒和进行破坏的主要对象。在发生骚乱的三天时间里，韩国店铺大多位于穷困生活区，不受洛杉矶警力的直接保护，于是成为最易受害的对象。这一区位因素还意味着，因为这些店铺正位于或最接近骚乱地点而使其成为最容易被洗劫之地。而且，由于韩国商人作为文化和种族上都跟黑人有很大差异的群体，他们的店铺在骚乱区域不成比例地高度集中，使它们被高度地突显了出来。^[21]

影响韩国人和黑人之间冲突的诸多因素都比较复杂，除了偏见之外，还包括着在交易争端中体现出来的最为明显的语言及文化障碍。正如尹麟镇(In-Jin Yoon)所言：

韩国店铺售卖的商品都价格低廉，因而也就不会持久耐用。但是，当顾客购买他们的商品时，韩国店主希望顾客们能够接受此种风险。此外，由于他们的商品只有微薄利润，韩国店主们不是完全拒绝退款和退换商品，就是规定其质保期仅仅为三天或一周。这是韩国店主和黑人顾客之间发生争端的最常见根源。黑人顾客们已经习惯于大商城的慷慨退款和商品退换，所以希望在韩国小店铺也能享受到同样的服务。当他们的退款或退换货物请求被拒绝时，他们就会与韩国店主发生舌战，这经常会进一步地发展成两方之间的种族侮辱。^[22]

在洛杉矶和纽约，地方性的黑人民族主义组织经常将韩国店铺在内城区的出现视为是对黑人经济的威胁，这常使黑人与韩国店主之间的交易争端转变为对韩国商业发展的抵制。^[23]

但是，如果说内城区黑人对韩国店主持有敌对性看法的话，那韩国店主对于黑人也持有极其消极的态度，他们认为，只要发生争端，就很难友善和解，即使他们没有任何对不起顾客之处。在对韩国城和洛杉矶南区 198 位韩国店主进行科学调查之后，尹麟镇发现，78%的应答者

都认为黑人很懒惰，76%的应答者认为黑人主要靠福利救济生活。通过比较韩国店主对于黑人、白人、亚洲人、西班牙人的不同态度，可以发现，他们认为，黑人是“最不努力工作的、最具有暴力倾向的、最不聪明的、最为依赖福利的”群体。尽管西班牙裔也不受韩国店主们的青睐，但其排序却在所有这些方面都高于黑人。而且，在对“如果要你在西班牙裔和黑人之间雇佣一名员工，你愿意顾谁？”这一问题的回答者中，80%的韩国店主都优先选择西班牙裔，只有10%的店主优先选择黑人。^[24]

192

韩国店主跟“西班牙裔之间维持着顺畅的交往关系”，在回答中也可以看出，他们与内城区的西班牙裔顾客之间很少发生冲突。正如尹麟镇所言：

作为移民，这两个群体身处同样的不利处境，他们所处的位置使他们都不具有土著美国人才具有的优越感。于是，西班牙裔美国人并不将经营小商业的韩国人视为是其自身经济的威胁，而是将其视为他们走向成功的学习榜样。相对而言，韩国人和黑人之间的出生地的不同，使韩国店主在跟美国本土出生的黑人进行交往时缺乏自信；跟西班牙人相比，黑人在和韩国人相处时更为自信。作为长期的美国居民，黑人认为他们具有先于外来移民得到经济发展的权利。这就导致他们将内城居民区中的韩国移民店铺，视为是对黑人经济的威胁；这些店铺是白人社会体系的一部分，都是对黑人的压迫和剥削。正是由于此种态度，一旦出现任何对顾客的不敬或不利时，黑人会比西班牙人更强烈地充满怨恨。^[25]

在经济困难时期，当多数美国人都忙于解决各种问题时（实际工资降低、急剧增加的新旧工作之间的转换、全球经济高度一体化与技术化

背景下的就业不稳定问题)，上述这些种族张力经常会爆发出来。对于经济困难时期的政治领导人来说，他们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将深感挫败的公民们引到积极的、建设性的方向上去。^[26]然而，在过去的几年中，经常出现的却正好与此相反。在经济极不稳定的时期，曝光度很大的特定代言人，经常运用恶毒的种族修辞，这会增加种族张力，并将以严重分裂种族群体的方式去引导人们的挫败感。在经济困难时期，人们会更易于接受简单化的意识形态信息，这些信息会使人们的注意力偏离他们问题的真正而复杂的根源。这些分裂性信息，不是使人们将自己遭遇的问题跟经济及社会变迁联系起来，而是使人们转向互相戕害——种族之间的互相对抗。

失业率的增加逐渐耗尽了内城社区的活力，很多这种信息都将内城区犯罪、骚乱频发、家庭破裂、福利依赖等问题与个人缺陷联系起来。这些信息附和着很多美国人所坚持的谴责受害者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最为简单。这些信息不仅强化了失业、贫困问题反映个体不足这种主流信念，而且还阻碍着人们对于旨在战胜内城区社会紊乱问题的更有效的新项目的支持。

确实，正如我们下文将要看到的那样，很多美国白人对于各种项目倾向于采取抵制策略，他们认为这些项目主要有益于少数族裔。在1960年代，为提高观众对于非裔美国人困境的关注和认识而做出的各种努力，促进了市民权利立法和后来的平权行动计划（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s）的实施。黑人领导者经常援引“黑人进步的迷思”（myth of black progress）这种措辞，来强化其对以种族为基础之各种政策的论证，而这却反而为保守主义批评者提供了诸多方便。尽管这一策略也许增加了某些白人对于美国黑人困境的同情，但是，它也制造了某种错误印象，让人们误以为联邦政府的反歧视举措是失败的，此种策略忽视了196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的复杂的种族变迁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也许，这一策略的最大危害在于，在各种煽动性信息的激发下，它培育了越来越多的公共关注，以至于政治家们若对黑人抱怨保持敏

感，其代价则是失去作为多数的白人的支持。

随着新世纪的来临，种族平等运动也需要采取新的政治策略，这一新策略将诉诸更广泛的联盟，去解决源自于历史种族主义(historical racism)和困扰着内城区居民的诸多问题。

1980年代初，民权斗争的成就是显而易见的——黑人在职业化、技术化、管理类岗位上的人数不断增多。这种进步还体现在，高等院校中黑人注册人数的增多，自有住房的黑人的增多。在这些领域中，黑人数量的增加比例要大于白人，因为此前只有极少数黑人才有自己的房产或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正如詹尼弗·霍克希尔德(Jennifer Hochschild)所言：“除非一个人能够将其成功传递到他的子女身上，否则他在美国就不算是真正的成功。”^[27]在1960年代，即使那些老黑人中产阶级中的少数成员，“也极难做到这一点”。1960年代早期对于黑人职业获得和流动状况的经验研究指出，“没有证据表明阶级对于职业或收入获得影响，会超过种族对于分层过程诸结果的影响。种族是一个影响极大的因素，即使在白人分层中较为稳定的阶级效应，一旦用来解释黑人，就会仅仅因为黑人的肤色就变得不再显著”。^[28]换句话说，霍克希尔德继续指出，黑人“中存在着某种强有力的拉平主义(egalitarianism)趋势——无论是贫困这个不利因素，还是财富优势，就他们是否可以成功或将其成功传递到子女身上而言，这些因素的影响都没有任何显著差异。歧视淹没了其他一切”。^[29]

194

然而，迈克尔·豪特(Michael Hout)的研究表明，在1962年到1973年之间，阶级开始影响黑人的职业生涯和代际流动，犹如阶级对于白人通常发生的影响一样。^[30]尤其是那些背景较好的黑人，他们多数都实现了很大的向上流动。“在美国历史上，较为富裕的黑人们第一次开始期望他们的成功能够得以持续和不断累积。从1973年开始，这些趋势仍然在持续着，尽管不再那么明显。”^[31]

另一方面，1973年到1980年期间，在那些黑人中的弱势者尤其是

聚居区的穷人们中间，失业、贫困的集中、家庭破裂和福利依赖等严重问题甚至更加恶化。^[32]

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不同黑人的不同发展速率仍然在继续着。最贫困者的家庭收入最能说明此种态势。从 1977 年到 1993 年，收入低于贫困线 50% 的黑人比例（“贫困”的标准是收入低于 14 335 美元的四口之家和收入低于 11 522 美元的三口之家），从 1977 年占黑人总人口的 9.3% 上升到了 1993 年的 16.7%。1977 年，在贫困黑人中，收入低于贫困线 50% 以下的人不到三分之一；到了 1993 年，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二分之一（50.4%）。而且，1977 年，贫困黑人家庭的收入比贫困线平均低 5 481 美元；但到 1993 年，则比贫困线低 6 818 美元。贫困黑人家庭收入在 1993 年跌落到贫困线以下的程度，要远远超出从 1967 年
195 国家统计局开始统计此类数据起的任何年份（这些数据和下面的数据都已经根据通胀情况做出过调整）。^[33]

从 1975 年到 1992 年（参见表 7.1），美国黑人家庭中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家庭，其平均收入下降了 33%（从平均 6 333 美元下降到了 4 255 美元）；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的家庭，其平均收入上升了 23%（从 55 681 美元上升到了 68 431 美元）；收入最高的 5% 的家庭，其收入上升了 35%（从 76 713 美元上升为 103 827 美元）。尽管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相当严重——如果将财富资产（总的财富资产而不仅是收入）考虑进来的话，两个种族之间的财富差距会更大；但据记载，在 1992 年，黑人家庭中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家庭，其总收入竟然是所有黑人家庭收入的 48.8%；同样根据记载，相比而言，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白人家庭，其总收入是所有白人家庭的 43.8%。^[34]所以，1975 年以来，美国总体上的收入不平等在逐渐扩大的同时，黑人之间的内部差距则更加严重。如果我们想要有效地解决黑人贫困问题，我们就必须去理解非裔美国人内部不平等的根源和动力机制。虽然民权运动所取得的成就绝不可否认，但是黑人领袖和政策制定者还是需要更加关注具体的补救措施，以使穷人的生活得到真正的具体改善。

表 7.1 黑人家庭的平均收入(按收入分为五组)

	1975*	1985*	1992	1975—1992
最低的 20%	\$ 6 333	\$ 5 169	\$ 4 255	- \$ 2 078
次低的 20%	13 186	12 653	11 487	- 1 609
中间的 20%	21 816	21 877	21 047	- 769
次高的 20%	32 811	35 049	35 029	+ 2.218
最高的 20%	55 681	64 499	68 431	+ 12 750
Top 5 percent	76 713	93 427	103 827	+ 27 114

* 根据通货膨胀调整到 1992 年美元的水平。

来源：美国统计局，“美国各家户(Households)、家庭(Families)、个人的货币收入”，参见当前人口报告(Curren Population Reports, series p.60, no.184)。华盛顿：政府印务局，1992 年。

民权运动的要求反映了 1960 年代黑人领袖们的总体信念：他们认为，为了保护少数族裔群体成员们的各项权利，政府的责任不是根据人们所属的种族群体来进行形式上的奖励和惩罚，而是应该通过反歧视立法工作来确保个体的自由。民权运动尤其关注的是人们拥有接受教育、就业、选举、使用公共设施等基本权利。从 1950 年代到 1970 年代，强调的重点是自由选择；国家的作用是防止人们以种族为基础对他人进行范畴化(categorization)对待。反偏见立法的目的是为了消除种族歧视，于是并未考虑少数族裔在特定位置中的人口比例问题。因为潜在的基本原则是，在选择想要的位置时，个人努力所获得的功绩应该是确定候选人的唯一决定因素。由于针对种族歧视而进行的民权抗议运动，明确地支持根本性的美国原则，此种运动也就具有了一定的道德权威，这也是马丁·路德·金等黑人领袖不断强调的一点。

指望以自由原则为基础的计划能够充分地解决我们社会中的种族不平等问题，这只是一种理想。其实，即使在我们清除掉各种种族障碍之后，长期的种族压迫所导致的不平等体制仍然会阴魂不散。正如我们在前几章所述，最为弱势的少数族裔个体，由于一直受到种族和阶级上的双重压制而严重受创，极其缺乏可使其在自由而开放的市场上进行有效竞争的各种资源。

消除种族障碍，实际上为那些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和技能培训、具有一技之长的少数族裔成员们创造最多机会，因为这些人拥有可以进行有效市场竞争的诸多资源。这些资源代表着家庭直接提供的或家庭使其得以可能的各种优势——家庭稳定、财务管理方式、同辈群体、学校教育等。^[35]

直到 1960 年代晚期，一些黑人领袖才开始认识到这一点。1967 年 11 月，肯尼思·克拉克(Kenneth B.Clark)曾说：“黑人们现在开始完全地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当前的民权胜利只是让很少的中产阶级黑人有所收益，而[贫困黑人]的困境仍然没有改变或甚至变得更糟。”^[36]仅仅消除种族障碍是远远不够的。正如后来的黑人经济学家薇薇安·亨德森(Vivian Henderson)所言：“如果说所有的种族偏见、种族歧视和种族主义在今天都已被消除殆尽的话，那么，由于经济阶级区隔过程(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lass distinction)和黑人经济萧条所造成的所有不幸却仍然岿然未动。”^[37]

于是，黑人领袖和自由主义的政策制定者都开始强调，不只需要消除主动性歧视(active discrimination)，而且还需对抗那些由过去的种族压制所遗留下来的各种后果。因而他们不只寻求良方去解决个体因遭受歧视而产生的不满，比如 1964 年通过的民权法案的第七章^[38]；而且，开始通过政府强制规定去大力实施平权行动计划(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s)，以确保少数族裔在就业、教育、公共项目等方面具有充分的比例。

然而，如果说少数族裔群体中的那些占有优势的成员们，从那些以个人机会平等为原则的各项政策中收益颇丰的话；那么，他们也将从仅仅以种族身份为基础的平权行动政策(affirmative action policies)中获益不少。^[39]来自最为优裕家庭的少数族裔人们，在大学录取、高收入工作、职位提升等他们的种族同胞最受限制或最想实现的方面，他们所占的比例远远超过了他们的人口比例。于是，平权行动政策主要为那些具有一定优势的少数族裔增加了机会，对于真正的弱势者的各种问题则并未起到充分的作用。^[40]

毫无疑问，平权行动的目的并不只是让具有一定优势的少数族裔获益。正如美国民权委员会前主任威廉·泰勒(William L. Taylor)所言：“多数[平权行动]措施的焦点都不只是白领工作，还包括执法工作、建筑工作、大企业中的工艺和生产工作——所有这些工作领域中所增加的新机会，都帮助较为弱势的少数族裔工人们实现了向上流动。”^[41]泰勒还指出，有研究表明，1970年代期间，很多进入医学院的少数族裔学生都来自低收入家庭。

但是，平权行动政策并没有真正地为弱势的黑人大众们打开向上流动的大门。就像其他形式的“竞争性挤压”一样，这些政策只是为社会经济背景虽然较低但却具有很好的教育资源及社会资源的人们提供了机会。只要认真分析一下有关收入、就业和教育获得的数据，就可以大致看出，居住在内城聚居区的人口中，真正从平权行动中获益的只是极少数人。

从1970年代早期开始，正如本书第二章所述，城市少数族裔人口在经济的结构性变迁面前开始变得极为脆弱，此种变迁包括从生产商品向提供服务的产业转变、劳动力市场中低收入工作和高收入岗位之间差距的日益极端化、技术创新的加速、制造产业向城市中心以外的区位转移。尽管反歧视立法的通过可以使少数族裔通过诉讼去应对各种歧视，平权行动计划的实施也为少数族裔就业问题制定了“目标和时间表”；但是，上述这些转变还是使失业及与之相关的贫困高度集中化、福利依赖、家庭破裂等问题急剧增多。

198

以种族为基础的各项政策，使少数族裔接受高等教育和获得职业化管理性岗位的人数得到快速上升。而且，只要少数族裔在高收入的、有吸引力的职业中比例过低，平权行动计划的存在就是必要的。^[42]但是，为了对保守主义者疾呼彻底废除平权行动做出回应，有一些自由主义者认为，平权行动需要从以种族为基础转向以经济阶级位置或需求(economic class position or need)为基础。^[43]

以需求为基础的平权行动，其最大特征是，认识到弱势者的问题(收

入过低、生活区犯罪率过高、家庭破裂、住房不够、接受教育较少、文化及语言差异)并非经常跟先前的种族歧视有明确关系。^[44]在受这些问题所困扰之家庭中长大的孩子,更倾向于否认生活机会的平等,因为他们的抱负和才能受到环境的很大限制,更别说种族因素了。不同的少数族裔人口从旨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平权机会计划(affirmative opportunity programs)中会获得不同程度的好处,因为他们受到环境影响的程度也不尽相同,但与此同时,弱势白人们的问题可能也会得到解决。

然而,以需求为基础的平权行动,很可能会将很多中等收入的黑人系统性地排斥到有吸引力的工作岗位之外,因为有关业绩的标准或传统做法并不会考虑种族的累积性效应。在此我指的是种族对于一个人生活机会的限制具有长期的跨代际效应(暂不考虑阶级),包括生活在隔离区所受到的影响——比如一个人在文化方面所习得的习俗、技能、行为方式等——隔离区中学校的实际教育质量、深受种族影响之父母的养育方式、父母能够传递给子女的资源状况等等。^[45]举例来说,如果我们只是遵循标准的大学录取程序,比如根据学术能力测试(SAT)成绩,那么,很多即使出身于中产阶级黑人家庭的学生也很难被录取;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白人将受到青睐,因为他们未受到各种源自种族限制的不利因素的累积性影响,因而若只是根据惯例性录取措施的话,其成绩可能就会比较高。我们很难确定,标准的能力测试是否能够准确地测出与特权截然不同的真正成绩或成功潜力。按理想来说,我们应该发展出灵活的评价准则(或功绩测量方法),而不只是数量化的导引或定额;由此而不至于将那些受到背景限制(包括作为少数族裔的黑人背景)的人们排斥在外,这些人跟那些不受背景限制的人们具有一样大的成功潜力。尽管一些测试能够很好地体现出学习成绩或工作业绩,但是它们却并未测量那些同样决定着功绩大小的一些重要特征,比如毅力、积极性、人际能力、可靠性、领导能力等。

所以,因为种族是构成“弱势”的因素之一,那么,理想的平权行动计划就应该强调以需求和种族为基础的灵活的评价准则。历史上的歧视

和种族隔离所导致的累积性效应，可能会以各种微妙的方式体现出来，从而导致黑人在较高位置中比例较低，而在较低位置中又比例过高。至少部分地以种族为基础的平权行动项目，可以轻易地解决此类问题；至于其他问题，则可以通过种族中立的策略来予以处理。正如前文所述，较为弱势的黑人在现代工业社会的变革面前极为脆弱，由此而导致很多仅仅靠以种族为基础之策略难以解决的各种问题——无论是诸如 1964 年民权法案这种体现了个体机会平等原则的举措，还是代表着平权行动的各种政策。现在，我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采取比以往各种在视野上更加广阔的解决方案。我将在本章最后一部分再次回到这一问题。

最后，如果说真有某种以种族为基础的计划可以使内城区的少数族裔贫困人口获得实质性好处的话，那它也肯定是一项能够有效地减少种族隔离程度的举措。无论是代表个体机会平等原则还是平权行动的各种举措，其目的都不是为了解决重要的种族隔离问题。正如前文所述，在隔离的聚居区中生活，会使就业和充分的就业准备都面临障碍。于是，种族隔离程度的减少必然会改善非裔美国人的就业前景。然而，“通过联邦政策去实现居住上的快速去隔离化，这在政治上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能之事”。^[46]只要还存在着白人可以后退的区域，那么，要在总体上降低隔离程度就绝非易事。一旦黑人搬进，白人就会搬离。而且这一过程的速度有时极为快速，正如我们在诸如芝加哥的大渡口(Greater Grand Crossing)等社区所看到的那样(参见第二章)。

要遏制住此种态势，方式之一也许是限制白人的迁徙自由，或者以某种方式提高白人迁徙的成本。但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政府去限制人们的迁徙自由，这既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受欢迎的。然而，通过消除排斥性区划(exclusionary zoning)和更加严格地执行公平居住法案(Fair Housing Act)，也可以逐渐降低种族隔离。这还有助于扫除障碍，以建设更多低收入家庭负担得起的住房，从而可能确保很多穷人家庭居住在就业机会更多的地区。总之，在几十年内，少数族裔穷人的收益还是相当大的。^[47]

有些举措可以看作是在这一方向上已经迈出的一些较小的步子。比如，1976年，面对芝加哥公共住宅区中歧视的普遍存在，在法庭判定压力下芝加哥开始实施高特罗计划(the Gautreaux program)。从那时起，这一计划已经将四千多名公共住宅区的居民，重新安置到了大芝加哥区域(the Greater Chicago area)内各生活区的各个政府补贴性住房之中。两位专门研究过这一计划的学者，在其研究中指出，那些被重新安置到郊区居住的家庭，在教育和就业方面享受到了相当大的收益。这一计划的成功，部分地是由于其相对很小的规模。因为每年重新安置到其他住宅区的家庭数量都很少，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些家庭的存在，于是并未形成大规模侵入的威胁。1994年，联邦政府确立了类似于高特罗计划的举措，名为“迁向机会之地”(moving to opportunity)。在两年时间中，只花费了2.34亿美元，就帮助6200个家庭从贫困生活区重新安置到了繁荣的地区。“但是，那些紧密关注着这一实验的住宅专家们却说，这会导致穷人们获得保障性住房的方式发生意义重大的转变。”^[48]

在美国，就提升社会权利(就业、经济保障、教育和医疗等)而言，没有哪个群体会比内城区贫困黑人更利害攸关。但遗憾的是，面向真正穷人的计划，有时会遭遇到相当大的阻力。在当前的政治氛围中，任何旨在增加穷人生活机会(包括就业机会)的计划，都不得不大范围地广泛实施。也就是说，该计划实际针对的是美国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而不只是解决那些内城聚居区人口的难题。

大约二十年前，晚年的非裔美国经济学家维维安·亨德森指出：“黑人在美国社会中的经济前景，跟这个国家中的其他人口紧密相关。将来用于解决穷人和受害者们的各种问题的政策，也将有益于黑人。反之，任何将黑人跟全国其他人口隔离开来的举措，都将可能导致经济受挫和种族对立的强化，这完全是在浪费全国资源和黑人们的宝贵资源。”^[49]

亨德森的警告似乎尤其适用于经济停滞时期，因为人们对于面向少数族裔之计划(或者当这一计划会涉及白人们的真实的或想象的物质牺

牲时)的公共支持在这个时候总会不断降低。当经济发展强劲之时,约翰逊执政期间确立了平权行动计划;当1970年代,经济逐渐衰退之时,大众对于平权行动的看法也开始日益充满敌意。

而且,正如约翰逊总统的内政事务特别助理约瑟夫·卡利法诺(Joseph A. Califano)在1988年的观察那样:“只有当这些计划仅仅作作为暂时的权宜之计以便促进黑人对社会及经济主流的融入时”^[50],这些计划才会总体上被白人所接受。但是,多年过去之后,很多白人“开始将此种政策倾斜的延续视为是某种不公平,并坚持认为,民主党只是在为一个跟他们无甚关系的奴隶及歧视时代进行赎罪”。他们还将公共学校的衰落跟“强制性整合”(forced integration)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将其跟社会的宏观变迁联系起来。

202

民主党也由于支持平权行动计划而大受攻击,人们越来越错误地认为这些计划只是为了穷困黑人。于是,几乎完全无关的两套医疗及法律系统在很多城市中得到发展。公共服务逐渐变得以黑人为主要对象,私人服务则主要面向白人。在一个表面上充满种族正义的时代,很多公共计划却似乎反讽性地构成了成本高昂的新的隔离形式。白人纳税人认为,他们被迫通过税收去支撑整个医疗及法律服务系统,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却缺乏为他们自己家人购买这些服务的资金实力。

然而,我们必须从多个方面去看待白人对于与种族相关之问题的反应。最重要的是,正如我们看待公共政策时的态度一样,有关这些反应的性质,我们也应该将其理解为意在解决内城区失业问题及相关问题。在过去的50年中,白人对于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支持发生了急剧降低。^[51]比如,尽管1942年只有42%的白人美国人支持学校整合,但到了1993年,这一数字却飞升至95%。有关过去50年中白人对于公共物品、公共交通、生活区域等方面之整合的支持情况,公共舆论调查揭示了类似的变化趋势。

尽管支持种族隔离的贬低黑人态度几乎已经消失,但是,对于旨在消除歧视、增加整合、促进黑人接受高等教育、扩大高层次职业中黑人

比例的政府计划，则并未因歧视黑人态度的缓和而获得更多支持。确实，正如公共舆论调查所表明的，白人几乎完全反对政府对黑人的援助。十分之八的非裔美国人都认为，政府现在并未花费足够资金去帮助黑人，而白人美国人中有此种感受的比例只比三分之一稍微多一点。对于因为黑人“长期长久遭受歧视”所以联邦政府“有义务去帮助提升黑人的生活标准”这种观点的支持率，1991年为五分之一，而且也从未有哪一年超过1975年以来的四分之一。^[52]此外，白人对于这一观点的不够支持，也跟他们的年龄、教育程度等背景因素有关。

203 也许，在最近这些年中，讨论最为广泛的种族政策问题是平权行动计划。尽管在1986年到1990年期间，教育和就业领域中平权行动计划的反对人数稍微有所减少，但是白人对于这些计划的反感始终都很强烈。1990年，大约有十分之七(69.1%)的白人美国人反对高等院校为黑人学生留出一定比例，有超过十分之八(82.5%)的白人反对优先雇佣或提升黑人的观点。^[53]

在上一章，我讨论了倾向于将贫困与福利依赖跟个体缺陷联系起来的美利坚主流信念体系。有关种族态度的研究也表明，白人之所以反对面向黑人的各种计划，也跟这些信念有关。“那些内心里充满反黑人情绪又在信念上认为黑人违背了诸如工作伦理、自力更生等价值的人们，更有可能反对平权行动政策。”^[54]确实，对可能提升黑人地位之政策最充满敌意的人，也大多是那些将非裔美国人的不利处境跟其黑人的个体特质联系起来的白人。这也许正是为何有这么多白人反对福利政策的原因之一。通过分析全国民意研究中心的综合社会调查数据(NORC General Social Survey)，劳伦斯·鲍勃(Lawrence Bobo)和莱安·史密斯(Ryan Smith)指出，人们对于黑人的敌对情绪跟反对福利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这些社会科学家却过于匆忙地指出，总体上的价值、信念和意识形态而不是种族态度，是解释白人对于福利花费之看法的最重要因素。^[55]

实际上，对于政府发起的旨在改进黑人生活标准的种族倾斜政策，种族态度显著地影响着人们对于这些政策的支持程度。鲍勃和史密斯

发现,即使在控制住社会经济地位和有关总体价值、信念及意识形态的一系列测量指标之后,种族态度作为一个重要因素,仍然在影响着美国人对于以种族为基础之政府政策的支持程度。〔56〕

然而,我们绝不能因为消极性种族态度跟反对种族政策之间在总体上存在着强相关关系,就忽视如下事实:有些以种族为基础的政策,也受到了白人的大量支持,这似乎跟种族态度无关。当前的一些研究表明,虽然很多白人都反对“倾斜性”种族政策,比如为了结果公平而实施的大学录取定额制或就业及晋升上的少数族裔优先政策;但是,多数白人却都支持“补偿性的”平权行动政策,比如针对少数族裔进行的就业培训、特殊教育、特殊招聘等政策。〔57〕例如,在1990年的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中,有69%的白人支持加大对黑人社区中学校教育的资金投入,尤其是学前教育和基础教育;而且,70%的白人都支持为那些成绩优秀的黑人学生设立专门的奖学金。〔58〕

204

于是,可以增强黑人把握机会之能力的政策,比如针对少数族裔的基础教育政策和就业培训政策,很少会“被白人视为是对个体主义和工作伦理等价值的挑战”。换句话说,补偿性的或增强机会性的平权行动政策都深受支持,因为这些政策强化了美国主流信念:工作获得和经济报酬应该以个人努力、培训技能和自我本领为基础。正如鲍勃和詹姆斯·柯吕格尔所言:

增强机会的政策之所以受到很大支持,是因为它们遵循着助人自助的价值规范。此外,增强机会的政策也不会对平等原则构成挑战。确实,让这些政策的受益者去努力获得提升经济地位所必须的培训和技能,这一点与根据个体努力获得报酬的信念是完全一致的。〔59〕

而且,不像“倾斜性”种族政策,增强机会性政策所获得的支持跟反黑人态度之间存在着相对较弱的关系。〔60〕

如今，在提升社会权利的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所有种族群体中的穷人和工人阶级都在努力实现收支平衡，甚至中产阶级的生活标准也有所降低。确实，不管何种种族和哪个阶级，所有美国人都在为诸多问题而深感焦虑：失业和工作保障、实得工资的降低、医疗及住房成本的升高、是否能获得可担负得起的儿童照顾政策、公共教育质量的急剧下降、生活区中的犯罪及毒品交易问题。

205 这些担心在公共舆论调查中都有所反映。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全国舆论调查一直都表明，人们强烈支持政府采取劳动力市场政策，包括加大培训和增加就业机会等。1988年的一项哈里斯民意调查(Harris poll)指出，大约四分之三的应答者都支持为支付儿童照顾费用而增加税收。1989年的哈里斯民意调查指出，几乎十分之九的美国人希望看到美国医疗保障体系的根本变革。1993年9月，《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联合调查指出，在克林顿总统发表有关医疗保险的全国讲话前夕，将近三分之二的美国公民都愿意缴纳更多税收，“以确保所有美国人都有无论如何都不会失去的医疗保障”。最后，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NORC)最近几年的调查都表明，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希望政府能够加大资金投入，以改进全国教育体系，遏制住持续上升的犯罪率和毒瘾率。^[61]

为了应对这些担心采取的各种举措，尽管是种族中立的，但却使全国人口中的多数弱势群体(尤其是贫困少数族裔群体)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益处。这些举措包括增加就业机会和工作技能培训、改善公共教育、完善儿童照顾和医疗保险、减少社区犯罪和毒品上瘾等。

用于解决经济及社会不平等的综合性种族中立举措，应该被视为是增强机会性政策(包括运用以种族为基础的标准去战胜社会不平等)的扩展而不是替代。我感到，在大学录取、雇佣工人、岗位晋升等方面，这些政策应该运用灵活的标准，应该以对弱势这一概念的宽泛定义为基础，既将弱势视为是需求上的也是种族方面的。尽管当今的公共舆论调查都指出，多数美国人都支持旨在增加机会的各种种族政策；但是，

如果这些政策设计的目的不是为了让美国人口中很大一部分都受益的话，那么，要维持人们对于这些政策的长期支持或动员人们来支持这些政策，将会变得异常困难。

然而，有些政策可以完全视为是种族中立的，比如全民健康保险、学校教育改革、以需求而非种族为基础进行就业培训；这些政策尽管强烈而积极地影响着少数族裔人口，但也同样有益于很大一部分白人。全国舆论调查表明，如果有可能进行调整的话，人们都支持将上述政策都纳入到综合性社会权利举措之中。如果此种调整有可能得到尝试的话，也许它应该采取某种新的公共修辞，这包括两项主要内容：(1)以不只困扰着穷人而且困扰着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各种问题为政策中心；(2)突出强调可以提升所有群体之社会及经济状况而不只是有益于真正弱势群体的整合性政策。但归根结底，内城区穷人的失业代表着最为极端的经济边缘化，而此种经济边缘化又源自于包括经济全球化在内的组织方式上的经济变革。

注释：

- [1] Hacker(1992), and Bell(1992).
- [2] Blumstein(1994).
- [3] Weir(1993b).
- [4] Caraley(1992).
- [5] Caraley(1992).
- [6] Weir(1993a).
- [7] Caraley(1992).
- [8] Hirschman(1970).
- [9] Rohter(1993).
- [10] Rohter(1993), p.11.
- [11] Rohter(1993).
- [12] Rohter(1993).
- [13] Rohter(1993).
- [14] Rohter(1993).
- [15] Kim and Kim(1994).
- [16] Kim and Kim(1994).
- [17] Yoon(1994) and Min(1993).
- [18] Yoon(1994), p.1.
- [19] Kim and Kim(1994).
- [20] Kim and Kim(1994).
- [21] Kim and Kim(1994).
- [22] Yoon(1994), p.13.

- [23] Yoon(1994).
- [24] Yoon(1994).
- [25] Yoon(1994), pp.20—21.
- [26] 正如我曾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这一主题正是克林顿总统在1992年总统竞选中不断强调的内容。参见 Wilson(1992)。
- [27] Hochschild(1995), p.44.
- [28] Hout(1984), p.308.
- [29] Hochschild(1995), p.44.
- [30] Hout(1984).还可参见 Featherman and Hauser(1978) and Wilson(1980)。
- [31] Hochschild(1995), p.44.
- [32] Wilson(1987).
- [33] U.S.Bureau of the Census(1994a).
- [34] Oliver and Shapiro(1995) and Wolff(1995).
- [35] Fiskin(1983).
- [36] Clark(1967), p.8.
- [37] Henderson(1975), p.54.
- [38] “1964年的民权法案第七章，是美国涵括面最广的就业歧视法规。它禁止拥有15名员工以上的私有的、国家的、地方政府的雇佣单位，因种族、肤色、宗教、性别或出生国而有任何就业歧视。还禁止任何规模的就业机构(employment agencies)、工会和联邦政府的行政部门有任何就业歧视。”(Bloch[1994], pp.48—49)
- [39] Fiskin(1983).
- [40] Fiskin(1983), Loury(1984), and Loury(1995).
- [41] Taylor(1986), p.1714.
- [42] 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95%的高级管理岗位(副总及以上)都是白人占据着，而白人只占所有劳动力的29%。Glass Ceiling Commission(1995)。
- [43] See, for example, Kahlenberg(1995)。
- [44] 弗什肯(Fiskin)曾将此种类型的平权行动跟生活机会的平等原则联系起来，参见 Fiskin(1983)。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公共政策研究院的诺埃尔·塞林格(Noel Salinger)，对于我这里有关平权行动的某些论述给予不少帮助。
- [45] Heckman(1995)。
- [46] Jargowsky(1994), p.310.
- [47] Jargowsky(1994)。
- [48] *New York Times*(1994)。
- [49] Henderson(1975), p.54.
- [50] Califano(1988), p.29.有关旨在有益于黑人之政策何以会导致白人对立的更佳讨论，可参见 Quadagno(1994)。
- [51] Bobo and Smith(1994)。
- [52] Bobo and Kluegel(1994)。
- [53] 相比而言，只有26%的非洲裔美国人反对黑人在高等院校录取方面的定额制，只有37.4%的非洲裔美国人反对在招聘和晋升时黑人优先的观点。参见 Bobo and Smith(1994)。
- [54] Bobo and Smith(1994), pp.382—383.
- [55] Bobo and Smith(1994)。
- [56] Bobo and Smith(1994)。
- [57] Bobo and Smith(1994), Bobo and Kluegel(1993), Lipset and Schneider(1978), Kluegel and Smith(1986), and Kinder and Sanders(1987)。
- [58] Bobo and Smith(1994)。
- [59] Bobo and Kluegel(1993), p.446.
- [60] Bobo and Smith(1994)。
- [61] General Social Survey(1988—1994)。

第八章

更广阔的视野：跨民族视角下的 社会政策选择

207

全球经济变革使欧洲和美国的福利国家制度负担加重，进而导致了包括种族冲突在内的日益严重的社会紊乱问题。1994年，在一次由七个工业化民主国家的财政部长和劳动部长参加的会议上，劳工部长罗伯特·瑞奇(Robert Reich)的提问是如此切中要害而又正合时机：“难道我们注定要在两难之间做出选择吗？更多就业但却充满不平等和缺乏保障，就像我们国家现在这样，或者更多数量少、收入更高的工作但却伴随着较高的失业率和丰厚的社会保障体系，就像欧洲那样？”^[1]这一提问的潜在意涵在于，欧洲和美国是否可以互相学习，以形成可以同时解决经济增长、失业和收入不平等等问题的社会政策。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任何主要的工业化民主国家，如果要解决就业和收入问题，都绝不能忽视高度一体化的全球市场体系的发展。确实，正是由于对如何在全球经济中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这一共同问题的关注，来自七个工业化民主国家(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美国，或称为七国集团，通常简称为G7)的财政部长和劳工部长们于1994年在底特律召开了一次就业大会。而在此前，只有各国领导人和财政部长才会“开会讨论高层次外交、金融汇率及利率管理问题”。^[2]然而，人们已经逐渐认为，这种高层对话方式并不能充分解决现在正困扰着这些国家的具体就业问题。

在会上，不仅讨论了老生常谈的话题，比如强调刺激经济增长的重 208

要性、避免运用保护主义政策去维持日益萎缩的就业市场；参会官员们还一致同意：“在快速技术变革背景下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唯一方式就是提升教育状况，尤其是为那些缺乏技术的人们提供更多教育培训。”^[3] 七国集团的政策制定者们第一次将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之间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视为全球问题来予以面对，并且强调过低的教育程度跟失业、低报酬工作等问题之间的紧密联系。^[4]

尽管该会议起到的更多是强调而非解决这些问题的作用，但是，这些部长们参会的主要希望还在于，本次会议讨论可以“让他们知道在解决就业问题时他们的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5] 这正类似于我从跨民族视角出发去思考可能的政策制定问题，这一跨民族框架可用于讨论美国就业问题的长期解决方案（此种方案需要坚持实施多年才能实现或达到所想要的目的），也可用于讨论我们可以想出的短期方案。

在我的思考框架中，长期解决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为了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并战胜工人之间日益扩大的收入不平等，就必须处理好两种关系：就业与教育、家庭支持体系之间的关系，在大都市中，则是城市中心区域与郊区的关系。这一框架中的短期方案，则是改进当前政策，或者建立新政策去努力减少弱势成人的失业问题。无论是长期方案还是短期方案，都需要将有关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的各项政策整合在一起通盘考虑。

我之所以急切地抛出我后文才会正式提出和讨论的政策框架，并非由于我受制于当前美国政治氛围中的关注热点。运用公共政策去战胜社会不平等的这种观点或做法的急剧退缩，严重地阻碍着人们去呼吁确立新的社会政策。强调的重点主要是个体责任，而非宏观社会中的不平等，其潜在假定是人们应该自力更生而不是依靠政府援助。于是，常有人认为，失业增加和福利依靠反映了人们对于社会核心价值的信守程度的降低，因而应该消除懒散动机或导致人们缺乏个人及家庭责任的各种因素。

这些观点随着某些力量的推动而得到发展，并从 1994 年的国会选

举开始逐渐成为公共讨论的持续话题，以至于有些对自由主义最为信奉者，也深感恐惧而无能为力。于是，有益于穷人的各项传统政策，比如有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AFDC)、针对穷人的医疗补助项目(Medicaid)、所得税抵免等政策，不是被彻底取消就是面临被严厉削减的威胁。

公共政策越来越不被视为是缓解社会不平等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式，这将会对诸如聚居区穷人等弱势群体的未来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本书中所讨论的高失业率、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社会问题都极为复杂，都根源于主要的经济、社会及文化变迁。因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诉诸大胆的、综合性的、考虑周详的决策方案，而不能只是采取简单但却可望不可及的需要加强个体责任这种观点。那些关心穷人及其后代之社会境况的进步主义者，不仅不得不去跟现存的公共政策进行斗争；而且，还具有提供与现存政策不同之策略的道德义务，以缓解而非加重穷人、失业者及美国其他弱势公民们的生活困境。

所以，我的目的是激励和召集关心弱者境况的美国人去展开反击，去击退那些在战胜社会不平等之路上使我们向后退而非向前进的那些人所展现出来的同样强大的力量和投身精神。因而，我之所以提出某些建议，并非是因为这些建议在当前政治氛围中似乎更易于被接受或“更切实可行”。相反，我所要谈论的是，我们应该如何去做才能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包括威胁着我们社会之根本组织(the very fabric of our society)的内城聚居区创纪录的高失业率问题。

有些人尽管认为需要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但是却感到应该等庞大的财政赤字得到重大减少之后，再去出台新的社会政策。然而，在最后的分析中，我们必须认识到，财政开支跟政治倾向具有直接关联。削减对于联邦资助政策的财政支持，无可置疑地是在牺牲弱势群体以成就优势群体(参见本章的图 8.1)。

我坚持认为，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去激励那些关心人类苦难和公共政策

架，需要对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的各种资源进行整合和动员。我们需要结成公私合作关系，共同去战胜社会不平等。在最后的分析中，我希望能够激励那些支持积极性社会改革并看到立刻行动之必要性的人们，去思考我们应该去做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去做。于是，下文所述的政策框架只是建议性的，不过是提供进一步讨论和争论的基础。下面，我将首先讨论我的政策框架中的长期解决方案，也即就业与教育、家庭支持体系之间的关系。

美国应该多向日本和德国这样的工业化民主国家学习。这些国家曾制定专门的发展政策以增加具有“高级思考能力”的工人的数量，包括制定政策要求年轻人必须达到较高的成绩标准才能从中学毕业，而每一所学校都肩负着实现这些国家标准的责任。正如雷·马歇尔(Ray Marshall)所言：“这些标准极为重要，因为它们为学生、老师和学校其他工作人员提供了努力的动因；为雇主和大专院校提供了录用的相关信息；也为政策制定者和公众提供了评估学校教育的方式。总之，通过加强各环节之间的联系，这些标准有助于确保人才塑造体系(fashion systems)避免跟社会脱节。”^[6]

达到较高标准的学生，不仅为其工作做好了准备，而且也有助于此后的技能培训和大专教育。^[7]然而，美国目前并未针对中学或中学生去制定此种国家标准。于是，那些并不修习大学预科课程的学生，在高中毕业后的找工作或技术培训方面，只有极为有限的选择。为了解决富裕生活区和贫困生活区的学校教育成绩之间的巨大差距，最为重要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要建立全美公共学校成绩标准体系。

但是，由于美国各地公共学校的教育质量很大程度上跟地方政府的资源状况有关，因而某些地区的纳税人和地方官员可能不会很重视全国统一标准。而且，因为有些学校仅有少数资源但却聚集了来自弱势背景或贫困生活区的大量学生，所以这些学校在实现全国成绩标准方面将会面临较大困难。对于此种联系，哥伦比亚大学教育专家琳达·达林-

哈蒙德(Linda Darling-Hammond)的反问显得极为重要：“全国成绩标准的制定真的能够促进学校教育的完善吗？或者，还需要去解决其他的各种结构性问题——比如资助金额、教师的知识和能力、获得课程资源的机会、功能失调的学校结构等问题？”她继续指出：

如果制定标准的目标是要改进所有学生的教育状况，而不仅仅是建立某种更有效的方式以便将学生和学校划分为“优秀”和“差劲”；那么，我们的工作重心就应该是，提升学校的教育水平，以使其以学习目标所要求的方式去进行教学。这就要求严谨认真地制定各种政策，以解决教师发展、学校发展、资源平等等问题。^[8]

因此，只有当制定全国标准这种方式可以解决当前美国公共教育体系中的不平等问题时，它才是一种有意义的改革之路。跟欧洲国家对各学校的平等支持不同是，美国对于公共教育的资助极不平等，“富裕学校的开支经常是贫困学校的两到三倍”。^[9]由此也就导致了不同学生教育经历的极大差异。富裕生活区中各公共学校的学生，经常享受着通风设施和设备齐全的小教室，而贫困生活区的学生们，则大都进入的是破旧学校，并且在设备贫乏的大教室中上课。^[10]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学生在高质量课程和高水平教师等资源的获得机会上也存在着极大差距，所有这都可以追根溯源为不平等的资助体系。正如伊里斯·罗特伯格(Iris C.Rotberg)和詹姆斯·哈维(James J.Harvey)所言：

“最好的”教师，包括经验最丰富的教师，往往会在学校分配方面获得不错的机会，因为他们的老资历会使他们免于被分配到高度贫困的学校。所以，低收入和少数族裔学生很少有机会接触到教学质量较好、经验较丰富的老师，而这些教师们所掌握的各种教学技巧，对于所有学生来说都是有效的。^[11]

212

当前，有关科学和数学学习机会之全国分布的研究表明，低收入、少数族裔的内城区学生们，经常处于不利于学习的环境之中，因为教师教学质量不高、物质资源很少、教室学习中很少有学生参与活动，因而在科学及数学方面，他们很少有机会接触到相关知识和接受到高质量教学。^[12]找出更多符合资格的教师这一问题日益成为紧迫之事。很多城市中心和贫困农村地区的学校中面临师资紧缺问题，由此而导致缺乏资历和经验的大量教师，他们中很多人的授课都并非是其最初所学，而且经常在短期授课和长期教学之间不断变动。^[13]

全国成绩标准体系应该受到特定支持，以确保那些贫困生活区的学校也能够达到所制定之标准。^[14]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不仅要给予各地方学校以平等的资助和出台有助于教师发展的政策（通过设立奖学金和低息贷款来促进师范生教育、吸引更多优质师资力量；增加对学校教育中师范生教育的支持；改革教师资格证制度等），而且还必须确保优质教师在各地方学校中得到相对平等的配置，以便使所有学生都有机会接受高质量教学。有些地区也许需要增大公共教育体系的极大灵活性，因为不只需要吸引和招聘优质教师，而且还需要重新安置那些课堂教学质量较差和缺乏教学兴趣的教师。地方教育机构和各州教育部门应该辨识出那些在课程发展和评估、教师发展、教育资源及物质资源等方面有较大欠缺的学校，并给予特定支持。

公共学校资源平等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计算机设施的可得性。自从有三分之二的新工作都需要使用计算机开始，所有学校都应该要求学生能够熟练地运用计算机。^[15]美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3至17岁的黑人青年中，只有35%的人在学校时会使用计算机。^[16]公共学校体系必须为每位学生在小学、中学、高中提供一块电脑工作区域，并与信息高速公路建立联系，包括确保能够上网。有些公共学校已经具备此种能力，因而无需改进；但是，还有些学校，尤其是内城区的那些学校，必需为其提供更多资源以实现这一目的。

为了将包括内城区学校在内的全美公共学校成绩标准都提高到期望

标准，可以将针对性教育(targeting education)作为国家政策的一部分。国家的任何努力都必须获得私有部门对于这一政策的支持和投入。应该鼓励大企业、地方小商业、市民团体、社区中心、教堂、社区组织，和学校一起参与到加强计算机能力教育之中。应该大力赞扬私有部门参与此类事业的具体例子，以便促使其他私有部门也参与进来。比如，美国交通部商业性空间运输办公室(the Office of Commercial Space Transportation)主任弗兰克·韦弗(Frank C.Weaver)曾言：

1994年，贝尔大西洋公司(Bell Atlantic)和远程通信公司(Tele-Communications, inc.)宣布，它们将为它们所服务之地区内的26 000所小学和中学提供免费的信息高速公路连接。根据这一名为基础教育连接(Basic Education Connection)的计划，相关学校将能够免费收到的教育有线电视节目，免费获得特定资料和网上资源，比如免费上网。

另一个名为休斯星球课堂(the Hughes Galaxy Classroom)的计划，则可以使全国51 000所小学的学生们，通过卫星电视获得更多教育资源。星球课堂基金(the Galaxy Classroom Foundation)的资助，不仅包括为学校提供碟形天线及相关设备，还包括通过卫星将科学和英语课程传送到学生课堂上。学生的反馈和提问都会被传真给节目制作人员，并将在下一期节目中做出解答。内城区和少数族裔的学校尤其值得关注。今年已有480所学校参加了这一计划，明年的目标是15 000所学校和150 000到200 000名学生。^[17]

214

因为全国成绩标准的确立，将为公众提供一种明确的方式去对不同学校进行评估，于是有关学校成绩的资料信息都会得到广泛散播。这将使不同背景的所有父母，包括那些生活在贫困生活区的父母，能够对

附近学校进行比较，从而做出恰当选择以确定他们的孩子应该去哪所学校。而且，如果某种有效的公共学校选择体系可以及时确立的话，那将更有助于那些贫困生活区的父母们做出选择和采取行动。此种体系将不仅包括选择公共学校的凭证，还应该包括简单易懂的有关学校成绩的信息。尽管目前还缺乏经验资料来证明现存的学校选择政策对于学生成绩的有效影响^[18]，但是，有新证据表明，公共学校之间的逐渐竞争（比如体现为大量学区在大都市区中的出现），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平均成绩和减轻财政开支压力。^[19]

1994年春，当国会通过《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案》（the Goals 2000: Educate America Act）时，美国终于在制定全国成绩标准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一法案列出了希望2000年能够实现的一系列目标，包括学生在各门科目中（科学、英语、数学、地理和历史）所体现出的能力到教师队伍的职业化发展。这一法案的潜在假定在于，联邦政府的重要职责是“鼓励各地方在宽泛的联邦指导框架下敢于实验、勇于探索”，而不是对教育体系进行完全统一的改革。^[20]

1994年，国会为《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案》拨款1.25亿美元；1995年的拨款是7亿美元。^[21]这一法案鼓励各州申请资助，以使其辖区的各学校参与到立法规定的教育改善工作之中。社区和地方学校也均受到鼓励，去发展出清晰明确而要求较高的标准，这些标准涉及教学、课程、技术、职业发展、父母及社区参与等方面。《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案》尽管是美国在制定全国成绩标准方面迈出的第一步，但是由于它并非是强制性的，而且只投入了很少资金，因而也就不可能使全国教育体系发生重大而广泛的变革。然而，教育问题却是至
215 关重要的，正如我在讨论为何需要建立恰当的全​​国成绩标准体系时所
说，教育问题要得到解决，必须实施大刀阔斧式的全面改革。

在其他工业化民主国家，旨在帮助儿童的家庭政策，也有助于加强教育体系。^[22]在工业化民主国家中，美国是唯一没有普遍的学前教育计划、儿童支持计划或育婴假政策的国家。正如雷·马歇尔（Ray

Marshall)所言：“这些政策的缺乏，使我们美国的很多家庭，尤其是低收入家庭，都缺乏较好的家庭学习体系。”“我们的很多儿童进入学校的时间都晚于其他先进国家，于是，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里，这些孩子都是在不太恰当的学习机会开始学习的。”^[23]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家庭结构正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单亲家庭的数量急剧上升，而且很多单亲家庭还深陷于长期的贫困之中。此外，即使在很多“完整”家庭中，丈夫和妻子都必须离家工作以维持生活。由于缺乏普遍的高质量学前教育及儿童支持政策，使这些家庭面临着更多的压力，阻碍了其提供某种学习环境的能力，而良好的学习环境可以为儿童进入学校打好基础并强化学习过程。

法国的儿童福利体系跟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法国，儿童可以从三个彼此联系的政策中得到支持——儿童照顾、收入支持、医疗保险。^[24]儿童照顾政策包括建立婴儿护理机构、高质量的托儿所(幼儿园)以及规定新生婴儿父母带薪休假等。收入支持政策则包括增强对儿童的支持(以使缺席的父母持续地为他或她的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儿童补助、给予低收入单身母亲的福利援助等。最后，医疗保险则是通过由社会保障基金出资建立的统一的全国健康保障体系而实现的，该体系对于儿童来说主要是某种预防性照顾体系，其中应有一群以儿童照顾为专长的公共健康护士。

幼儿园(école maternelle)也许是法国体系最独特的制度。儿童自从不用尿布起，就可以进入幼稚园，并一直待到他们升入小学一年级为止。父母都认为进入幼稚园对于他们的子女具有很大益处，因而即使那些无需工作的母亲，也会将其子女送进幼儿园。

正如经济学家芭芭拉·伯格曼(Barbara Bergmann)所言：

216

幼儿园将包括少数族裔儿童在内的所有儿童都整合在一起，为他们以后进入正规学校并成为未来公民奠定了基础。其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尤其是对于四五岁的孩子来说，是为孩子们进入

正规学校做好了准备。每年都在某所幼稚园读过的孩子，其在严格要求的一年级因考试不及格而需要留级的概率很低。而那些并未进入幼儿园的家庭较为贫困的孩子，则有一半以上都在一年级就会留级。学前四年都进入幼儿园，可使贫困儿童在一年级的留级率下降一半。对于那些家庭富裕的孩子，进入幼儿园则更加有助于他们通过一年级的考试。^[25]

将公共学校中的全国成绩标准体系和家庭政策联系起来，以强化学习体系，还可以使人们从学校向工作的转变更为顺利。“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中，学校向工作过渡的过程在美国是最为差劲的，”雷·马歇尔继续说道，“简单来说，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系统性政策去帮助高中毕业生顺利地实现从学校到工作岗位的转变。”^[26]美国各中等学校和咨询体系的焦点，是鼓励年轻人升入大专院校去攻读学位。但是，不上大学的高中生，在每个毕业班都几乎占到一半。于是，他们“只能自由闯荡——没人会给予任何建议或职业咨询，也没有任何就业安置方面的援助”。

不像德国和日本的雇主，美国的那些雇主如有收入较高、职业前景较好、福利可观的工作机会，他们通常不会雇佣那些刚刚从高中毕业的学生。美国的那些最大的、最好的企业，几乎都不会考虑青年工人。正如马歇尔所言：“在财富五百强企业中，只有少数才会雇佣刚刚毕业的高中生，为其提供具有职业生涯发展机会的入门工作。”^[27]很多大公司尽管最终也会雇佣高中毕业生，但是一般都是等他们达到25岁左右、累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并“已经成熟和定居下来”之后。其他的雇主都会效法大公司的这种做法。以至于“在美国见习生的平均初始年龄在25至30岁之间。职业生涯起点的这种延迟，使很多青年人都
217 在那些既缺乏技能学习又没有发展机会的工作岗位上挣扎5至6年”。

青年被雇佣的时间延迟，对于美国青年人从学校向工作的过渡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28]这使德国和日本的青年在首次获得重要的职业技

能培训方面，要比美国青年早 5 至 10 年；这使我们国家的最好企业及其重要的学习体系，未能及时对青年工人起到塑造作用；这破坏了企业和学校之间的自然沟通网络，使雇主难以将有关工作场所中的不断变化的技能要求反馈给学校；最为重要的是，这使学生在校时的学习成绩跟工作场所中的报酬没有任何联系，因而削弱了学生们取得学业成功的动力。

尽管所有种族和民族的学生们都面临着从学校向工作过渡的问题，但是这一问题对于黑人青年来说尤为严重。根据当前美国劳工统计局的一份报告，在未进入大学的黑人青年中，只有 42% 的人在 6 月份高中毕业后于 10 月之前找到了工作，而相应的白人青年的比例是 69%。^[29]对于生活在内城聚居区的黑人青年来说，这一数字显然会更低。从学校向工作过渡这一体系的不完善性，还导致了高中毕业生跟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在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当学校向工作过渡体系跟批量生产体系相互匹配之时，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收入只比高中毕业生高 20%。但到了 1979 年，这一数字却升到了 49%；1992 年，甚至快速地升到了 83%。

于是，学校向工作过渡在美国是一大问题，它已经使内城聚居区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危机。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第一步，国会于 1994 年春通过了《从学校向工作机会过渡法案》(SWOA)。这一法案为形成全国性的从学校向工作过渡政策提出了基本框架，其基本目标“建立在《2000 年目标》法案所提出的高标准基础之上”。^[30]该法案认为，发展全国性的从学校向工作过渡体系的最佳方式，首先应该是国家和地方的自愿性示范，包括自愿让商业公司跟教育机构一起进行学校改革，将工作和学校学习结合起来。该法案鼓励联邦、各州和各地方之间多开展合作。此外，该法案还强调商业和教育在各地方的合作，这是学习自德国和日本的经验，这两国都极为重视私有部门对于教育事业之投入的重要意义。

218

但是，我不得不再次指出的是，投入到这一政策上的资金相对而言

是很少的。在1994和1995这两个财政年度中，这一法案总共的资助额度还不到5亿美元。而且，赋予各州以自愿性示范权利，并不能确保最终一定会形成综合性的、全国统一的从学校向工作过渡政策。但是，这样一种政策却是迫切需要的，这不仅是为了解决高中毕业生之间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经济边缘化等问题，而且也是战胜内城聚居区严重失业问题的重要武器。

如果说，在就业问题的长期解决方案方面，其他工业化民主国家给予我们的教训是将就业与教育、家庭支持体系联系起来的话；那么，它们还给予我们的一大重要教训是，要重视从大都市视角出发去解决问题——也即，城市与郊区的整合和合作。没有哪个工业化民主国家允许其城市中心恶化到美国这样的程度。在欧洲国家中，郊区化进程并不意味着不再将城市中心视为是居住区域。“中央政府一直将城市视为是全国性资源来予以保护和培育。”^[31]确实，欧洲的各城市中心仍然是人们想去居住的理想地方，因为那里有最便利的公共交通、最有效的城市更新项目、主要为弱势家庭学生广泛提供的良好公共教育。而且，跟美国不同的是，欧洲的廉价公共交通使城市居民到郊区工作变得极为便利。

除非我们能够解决内城区中税收变少、社会服务不足、工作机会日益减少等问题，否则，将难以解决美国城市中日益严重的种族张力问题。城市逐渐成为人们不愿意居住的地方，城市和郊区之间的经济及社会差距也在日益扩大。剩下的群体则围绕较好的学校、住房及居住区等残留资源展开了激烈斗争，此种斗争很大程度也是种族斗争。新的城市贫困生活区的增多，则加剧了上述各种问题。贫困地区的高失业率及其社会解组所造成的各种问题，经常会散播到城市中的其他地方。所有这些因素都在不断地使种族关系日益恶化，使种族张力日趋激化。

按理想来说，我们应该恢复联邦政府在1980年时已经做到的对于

城市预算的投入，大力增加就业人数。无论联邦城市政策如何变化，只要可以实质性地增加就业人数，城市中的财政危机就越很容易得到缓解。就业的增加，还可以使新贫困社区更为稳定，遏制住人口密度急剧降低的趋势，最终使城市地区的种族关系得到质的改善。

谈论增加城市和郊区之间的合作而非隔离，也许，在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紧迫而重要。美国很多大都市地区中的政治分裂，是导致内城区失业及社会紊乱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正如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前市长戴维·鲁斯克(David Rusk)所指出的，因为东部和中西部的老城市难以通过城乡合并或吞并来扩张其区域，于是这些城市也就无法获得郊区扩张所带来的诸多收益，比如购物中心、办公楼、工业园区等在城市新区中的增多。作为少数族裔越来越集中居住的地区，这些城市面临着不可避免的螺旋式下降问题，因为它们缺乏郊区扩张所带来的收益。鲁斯克继续指出，各种聚居区更新政策，比如建立社区发展银行、发展非营利性内城区住房项目、筹建企业振兴区等等，并不能“逆转内城区的螺旋式下降趋势”，除非这项政策的实施是在“消除城市与郊区之间各种阻碍的行动框架”中进行的。^[32]

努力提升城市与郊区之间的合作，将不仅有利于城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城区和郊区在经济上往往是相互依赖的。城市中心越是被失业、学校功能失调、犯罪等问题所困扰，该城市周围的郊区在社会及经济财富方面就越可能不断下降。1980年代，郊区人口在收入上的增加，离不开当时城市中心的繁荣。^[33]在全球经济背景下，大都市中各区域之间围绕工作机会而展开的竞争日趋激烈。尽管跟城区相比，郊区仍将保持优势或逐渐变得具有相对优势，因为郊区具有技能较高的劳动力大军、良好的学校、职业化服务机构的聚集、第一流的医院、重要大学及研究中心、可以通往美国其他地区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便利交通网络；然而，这些因素未必仅仅为郊区所独有。它们也需要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中心。对于美国人来说，必须认识到城市与郊区的整合是大都市各区域甚至全国保持良性运转的关键。

人们提出了众多以实现城区与郊区合作为目的的改革措施：建立大都市政府(metropolitan government)、都市税收共享(在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已经开始实施)、进行协作性都市规划、当各社区难以达成一致时通过确立地方权威去解决其共同问题。^[34]在众多问题中，很多大都市都共同存在的问题是过于薄弱的公共交通体系。如果通过城区与郊区合作的方式去解决这一问题，这将既有益于城区居民，也有益于郊区居民。从理论上讲，在大都市各区域之间自由流动将有益于所有人，而内城区居民则将获得防止高失业率的一大重要法宝。

内城区的失业及社会紊乱问题，部分地跟全球经济变革有关；正是全球经济变革，导致了美国工人们之间总体上的严重收入不平等和工作不稳定，而美国社会政策又未能成功地适应此种全球经济变革。于是，如果只是孤立地看待聚居区失业问题，而不是将其跟困扰着宏观社会的诸多问题联系起来，那这将是极为肤浅的短视。

在我运用这一跨文化视角时，我并非意味着我们能够或甚至应该完全引进日本、德国或其他西欧国家的社会政策。正如雷·马歇尔所恰当地指出的，其他国家的政策取向嵌入在它们自身的文化之中，“正如有其优势一样，它们也具有自身的弱点和不足”。我们应该“学习其他国家的政策取向，将其中的有益成分吸收到我们自己的解决方案之中”。^[35]

221 其他国家的政策取向具有明显的优势。比如，在德国和日本，高中和大学的毕业生离校后都已经具有一定的技术能力，可以满足全球经济中高度技术化的市场要求。^[36]相比而言，美国则只有大学生和少数在高中毕业后又接受过特殊专业培训的学生，才会具有可以满足市场需求的技能。那些仅仅具有高中及以下文凭的学生，则大都并不具备这样的技能。

同样的，其他国家的政策取向也具有明显的不足和缺陷。除德国之外，在欧洲其他国家，工人们都存在着同样的技术差距。^[37]然而，

由于欧洲具有丰厚的失业保障，缺乏技术的欧洲工人不太会愿意接收低收入工作，而美国的低技术工人则经常不得不从事低收入工作。所以，欧洲无技术工人们的问题，不只在工资过低，还包括高失业率问题。正如我在第六章中所指出的，欧洲低技术工人们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加重了福利国家的重担。在失业人口中，有很多都是少数族裔移民，于是，公众总会将福利成本攀升问题跟这些人口联系起来。公众的此种认识进而导致日趋严重的群际张力。因此，曾经困扰着美国的种族对立、失业、城市贫困集中化等问题，现在开始在欧洲各国中逐渐表现出来。

正如美国可以从其他国家的某些政策取向中学到教训一样，欧洲各国也可以向美国学习如何使其劳动力更具有灵活的适应性，而不只是让他们长期处于失业状态却还享受着丰厚的保障。欧洲国家尤其应该向美国学习如何让无技术工人接受低收入工作，同时辅之以一定程度的保障水平，比如全民健康保险，以防止工人们跌落到极度贫困的深渊，比如美国工人就经常陷入极度贫困之境地。

讨论解决美国失业问题的短期方案，也很重要。由于内城区穷人和其他的弱势工人们，都只有很低的技术培训水平和教育程度，所以他们大都只能找到仅仅支付最低工资甚至更低工资的工作，而且还没有健康保险。然而，当前联邦政府的政策，却使这些工作开始变得具有吸引力。1993年，美国国会颁布规定，使所得税抵免(EITC)得到增加。到1996年时，增加后的所得税抵免，使工人的收入从最低工资涨到了222每小时7美元。收入在8400到11000美元之间的家庭，还将获得最高达3370美元的现金资助。^[38]所得税抵免的这次增加和此前于1986年、1990年分别在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时期的两次增加，都反映了如此共识：工资对于低收入工人的重要性日益降低，旨在帮助从事工作之穷人的其他政策(比如最低工资政策)也逐渐弱化。^[39]

然而，即使所得税减免的最近一次增加，其政策效果也是直到1996

年才完全体现出来(如表 8.1 所示);而 1970 年代以来最低工资实际价值的急剧降低和有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所给予资助的大幅度减少,都未得到相应的补偿。虽然如此,但是,“1993 年的立法规定,对于拥有两个及以上孩子之家庭的所得税抵免,可使拥有一名收入为最低工资的全职工作者的四口之家,在收入上达到有贫困线的水平,如果该家庭还可以获得食物券的话,那么其最低工资也就稍有提高”。^[40]

表 8.1 拥有两个孩子的母亲,可从工资、食物券、所得税抵免(ETIC)、联邦税(FEDERAL TAXES)中获得的平均可支配性收入(以 1993 年美元为准)

年 份	全年都从事最低收入工作所需要的小时数		
	20 小时	30 小时	40 小时
1972	\$ 13 482	\$ 14 602	\$ 15 656
1980	11 479	12 870	13 792
1990	9 830	10 467	11 509
1993(所得税抵免的政策效果到 1996 年才完全体现出来)	10 612	11 956	13 653
拥有两个孩子的母亲,其平均可支配性收入的变化			
1972—1993	- 21%	- 18%	- 13%

来源: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改编自预算与优先政策研究中心(1995)。

如果这些福利按月发放,再加上全民医疗保险,低收入工人的生活状况将得到很大改善,并有可能跟欧洲相应工人的收入水平相当。对于那些因孩子健康需要而深陷于公共援助之噩梦中的单身母亲来说,全民医疗保险的通过极为重要,这可以使她们不再被列入福利救济人员名单。全民医疗保险增加低收入工作对于技术工人们的吸引力,从而可以提升就业率。

223

然而,正值本书写作之时,在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中,不仅全民医疗保险的立法工作被搁置了起来,而且此前两党都支持的所得税抵免政策也开始被削减。1995 年 5 月,参议院通过了一项预算决议,其中包括在未来五年内将对所得税抵免削减 1 300 万,在未来七年内削减 2 100 万。正如预算与优先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这个非福利性公共政策研究组织,在对联邦及各州财政政策

进行分析时所指出的：

这些削减中的三分之二，都将通过废除 1993 出台的以增加所得税抵免政策的最后阶段来予以实现，而这一针对有两个及以上孩子家庭的优惠政策，按计划将在 1996 年才会产生明显政策效应；从而将所得税抵免降低到了比当前水平（1995 年的课税年度水平）还低的程度，无论是对于有两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还是对于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都是如此。大约 1 000 万有孩子的家庭所受到的所得税抵免优惠，将低于其原本应该享有的水平……1993 年的增加所得税抵免政策，在过去几年中都是按阶段实行。对于有一个以上孩子的家庭来说，按计划其最后阶段应该是到 1996 年的课税年度。如果增加所得税抵免政策的最后阶段被完全废止，1995 年的增加又被相应削减，那么，一个夫妻一方有全职工作且全年都只有最低工资的四口之家，其收入将降低 445 美元，这几乎是将他们向贫困深渊推了一把。^[41]

相反，并不太多的所得税抵免不但不应该削减，而且应该进一步增加；也即以一定的合理代价，使全部的至少有一人全年全职工作的贫困家庭摆脱贫困，而不只是使当前仅有最低工资的家庭走出贫困。进一步增加所得税抵免和争取立法通过全民医疗保险，仍然应该在现今的各种进步性公共政策议程中排在首位。我将在本章最后一部分再次讨论这些问题，但我首先需要论述完解决失业问题的短期方案。

在美国，对于某些工作者来说，居住地与工作地之间的远距离或不匹配经常是一大问题，因为跟欧洲不同，美国的公共交通体系并不完善而且比较昂贵。这就会成为内城区黑人的特定问题，因为他们很少拥有私人汽车；不像墨西哥人，黑人们并未形成可以一起拼车的社交网络。他们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共交通，因而到郊区工作就会面临困

224 难，而郊区往往具有更多工作机会，工作岗位的增长也较快。^[42]在大都市区域的公共交通体系得到改善之前，通过建立私人出资的共乘车或合用车网络，以便让内城区居民方便地抵达工作地，尤其是郊区，这可能是成本相对低廉的增加工作机会的方式了。^[43]

在内城聚集区中，非正式就业信息网络的断裂，进一步加重了居住地与工作地之间的空间不匹配问题。内城区居民点中大多数正在工作的成人，都主要是通过有工作的亲朋好友和熟人介绍工作或了解岗位空缺信息。在职雇员的就业推荐在美国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很大，正如本书第五章讨论招聘面试时所明确指出的。生活在失业聚居区中的人们却很少通过这一方式实现就业。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内城区的各个地方建立盈利的或非盈利的就业信息与安置中心，那这将不仅极大地便利了大都市区域居民对就业信息的获取，而且还可以直接将工人介绍给雇主。^[44]

这些中心可以吸收和接受内城区的工人，并将其安置到各种工作岗位上去。其主要目的在于，迫使那些长期失业或无业之人进入“待业状态”，以向潜在的雇主取保这些人能够理解和实现雇主的期望，比如准时上班、按规定办事、服从上级等等。只有当就业信息与安置中心对于某个待业工人感到满意后，才将他介绍给有空缺职位的雇主。而且，就业信息与安置中心还可以跟共乘车和合用车网络协调，以帮助那些缺乏私人交通工具的求职者方便地到达就业地。

225 然而，正如前面的经济分析所表明的，内城区工人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并非是完善就业信息的传播，也不是到哪里找工作或转变为待业的问题。主要问题是，经济的结构变革，已经导致劳动力市场对低技术工人的需求日益减少。^[45]在特定时期，这一问题可以通过恰当的宏观经济杠杆来予以一定程度地缓解，这些经济杠杆可以起到加速经济增长、减少失业的作用，如规定政府开支的财政政策和影响利率变动、控制货币供给的税收及货币政策。^[46]但是，由于市场对低技术工人的需求是根本性的结构性降低，这些政策将主要影响的是经济中的高收入人

口。很多低收入工人，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内城聚集区的人们，从未进入或被迫脱离了劳动力市场，而且还面临着消极性的雇佣态度问题；因而财政及货币政策调整并不能改善他们的就业前景。尽管有些人认为，低技术工人不能把握住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机会^[47]，但是我们所得到的证据都表明，跟1970年代早期的相应工作相比，如今提供给他们的工作，不仅实际收入很低、福利很差，而且对于特定的低技术工人，尤其是那些并未被纳入到不断扩大的福利体系之内的低技术男性工人，即使这种较差工作，现在也难以找到。^[48]正如经济学家谢尔登·丹齐格(Sheldon Danziger)和彼得·戈特沙尔克(Peter Gottschalk)所言：

在我们看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被迫选择不工作的人越来越多，而是在于雇主们对低技术工人的需求日益降低，甚至也不太需要那些愿意从事低收入工作的人。悖谬的是，对于改变福利依赖者的劳动供给行为，人们是如此的关心；对于改变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方，则又是如此的缺乏关心；而劳动力市场对于缺乏经验的低技术工人的需求越来越少。^[49]

如果私有企业不使用或拒绝雇佣那些愿意接受最低工资或更最低工资的低技术成人，那么，除了最后诉诸于增加公共部门就业的政策之外，内城区工人失业问题就不能得到恰当解决。确实，在劳动力市场的当前变革没有逆转之前，或者当下一代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其技术得到提升之后，很多工人，尤其是那些非正式劳动力，将很难找到工作，除非政府变成他们的最后雇主。^[50]这一观点尤其适用于内城区的低技术黑人。更糟的是，他们不仅面临着所有低技术工人共同存在的劳动力市场需求转变问题；而且，他们还遭受着雇主们对他们的工作技能和工作态度的消极认识。

226

如果在经济扩张时期，即使对于低技术工人来说就业也很充分之时，劳动力短缺将削弱雇主根据其对于某一群体之工作特征的主观性消

极评价去招聘雇员的可能。在1970年代晚期之前，很少需要创造出公共部门的就业机会。^[51]经济扩张时期不仅经济增长相当快速，而且“增长的收益可以得到广泛共享”。^[52]在1970年代晚期之前，作为最后雇主的公共部门，“在经济萧条时期实行的是逆周期政策，待到经济恢复期则再转换回来。只是从1970年代晚期开始，弱势群体才开始在经济恢复中逐渐被甩出去。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似乎永久地削减了私有部门对于低技术工人的需求”。^[53]

如果通过增加公共岗位去提升低技术工人的就业机会的话，那么这些工作的性质究竟应该为何？又该如何去实施呢？在创造更多公共岗位方面，有三种考虑周详的方案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第一种认为应该增加更多公共性基础设施维护岗位，第二种认为应该为低技术工人们提供更多公共服务工作，第三种则综合了前两种方案，认为应该增加罗斯福执政时期所设立的公共事业振兴署所开展的那些工作。

爱德华·里根(Edward V.Regan)曾提出一种方案，加大公共投入，实行基础设施维护政策。他指出：“基础设施的维护和更新可以……通过创造就业机会，尤其是为相对缺乏技能的人们，来促进经济发展；通过提高生产率，促进长期的经济增长。”^[54]据估计，在公路维护方面每投入10亿美元，将可以直接创造出25000个工作机会，间接使15000人实现就业。^[55]另一方面，新的工程建设只会创造出少量的高收入工作。另一项研究报告指出，新的建筑项目或重大工程所雇佣人数要比工程维护项目少40%。^[56]正如健康保险、儿童照顾、所得税抵免等政策会使其他低技术工作更具吸引力一样，这些政策也会增大基础设施维护项目中低收入工作的吸引力。

除了创造就业机会外，基础设施维护项目还可以促进生产率的提高。有关这一点，里根指出：

直观地看，维护道路、加固桥梁将意味着车辆轮轴的损坏越来越少、交通事故和道路拥挤的减少、运货成本的降低、交通运输

效率的提高。公路的拥挤和恶化、给水管道的破裂、污水处理的不及时,都会降低交通服务的效益——所有这些基础设施问题都会使生产率降低,使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增加,使就业机会减少。任何州政府或地方政府的官员,如果曾致力于将商业机构吸引到某一特定地区,如果曾看到企业决策者们对裂缝的混凝土或生锈的桥梁嗤之以鼻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明白我上述讲话的实际意义。[57]

里根还指出,基础设施的改善还将有益于很多方面,只是这些方面很少被认为是标准的经济指标,比如缩短了上下班时间、减少了交通拥挤。如果政策选择得当的话,对于基础设施维护的公共投入,完全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意见,将高速公路体系维护到当前质量水平所需要投入资金的全国真实回报率是30%到40%,那些拥挤的城市地区则需要加大投入,其回报率为10%到20%。[58]

尽管基础设施维护工作的增加将为低技术工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是在当前劳动力市场的现实状况下,这些工作很少会提供给那些高中辍学生或缺乏经验和经验很少的高中毕业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他们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谢尔登·丹齐格和彼得·戈特沙尔克两位经济学家认为,应该为现在的低技术工人和无业工人提供更多劳动密集型的、最低工资的公共服务工作,将这些工作作为他们最后的选择。[59]这些人可以考虑从事托儿所助理等工作,在放学时间,还可以到学校体育馆或公园做助理这类工作。这些工作只提供给那些在私有企业中找不到工作的贫困工人,这些工作所提供的服务,也往往是陷入财政危机的城市仅仅依靠其地方资源难以负担得起的重担。

他们有关增加公共服务工作的方案,跟当前旨在提升对福利依赖者的工作要求和工作动机的很多建议相比,主要有两点不同。第一,他们的方案针对的不只是福利依赖者,而是深受当前经济变革不利影响的

济名单还却还未接受福利救济的人。从1970年代早期开始就业前景逐渐黯淡的那些人中，只有少部分是福利依赖者。第二，他们的方案强调的是工作机会和增加收入而不是工作要求与工作动机，因而要求改变的是劳动力市场中的需求一方。

在此，我们需要澄清克林顿政府的福利改革计划中有关公共服务工作的建议；1994年，共和党在国会胜出之后，克林顿的这一计划也随之被弃。在克林顿的提议中，享受福利将从基础权利转变为仅仅只能享受两年而且是通过现金补助实现的某种过渡体系。对于那些福利受助者来说，如果他们在两年时间之后未能在私有企业中找到工作，那他们将有机会获得过渡性的公共服务岗位。然而，正如丹齐格和戈特沙尔克所恰当指出的：

该计划只是为享受了两年现今补助后仍然未找到工作的福利受助者提供最终岗位，这可能潜在地起到激励倒错(perverse incentives)和加重不平等的作用。那些没有资格享受福利或虽有资格但却尚未享受福利的家庭，将没有机会获得这些工作。尽管人们为了获得公共服务工作而努力去申请福利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仅仅为福利受助者提供工作，而不考虑哪些同样需要工作而且正在劳动力市场努力寻找工作的家庭，还是可能引发不满。^[60]

丹齐格和戈特沙尔克还指出，如果该计划提供的是“较好的”公共部门岗位的话，地方官员可能会在利诱下，违规安排制造业或其他货物生产行业的经验丰富工人来填补这一空位。于是，那些生活在失业率极高的内城区之中而又缺乏经验、技术和培训的工人们，就很可能被忽视。而按照他们的方案，为穷人提供的公共服务工作，产出的私有部门并不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因而也就难以让私有企业中的工人占去这些岗位。

他们的方案是向任何申请者都提供低于最低工资的公共服务工作。

他们还建议提供 10% 到 15% 的补偿金(低于最低工资), 以鼓励人们一旦有机会就转到私有企业中去工作。划分等级的职位体系应该为成功获得这一岗位的人提供奖励, “但是其所得工资必须低于其他工人在私有部门中成功获得类似岗位后的工资水平”。^[61]除了这些工资外, 他们还将获得增加的所得税抵免和其他补充性收入(包括联邦政府的儿童照顾补助金, 这一补助金将以返还所得税抵免和各州退税的形式给予有工作的穷人)。

显然, 根据丹齐格和戈特沙尔克的方案, 那些不得不从事社会服务工作的人, 其生活并不会达到舒适的水平。这些工作只是最低限度的, 只是“为那些想要工作但却无法进入私有化劳动力市场的穷人们提供一定的工作保障”。然而, 他们坚持认为, 他们的方案是对当前体系的某种改进, “只为从事公共服务工作的人们提供最低工资, 但这将使成千上万的穷人继续寻找工作, 即使很多已经拥有工作的人也必须不停地找工作”。^[62]

我们下面要考虑的最后一份方案是米奇·考斯(Mickey Kaus)提出来的, 他是《新共和》杂志的一位很有洞见的记者。考斯的方案以公共事业振兴署(WPA)为榜样, 这是罗斯福总统在 1935 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出的一项宏大的公共工作计划。罗斯福所设想的公共工作包括高速公路建设、贫民窟的清洁、住房建设、农业电气化等等。正如考斯所言:

根据官方记录, 在其存在的八年中, 公共事业振兴署建设或改进了 651 000 英里的道路、953 个机场、124 000 座桥梁和高架桥、1 178 条地下通道、8 000 个公园、18 000 个剧场和体育场、2 000 个游泳池。还建造了 40 000 栋建筑(包括 8 000 所学校), 修复了至少 85 000 栋建筑。大半个纽约市——包括拉瓜迪亚机场、罗斯福路、几百个公园和图书馆, 都是公共事业振兴署建造的……莱斯特·瑟罗(Lester Thurow)曾指出, 现在纽约市的基础设施之所以日益恶化, 就是因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没有了公共事业

署，从而缺乏对这些公共设施的重新修建或改造。^[63]

230 考斯提出了他所谓的新公共事业署计划，该计划将为想要获得公共工作的每位 18 岁以上美国公民提供就业，给予公共工作的工资稍微低于最低工资。考斯提出的计划不仅取消了为身体健全者提供公共援助或“工作福利”（workfare）的需要，而且，不像福利政策，振兴公共事业类工作

将向所有人提供，不管男人还是女人、单身还是已婚、母亲还是父亲。不会导致颠倒的“反家庭”激励。它甚至不会必然地限制向穷人提供公共工作。即使地产大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不怕难堪，他也可以来工作。只不过他不会愿意来。多数美国人都不會愿意来。他们无需“瞄准”针对穷人的政策项目。低工资本身就可以确保那些愿意得到这些工作的人正好就是需要这些工作的人，从而阻止了那些希望在私有企业寻找更好工作的人进来。^[64]

考斯认为，就像罗斯福通过公共事业振兴署实行以工代赈一样，他的方案中的以工代赈，也不会使人们背上接受现金施舍的污名。人们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报酬。尽管有些从事公共事业类工作的人，也会“晋升至高收入的公共服务岗位”，但是他们中的多数人都会在职业轨道上转向私有部门。“如果你无论如何都不得不去工作，”考斯问道，“那为何不去从事收入多于每小时 4 美元的工作呢？”

考斯的方案，同样为身体健全的福利受助者设定了时间限制。在一定时间之后，他们将失去接受现金援助的资格。然而，跟 1995 年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所提出福利计划不同的是，考斯方案仍然为那些不再接受福利救济的人们提供公共工作。考斯指出，为了让贫困母亲更好地

工作，政府资助的日托服务必须为这些有所需要的贫困母亲开放。但是，必须将这一服务整合到同样针对美国其他家庭的整个儿童照顾体系之中，以避免形成由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构成的“日托贫困区”（day-care ghetto）。

在考斯的方案中，在振兴公共事业类工作之外，人们还可以获得所得税抵免；所得税抵免可以合理的代价，提升所有全年都在通过全职工作摆脱贫困的那些家庭的生活水平。因为这一补助将会使所有低收入工人的收入得到增加，所以那些在私有部门工作的低收入工人也就不会感到不公平，而且他们的平均收入还将稍微高于那些从事公共事业类工作因而其报酬低于最低工资的工人。

231

考斯坚持认为，将会有足够多的公共事业类工作，可提供给任何想要从事这类工作的人。美国各城市中混乱而破旧的基础设施都该好好维护一下了。因财政原因而被政府砍掉的那些服务工作，比如一周捡两次垃圾、每天晚上和周六全天开放图书馆，都该重新恢复了。从填坑、给桥梁喷漆到做护理助手、办公员和厨师，无论男女，都有很多工作可以去做。“通过新的公共事业振兴计划，高速公路、学校、操场和地铁都得到了维护，图书馆每晚开放，城市街道一天清理一次，我们将过上更好的公共生活，将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些工作值得恢复。”^[65]

在对这三种方案进行评述之后，我们可以看出，考斯的新公共事业振兴计划最具全面性，因为它不仅包括了里根所提倡的基础设施维护类工作，而且也包括了丹齐格和戈特沙尔克所提议的劳动密集型公共服务工作。不像丹齐格和戈特沙尔克的方案，考斯的新公共事业振兴计划和里根的基础设施维护计划都并非专门以贫困工人为政策对象。考斯明确地指出，支付给新公共事业类工作的报酬应该低于最低工资；里根则并未论述基础设施维护工作的支付水平问题。但是，我们有理由推测，支付给基础设施维护类工作的报酬同样应该低于私有部门中类似工作的工资水平。然而，这两种方案或计划都很可能会吸引大量的经验丰富的工人，当尚未在私有部门中找到高收入工作之前，他们会更愿意

从事低收入的公共事业类工作。

由于考斯的新公共事业振兴计划比里根的基础设施维护计划具有更广泛的范围，因而根据考斯计划而实现就业的低技术和缺乏或没有经验的工人比例，肯定会高于根据里根计划实现就业的低技术工作比例。于是，考斯的计划将可能为高失业率的内城聚居区中的工人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232 丹齐格和戈特沙尔克所提出的劳动密集型的公共服务工作计划，旨在为低技术、缺乏或没有经验的工人提供直接的就业机会。然而，由于该计划明确地以贫困工人为政策对象，因为其具有导致污名化的危险。考斯所提出的公共事业类工作则可以避免这一问题，该计划将面向想要从事此类工作的所有美国人。鉴于其报酬低于最低工资，因而那些可以轻易在私有部门中找到高收入工作的工人，很少会对此类工作发生兴趣。即使地方官员经不起利诱而将“较好”的公共事业类工作提供给那些有经验的工人，那也还是会有足够多的劳动密集型工作，可提供给缺乏技术、培训或经验的工人。而且，那些有经验的高收入工人，只有在私有部门停工期间，才会接受公共事业类工作，因而他们从事公共事业工作的时间都可能会较短。

此外，考斯的公共事业类工作计划，还符合我在第七章所讨论的进步性公共修辞——也即以困扰着穷人、工人阶级、中产阶级的各种共同问题而焦点的公共修辞，而不是仅仅以穷人的问题为焦点。于是，该计划所促进的社会及经济状况的改善，将有益于社会中的所有群体，而不只是有益于社会中的那些真正的弱势群体。这也跟我的论述所见略同，也即，包括内城区穷人在内的所有穷人的失业问题，只是很多群体都遭遇的经济边缘化的最极端形式，此种经济边缘化很大程度上源自于经济(包括全球经济)在组织方式上的变革。

正是因为考斯计划具有综合性、引发污名可能性较小、符合有关社会改革的进步性公共修辞，所以我最终将其纳入到了我所提出的解决失业问题的一系列短期方案之中。然而，考斯却并未讨论新公共事业振

兴计划的管理问题。这一计划必须由联邦政府管理(正如原先的公共事业振兴计划直接由罗斯福政府管理),以避免“财政挪用”问题——也即,将公共就业项目的开支从地方或各州转移到由联邦政府负责。^[66]曾经的全面就业与培训法案(CETA)就曾出现财政挪用问题。1970年代,通过全面就业与培训法案创造的公共服务工作,却并未使累积就业人数增加多少,这是因为,各州和地方政府越来越利用这一法案,将受资助岗位替换为先前并不受资助的公共服务工作。^[67]其后果实际上是将某一资金渠道资助的就业岗位,转换为另一资金渠道资助的就业岗位。在此,我们的目标是增加就业,因而很有必要采取广泛的联邦监管措施。

233

作为避免岗位置换的另一种方式,我还建议,从事联邦性的公共事业类工作的工人,其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应该是私有部门中并不提供的,或者是常规的公共部门目前尚未提供的。^[68]如果这一问题不得到解决,那么,这一计划将会受到来自私有部门和公共部门中的工会与私有部门中各企业的联合反对。于是,跟考斯一样,我也认为,公共工作的有用性不应该仅仅根据财政原因来确定。^[69]这包括那些常规性的基础设施维护工作;一天清扫两次而非一次街道;一周清理两次而非一次垃圾;每周六和每天晚上开放图书馆;以确保深受吸引和大受欢迎为准,来确定对市政公园、操场及其他公共设施进行清洁的质量水平和频率多少;对操场的管理应该使周围生活区的所有儿童们最为安全地进行成人监管下的娱乐活动。

我们可以合理地预测,公共事业类工作者将会被用于补充或复兴公共服务者工作队伍;为了减少开支,在严重的财政紧张时期,有些州和地方曾经逐渐削减了常规性的公共服务岗位,而主要依赖于联邦资助的公共服务工作者。为了消除常规性政府服务工作者置换问题,我建议,特定时期内被取消或空缺的常规性工作岗位有多少,就应该相应地减少多少公共事业类工作者。

公共事业振兴计划的成本并不低。^[70]在短期内,跟创造就业机会

相比，直接给予人们现金救济的成本会较低一些。据估计，如果将监管费用和物资费用算进来的话，每份报酬低于最低工资的公共事业类工作，其成本至少为 12 000 美元。这意味着，每创造 100 万个工作岗位，就需要花费 120 亿美元的成本。这一数字还不包括通过所得税抵免以增加穷人收入的资助金额，这一数字也并不能反映在基础设施维护方面公共投入的长期的真实回报率，而基础设施维护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234 我所提议的这些短期方案，都不包括对那些在高技术化全球经济中可以谋得高收入职业的人们进行再培训。欧洲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及见多识广的观察家都广泛认识到，应该对低技术工人进行再培训。然而，有关新经济下进行再培训的热烈讨论，都主要针对的是年轻人和他们的从学校向工作的过渡或从学校向大专培训的过渡。对成年人进行再培训的成本是相当高的，在这方面，没有哪个工业化民主国家曾发展出了可以有效实施的成功方案。^[71]而且，过于强调技能学习和就业再培训，很可能会使那些已经具有很多工作技能而只是需要有所提升的人们多多获益。

此外，我的短期方案并不能解决美国社会中日益严重的工资收入不平等。我提出的长期方案，其中包括使下一代做好准备以适应全球经济所创造出的新就业机会，其目的正在于战胜收入不平等这一难题。但是，我所倡导的便于立刻行动的那些观点，则主要是为了解决很多低收入工人的就业问题，包括那些生活在内城区的穷人。他们当前面临着工作机会在内城聚居区日渐减少的严重问题。尽管根据我们的计划所创造的工作，其收入都并不高，但是如果辅之以全民医疗保险、儿童照顾政策、所得税抵免政策等福利的话，至少可使那些工人和他们的家庭达到最低水平的生活，而不至于面临失业及与失业相关的各种问题。美国国会已经立法规定，增加所得税抵免。全民医疗保险和一些灵活的儿童照顾政策尽管成本较高，但是这些政策却有益于所有美国人。而且，全国都开始认识到我们需要这些社会福利，仍然有相当

多的公众支持同时推进这两项政策——尤其是在那些医疗保险已经覆盖的区域，尽管在1994年国会选举之后，国会在实行那些旨在战胜社会不平等的公共政策方面多有退缩。

颇为悖谬的是，此时的欧洲却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削减社会保障的压力，尤其是无限期地享受失业保障的权利。未来将会出现两种方向截然不同的运动趋势——美国将趋向于增强其社会保障体系、欧洲则是趋向于削弱其社会保障体系，这将会导致欧美都达到类似的或水平相当的社会福利政策，以使大西洋两岸的工人们都免于经济匮乏和严重困境。然而，为了促进这一趋势，以战胜社会不平等为主要关怀的美国，必须抵制住美国国会在解决失业和贫困问题等公共政策议题方面的退缩。

235

旨在增加就业机会的政策，比如创造更多公共事业类工作，应该以美国人口中的大部分而不只是内城区工人们为政策对象，由此才能获得坚实的政治支持基础。在新的、全球高度一体化的现代经济环境中，不管属于何种种族、族裔和收入群体，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都面临着实际收入减少、工作变换增多、经济上缺乏保障等问题。前所未有的内城区失业问题，所代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紊乱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而这些宏观经济紊乱影响着美国社会中所有的种族和族裔群体。于是，当我们进行经济及社会改革时，如果只是聚焦于那些最为弱勢的群体，而忽视那些同样深受全球经济变革之不利影响的其他人口，那这在政治上将是极不明智的选择。

然而，正当我们需要采用大胆而创新的综合举措以解决这些问题之时，美国国会却越来越开始不再将公共政策视为是战胜社会不平等的有力武器。在解决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包括美国各城市内城区失业人口的不断增多）上的失败，严重恶化了城市各生活区和各家庭的经济生活。

为了改变当前政策制定者所采取的政策路径和政策方向，必须将那些在现代经济状况下为基本生活而苦苦挣扎的所有群体都有效地动员起

来，包括内城区穷人、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或许，联盟政治(Coalition politics)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方式，通过联盟政治推进各种种族中立政策的实施，如创造就业机会、进一步扩大所得税抵免、公共学校改革、儿童照顾政策、全民医疗保险等。必须结成广泛的政治联盟，以使这些政策在政治过程中得以顺利地通过。

236 因为有效的政治联盟部分地取决于如何界定所要解决之问题，所以在联盟的政治咨文中必须强调经济及社会改革之所以必要，是让所有群体都从中获益，而不只是为了作为少数人的美国穷人。^[72]这一政治咨文的制定者们应该认识到，全球经济变革正在导致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正在造成使不同种族和族裔群体的彼此对立不断加剧的境况；尽管这些群体被视为是彼此的对手，但是，他们也是潜在的改革联盟者，因为他们遭受着共同的问题——他们所无法掌控的外部力量所导致的经济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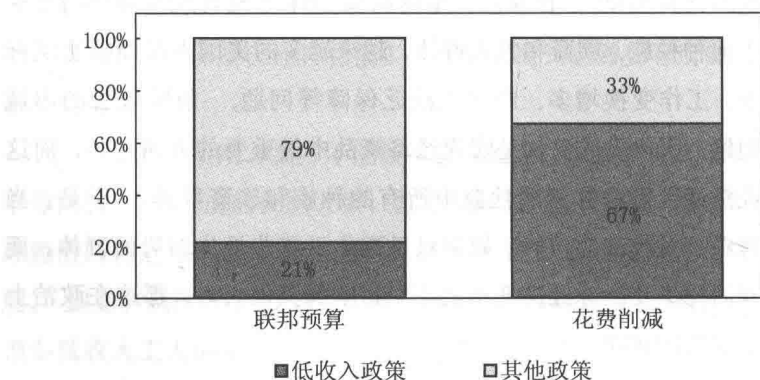


图 8.1 2000 年，低收入政策在联邦预算和住房花费削减中所占的比例

数据来源：预算与优先政策研究中心，1995 年。

在缺乏有效政治联盟的情况下所制定的政策，优先考虑的并不是弱势群体的利益。比如，在众议院所提出的削减 2000 年联邦预算的提议中，有 67% 都是要削减低收入政策，尽管这些政策在当前联邦预算中仅仅占到 21% (参见图 8.1)。如果缺乏有效的政治联盟，国会可能就不会

愿意出资支持旨在战胜新的社会不平等的各项改革举措。就在写作本书之际，当前势头是正在远离而非推进各项社会政策。那些政策制定者们，不是去认识和应对导致很多美国人陷入经济困难的复杂而多变的社会现实，而是在努力寻找替罪羊，将个人和家庭的经济问题归咎于个人缺陷，如缺乏工作积极性、工作伦理或工作动力。于是，也就很少有人对政府斥资实施各项社会政策给予支持——即使为那些福利期限已到、人数很少的福利受助者提供公共服务工作，也缺乏支持。最令人失望的是，面对这种在公共政策方面缺乏远见的退缩，及其将会对很多美国人所造成的严重恶果；那些进步团体，不但没有被动员起来去扭转当前公共政策的方向（也是我们国家正在航行的方向），相反，在共和党的与美国订立契约这种修辞面前，它们似乎都因深感恐惧而目瞪口呆。

237

于是，在各群体之间的新的政治联盟得以形成并对经济及社会改革施加压力之前，我所提议的各种长期方案和短期方案被接受的几率肯定都会很低，更不要说被认真考虑了。一旦新的政治联盟得以形成，那些关心当前公共政策之转变的政治领导们，将不得不提出一种统一的修辞，一种令多数美国人都深感共鸣的发展纲领，一种使各群体都出于自身利益而加入到旨在推动美国向前发展之改革联盟中去的政治咨文。

我所概要性地提出的解决方案，正是为了寻找适合这一改革联盟并易于被接受的政策框架。我的长期方案，包括在公共学校中发展全国性成绩标准体系、全国的从学校向工作过渡体系、提升城郊之间整合与合作的各种举措，将有益于美国的多数人口，于是也将获得较大范围的支持。我的短期方案，包括发展就业与安置中心、资助聚居区居民形成拼车网络、创造更多公共事业类工作等，与低收入美国人的关系更为紧密，但是由于这些都是增强机会的政策，因而会受到不管何种种族或阶级背景的所有美国人的共同支持。

虽然我的政策框架旨在吸引广泛的大众支持，但我坚信，如果这一框架可以得到采用的话，当前正困扰着内城区的大量经济及社会难题都

238 将得到缓解。很多内城生活区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工作机会的减少，而公共事业类工作的增加，则可使这些生活区中的就业基数立刻回升；所得税抵免的增加，也将使内城区居民的收入水平得到提高；诸如全民医疗保险、日托服务等政策，将使低收入工作和“以工代赈”（make work pay）更具吸引力。

就业基数的增加，将对内城聚居区各居民点的社会组织产生巨大的积极性影响。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就业，包括暴力犯罪在内的各种犯罪和吸食毒品等问题都将减少；家庭关系将变得更为和谐，福利受助者也将大幅度减少；跟聚居区联系紧密的特定文化及行为，也将因持久失业问题的解决而变得难以滋生和维持，于是不得不逐渐消失。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实现就业并获得工作经验，他们也将具有在私有部门中寻找更好工作的机会。雇主们对于内城区工人的态度也将有所改变，部分是因为他们将遇到更多具有稳定工作经验并手执前领导所写之推荐信的求职者。

这并不是说，内城区的所有失业者都能够把握住这些就业机会。有些人因长期失业而酗酒、嗑药，这些因素肯定会影响他们的整体工作业绩，如能否准时上班或持续工作。但是，这些人只是内城区工人中的一小部分。内城区的多数工人都需要、愿意、能够且渴望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我所提出的长期方案，将能够降低现在正在学校学习或处于学前阶段的青少年儿童们成为新一代失业工人的可能性。我们必须破除失业的代际循环，提前为青少年儿童们打好基础，以使其以后能够更好地适应全球经济背景下的新型劳动力市场。

无论是长期方案还是短期方案，我的政策框架都以这样一种认识为基础：失业聚集区的问题跟全国其他地区的问题紧密相连。尽管这些方案具有广泛的运用范围，并能够缓解很多美国人的经济困难，但是，它们对于失业聚集区的影响可能最为深远。这些政策建议的最大贡献，也许对于聚集区儿童的影响，他们将能够提前预期到经济不断变

动的未来，能够一起分享如此多的美国公民同胞们所体验到的作为美国式生活方式之一部分的希望和热望。

注释：

- [1] Quoted in Friedman(1994a).
- [2] Friedman(1994a).
- [3] Friedman(1994b).
- [4] Friedman(1994b).
- [5] Friedman(1994b).
- [6] Marshall(1994), pp.6—7.
- [7] Marshall(1994).
- [8] Darling-Hammond(1994), p.480.
- [9] Darling-Hammond(1994), p.499.还可参见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1991).
- [10] Darling-Hammond(1994).
- [11] Rotberg and Harvey(1993).
- [12] Oakes(1990).
- [13] Darling-Hammond(1990 and 1994).
- [14] Darling-Hammond(1994).
- [15] Hunt(1995).
- [16] Weaver(1995).
- [17] Weaver(1995), p.7.还可参见 Krieg(forthcoming).
- [18] Katz(1995).
- [19] Hoxby(1994) and Katz(1995).
- [20] Marshall(1994), p.21.
- [21] Marshall(1994).
- [22] Marshall(1994).
- [23] Marshall(1994), p.7.
- [24] Bergmann(1993).
- [25] Bergmann(1993), pp.343—344.
- [26] Marshall(1994), p.3.
- [27] Marshall(1994), p.9.
- [28] Marshall(1994).
- [29] U.S.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1994).
- [30] Marshall(1994), p.22.
- [31] Weir(1993a), p.26.
- [32] Rusk(1993), p.121.
- [33] Bok(1994).
- [34] Bok(1995), p.13.还可参见 Weir(1993b).
- [35] Marshall(1994), p.26.
- [36] Marshall(1994).
- [37] Friedman(1994b).
- [38] *New York Times*(1994).
- [39]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1995a and 1995b).
- [40]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1995b), p.2.
- [41]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1995b), p.2.
- [42] Hughes(1993).
- [43] 公/私事务所(Public/Private Ventures)是一个非营利性研究组织，它以芝加哥的多项地方性交通政策[尤其是郊区工作公交公司(Suburban Job Link Corporation)所创立的“工作快车”(JobExpress)项目]为基础，“设计了一项示范性研究，以测试连接内城区居

民和城郊工作机会的交通能力。这一名为通往工作之桥(Bridges to Work)的项目, 主要内容包括有交通(公共的或私人的)、一所能够将受过培训的工人跟郊区空缺岗位对接起来的机构(地方性就业服务机构)、特殊的支持性服务(由一个社区机构提供)。这项将用四年时间完成的示范性研究, 计划于1995年秋开始在九个地点进行”。参见 Public/Private Ventures(1994), p.9。

[44] 有关这一短期政策的建议, 我得多谢詹姆斯·托宾(James S.Tobin)。

[45] 参见本书第二章的讨论。还可参见 Danziger and Gottschalk(1995)。

[46] Bloch(1994)。

[47] 如 Mead(1992)。

[48] Danziger and Gottschalk(1995), p.155, Holzer(1995), and Carlon and Theodore (1995)。

[49] Danziger and Gottschalk(1995), p.156。

[50] Danziger and Gottschalk(1995)。

[51] Danziger and Gottschalk(1995)。

[52] Danziger and Gottschalk(1995), p.174。

[53] Danziger and Gottschalk(1995), p.174。

[54] Regan(1994), p.43。

[55] Montgomery and Wyes(1992)。

[56] Wieman(1993)。

[57] Regan(1994), p.44。

[58] Regan(1994)。

[59] Danziger and Gottschalk(1995)。

[60] Danziger and Gottschalk(1995), p.173。

[61] Danziger and Gottschalk(1995), p.172。

[62] Danziger and Gottschalk(1995), p.173。

[63] Kaus(1992), p.259。

[64] Kaus(1992), p.125。

[65] Kaus(1992), p.137。

[66] Danziger and Gottschalk(1995)。

[67] Danziger and Gottschalk(1995)。

[68] Danziger and Gottschalk(1995)。

[69] Kaus(1992)。

[70] 有关公共部门就业的讨论, 可参见 Danziger and Gottschalk(1995)和 Kaus (1992)。

[71] 据估计, 可能需要在教育和培训上投入“1.66万亿(1989年的美元价值), 才能使低收入工人跟具有大学文凭的工作者之间的收入比恢复到1979年的水平, 而同时又使有大学文凭的工作者保持其在1989年的工资水平”。参见 Heckman, Roselius, and Smith(1994), p.84。

[72] Wilson(1987)。

有关贫困集中化的观点

道格拉斯·马西(Douglas Massey)和米切尔·埃格(Mitchell Egger)(1990)曾对内城区贫困黑人日益加剧的隔离程度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尽管在1970年代黑人的内部隔离(interclass segregation)日趋严重，但是，我们并不能找出任何证据可以说明正是这些趋势导致了黑人贫困的日益集中化。”他们指出，由于存在持久的隔离，高收入黑人“难以完全脱离穷人而非其他的较富裕群体”(Massey and Egger [1990], p.1186)。于是，高度隔离群体中贫困率的增加，自然会伴随着贫困的日益集中化。然而，他们的研究以美国标准大都市统计区(Standard 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s, SMSAs)各普查地段的均值为基础，我并不认为此种方法可以足够好地测量出非贫困黑人从较为贫困的内城生活区向外迁出情况的变化。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道格拉斯·马西、安德鲁·格罗斯(Andrew Gross)和涉谷久美子(Kumiko Shibuya)(1994)通过利用收入动态追踪研究(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的调查数据，分析了穷人和非穷人在生活区(也即普查地段)层面的流动情况；收入动态追踪研究(PSID)旨在对个体和家庭的社会及经济经历进行全国性的长期追踪研究，目前该研究已将普查地段数据添加到了个人资料(individual records)之中。由于缺少1975年到1980年的通讯录，他们只能计算出1970年到1973年和1979年到1984年两个时间段的流动率。其结果表明，在1970年代早期，跟贫困黑人相比，非贫困黑人迁出贫困生活区的比例更高。

242 这一结论也支持了我在《真正的穷人》(Wilson[1987])一书中所提出的观点,该书主要讨论的是1970年代生活区的变迁。然而,早在1980年代,这一“差异就已反转过来”,穷人迁出的比例已经开始超过非穷人(p.431)。他们指出,主要有三种因素导致了贫困集中化。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其中的两种因素已经在《真正的穷人》一书中有所讨论:非贫困白人的迁出,贫困集中区域中越来越多的原有居民日益陷入贫困。第三种因素是指,贫困人口向贫困生活区的迁入。

除了保罗·贾高斯基(Paul Jargowsky)和玛丽·乔·贝恩(Mary Jo Bane)外(1999[参见第一章]),最近还有两项研究也分析了人口转变对于贫困集中区日益增多的影响,但这两项研究所依据的资料也是对某些生活区进行的调查数据而不是全市统计均值。这三项研究都表明,高收入家庭从贫困区域的迁出,是导致这些地区贫困集中化日益严重的影响因素之一。

克劳迪娅·考尔顿(Claudia Coulton)和她在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的同事们,将克利夫兰市的生活区划分为传统贫困地区、正在形成中的贫困地区和新贫困地区。他们发现,尽管在1970年代的十年中,这三个区域都有越来越多的人口陷入贫困,但是,对这些区域贫困集中化影响最大的因素,却是非穷人的迁出(Coulton, Chow, and Pandey[1990])。

贾高斯基和贝恩的研究焦点主要是费城、克利夫兰、密尔沃基、孟菲斯四座城市。通过将生活区替换为普查地段,他们将各生活区划分为从贫民区(也即贫困率至少为40%的生活区)和非贫民区,其研究发现,从1970年到1980年,贫民区具有显著的地理扩散趋势。1980年变成贫民区的那些地区,在1970年还是既有低收入者也有高收入者的普查地段,尽管这些地区一直都被视为是贫民区。他们的研究表明,贫民区日益增多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是非穷人从这些混合收入地区的流出:“穷人仍然生活在这里,非穷人却都很快搬离,于是1980年时仍然生活在这里的人口,也就比1970年时[曾生活在这个混合收入地区

中]的居民更贫困。”(p.56)

贾高斯基和贝恩继续指出,随着非贫困人口从混合收入地区中大量迁出,原先大多都是白人和非穷人生活区域的城市中心周围,就逐渐成为“大量黑人和穷人的生活区,较为富裕的白人都迁出了这些区域,使这里整体上少了很多人口”(pp.56—57)。于是,黑人中产阶级从混合收入地区而后变成贫民区的迁出,并未导致黑人中产阶级跟贫困黑人之间的相互接触日益减少,因为他们所迁入之地同时也是较富裕的白人所迁离之地,这一过程使 1970 年代的隔离和贫困不断在地理空间上得到扩展。

杰弗瑞·莫雷诺夫(Jeffrey Morenoff)也曾指出过这一点:

随着不管何种收入水平的非裔美国居民都逐渐从贫民区及其周围逃离,也有很多人迁入了这些贫困区周围的生活区中,很多这些地区似乎都在发生着种族转变(racial transition)。因而,随着核心贫民区在生活条件上的恶化,这些生活区也会出现净人口的减少,同时伴随着贫困率的增加,因为那些留下来的居民往往缺乏各种资源。这时,相较于核心贫民区而言,其周围生活区的人口则可能会增加(因为迁入人口的数量超过了迁出人口),这也会导致贫困的增加,从而需要对这些周围地区进行生态区位上的重新界定。

243

在这些研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经济学家凯瑟琳·尼尔森(Kathryn Nelson)的研究。她利用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的最新的美国住房调查数据,划分出了大都市区域中的“人口带”(zones of population),并对 1980 年代这些人口带的居民流动情况进行了追踪。可将其人口带视为是对生活区的替换。由于她能够辨别出人口带中多数城际流动者(inter-metropolitan mover)的当前居住地和先前居住地,所以她“对城市内部流动者(intra-metropolitan mover)的研究

可以达到地理方位相当详尽的地步，而不只像统计出版物或微观数据，只能说明城郊之间的流动情况”（Nelson[1991]， p.1）。

她指出，在 1980 年代，包括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在内的所有家庭，从最贫困地区迁出的比例都很高。而且，她还发现，从贫困区的迁出还“显著地伴随着收入的增加，黑人家庭和少数族裔家庭跟所有家庭一样；而且……在隔离较为严重的都市区域中，黑人迁出最贫困地区的比例相对较高且主要根据收入高低决定是否迁出”（Nelson[1991]， p.28）。她还发现，在那些隔离较为严重的都市区域中，白人迁出赤贫带的比例要高于黑人，而且也跟收入具有正相关关系。这使她推测道，生活在隔离较为严重之都市区域中的高收入黑人，也许很难找到不那么贫困的生活区：由于住房隔离这一常规模式的存在，当高收入黑人迁出贫民区时，可供他们选择的迁入地却很少，正如马西和埃格的研究所指出的，他们跟穷人为邻的可能性会更高。

有关类似的讨论，还可参见黄琦(Qi Huang)和保罗·阿特维尔(Paul Attewell)(1993)的研究。

城市不平等研究中心的方法论说明

243

芝加哥城市贫困与家庭生活研究

城市贫困与家庭生活研究(UPFLS)主要包括四部分:针对内城区居民的一项大型调查;从大型调查中选择少部分样本,进行开放式调查(社会机会调查[The Social Opportunity Survey]);民族志式的田野研究;针对大芝加哥地区雇主进行的一项调查。

244

有关城市贫困与家庭生活的大型调查(The UPFLS survey)

该调查实施于1987年和1988年,包括对1986年正生活在芝加哥贫困生活区、年龄在18至44岁之间的非裔美国人、非西班牙裔白人、墨西哥人、波多黎各人进行分层概率抽样。还包括对生活在同样地区、年龄在18至44岁之间并且不是父母的非裔美国人进行的补充抽样。所谓贫困生活区是指至少有20%的居民其家庭收入低于1980年联邦贫困线的普查地段。1980年时,有55%的芝加哥非裔美国人、有53%的波多黎各人、37%的墨西哥人和3%的非西班牙裔白人住在贫困生活区。

该调查每份问卷的平均耗时是两小时,由全国民意研究中心(NORC)的工作人员上门去进行调查。但是,有33%的调查问卷是通过电话进行的,因为有些被调查者不愿面见或已搬离芝加哥。该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收入、家庭人员构成、家庭背景、态度和社会网络。

271

也包括了有关就业、教育、公共援助、生育、迁移、兵役、拘留、关系（跟父母的关系、婚姻关系、同居关系）等内容的生活史信息。在问卷印制和调查过程中，运用了英语、西班牙语两种语言。样本量为3 165人，其中成功调查的人数为2 490人，应答率为78.7%。总体上，有1 572人为女性，有918人为男性。有1 183名黑人应答者，489名墨西哥人，454名波多黎各人，364名白人。在被调查的非裔美国人中，有1 020人是父母，有163人没有子女。在应答者中，几乎所有的非西班牙裔白人和黑人都是在美国出生，有85%的墨西哥应答者和73%的波多黎各人不是在美国大陆出生。但是，这些在岛上出生或国外出生的应答者，都是在儿童时期就迁居到了美国大陆。

社会机会调查

该调查的对象主要是从大型调查中抽出的167名应答者，他们都生活在最贫困的普查地段。运用的抽样方法是定额抽样，以4:2:2:1的比例从中分别抽出相应人数的黑人、墨西哥人、波多黎各人、白人。在每个族群和普查地段内部，则从每种婚姻状况（已婚/未婚）和就业状况（就业中/失业）中抽出同样人数的男性和女性。跟大型调查中的简短问答不同，该调查采用的是开放式问卷，以收集更为信息的系统性资料。问卷内容的组织主要围绕以下主题：机会和流动、工作经历和观念、教育程度及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家庭人员构成、社会阶级、家庭财务状况、访谈员的观察记录。在问卷的印制和调查执行中，也运用了英语和西班牙语两种语言。

在经被访者同意后，这些访谈都有录音。每次访谈的平均时间是一小时。要找到该调查中抽中的所有被访者极为困难，尤其是男人。因而最终成功的被访者中，有63名女性非裔美国人和34名男性非裔美国人，17名墨西哥女性和14名墨西哥男性，11名波多黎各女性和3名波多黎各男性，20名白人女性和5名白人男性。

民族志式的田野研究

民族志式田野研究包括两项内容：深入的个案研究和贫民区的参与

观察，这两项研究都是在贫困的城市生活区进行的，无论黑人、墨西哥人、波多黎各人还是白人，所有受访者都主要聚集在这里。此外在该研究中又增加了两个生活区：一个是亚述移民生活区，一个是位于芝加哥东南部的贫困黑人居住的郊外生活区。“之所以增加这两个地方，是为了利用[研究助手们]此前已经对这两处地方进行过的研究和联系，以便将其跟其他一些地区进行比较和对照。那个黑人郊外社区跟内城生活区较为类似，因为都是贫困区；它不同之处在于，它的人口很少，缺乏公共交通，因而跟其他社区几乎完全隔离开来。[亚述人社区]跟这些社区尤为相似，因为这里的很多居民都是第一代移民，不懂英语，主要生活在亚述人社区这个飞地中。”(Krogh[1991a])

个案研究主要是跟 99 名被访者进行谈话，从对一名被访者进行一两次访谈到对同一名被访者进行 30 或 40 次访谈，访谈次数没有限制。但平均而言，大概会对每位被访者访谈 6 次。在经被访者同意后，所有访谈都有录音。跟被访者的总接触次数几乎达到 600 次，收集到将近 600 份个案研究资料。参与观察研究，则主要由作为研究生的民族志作者根据其非正式观察去收集资料。参与观察的主要内容包括走街串巷并跟人们进行非正式交谈；经常到访那些人们聚集在一起进行娱乐活动、接受社会服务或使用公共设施的场所，与他们互动的同时观察他们的行为；跟个案研究中的被访者建立关系，以便让其介绍观察者跟其他人认识或参与他们的邻里活动。

在参与民族志式田野研究的研究生中，有四人主要负责黑人生活区，有三人主要负责墨西哥生活区，分别有一人负责白人、波多黎各人、亚述人居住三个生活区。他们主要于 1986 年和 1987 年的两个夏天进行了专门的田野研究，但在 1986 年和 1987 年这两个学年中，他们也利用空闲时间继续了该研究。有两位学生于 1988 年继续扩展了他们的田野研究，他们努力访谈了更多的黑人和墨西哥人。

雇主调查

芝加哥及郊区的库克县(Cook county)中的一些企业和一些私营企

业主，为我们的雇主调查提供了资料。样本框的制定以工作职位在各行业和各地区的分布为基础，具体以1984年版《到哪里去工作？》（*Where Workers Work*）中所列出的信息为准。“制造型企业主要根据伊利诺伊州制造商指南而选出，其他各公司则主要是根据伊利诺伊州服务业指南而选出。此外，有些零售企业和消费者服务型公司是根据电话簿选出的，因为商业指南中并未完全收录这些企业。”（Krogh[1991a], p.25）

246

企业样本的确定方法，是根据行业类型、规模、地区进行分层抽样。运用标准的行业分类：制造业、建筑业、采矿业、批发业、零售业、交通运输业、通信业、公用事业，通过分层以反应各类型企业在芝加哥都市区中的分布情况。运用人员规模进行分层，是为了反映其所提供就业机会的多少，尽管有很多小企业，但是大企业可以提供更多跟其人员规模相称的就业机会。于是，要根据其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的比例来选择企业。因为预期的应答率是50%，所以为了有200个企业做出回复，最终就选定了400家企业。“事实表明，超过50%的企业都愿意接受访谈，但是由于该研究项目缺乏足够的资源，而难以对所有的潜在被访者都进行访谈。在田野进行到一般时，在控制住行业比例后，每一地区的应答者比例已经都达到了40%。按照高于40%的比例所确定分层样本中那些尚未联系好的个案，我们也不再继续。”（Krogh [1991a]）最终的总体应答率是45%。这一比例在各个分层指标中都是极为类似的，无论是行业、规模或地区，都没有任何重大的偏离。

跟雇主的面对面访谈是由六名研究生进行的，他们于1988年7月和1989年3月之间跟样本企业中的代表进行了访谈。每次访谈的平均时间是1小时，尽管很多被访者愿意交谈更长时间。最初接触和多数访谈都是跟企业里的高层主管进行的。调查中既有封闭式问题也有开放式问题，包括了从雇佣及招聘措施到对内城区劳动力的看法等内容。

访谈的多数结构化部分，都主要围绕某份样本工作（sample job）展开，访谈计划中将此种样本工作界定为各公司模式化职业

发展路径中“最典型的入门职位”——销售员、办公职员、技术员、半技术员、服务员,但不包括管理性的、职业化的、技术性强的职位。我们的样本工作的分布,类似于1980年库克郡普查时的职业分布,同样是未包括管理性的、职业化的、技术性强的职位。实际上,我们的样本工作所代表的是,那些最缺乏技术的芝加哥求职者们的就业机会。(Kirschenman and Neckerman[1991], pp.206—207)

正如第五章中所提及的那些雇主意见所表明的,很多雇主不愿意给予直白的评论。在描述这些雇主们的回应时,我们的两位访谈员乔琳·基尔申曼(Joleen Kirschenman)和凯瑟琳·内克曼(Kathryn Neckerman)指出:“最标准的话语规则是,谈论某些事是人们可以接受的,至于另一些事则最好避而不谈。沉默有时抵得上长篇大论。于是,芝加哥雇主们都以消极的方式、愉快地跟我们谈论着那些黑人,他们谈论时的轻松愉快程度简直令我们受不了。”(Kirschenman and Neckerman[1991], p.207)

有关奥克兰居民点和伍德朗居民点的研究

247

该研究主要是调查芝加哥南部两个高失业率居民点中的居民,但还包括了跟当地居民和一位居民点主任进行的六次焦点小组讨论。社区居民调查主要是对两个居民点中被抽到的作为样本的居民进行调查。该调查的内容包括当地居民对于其生活质量的感知,其生活社区的优势与不足,诸如社会服务、住房、就业服务的可得性等现存的社区资源情况。此外,还收集的资料有应答者对于社区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其个人的认识,及其对于社区未来的关心程度。

城市不平等研究中心、社区复兴与发展基金、芝加哥都市信息中心

(MCIC)的研究人员，共同合作制定了调查问卷。芝加哥都市信息中心是一个私有的非营利性组织，其研究人员具体完成了面对面访谈。该研究根据普查地段资料对黑人进行了配额抽样，之所以运用配额方法确定黑人样本，是为了确保所选中被访者在社区中的随机分布。

该研究的调查问卷有将近 30 道封闭问题和开放问题，一次访谈一般大概需要 15 分钟。共计 500 人接受了访谈，奥克兰和伍德朗两个居民点各有 250 人；访谈是在 1993 年 9 月 1 日和 11 月 30 日期间进行的。被访居民均为成年人，年龄在 18 岁及以上。大多数被访者都是非裔美国人，男女比例相当。

该研究的第二阶段是，组织焦点小组讨论。焦点小组的人员构成需要反映奥克兰和伍德朗这两个社区中居民在年龄和社会经济水平上的差异。每个社区都由一群成年居民和一群高中生作为代表。由于奥克兰的贫困率很高，其参与焦点小组的人员完全是公共救济受助者。第六个焦点小组的构成人员，是已经迁出伍德朗的那些以前居民。研究中心雇了一位顾问，其任务是在研究人员的帮助下主持每场讨论会。每次讨论会都根据常规形式引入各个讨论话题。每场焦点小组讨论的持续时间为 1.5 小时到 2 小时。

为了征集焦点小组讨论话题，研究中心跟伍德朗和北肯伍德(North kenwood)/奥克兰的 19 个不同组织进行了联系，并请它们提供了可能有兴趣参与讨论的居民名单。焦点小组的参与成员正是从这些名单中随机选出的，对每位参与者都给予了象征性的费用。因而这些焦点小组并不能代表整个社区。在具体讨论中也会出现一些偏差；比如，由于他们都属于某一社区组织，因而这些参与者也许会更为关心特定的社区需求，或对特定资源更为敏感。然而，尽管这些焦点小组参与者们的人口特征并不能完全代表这些社区中的人口，但是，他们的看法和关怀在很多方面都跟这些社区的总体人口极为类似。

总之，在六个焦点小组的所有参与者中，共有 25 名奥克兰居民和 20 名伍德朗居民。所有的参与者都是非裔美国人，其中有 66% 为女

性。除了高中生群体外，剩下参与者中有 35% 的人都是已婚。成人焦点小组的那些参与者的教育程度都相当高：几乎有三分之二的人具大学学习经历，还有 8 人完成或获得了高于学士的学位。参与焦点小组的高中生们的平均年龄是 14 岁。

生活区对青少年的社会影响

该研究的目的是探寻高危险地区的生活区对于青少年的社会影响。该研究调查了住在(工人阶级或中产阶级)黑人居民区的母亲或主要照顾者及他们的一两位儿童。贫困生活区的居民所占比例较高。北伊利诺伊大学调查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具体完成了所有的面对面访谈。

样本设计主要包括两层：一层是高贫困样本(50%及以上的人口为黑人、20%的人口处于贫困甚至更贫困状态)，另一层是低贫困样本(30%及以上的人口为黑人、平均收入等于或高于 30 000 美元)。选择住户的标准是，家里需有年龄在 11 岁到 16 岁的青少年。每家每户的母亲和符合要求的青少年，会被选中为我们的样本。高贫困样本包括了 383 户和 614 位青少年。低贫困样本包括了 163 户和 273 位青少年。总样本包括了 58 个生活区、546 户和 887 位青少年。

生活区的基本特征，主要从普查资料和对各位母亲的访谈中获得。每个普查地段代表一个生活区。主要运用 1990 年的统计资料，测量了每个生活区中的不利社会处境。该测量主要包括有关不利处境的四个标准统计指标：贫困、居民流动率、家庭结构(单亲母亲的比例)、族群多样性。在生活区基本特征中，还纳入了生活区社会组织指标：生活区的社会控制(比如正式的和非政治的制度性控制)、社会整合(比如社区组织/活动和联结纽带)、非正式网络(比如生活区中的朋友和家庭关系)。该研究对可能影响社会后果的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比如年轻程度、年龄、性别、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结构、在此生活多久)都进行了控制。

附录 C

249 有关城市贫困与家庭生活研究的数据

表 1 在拥有 18 岁以下孩子的黑人已婚夫妇家庭(Married-Couple Families)中, 黑人家庭户主的教育程度与家庭数量的交叉表(1990)

教育程度	户主获得这一教育程度的家庭数量	有子女获得这一教育程度的家庭比例(%)
高中以下	410 185	37.9
高中毕业(或高中同等学力)	589 183	45.8
大学学历或取得肄业证书	580 467	49.0
学士学位	188 126	65.1
研究生学位或专业学位	97 610	69.3
总计	1 865 571	46.8

来源: 黑人的口特征, 1990 年人口统计资料。

表 2 受雇的黑人男性: 他们在制造业和建筑业中所占的比例(1970—1987), 以及他们中工会成员的比例(1969—1987) 根据出生年份分组, 于每年 3 月进行测量

生活在美国的、年龄在 15 岁以上的、没有学士学位的 UPFLS 父亲(下述百分比已加权) 黑人男性在制造业和建筑业中的比例(%)					
出生年份	1970	1974	1978	1983	1987
1941—1949	40	44	31	27	27
1950—1955	72	57	52	31	31
1956—1960	—	51	52	30	28
1961—1969	—	—	35	30	21

黑人男性群体中工会成员的比例					
出生年份	1969	1974	1978	1983	1987
1941—1949	55	41	38	23	32
1950—1955	72	60	53	36	27
1956—1960	—	62	61	48	42
1961—1969	—	—	36	24	35

来源: 改编自柯劳格(1993)。

表 3 受雇男性在制造业中的比例(1969—1987)
根据出生年份和所属族群进行分组,于每年 3 月进行测量

生活在美国的、年龄在 15 岁以上的、没有学士学位的 UPFLS 父亲(下述百分比已加权)										
出生年份/ 所属族群	1969		1974		1978		1983		1987	
	%	S.E.	%	S.E.	%	S.E.	%	S.E.	%	S.E.
1941—1945										
墨西哥人	04 ^①	9.4	37	7.0	29	5.4	33	5.8	33	3.9
波多黎各人	24	10.5	42	8.3	27	6.6	34	6.6	34	6.1
白人	49	13.4	44	10.8	43	8.4	32	7.5	24	6.5
黑人	49	10.8	43	7.9	39	8.1	28	7.0	27	5.9
老龄组	45	7.0	41	4.8	35	4.6	30	4.0	29	3.4
1965—1969										
墨西哥人	—	—	47	8.4	37	7.4	42	7.3	29	5.3
波多黎各人	—	—	34	12.3	41	11.3	44	11.0	42	10.2
白人	—	—	25	11.7	46	14.8	27	12.0	27	11.2
黑人	—	—	39	8.0	37	6.6	25	5.4	18	3.9
年轻组	54	8.7	40	6.1	38	4.8	30	4.1	23	3.1
Total	48	5.9	41	3.9	36	3.2	30	3.1	27	2.3

来源:改编自柯劳格(1993)。

表 4 人们对于芝加哥贫困地段居民的工作和福利状况的态度
根据种族或族群、移民状态进行分组
括号外数字为所占百分比,括号内数字为应答人数

态度 变量	黑人	墨西哥 移民	墨西哥裔 美国人	白人	在岛上出生的 波多黎各人	在美国本土出生的 波多黎各人
如果收入和医疗保险金额一样多的话,你会倾向于						
选择工作	80.8 (658)	89.5 (358)	83.3 (50)	87.7 (286)	78.6 (220)	79.8 (87)
接受援助	16.3 (133)	5.3 (21)	13.3 (8)	10.7 (35)	19.6 (50)	16.5 (18)
不知道	2.8 (23)	5.3 (21)	4.9 (2)	2.5 (5)	1.8 (5)	3.7 (4)
为了取得成功,辛勤工作很重要 ^a						
	70.5 (721)	75.9 (315)	76.4 (55)	84.5 (306)	68.5 (222)	68.2 (88)

① 原文如此。——译者注

续表

态度 变量	黑人	墨西哥 移民	墨西哥裔 美国人	白人	在岛上出生的 波多黎各人	在美国本土出生的 波多黎各人
为了取得成功，辛勤工作比较重要 ^a	26.1 (267)	19.0 (79)	19.4 (14)	14.4 (52)	22.6 (73)	27.0 (35)
为了取得成功，辛勤工作一点都不重要 ^a	3.4 (35)	5.1 (21)	4.2 (3)	1.1 (4)	8.9 (29)	4.8 (6)
认为人们即使不工作，也有权利享受援助 ^a	74.4 (760)	33.2 (136)	53.5 (38)	40.6 (147)	57.1 (185)	58.1 (72)
认为人们之所以要享受福利，是因为他们不想工作，而不是因为缺乏体面工作 ^a	21.8 (222)	62.7 (259)	49.3 (35)	53.2 (191)	43.3 (141)	44.4 (55)

a 选择“不知道”和因为残疾而倾向于享受援助的回答，均已被排除。
来源：城市贫困与家庭生活调查，1987年。

参考文献

- Acs, Gregory, and Sheldon Danziger. 1993.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arnings: 1973—1987."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8:618—648.
- Alkalimat, Abdul Hakim Ibn (Gerald McWorter). 1969. "The Ideology of Black Social Science." *Black Scholar* 1(December):28—35.
- Anderson, Elijah. 1978. *A Place on the Corn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 1990. *Streetwise: Race, Class, and Change in an Urban Commun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 1991. "Neighborhood Effects on Teenage Pregnancy." In *The Urban Underclass*, edited by Christopher Jencks and Paul E. Peterson, pp.375—398.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 . 1994. "The Code of the Streets." *Atlantic Monthly*, May, pp.80—94.
- Anderson, Martin. 1964. *The Federal Bulldozer: A Critical Analysis of Urban Renewal, 1949—1962*. Cambridge: MIT Press.
- Anderson, Nels. 1923. *The Hob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 1940. *Men on the Mov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Aponte, Robert. 1991. "Ethnicity and Male Employment in the Inner City: A Test of Two Theori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hicago Urban Poverty and Family Life Conference, October 10—12, 1991.
- Auletta, Ken. 1982. *The Underclass*. New York: Random House.
- Bach, Victor, and Sherece Y. West. 1993. *Housing on the Block: Disinvestment and Abandonment Risks in New York City Neighborhoods*. New York: Community Service Society of New York.
- Bailey, Thomas. 1989. "Black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In *Setting Municipal Priorities, 1990*, edited by Charles Brecher and Raymond D. Horton, pp.80—111.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Bandura, Albert. 1982. "Self-Efficacy Mechanism in Human Agency." *American Psychologist* 37(February):122—147.
- . 1986. *Social Foundations of Thought and Action: 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Bane, Mary Jo, and David Ellwood. 1983a. *The Dynamics of Dependence and the Routes to Self-Sufficiency*. Cambridge: Urban Systems Research and Engineering.

———. 1983b. "Slipping into and out of Poverty: The Dynamics of Spells." Working paper no.1199,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Banfield, Edward. 1970. *The Unheavenly City*. 2d ed. Boston: Little, Brown.

Bartelt, David W. 1993. "Housing the 'Underclass.'" In *The "Underclass" Debate: Views from History*, edited by Michael B.Katz, pp.118—157.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artik, Timothy J.(Forthcoming.) "The Distributional Effects of Local Labor Market Demand and Industrial Mix."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Bauman, John F., Norman P. Hummon, and Edward K. Muller. 1991. "Public Housing, Isolation, and the Urban Underclass."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17:264—292.

Bazie, Michelle, and Isaac Shapiro. 1994. "'Contract' Would Ultimately Deny Benefits to Five Million Poor Children." News release,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Washington, D.C., November 22.

Bell, Derrick. 1992. *Faces at the Bottom of the Well: The Permanence of Rac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Bennett, N.G., D.E.Bloom, and P.H.Craig. 1989. "The Divergence of Black and White Marriage Patter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5:692—722.

Bergmann, Barbara. 1993. "The French Child Welfare System: An Excellent System We Could Adapt and Afford." In *Sociology and the Public Agenda*, edited by William Julius Wilson, pp.341—350.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Blank, Rebecca. 1994. "Outlook for the U.S.Labor Market and Prospects for Low-Wage Entry Jobs." Working paper, Center for Urban Affair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Bloch, Farrell. 1994. *Antidiscrimination Law and Minority Employment: Recruitment Practices and Regulatory Constrain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luestone, Barry, Mary Stevenson, and Chris Tilly. 1991. "The Deterioration in Labor Market Prospects for Young Men with Limited Schooling: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Demand Side' Factor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Eastern Economic Association, March 14—15, Pittsburgh.

Blumstein, Alfred. 1994. "Youth Violence, Guns, and the Illicit-Drug Industry." Working paper, H.John Keinz III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Bobo, Lawrence. 1988. "Attitudes Toward the Black Political Movement: Trends, Meaning, and Effects on Racial Policy Preference."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51:287—302.

———. 1991.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dividualism, and Redistributive Policies." *Sociological Forum* 6(1):71—92.

Bobo, Lawrence, and James R.Kluegel. 1993. "Opposition to Race Targeting: Self-Interest, Stratification Ideology, or Racial Attitud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8:443—464.

Bobo, Lawrence, and Ryan A. Smith. 1994. "Antipoverty Politics, Affirmative Action, and Racial Attitudes." In *Confronting Poverty: Prescriptions for Change*, edited

by Sheldon H. Danziger, Gary D. Sandefur, and Daniel H. Weinberg, pp. 365—39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ok, Derek. 1994. "Cities and Suburbs." Paper prepared for the Aspen Institute Domestic Strategy Group. Aspen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Borjas, George, Richard Freeman, and Lawrence Katz. 1992. "On the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migration and Trade." In *Immigration and the Work Force*, edited by George Borjas and Richard Freeman, pp. 213—244.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or NBER).

Bound, John, and Richard B. Freeman. 1992. "What Went Wrong? The Erosion of the Relative Earnings of Young Black Men in the 1980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7(February): 201—233.

Bound, John, and Harry Holzer. 1993. "Industrial Shifts, Skills Levels, and the Labor Market for White and Black Me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75(August): 387—396.

Bourdieu, Pierre. 1965. *Travail et travailleurs en Algérie*. Paris: Editions Mouton.

Bourgeois, Philippe. 1995. *In Search of Respect: Selling Crack in El Barrio*.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raddock, Jomills Henry, II, Robert L. Crain, James M. McPartland, and R. L. Dawkins. 1986. "Applicant Race and Job Placement Decisions: A National Survey Experiment." *Social Problems* 37: 243—257.

Braddock, Jomills Henry, II, and James M. McPartland. 1987. "How Minorities Continue to Be Excluded from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Research on Labor Market and Institutional Barrier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43: 5—39.

Breslau, Daniel. 1991. "Reciprocity and Gender in Low-Income Household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hicago Urban Poverty and Family Life Conference, October 10—12, Chicago.

Bronfenbrenner, Urie. 1989.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In *Annals of Child Development: Six Theories of Child Development—Revised Formulations and Current Issues*, edited by Ross Vasta, pp. 1—103. Greenwich, Conn.: Jai Press.

Brooks-Gunn, Jeanne, Greg J. Duncan, K. Klebanov, and Naomi Sealand. 1993. "Do Neighborhoods Influence Child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9: 353—394.

Burton, Lawrence, Robert Haveman, and Owen O'Donnell. 1994. "Recent Trends in U.S. Male Work and Wage Patterns: An Overview." Unpublished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ecember.

Califano, Joseph A., Jr. 1988. "Tough Talk for Democrats."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anuary 8.

Caplow, David. 1965. *The Poor Pay More*. New York: Free Press.

Caraley, Demetrios. 1992. "Washington Abandons the Citie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07(Spring): 1—30.

Carlson Virginia L., and Nikolais, C. Theodore. 1995. *Are There Enough Jobs?*

Welfare Reform and Labor Market Reality. Illinois Job Gap Project, Center for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University of Illinois, Chicago.

Case, Anne C., and Lawrence F.Katz. 1990. "The Company You Keep: The Effects of Family and Neighborhood on Disadvantaged Youth." Working paper no.3705,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Castel, Robert. 1978. "The 'War on Poverty' and the Status of Poverty in an Affluent Society."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19(January):47—60.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1995a. "Is the EITC Growing at a Rate That Is 'Out of Control' ?" Washington, D.C., May 9.

———. 1995b. "The 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Reductions in the Senate Budget Resolution." Washington, D.C., June 5.

———. 1995c. "The Administration Releases New Estimates of House and Senate Budget Bills' Effects on Poverty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Washington, D.C., November 13.

———. 1995d. "The Conference Agreement on the Welfare Bill." Washington, D.C., December 8.

Center on Social Welfare Policy and Law. 1994. *Living at the Bottom: An Analysis of the 1994 AFDC Benefit Levels*. New York: Center on Social Welfare Policy and Law.

Chicago Tribune. 1986. *The American Millstone*. Chicago: Contemporary Books.

Citro, Constance F., and Robert T.Michael, eds. 1995. *Measuring Poverty: A New Approach*.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Clark, Kenneth B. 1964. *Youth in the Ghetto: A Study of the Consequences of Powerlessness and a Blueprint for Change*. New York: Harlem Youth Opportunity(HARYOU) Report.

———. 1965. *Dark Ghetto: Dilemmas of Social Power*. New York: Harper & Row.

———. 1967. "The Present Dilemma of the Negro."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Southern Regional Council, November 2, Atlanta.

Cohen, Cathy J., and Michael C.Dawson. 1993. "Neighborhood Poverty and African American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7:286—302.

Coleman, James S. 1990.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1990. "The Perception of Poverty in Europe." Rue de la Loi 200, B-1049 Brussels.

Committee on Ways and Means.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1993. *Green Book: Background Material and Data on Programs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ommittee on Ways and Means*.

Condon, Mark. 1991. "Public Housing, Crime and the Urban Labor Market: A Study of Black Youths in Chicago." Working paper series, Malcolm Wiener Center for Social Policy, John F.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March, no.H-91-3.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1988. *New Directions for the Nation's Public Works*. Washington, D.C., October.

Corcoran, Mary. 1995. "Rags to Rags: Poverty and Mobility in the U.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1:237—267.

Corcoran, Mary, and Terry Adams. 1993a. "Underclass Neighborhoods and Intergenerational Poverty and Dependency." Unpublished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June.

—. 1993b. "Race, Poverty, Welfare and Neighborhood Influences on Men's Economic Outcomes." Report for Grant no. 88ASPE203A, Office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Planning and Evaluation,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and Grant no. GAE09808, Rockefeller Foundation.

—. 1994. "Family and Neighborhood Welfare Dependency and Son's Labor Supply." Unpublished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Corcoran, Mary, Roger Gordon, Deborah Laren, and Gary Solon. 1989. "Effects of Family and Community Background on Men's Economic Status." Working paper no.2896,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Corcoran, Mary, and Sharon Parrott. 1992. "Black Women's Economic Progress." Working paper,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Coughlin, Richard M. 1979. "Social Policy and Ideology: Public Opinion in Eight Nations."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 2:3—40.

Coulton, Claudia J., Julian Chow, and Shanta Pandey. 1990. *An Analysis of Poverty and Related Conditions in Cleveland Area Neighborhoods*. Cleveland: Center for Urban Poverty and Social Change,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Crane, Jonathan. 1989. "Effects of Neighborhoods on Dropping Out of School and Teenage Childbearing." In *The Urban Underclass*, edited by Christopher Jencks and Paul E.Peterson, pp.299—320.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Cross, Harry, G.Kewney, J.Mell, and W.Zimmerman. 1990. "Employer Hiring Practices: The Differential Treatment of Hispanic and Anglo Job Seekers." Washington, D.C.: Urban Institute Press, Report 90—94.

Culp, Jerome, and Bruce H.Dunson. 1986. "Brothers of a Different Color: A Preliminary Look at Employer Treatment of White and Black Youth." In *The Black Youth Employment Crisis*, edited by Richard B.Freeman and Harry J.Holzer, pp.233—259.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anziger, Sandra K., and Sheldon H.Danziger. 1995. "Will Welfare Recipients Find Work When Welfare Ends?" In *Welfare Reform: An Analysis of Issues*, edited by Isabel V.Sawhill, pp.43—47. Washington, D.C.

Danziger, Sheldon H., and Peter Gottschalk. 1995. *America Unequal*.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Danziger, Sheldon H., Gary D.Sandefur, and Daniel H.Weinberg, eds. 1994. *Confronting Poverty: Prescriptions for Chang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Danziger, Sheldon H., and Peter Gottschalk, eds. 1993. *Uneven Tides: Rising Inequality in America*.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Darling-Hammond, Linda. 1994. "National Standards and Assessments: Will They Improve Educ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Education* 102(August):478—510.

—. 1990. "Teacher Quality and Equality." In *Access to Knowledge: An Agenda for*

Our Nation's Schools, edited by John Goodlad and Pamela Keating, pp.237—258. New York: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Board.

Datcher, Linda. 1982. "Effects of Community and Family Background on Achievement."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64:32—41.

Davis, James A., and Tom W. Smith. 1994. *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s: Cumulative Code Book, 1972—1994*. Chicago: 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

Dornbusch, Sanford M., J. Merrill Carlsmith, Steven J. Bushwall, Philip L. Ritter, Herbert Leiderman, Albert H. Hastorf, and Ruth T. Gross. 1985. "Single Parents, Extended Households, and the Control of Adolescents." *Child Development* 56:326—341.

Drake, St. Clair, and Horace Cayton. 1945; rev. ed. 1962. *Black Metropolis: A Study of Negro Life in a Northern Cit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D'Souza, Dinesh. 1995. *The End of Racism: Principles of a Multiracial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Duncan, Greg J. 1984. *Years of Poverty, Years of Plenty*. Ann Arbor: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1994. Testimony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Human Resources of the Committee on Ways and Means Hearing on Early Childbearing, July 29, Washington, D.C.

Duncan, Greg J., and Saul D. Hoffman. 1990. "Welfare Benefits,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d Out-of-Wedlock Births Among Black Teenage Girls." *Demography*, November 4, pp.519—535.

—. 1991. "Teenage Underclass Behavior and Subsequent Poverty: Have the Rules Changed?" In *The Urban Underclass*, edited by Christopher Jencks and Paul E. Peterson, pp.155—174.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Duncan, Greg J., and Deborah Laren. 1990. "Neighborhood Correlates of Teen Births and Dropping Out: Preliminary Results from the PSID-Geocode Fil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Survey Research Cente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May 8.

Duneier Mitchell. 1992. *Slim's Table: Race, Respectability, and Masculin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1964.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Edin, Kathryn. 1994. "The Myths of Dependence and Self-Sufficiency: Women, Welfare, and Low-Wage Work." Unpublished manuscript, Center for Urban Policy Research, Rutgers University.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1991. *The State of Inequality*. Princeton: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Elder, Glen H., Jr., Jacquelynne S. Eccles, Monika Ardel, and Sarah Lord. 1995. "Inner-City Parents Under Economic Pressure: Perspectives on the Strategies of Parenting."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7(August):1—13.

Elliott, Delbert S. 1992. "Longitudinal Research in Criminology: Promise and Practi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NATO Conference on Cross-National Longitudinal Research on Criminal Behavior, July 19—25, Frankfurt, Germany.

Elliott, Delbert S., William Julius Wilson, David Huizinga, Robert Sampson, Amanda Elliott, and Bruce Rankin. N.d. *Beating the Odds: Overcoming Adversity in High-Risk Neighborhood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orthcoming.

Ellwood, David T. 1986a. "Targeting 'Would-Be' Long-Term Recipients of AFDC." Princeton: Mathematical Policy Research.

———. 1986b. "The Spatial Mismatch Hypothesis: Are There Teenage Jobs Missing in the Ghetto?" In *The Black Youth Employment Crisis*, edited by Richard B. Freeman and Harry J. Holzer, pp.147—148.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9. "The Origins of 'Dependency': Choices, Confidence or Culture?" *Focus* 12:6—13.

Ellwood, David T., and David T. Rodda. 1991. "The Hazards of Work and Marriage: The Influence of Male Employment on Marriage Rates." Malcolm Wiener Center for Social Policy, 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no.H-90-5, March.

Erenburg, Sharon J. 1994. "Public Capital: The Missing Link Betwee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Linking Public Capital to Economic Performance*. Public Policy Brief no.14. Jerome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Bard College.

Fagan, Jeffrey. 1993. "Drug Selling and Licit Income in Distressed Neighborhoods: The Economic Lives of Street-Level Drug Users and Dealers." In *Drugs, Crime and Social Isolation*, edited by G. Peterson and Adele V. Harrell, pp.519—535. Washington, D.C.: Urban Institute Press.

Faris, Robert E.L., and Warren Dunham. 1931. *Mental Disorder in Urban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arley, Reynolds. 1989. "Trends in the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Groups Among American Blacks: 1970 to 1980." Paper presented at a conference on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October 19—21,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Feagin, Joe R. 1972. "America's Welfare Stereotype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52:921—933.

———. 1975. *Subordinating the Poor: Welfare and American Belief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Featherman, David L., and Robert M. Hauser. 1978. *Opportunity and Chang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Feldman, S. 1984. "Economic Individualism and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merican Politics Quarterly* 11:3—29.

Ferguson, Ronald. 1993. "New Evidence on the Growing Value of Skill and Consequences for Racial Disparity and Returns to Schooling." 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Facult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R93—94.

Fernandez, Roberto M. 1991. "Race, Space and Job Accessibility: Evidence from a Plant Relocatio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Fernandez, Roberto M., and David Harris. 1991. "Social Isolation and the Underclas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hicago Urban Poverty and Family Life Conference,

October 10—12, Chicago.

Fiskin, James S. 1983. *Justice, Equal Opportunity, and the Famil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The Forgotten Half: Pathways to Success for America's Youth and Young Families. Final Report, Youth and America's Future. 1988. William T. Grant Foundation Commission on Work, Family and Citizenship.

Franklin, Donna, and Susan E. Smith. 1991. "Adolescent Mothers and Persistent Poverty: Does Delaying Parenthood Still Make a Differen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hicago Urban Poverty and Family Life Conference, October 10—12, Chicago.

Franklin, John Hope, and Alfred A. Moss, Jr. 1967. *From Slavery to Freedom*. 3d ed. New York: Knopf.

Frazier, E. Franklin. 1932. *The Negro Family i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39. *The Negro Family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reeman, Richard B. 1989. "The Employment and Earning of Disadvantaged Male Youths in a Labor Shortage Economy." Paper presented at a conference on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October 19—21,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 ed. 1994. *Working Under Different Rule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Freeman, Richard B., and Lawrence F. Katz. 1994. "Rising Wage Inequality: The United States vs. Other Advanced Countries." In *Working Under Different Rules*, edited by Richard B. Freeman, pp.29—62.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Frey, William. 1985. "Mover Destination Selectivity and the Changing Suburbanization of Whites and Blacks." *Demography* 22:223—243.

Friedman, Alan. 1994. "In Europe's Jobs Crisis, Growth Is No Answer."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rch 10.

Friedman, Thomas L. 1994a. "World's Big Economies Turn to the Jobs Issue."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4.

———. 1994b. "Accent on Education as Talks on Jobs End." *New York Times*, March 16.

Furstenberg, Frank F., Jr. 1993. "How Families Manage Risk and Opportunity in Dangerous Neighborhoods." In *Sociology and the Public Agenda*, edited by William Julius Wilson, pp.231—258.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 1994. "Fathering in the Inner City: Paternal Participation and Public Policy." Unpublished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Gamson, William A., and Kathryn E. Lasch. 1983.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Social Welfare Policy." In *Evaluating the Welfare State: Soci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edited by Shimon E. Spiro and Ephraim Yuchtman-Yaar, pp.397—415.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Gamson, William A., and Andre Modigliani. 1987. "The Changing Culture of Affirmative Action." In *Research in Political Sociology*, edited by R.G. Braungart and M. M. Braungart, pp.137—177. Greenwich, Conn.: Jai Press.

Gans, Herbert. 1968.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Study of Poverty; An Approach to Antipoverty Research." In *On Understanding Poverty; Perspectives from the Social Sciences*, edited by Daniel Patrick Moynihan, pp.201—228. New York; Basic Books.

Gans, Herbert J. 1990. "Deconstructing the Underclass: The Term's Danger as a Planning Concept."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56(Summer):271—277.

———. 1995. *The War Against the Poor: The Underclass and Antipoverty Policy*. New York; Basic Books.

Garfinkel, Irving, and Sara McLanahan. 1986. *Single Mothers and Their Children: A New American Dilemma*. Washington, D.C.; Urban Institute Pres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1987. *Unemployed Parents; Evaluation of Effects of Welfare Benefits on Family Stability*. PEMD-92-19BR. Washington, D.C.

Gilder, George. 1981. *Wealth and Poverty*. New York; Basic Books.

Gittleman, Maury B., and David R.Howell. 1993. "Job Quality and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in the 1980s: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Effects of Employment Restructuring by Race and Gender." Working paper no.82, Jerome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Bard College, March.

Glass Ceiling Commission. 1995. "Good for Business; Making Full Use of the Nation's Human Capital." U.S. Department of Labor, March.

Greenberg, Mark. 1993. *Beyond Stereotypes; What State AFDC Studies on Length of Stay Tell Us About Welfare as a "Way of Life."* Center for Law and Social Policy.

Greenstein, Robert. 1991. "Universal and Targeted Approaches to Relieving Poverty: An Alternative View." In *The Urban Underclass*, edited by Christopher Jencks and Paul E.Peterson, pp.399—410.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Grier, Eunice S., and George Grier. 1988. "Minorities in Suburbia: A Mid-1980s Update." Report to the Urban Institute Project on Housing Mobility, March. Washington, D.C.; Urban Institute Press.

Hacker, Andrew. 1992. *Two Nations; Black and White, Separate, Hostile and Unequal*. New York; Scribner's.

Hamill, Pete. 1988. "Breaking the Silence." *Esquire*, March, pp.91—102.

Hamilton, Richard F. 1972. *Class and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John Wiley.

Handler, Joel F. 1972. *Reforming the Poor*.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94. "'Ending Welfare as We Know It' —A Wrong and Pernicious Idea." Unpublished manuscript, UCLA Law School.

Hannerz, Ulf. 1969. *Soulside; Inquiries into Ghetto Culture and Commun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Hare, Nathan. 1969. "The Challenge of a Black Scholar." *Black Scholar* 1(December): 58—63.

Harrington, Michael. 1962. Rev.ed. 1969. *The Other America;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Macmillan.

Hechinger, Fred M. 1992. *Fateful Choices*. New York; Hill & Wang.

Heckman, James J. 1995. "Review of *The Bell Curve: 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ritocracy and Equality Seminar Series, February 2, Chicago.

Heckman, James J., Rebecca Roselius, and Jeffrey Smith. 1994. "U.S.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olicy: A Re-evaluation of the Underlying Assumptions Behind the New Consensus." In *Labor Markets, Employment Policy, and Job Creation*, edited by Lewis C. Solmon and Alec R. Levenson, pp.83—121.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Henderson, Vivian. 1975. "Race, Economics, and Public Policy," *Crisis* 83(Fall): 50—55.

Herrnstein, Richard J., and Charles Murray. 1994. *The Bell Curve: Intelligence and Class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Free Press.

Hicks-Bartlett, Sharon. 1991. "A Suburb in Name Only: The Case of Meadow View."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hicago Urban Poverty and Family Life Conference, October 10—12, Chicago.

Hill, Robert B. 1972. *The Strength of Black Families*. New York: Emerson Hall.

Hirsch, Arnold R. 1983. *Making the Second Ghetto: Race and Housing in Chicago, 1940—19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irschman, Albert O. 1970. *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the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ochschild, Jennifer L. 1981. *What's Fair? American Beliefs About Distributive Justi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93. "Equal Opportunity and the Estranged Poor." In *The Ghetto Underclass: Social Science Perspectives*, edited by William Julius Wilson, pp.160—172.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 1995. *Facing Up to the American Dream: Race, Class, and the Soul of the N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offman, Saul D., Gregory J. Duncan, and Ronald B. Mincy. 1991. "Marriage and Welfare Use Among Young Women: Do Labor Market, Welfare and Neighborhood Factors Account for Declining Rates of Marriage Among Black and White Wome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December, New Orleans.

Hogan, Dennis P., and Evelyn M. Kitagawa. 1985. "The Impact of Social Status, Family Structure, and Neighborhoods on the Fertility of Black Adolesc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0:825—855.

Holmes, Steven A. 1994. "Birthrate for Unwed Women Up 70% Since '83, Study Says." *New York Times*, July 29.

———. 1995. "Jobless Data Show Blacks Joining Economic Recovery."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2.

Holzer, Harry J. 1991. "The Spatial Mismatch Hypothesis: What Has the Evidence Shown?" *Urban Studies* 28:105—122.

Holzer, Harry. 1995. *What Employers Want: Job Prospects for Less-Educated*

Workers. New York: Russell Sage.

Holzer, Harry J., Keith R. Ihlanfeldt, and David L. Sjoquist. 1994. "Work, Search and Travel Among White and Black Youth."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35:320—345.

Hout, Michael. 1984. "Occupational Mobility of Black Men: 1962 to 1973."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9:308—322.

Hoxby, Caroline Minter. 1994. "Does Competition Among Public Schools Benefit Students and Taxpayers?" Working paper no. 4979,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December.

Huang, Qi, and Paul Attewell. 1993. "Testing Theories of the Underclass." Unpublished paper,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ugust 11.

Hughes, Mark Alan. 1993. "Over the Horizon: Jobs in the Suburbs of Major Metropolitan Areas." A Report to Public/Private Ventures, December.

Hundt, Reed. 1995. "The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 Ensuring that Poor and Minority Children Do Not Fall Further Behin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hildren Defense Fund's Black Community Crusade for Children Working Committee Planning Retreat, July 8, Knoxville, Tenn.

Ihlanfeldt, Keith R., and David L. Sjoquist. 1990. "Job Accessibility and Racial Differences in Youth Employment R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0:267—276.

———. 1991. "The Effect of Job Access on Black Youth Employment: A Cross Sectional Analysis." *Urban Studies* 28:255—265.

Iyengar, Shanto. 1987. "Television News and Citizens' Explanations of National Issu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1:815—832.

———. 1989. "How Citizens Think About Political Issues: A Matter of Responsibi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3:878—900.

———. 1990. "Framing Responsibility for Political Issues: The Case of Poverty." *Political Behavior* 12:19—40.

Jackson, Aurora P. 1992. "Well-Being Among Single, Black, Employed Mothers." *Social Service Review* 66(September):399—409.

Jackson, Kenneth T. 1985. *Crabgrass Frontier: The Suburbaniz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ahoda, Marie, Paul F. Lazarsfeld, and Hans Zeisel. 1971. *Marienthal: The Sociography of an Unemployed Community*. Chicago: Aldine-Atherton.

Jargowsky, Paul A. 1994. "Ghetto Poverty Among Blacks in the 1980's."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13:288—310.

Jargowsky, Paul A., and Mary Jo Bane. 1991. "Ghetto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0—1980." In *The Urban Underclass*, edited by Christopher Jencks and Paul E. Peterson, pp.235—273.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Jaynes, Gerald David, and Robin Williams, Jr., eds. 1989. *A Common Destiny: Blacks and American Societ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Jencks, Christopher. 1991. "Is the American Underclass Growing?" In *The Urban Underclass*, edited by Christopher Jencks and Paul E. Peterson, pp.28—102.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Jencks, Christopher, and Kathryn Edin. 1990. "The Real Welfare Problem." *American Prospect* 1(Spring):31—50.

Jencks, Christopher, and Susan E. Mayer. 1989a.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Growing Up in a Poor Neighborhood: A Review." Working paper, Center for Urban Affairs and Policy Research,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 1989b.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Job Proximity, and Black Job Opportunities: The Empirical Status of the Spatial Mismatch Hypothesis*. Working paper, Center for Urban Affair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Jencks, Christopher, and Paul E. Peterson, eds. 1991. *The Urban Underclas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Johnson, James, Elisa Jayne Bienenstock, and Jennifer A. Stoloff. 1996.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Cultural Capital Hypothesis." *Review of Black Political Economy* 23(Spring):7—27.

Johnson, James, and Melvin Oliver. 1992. "Structural Changes in the U.S. Economy and Black Male Joblessness: A Reassessment." In *Urban Labor Markets and Job Opportunity*, edited by G. Peterson and W. Vromaneds, pp.113—147. Washington, D.C.: Urban Institute Press.

Johnson, Waldo Emerson, Jr. 1994. "Perceptions and Patterns of Paternal Role Functioning of Adolescent and Young Adult Lower Socio-Economic Status of African-American Males: A Social Choice/Social Norms Perspective."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Juhn, Chinhui, Kevin M. Murphy, and Brooks Pierce. 1991. "Accounting for the Slowdown in Black-White Wage Convergence." In *Workers and Their Wages: Changing Patterns in the United States*, edited by Marvin H. Koster, pp.107—143.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Press.

———. 1993. "Wage Inequality and the Rise in Returns to Skil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1:410—442.

Juhn, Chinhui, Kevin M. Murphy, and Robert H. Topel. 1991. "Why Has the 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 Increased Over Time?"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75—126.

Kahlenberg, Richard. 1995. "Class, Not Race." *New Republic*, April 3, pp.21—27.

Kain, John. 1968. "Housing Segregation, Negro Employment and Metropolitan Decentraliz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6:110—130.

Kasarda, John D. 1990a. "Structural Factors Affecting the Location and Timing of Urban Underclass Growth." *Urban Geography* 11:234—264.

———. 1990b. "Urban Industrial Transition and the Underclas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01:26—47.

———. 1990c. "City Jobs and Residents on a Collision Course: The Urban Underclass Dilemma."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4(November):313—319.

———. 1993a. "Cities as Places Where People Live and Work: Urban Change and

Neighborhood Distress." In *Interwoven Destinies: Cities and the Nation*, edited by Henry G. Cisneros, pp.81—124. New York; Norton.

———. 1993b. "Inner-City Concentrated Poverty and Neighborhood Distress: 1970—1990." *Housing Policy Debate* 4(3):253—302.

———. 1995.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the Changing Location of Jobs." In *State of the Union: America in the 1990s*, vol.1, edited by Reynolds Farle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Katz, Lawrence F. 1995. "Work-Force Preparation Policies to Promote Economic Opportuni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Domestic Strategy Group Meeting on "Opportun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and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Aspen Institute, August 19—23, Aspen, Colo.

Katz, Michael B. 1993. "Reframing the 'Underclass Debate.'" In *The "Underclass" Debate: Views from History*, edited by Michael B. Katz, pp.440—47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aus, Mickey. 1986. "The Work-Ethic State." *New Republic*, July 7, pp.22—33.

———. 1992. *The End of Equal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Kelley, Robin D.G. 1993. "The Black Poor and the Politics of Opposition in a New South City, 1929—1970." In *The "Underclass" Debate: Views from History*, edited by Michael B. Katz, pp.293—333.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erbo, H. R. 1981.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or; A Continuing Focus in Social Research." *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65:323—331.

Kim, Kwang Chung, and Shin Kim. 1994. "The Multi-Race/Ethnic Nature of Los Angeles Unrest in 1992."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ugust 5—9, Los Angeles.

Kinder, Donald R., and Lynn M. Sanders. 1987. "Pluralistic Foundation of American Opinion and Ra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September 3—6, Chicago.

———. 1990. "Mimicking Political Debate with Survey Questions: The Case of White Opinion on Affirmative Action for Blacks." *Social Cognition* 8:73—103.

Kinder, Donald R., and David O. Sears. 1981. "Prejudice and Politics: Symbolic Racism versus Racial Threats to the Good Lif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0:414—431.

Kirschenman, Joleen. 1991. "Gender Within Race in the Labor Marke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hicago Urban Poverty and Family Life Conference, October 10—12, Chicago.

Kirschenman, Joleen, and Kathryn Neckerman. 1991. "'We'd Love to Hire Them, But...': The Meaning of Race for Employers." In *The Urban Underclass*, edited by Christopher Jencks and Paul E. Peterson, pp.203—234.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Bluegel, James R. 1986. *Beliefs About Inequality: Americans' Views of What Is and What Ought to Be*.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 1987. "Macro-economic Problems, Beliefs About the Poor, and Attitudes Toward Welfare Spending." *Social Problems* 34(1):82—99.

——. 1988. "Economic Problems and Socioeconomic Beliefs and Attitudes." In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edited by Arne Kalleberg, 7: 273—302. Greenwich, Conn.: Jai Press.

——. 1990. "Trends in Whites' Explanations of the Gap in Black-White Socioeconomic Status, 1977—1989."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5:512—525.

Kluegel, James R., and Eliot R. Smith. 1983. "Affirmative Action Attitudes: Effects of Self-Interest, Racial Affect, and Stratification Beliefs on Whites' Views." *Social Forces* 61:797—824.

——. 1986. *Beliefs About Inequality: Americans' Views of What Is and What Ought to Be*.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Korpi, Walter. 1980.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Critical Notes from a European Perspective." In *Poverty and Public Policy: An Evaluation of Social Research*, edited by V.T. Covello, pp.287—314. Boston: G.K.Hall.

Krein, Sheila Fitzgerald, and Andrea H. Beller. 1988. "Educational Attainment of Children from Single-Parent Families; Differences by Exposure, Gender, and Race." *Demography* 25(May):221—224.

Krieg, Richard M. Forthcom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Low Income Inner-City Communities." *Journal of Urban Technology*.

Krogh, Marilyn. 1993. "A Description of the Work Histories of Fathers Living in the Inner City of Chicago." Working paper,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Urban Inequali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dner, Joyce, ed. 1973. *The Death of White Sociology*. New York: Random House.

Laseter, Robert L. 1994. "Young Inner-City African American Men: Work and Family Life."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uer, Robert H. 1981. "The Middle Class Looks at Poverty." *Urban and Social Change Review* 5(Fall):8—10.

Lawson, Roger, and William Julius Wilson. 1995. "Poverty, Social Rights and the Quality of Citizenship." In *Poverty, Inequality and the Future of Social Policy*, edited by Katherine McFate and Roger Lawson, pp.693—714.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Lemann, Nicholas. 1986. "The Origins of the Underclass." *Atlantic*, June, pp.31—61.

——. 1991. *The Promised Land: The Great Black Migration and How It Changed America*. New York: Knopf.

Lerman, Robert I. 1986. "Generating Poverty: Why Do Young Men Become Absent Father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Seattle.

——. 1989.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of Young Men and Family Form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79:62—66.

Lerman, Robert I., and Martin Rein. Forthcoming. *Social Service Employment: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Levy, Frank. 1988. *Dollars and Dreams: The Changing American Income Distribution*.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Lewis, Oscar. 1959. *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61. *The Children of Sanchez*. New York: Random House.

———. 1966. *La Vida: A Puerto Rican Family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San Juan and New York*. New York: Random House.

———. 1968. “The Culture of Poverty.” In *On Understanding Poverty: Perspectives from the Social Sciences*, edited by Daniel Patrick Moynihan, pp.187—220. New York: Basic Books.

Lieberson, Stanley. 1980. *A Piece of the Pie: Black and White Immigrants Since 188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iebow, Elliott. 1967. *Tally's Corner: A Study of Negro Streetcorner Men*. Boston: Little, Brown.

Lipset, Seymour Martin. 1979. *The First New Nation: The United States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New York: Norton.

Lipset, Seymour Martin, and William Schneider. 1978. “The Bakke Case: How Would It Be Decided at the Bar of Public Opinion?” *Public Opinion*, March/April, pp.38—48.

Local Community Fact Book—Chicago, 1950. 1953. Chicago Community Invento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Local Community Fact Book—Chicago Area, 1960. 1963. Chicago Community Invento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Local Community Fact Book—Chicago Metropolitan Area, Based on the 1970 and 1980 Censuses. 1984. Chicago Fact Book Consortium,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Long, L.H. 1974. “Poverty Status and Receipt of Welfare Among Migrants and Nonmigrants in Large Cit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9:46—56.

Long, L.H., and L.R.Heltman. 1975. “Migration and Income Differences Between Black and White Men in the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0:1391—1409.

Loury, Glenn C. 1984. “On the Need for Moral Leadership in the Black Communi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sponsored by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dustrial Societies and the John M.Olin Center, Chicago.

———. 1995. *One by One from the Inside Out: Essays and Reviews on Race and Responsibility in America*. New York: Free Press.

Lundgren-Gaveras, Lena. 1991. “Informal Network Support, Public Welfare Support and the Labor Force Activity of Urban Low-Income Single Mother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hicago Urban Poverty and Family Life Conference, October 10—12, Chicago.

Magnet, Myron. 1987. “America's Underclass: What to Do?” *Fortune* 115(10): 130—150.

Mare, Robert D., and Christopher Winship. 1991. “Socioeconomic Change and the Decline of Marriage for Blacks and Whites.” In *The Urban Underclass*, edited by

Christopher Jencks and Paul E. Peterson, pp.175—202.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Marshall, Ray. 1994. "School-to-Work Proces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arnegie Corporation/Johann Jacobs Foundation, November 3—5, Marbach Castle, Germany.

Marshall, T. H. 1964. *Class, Citizenship,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ew York: Doubleday.

Massey, Douglas S., and Nancy A. Denton. 1993. *American Apartheid: Segregat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Undercla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ssey, Douglas S., and Mitchell L. Eggers. 1990. "The Ecology of Inequality: Minorities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Poverty, 1970—1980."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5:1153—1188.

Massey, Douglas S., and Andrew B. Gross. 1993. "Black Migration, Segregation and the Spatial Concentration of Pover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 April 1, Cincinnati.

Massey, Douglas S., Andrew B. Gross, and Kumiko Shibuya. 1994. "Migration, Segregation,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Pover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9(June): 1153—1189.

Mayer, Susan E. 1989. "How Much Does a High School's Racial and Socioeconomic Mix Affect Graduation and Teenage Fertility Rates?" In *The Urban Underclass*, edited by Christopher Jencks and Paul E. Peterson, pp.321—341.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McClosky, Herbert, and John Zaller. 1984. *The American Ethos: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cKinsey & Co. 1994. *Employment Performance*. Washington, D. C.: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November.

McLanahan, Sara, and Larry Bumpass. 1988. "Intergenerational Consequences of Family Disrup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130—152.

McLanahan, Sara, and Irwin Garfinkel. 1989. "Single Mothers, The Underclass, and Social Policy."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01 (January):92—104.

Mead, Lawrence. 1986. *Beyond Entitlement: The Social Obligations of Citizenship*. New York: Free Press.

———. 1992. *The New Politics of Poverty: The Working Poor in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Melville, Keith, and John Doble. 1988. *The Public's Perspective on Social Welfare Reform*. New York: The Public Agenda Foundation, January.

Merton, Robert K. 1972. "Insiders and Outsiders; A Chapter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9—47.

Miller, Brent C., and Kristin A. Moore. 1990. "Adolescent Sexual Behavior, Pregnancy and Parenting: Research Through the 1980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2(November):1025—1044.

Min, Pyong Gap. 1993. "Korean Immigrants in Los Angeles." In *Immigr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ited by Ivan Light and Bhachu Parmmole.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cations.

Montgomery, Michael, and David Wyes. 1992. "The Impact of Infrastructure." *DRI/McGraw-Hill U.S.Review*, October.

Moon, Henry L. 1983. *Balance of Power: The Negro Vote*.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Moon, J. Donald. 1988. "The Moral Basis of the Democratic Welfare State." In *Democracy and the Welfare State*, edited by Amy Gutman, pp. 53—7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orenoff, Jeffrey D. 1994. "Neighborhood Change and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cago, 1960—1990." Working Paper Series, vol.2, no.4,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Urban Inequali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Moss, Philip, and Christopher Tilly. 1991. "Why Black Men are Doing Worse in the Labor Market: A Review of Supply-Side and Demand-Side Explanations." New York: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Moynihan, Daniel Patrick. 1965. *The Negro Family: The Case for National Action*.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Policy Planning and Research, U.S.Department of Labor.

Moynihan, Daniel Patrick. 1996. "Congress Builds a Coffin." *The New York Review*. January 11, pp.33—34.

Murray, Charles. 1984. *Losing Ground: American Social Policy, 1950—1980*.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90. "Here's the Bad News on the Underclass."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8.

Myrdal, Gunnar. 1963. *Challenge to Affluenc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Nasar, Sylvia. 1994. "The Men in Prime of Life Spend Less Time Working."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1994. *Monthly Vital Statistics Report* 43, no.5, October 25.

———. 1995. *Monthly Vital Statistics Report* 43, no.11, May 25.

National League of Cities. 1993. "All in It Together: Cities, Suburbs and Local Economic Region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League of Cities.

Neal, Derek A., and William R.Johnson. 1995. "The Role of Pre-Market Factors in Black-White Wage Differenc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ritocracy and Equality Seminar Series, January 19,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Neckerman, Kathryn M. 1993. "What Getting Ahead Means to Employer and Inner-City Workers." Revised version of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hicago Urban Poverty and Family Life Conference, October 10—12, Chicago.

Neckerman, Kathryn M., and Joleen Kirschenman. 1991. "Hiring Strategies, Racial Bias, and Inner-City Workers." *Social Problems* 38(November):433—447.

Nelson, Kathryn P. 1991. "Racial Segregation, Mobility, and Poverty Concentr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 March 19—23, Washington, D.C.

Newman, Katherine S. 1996. "Working Poor: Low Wage Employment in the Lives of Harlem Youth." In *Transitions Through Adolescence: Interpersonal Domains and Context*, edited by J. Graber, J. Brooks-Gunn, and A. Petersen, pp.323—344. Mahwah, N.J.: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New York Times. 1994. "Clinton Wages a Quiet but Energetic War Against Poverty." March 30.

Oakes, Jeannie. 1990. *Multiplying Inequalities: The Effects of Race, Social Class, and Ability Grouping on Access to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Corporation.

O'Connor, Alice. 1992. "Race and Class in Chicago Sociology, 1920—1990."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 History Association, November 8, Chicago.

O'Hare, William, Tania Mann, Kathryn Porter, and Robert Greenstein. 1990. *Real-Life Poverty in America: Where the American Public Would Set the Poverty Line*.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and Families USA Foundation report, Washington, D.C.

O'Hare, William, and Anne Pauti. 1990. *Declining Wages of Young Workers in Rural America*. Staff Working Papers,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Washington, D.C.

Oliver, Melvin, and Tom Shapiro. 1995. *Black Wealth/ White Wealth: A New Perspective on Racial Inequality*. New York: Routledge.

O'Neill, June, D.A.Wolf, L.J.Bassi, and M.T.Hannan. 1984. "An Analysis of Time on Welfare." Contract no.HHS-100-83-0048. Washington, D.C.: Urban Institute Press.

Orfield, Gary, and Carole Ashkinaze. 1991. *The Closing Door: Policy and Black Opportun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Osterman, Paul. 1990. "Welfare Participation in a Full Employment Economy: The Impact of Family Structure and Neighborhood." Unpublished manuscript,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ark, Robert E., and Ernest W. Burgess. 1925. *The C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arrott, Sharon. 1995. "An Analysis of the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ct (H.R.1214)." News release,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Washington, D.C., March 16.

Patterson, James T. 1981. *America's Struggle Against Poverty, 1900—198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atterson, Orlando. 1995. "For Whom the Bell Curv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ritocracy and Equality Seminar Series, February 2, Chicago.

Pavetti, LaDonna. 1993. "The Dynamics of Welfare and Work: Exploring the Process by Which Women Work Their Way off Welfare." Doctoral dissertation, 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 1995. "Who Is Affected by Time Limits?" In *Welfare Reform: An Analysis of*

- Issues*, edited by Isabel Sawhill, pp.31—35. Washington, D.C.: Urban Institute Press.
- Pear, Robert. 1993. "Poverty 1993: Bigger, Deeper, Younger, Getting Wors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0.
- Pedder, Sophie. 1991. "Social Isolation and the Labor Market: Black Americans in Chicago."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hicago Urban Poverty and Family Life Conference, October 10—12, Chicago.
- Peoples, Faith, and Rolf Loeber. 1994. "Do Individual Factors and Neighborhood Context Explain Ethnic Differences in Juvenile Delinquency?"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Criminology* 10:141—157.
- Petersen, Paul E. 1995. "State Responses to Welfare Reform: A Race to the Bottom." In *Welfare Reform: An Analysis of Issues*, edited by Isabel V.Sawhill, pp.7—11. Washington, D.C.: Urban Institute Press.
- Plotnick, Robert D. 1990. "Determinants of Teenage Out-of-Wedlock Childbearing."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2:735—746.
- Price, Hugh. 1994. Keynote address. National Urban League Annual Conference, Indianapolis, July 24.
- Prothrow-Stith, Deborah. 1991. *Deadly Consequence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 Public/Private Ventures. 1994. *Annual Report*. Philadelphia.
- Putnam, Robert D.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Quadagno, Jill. 1994. *The Color of Welfare: How Racism Undermined the War on Pover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ainwater, Lee. 1966. "Crucible of Identity: The Negro Lower-Class Family." *Daedalus* 95(Winter):176—216.
- . 1970. *Behind Ghetto Walls: Black Family Life in a Federal Slum*.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
- . 1987. "Class, Culture, Poverty and Welfar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Harvard University.
- Rainwater, Lee, and William L.Yancey. 1967. *The Moynihan Report and the Politics of Controversy*. Cambridge: MIT Press.
- Reardon, Patrick. 1991. "Study Links City Jobless, Suburban Housing." *Chicago Tribune*, May 1.
- Regan, Edward V. 1994.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for Tomorrow". Public Policy Brief, no.141, Jerome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Bard College.
- Rich, Frank. 1995. "The L.A. Shock Treatment."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4.
- Ricketts, Erol, and Ronald Mincy. 1986. *Growth of the Underclass: 1970—1980*. Washington, D.C.: Urban Institute Press.
- Ricketts, Erol, and Isabel Sawhill. 1986. *Defining and Measuring the Underclass*. Washington, D.C.: Urban Institute Press.
- Rifkin, Jeremy. 1995. *The End of Work: The Decline of the Global Labor Force and the Dawn of the Post-Market Era*. New York: Putnam's.

Ritchey, P. N. 1974. "Urban Poverty and Rural to Urban Migration." *Rural Sociology* 39:12—27.

Rodman, Hyman. 1963. "Lower-Class Value Stretch." *Social Forces* 42(December): 205—215.

Rohter, Larry. 1993. "As Hispanic Presence Grows, So Does Black Anger." *New York Times*, June 20.

Rose, Stephen J. 1994. "On Shaky Ground: Rising Fears About Incomes and Earnings." Research report no.94—02,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Employment Policy, Washington, D.C., October.

Rosenbaum, James E., and Susan J. Popkin. 1991. "Employment and Earnings of Low-Income Blacks Who Move to Middle-Class Suburbs." In *The Urban Underclass*, edited by Christopher Jencks and Paul E. Peterson, pp.342—356.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Rotberg, Iris C., and James J. Harvey. 1993. *Federal Policy Options for Improving the Education of Low-Income Students*.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Corporation.

Ruggles, Patricia. 1990. "The Poverty Line—Too Low for the 1990s." *New York Times*, April 26.

Rural Sociological Society Task Force on Persistent Rural Poverty. 1993. *Persistent Poverty in Rural America*.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Rusk, David. 1993. *Cities Without Suburbs*.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Sampson, Robert J. 1986. "Crime in Cities: The Effects of Formal and Informal Social Control." In *Communities and Crime*, edited by Albert J. Reiss, Jr., and Michael Tonry, pp.271—31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8. "Urban Black Violence: The Effect of Male Joblessness and Family Disrup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3:348—382.

———. 1992a. "Family Management and Child Development: Insights from Social Disorganization Theory." In *Facts, Frameworks and Forecasts*, vol.3 of *Advances in Criminology Theory*, edited by Joan McCord, pp. 62—93. New Brunswick, N. J.: Transaction Press.

———. 1992b. "Integrating Family and Community-Level Dimensions of Social Organization: Delinquency and Crime in the Inner City of Chicago."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Integrating Individual and Ecological Aspects on Crime, August 31-September 5, Stockholm, Sweden.

Sampson, Robert J., and Walter Groves. 1989.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Crime: Testing Social Disorganization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774—802.

Sampson, Robert J., and William Julius Wilson. 1995. "Toward a Theory of Race, Crime, and Urban Inequality." In *Crime and Inequality*, edited by John Hagan and Ruth Peterson, pp.37—5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chmitter-Heisler, Barbara. 1991.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the Underclass." *Theory and Society* 20:455—483.

- Shapiro, Robert Y., and J.T. Young. 1989. "Public Opinion and the Welfare State: The United Stat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04:59—87.
- Shapiro, Walter. 1987. "The Ghetto: From Bad to Worse." *Time*, August 24, pp.18—19.
- Sheley, J.F., and J.D. Wright. 1993. "Gun Acquisition and Possession in Selected Juvenile Samples." *Research in Brief*.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
- Smock, Pamela J. 1990. "Remarriage Patterns of Black and White Women: Reassessing the Role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Demography* 27:467—473.
- Sosin, Michael. 1991. "Concentration of Poverty and Social Isolation of the Inner-City Poo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hicago Urban Poverty and Family Life Conference, October 10—12, Chicago.
- Sowell, Thomas. 1994. *Race and Culture: A World View*. New York: Basic Books.
- Spear, Allan. 1967. *Black Chicago: The Making of a Negro Ghett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taples, Robert. 1970. "The Myth of the Black Matriarchy," *Black Scholar* 2 (February):9—16.
- . 1971. *The Black Family: Essays and Studies*.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Publishing Co.
- Steinberg, Laurence, Nancy E. Darling, Anne C. Fletcher, B. Bradford Brown, and Stanford M. Dornbusch. 1995.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and Adolescent Adjustment: An Ecological Journey." In *Examining Lives in Context: Perspectives on 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 edited by Phyllis Muen, Glen H. Elder, Jr., and Kurt Lüscher, pp.423—466.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Stier, Haya, and Marta Tienda. 1994. "Spouses or Babies: Race, Poverty and Pathways to Family Lif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Chicago, March.
- Sugrue, Thomas J. 1993. "The Structures of Urban Poverty: The Reorganization of Space and Work in Three Periods of American History." In *The "Underclass" Debate: Views from History*, edited by Michael B. Katz, pp. 85—117.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um, Andrew, and Neal Fogg. 1990. "The Changing Economic Fortunes of Young Black Men in America." *Black Scholar* 21 (January, February, and March):47—55.
- Susser, Ida, and John Kreniski. 1987. "The Welfare Trap: A Public Policy for Deprivation." In *Cit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edited by Leith Mullings, pp.51—6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widler Ann. 1986. "Culture in Action: Symbols and Strateg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 (January):273—286.
- Taub, Richard. 1991. "Differing Conceptions of Honor and Orientations Toward Work and Marriage Among Low-Income African-Americans and Mexican-America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hicago Urban Poverty and Family Life Conference, October 10—12, Chicago.

Taylor, Ralph B. and Jeanette Covington. 1988. "Neighborhood Changes in Ecology and Violence." *Criminology* 28(November):553—558.

Taylor, Robert, J., Linda M. Chatters, M. Belinda Tucker, and Edith Lewis. 1990. "Developments in Research on Black Families: A Decade Review."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2:993—1014.

Taylor, William L. 1986. "Equal Protection, and the Isolation of the Poor." *Yale Law Journal* 95:1700—1735.

Testa, Mark. 1990. "Joblessness and Absent Fatherhood in the Inner Ci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ugust, Washington, D.C.

———. 1991. "Male Joblessness, Nonmarital Parenthood and Marriag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hicago Urban Poverty and Family Life Conference, October 10—12, Chicago.

Testa, Mark, and Marilyn Krogh. 1995. "The Effect of Employment on Marriage Among Black Males in Inner-City Chicago." In *The Decline in Marriage Among African Americans: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edited by M. Belinda Tucker and Claudia Mitchell-Kernan, pp.59—95.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Thrasher, Frederic. 1927. *The Ga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ienda, Marta. 1989. "Poor People and Poor Places: Deciphering Neighborhood Effects on Poverty Outcom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ugust 9—13, San Francisco.

———. 1990. "Welfare and Work in Chicago's Inner C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0(May):372—376.

Tienda, Marta, and Haya Stier. 1990. "Intergenerational Continuity of Welfare Dependence: Racial and Ethnic Comparis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XII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July, Madrid, Spain.

———. 1991. "'Making a Livin'": Color and Opportunity in the Inner Ci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hicago Urban Poverty and Family Life Conference, October 10—12, Chicago.

Time. 1977. "The American Underclass." August 29, pp.14—27.

Tobin, James. 1965. "On Improving the Economic Status of the Negro." *Daedalus* 94:878—898.

Tompkins, D.C. 1970.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Sixties: A Bibliography*. Berkeley: Institute of Government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Topel, Robert. 1993. "What Have We Learned from Empirical Studies of Unemployment and Turnover?" *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83:110—115.

———. 1994. "Regional Labor Markets and the Determinants of Wag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May):17—22.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88.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pulation Below the Poverty Level, 1978—84" and "Poverty in the U.S., 1985—87."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 1988. "Money Income and Poverty Status in the U.S." Table 2. In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series P-60, no.161.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 1992.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92." Table 6. In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series P-60, no.185.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 1993. "Marital Status and Living Arrangements." In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series P-20, no.468.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 1994a.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Published and unpublished data, March.
- . 1994b. Income and Poverty. CD-ROM.
- U.S.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1989. "Nearly Three-Fifths of High School Graduates of 1988 Enrolled in College." In *U.S. Department of Labor News Release*, no.89—103, June.
- . 1994. "College Enrollment of 1993 High School Graduates." In *U.S. Department of Labor News Release*, no.94—252, May.
- Valentine, Charles A. 1968. *Culture and Poverty; Critique and Counter-Proposal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Van Haitsma, Martha. 1989. "A Contextual Definition of the Underclass." *Focus* (Newsletter of the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Poverty) 12(Spring and Summer):27—31.
- . 1991. "Attitudes, Social Context and Labor Force Attachment: Blacks and Immigrant Mexicans in Chicago Poverty Areas." Presented at the Chicago Urban Poverty and Family Life Conference, October 10—12, Chicago.
- . 1992. "The Social Context of Nonemployment: Blacks and Immigrant Mexicans in Chicago Poverty Area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 History Association, November 5—8, Chicago.
- Venkatesh, Sudhir. 1996. "Private Lives, Public Housing: An Ethnography of the Robert Taylor Homes." Ph. D.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 Vroman, Wayne. 1995. "Rainy Day Funds; Contingency Funding for Welfare Block Grants." In *Welfare Reform; An Analysis of Issues*, edited by Isabel V.Sawhill, pp.11—17. Washington, D.C.: Urban Institute Press.
- Wacquant, Loïc J.D. 1991. "The Specificity of Ghetto Povert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Race, Class, and Urban Exclusion in Chicago's Black Belt and the Parisian Red Belt." Presented at the Chicago Urban Poverty and Family Life Conference, October 10—12, Chicago.
- Wacquant, Loïc J.D., and William Julius Wilson. 1989. "Poverty, Joblessness and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ner City." In *Reforming Welfare Policy*, edited by D.Ellwood and P.Cottingham, pp.70—102.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 1990. "The Cost of Racial and Class Exclusion in the Inner City."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01(January):8—25.
- Waldinger, Roger. "Black/Immigrant Competition Re-assessed; New Evidence from Los Angeles." Unpublished m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CLA.
- Warner, W.Lloyd, and Paul S.Lunt. 1941. *The Social Life of a Modern Community*. Vol.1, Yankee City Ser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 1942. *The Status System of a Modern Community*. Vol.2, Yankee City Ser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Weaver, Frank C. 1995. "Preparing Our Youth for the Information Age." *Focus*, Joint Center fo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udies, May, p.7.

Weir, Margaret. 1993a. "Race and Urban Poverty: Comparing Europe and America." Occasional paper no.93-99, Center for American Political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March.

———. 1993b. "Urban Policy and Persistent Urban Poverty." Background memorandum prepared for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Policy Conference on Persistent Urban Poverty, November 9-10, Washington, D.C.

West, Cornel. 1993. *Race Matters*. Boston: Beacon Press.

Wieman, Clark. 1993. "Road Work Ahead." *Technology Review* 96(January):42-48.

Wilkerson, Isabel. 1994. "Crack Means Power, and Death, to Soldiers in Street War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3.

Wilkins, Roger. 1989. "The Black Poor are Different." *New York Times*, August 22.

Williamson, John B. 1974a. "The Stigma of Public Dependency: A Comparison of Alternative Forms of Public Aid." *Social Problems* 21(June):213-228.

———. 1974b. "Beliefs About the Motivation of the Poor and Attitudes Toward Poverty Policy." *Social Problems* 21(June):634-647.

———. 1974c. "Beliefs About the Welfare Poor." *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58 (January):163-175.

Wilson, William Julius. 1980. *The Declining Significance of Race: Blacks and Changing America Institutions*. 2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7a.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7b. "The Obligation to Work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Jobs: A Dialogue Between Lawrence M.Mead and William Julius Wilson." *Focus*(newsletter of the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Poverty) 10(Summer):11-19.

———. 1988. "The American Underclass: Inner-City Ghettos and the Norms of Citizenship." Godkin Lecture, 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April 26.

———. 1991a. "Studying Inner-City Social Dislocations: The Challenge of Public Agenda Researc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February):1-14.

———. 1991b. "Response." *American Prospect* (Spring):93-96.

———. 1992. "The Right Message." *New York Times*, March 17, op-ed page.

———, ed. 1993a. *The Ghetto Underclass: Social Science Perspectives*. Updated ed.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 ed. 1993b. *Sociology and the Public Agenda*.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Wilson, William Julius, Robert Aponte, Joleen Kirschenman, and Loic J. D. Wacquant. 1988. "The Ghetto Underclass and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American Poverty." In *Quiet Riots: Race and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edited by Fred R.Harris

and Roger W. Wilkins, pp.123—154. New York: Pantheon.

Wolff, Edward N. 1995. *Top Heavy: A Study of the Increasing Inequality of Wealth in America*. New York: Twentieth Century Fund Press.

Yinger, John. 1995. *Closed Doors, Opportunities Lost: The Continuing Costs of Housing Discrimination*.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Yoon, In-Jin. 1994. "Who Are My Neighbors? Korean's Perceptions of Blacks and Hispanics as Employees, Customers, and Neighbor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ugust 5—9, Los Angeles.

Zax, Jeffrey, and John Kain. 1992. "Moving to the Suburbs: Do Relocating Companies Leave Their Black Employees Behind?" Unpublished manuscript, Harvard University.

Zedlewski, Sheila, and Isabel V. Sawhill. "Assessing the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ct." In *Welfare Reform: An Analysis of Issues*, edited by Isabel V. Sawhill, pp.35—39. Washington, D.C.: Urban Institute Press.

Zelditch, Morris, Jr. 1989. "Levels in the Logic of Macro-Historical Explan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ugust 10, San Francisco.

Zorbaugh, Harvey W. 1929. *The Gold Coast and the Slu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索 引

(页码为原版书页码,即本书的边码)

- Adams, Terry 特瑞·亚当斯,270
- AFDC (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 有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 50, 65, 80—81, 83—85, 92—94, 156, 164—167, 169—170, 176, 222
- Affirmative Action 平权行动,193, 197—199, 203—204
- African Americans, *see* blacks 非裔美国人,参见黑人
- Alabama 阿拉巴马,165
- Anderson, Elijah 伊莱贾·安德森,72, 107
- Arizona 亚利桑那,165
- Armed Forces Qualification Test (AFQT) 武装部队资格测验, xvi
- Assyrian immigrants 亚述移民,245
- Atlanta 亚特兰大,166, 256
- Auletta, Ken 肯·奥莱塔,176, 177
- Austria, study of persistent unemployment in 有关奥地利旷日持久的失业问题的研究,73—74
- Baltimore 巴尔的摩,14, 32, 256
- Bandura, Albert 阿尔伯特·班杜拉,75, 78
- Bane, Mary Jo 玛丽·乔·贝恩,12, 14, 242, 256
- Basic Education Connection (BEC) 基础教育连接计划,213
- Belgium 比利时,150, 160
- belief systems 信念体系
- on American values 有关美国价值, 179—181
- on poverty and welfare 有关贫困与福利,159—161, 164, 171
- Bell, Derrick 德里克·贝尔,183
- Bell Atlantic 贝尔大西洋公司,213
- Bell Curve, The* (Herrnstein and Murray) 理查德·赫恩斯坦 (Richard Herrnstein)、查尔斯·穆雷 (Charles Murray) 著《钟型曲线》, xv—xvii
- Bergmann, Barbara 芭芭拉·伯格曼, 216
- black perspective 黑人观点,172—173
- blacks (African Americans) 黑人(非裔美国人)
- assimilation theory and 同化理论与黑人,17—18, 258—259
- employment of 黑人的就业
- absenteeism attributed to blacks 将黑人失业归咎为缺勤旷工, 119, 120, 132
- bad attitude attributed to blacks 将黑人失业归咎为态度恶劣,118—121, 131,132
- comments of black employers 黑人

- 雇主对黑人就业问题的评价, 129—132, 136
- drug tests 药物检测, 121—122
- employers' perceptions 雇主对黑人就业问题的认识, 111—126, 136
- employers' racism 雇主的种族主义, 77—78, 118, 127—137
- job interviews 求职面试, 132—133
- problem of termination 合同终止问题, 127—128
- recruitment programs 招聘计划, 133—137, 204
- reservation wages 保留工资, 139—141
- statistics 统计, 26
- theft attributed to blacks 将黑人视为小偷, 113—114, 116, 120, 122, 135
- female 黑人女性
- attitudes toward men 对男人的态度, 98—103
- child-care needs 儿童照顾需要, 78, 93—94, 125
- employers' preference for 雇主对黑人女性的偏爱, 118, 122—126
- employers' problem of termination 雇主的合同终止问题, 127—128
- employment of black mothers 黑人母亲的就业, 93—94
- joblessness and isolation 失业与孤立, 65, 144
- marriage and divorce 婚姻与离婚, 88—97
- in service sector 服务业中的黑人女性, 32—33
- work prospects for 黑人女性的工作前景, 144—145
- illegitimacy among 黑人的非婚生问题, 87
- laziness attributed to 认为黑人比较懒惰, 112, 118, 122, 131, 132, 191
- male 黑人男性
- black women's attitudes toward 黑人女性对于黑人男性的态度, 98—103
- employers' perception of 雇主对黑人男性的认识, 117—125, 128, 131, 132
- employment related to childhood exposure to work 黑人男性的就业跟他是否在工作环境中长大有关, 270
- as fathers 作为父亲的黑人男性, 89—91, 95—96, 100—102
- general negative views of 对于黑人男性总统上的消极看法, 138—144
- in low-skilled service jobs 从事低收入服务工作的黑人男性, 30—31, 33, 141—142
- migration to North by 向北部移民, 48
- Moynihan report criticized by 对莫伊尼汉报告的批评, xvi—xvii, 172, 174
- Number in ghettos 在聚居区中的数量, 14
- progress of 黑人男性的进步, 193—194
- school-to-work transition for 从学校向工作的转变, 217—218
- single-parent families of 黑人的单亲家庭, 87—94, 104—105
- social class and mobility of 社会阶层与黑人的流动, 194—195
- southern-vs. northern-born 南部出生与北部出生的黑人男性的差异, 176
- in suburbs 郊区的黑人, 38, 47
- in underclass 底层黑人, 174—175
- see also civil rights movement; races; racism 还可参见民权运动、种族、种族主义
- Blank, Rebecca 丽贝卡·布兰克, 28
- Bloch, Farrell 法雷尔·布洛克, 37
- Blumstein, Alfred 阿尔弗雷德·布鲁姆

- 斯坦, 21, 184
- Bobo, Lawrence 劳伦斯·鲍勃, 203—204
- Boston 波士顿, 14, 32, 143, 187
- Bourdieu, Pierre 皮埃尔·布尔迪厄, 73
- Brawley, Tawana 塔瓦娜·布罗莉, 184
- Britain (United Kingdom) 不列颠(英国), 150, 157, 207
- Burgess, Ernest W. 欧内斯特·伯吉斯, 17
- Bush administration 布什政府, 49, 222
- Califano, Joseph A. 约瑟夫·卡利法诺, 201
- California 加利福尼亚, 34, 611
- Canada 加拿大, 151, 153, 155, 207
- Castel, Robert 罗伯特·卡斯特尔, 160
- Catholic school 天主教学校, 134—135, 186
- Cayton, Horace 贺拉斯·凯顿, 18—20, 23
- census tracts 普查地段
- mixed 白人与黑人混合居住的普查地段, 257
 - poverty 贫困的普查地段, 6, 10, 12—14, 19, 67, 87, 256—258
-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Urban Inequality 城市不平等研究中心, xxii, 63, 78, 243—248
-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预算与优先政策研究中心, 165, 169, 223
- Center on Social Welfare Policy and Law 社会福利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 165
- central cities 中心城区或城市中心
- decline in federal contribution to 联邦政府对中心城区的投入日益减少, 49, 185—186, 219
 - in Europe 欧洲的中心城区, 218
 - joblessness in 中心城区的失业问题, 19, 50
 - need for cooperation between suburbs and 中心城区与郊区之间亟需合作, 218—220
- poverty population in 中心城区的贫困人口, 11—12, 254, 256—257
- suburbanization of employment and 就业的郊区化与中心城区, 37—44, 54, 223—224
- whites in 中心城区的白人, 185—188
- Chicago 芝加哥
- Black Belt of 芝加哥市的黑人地带, 12—13, 15—16
 - Bronzeville area of 布朗兹威尔区域, 18—20, 23, 43—45
 - car-pool and van-pool networks in 私车与货车拼车网络, 281
 - crack-cocaine in 芝加哥的快克-可卡因吸食问题, 60
 - gangs in 黑帮, 4, 9, 11, 21
 - Gautreaux program in 高特罗计划, 38—9, 200—201
 - loss of jobs in 芝加哥的失业问题, 29—30, 109
 - map of 芝加哥地图, 13
 - Mexicans in 芝加哥的墨西哥人, *see* Mexicans 参见墨西哥人
 - minorities as majority in 少数族裔人口逐渐成为芝加哥中心城区的多数人口, 185
 - Near West Side of 芝加哥市近西部, 6, 7, 13
 - Northwest Side of 芝加哥市西南部, 134
 - poverty rates in 芝加哥市的贫困率, 15—16
 - riots in 芝加哥的暴乱, 35
 - South Side of 芝加哥南部, xvii, 3—8, 18, 19, 23, 58—60
 - Marquette Park 马凯特公园, 187
 - Oakland 奥克兰, 12, 247—248
 - Woodlawn 伍德朗, 5—6, 247—248
- Suburbanization of employment in 就业

- 的郊区化,37
- University of 芝加哥大学,12, 17—18, 63; see also UPFLS 还可参见 UPFLS
- West Side of 芝加哥西部,4, 7—10, 18,116
- North Lawndale 北朗代尔,34—37
- worsening ghetto conditions in 芝加哥市聚居区状况的恶化,174
- Chicago School 芝加哥学派,17, 18, 258—259
- childcare 儿童照顾,78, 93—94, 125, 205, 229, 234
- in Europe 欧洲的儿童照顾,158, 215—216
- children 儿童
- enforced learning by 加强教育体系, 215—216
- in poverty today 生活在当今贫困状况下的儿童,91—92
- problems of socialization 社会化问题, 62—64, 92, 106—107
- in single parent families 单亲家庭中的儿童,87—94, 104—105, 107, see also AFDC; high schools; public schools 还可参见 AFDC、中学、公共学校
- cities, see central cities 城市,参见中心城区
-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 1964 年的民权法案,197, 199, 278
- civil rights movement 民权运动
- achievements of 民权运动的成就 193—194
- black middle class as main beneficiary of 黑人中产阶级作为民权运动的主要受益者,196
- freedom of choice emphasized by 民权运动所强调的自由选择权,196
- Clark Kenneth B. 肯尼思·B·克拉克 72, 108, 177, 196
- Cleveland 克利夫兰,14, 187, 242
- Clinton, Bill 比尔·克林顿,xxi, 168—169, 171, 228
- Coleman James S. 詹姆斯·科尔曼,62
- college education 大学教育
- average earnings after 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收入,217
- black scholarships favored by whites 白人支持的黑人奖学金,204
- increased work for those with 大学毕业生工作机会的增多,261
- new jobs and 新兴岗位与大学教育,29, 31
- quotas for blacks in 大学教育中的黑人定额,203
- community, decline in sense of 社区归属感的衰落,3—11, 34—37, 46, 174
- Comprehensive Employment and Training Act(CETA) 全面就业与培训法案,232
- computers 电脑,29, 152, 212—213
- Condon, Mark 马克·康登,48
- Congress, U.S. 美国国会
- AFDC opposed by 对 AFDC 的反对, 165
- current policy retreat of 美国国会当前政策的倒退,234—237
- EITC expanded by 所得税抵免的增加, 221—222
- proposed welfare reform by 提及进行福利改革,163—164, 169—171
- conservatives, ideology of 保守主义意识形态,xiv, 158, 171, 175—176, 198
- construction industry, statistics on employment in 建筑业中就业情况的统计,249
- Contract with America “与美国订立契约”,169, 170, 237
- Corcoran, Mary 玛丽·科克伦,270
- Coulton, Claudia 克劳迪娅·库尔顿,242
- Coyne, Laura 劳拉·柯尼,266
- crack-cocaine 快克-可卡因,59—60, 185
- crime 犯罪
- lower population density and increase in 低人口密度与犯罪的增加,46

- public support of programs vs. 公共支持计划 vs. 犯罪, 205
see also drugs; violence 还可参见毒品、暴力
- Cubans 古巴人, 112, 189
- Culture 文化
definition of 文化的定义, 66
of inner-city ghetto 内城聚居区的文化, 67—86
blacks and work 黑人与工作, 114—115
mainstream vs. ghetto-related elements 主流 vs. 与聚居区相关的要素, 67
sharing of 文化共享, 71—72
situationally adaptive elements of 文化中的情境适应性要素, 71—77
of subgroups, social outcomes and 亚群体的文化及其社会后果, 140
underclass and 底层阶级与文化, 177—178
- Dallas 达拉斯, 189, 257
- Danziger, Sheldon 谢尔登·丹齐格, 34, 225, 327—329, 231
- Darling-Hammond, Linda 琳达·达林-哈蒙德, 211
- Dash, Leon 莱昂·丹斯, 176
- Defender (newspaper) 《卫报》(报纸), 134
- Denton, Nancy 南希·登顿, 15, 23
- Denver 丹佛, 63, 166
- Detroit 底特律, 29, 30, 207, 256
- Disadvantage 弱势
affirmative action for 为了弱势群体的平权行动, 198—199
need and race in definition of 根据需要和种族界定弱势, 205
suggested integrative programs vs. 提出整合性计划, 205—206, 232, 235—236
- discrimination 歧视
charges of 歧视指控, 127—128
- statistical 有关歧视的统计, 129, 136—137
see also racism 还可参见种族主义
- Dornbusch, Sanford 桑福德·多恩布施, 92
- Drake, St. Clair 克莱尔·德雷克, 18—20, 23
- drugs 毒品, 9—10, 21—23, 49, 55—60, 74—75, 238
public support of programs vs. 抵制毒品的公共支持计划, 295
tests of employees for 针对雇员的药物检测, 121—122, 132
- Duke, David 戴维·杜克, xxi
- Duncan, Greg 格雷格·邓肯, 96
- Duneier, Mitchell 米切尔·邓奈尔, xvii—xviii
- 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EITC) 所得税抵免, 221—222, 229, 230, 234, 238
- école maternelles 幼稚园, 215—216
- economy 经济
future of blacks in 黑人的未来, 201
global 全球, see global economy 参见全球经济
informal 非正式经济, xix, 70, 74—75, 80, 142—143
restructuring of 结构调整, 29—37
- Edin, Kathryn 凯瑟琳·埃丁, 79—83, 91
- Education 教育
of blacks, favored by whites 受到白人支持的黑人教育, 204
employment and 就业与教育, 31—33, 116—117, 119
G7 support of G7 对教育的支持, 208
marriage and 婚姻与教育, 88
in married-couple families with children 有孩子的已婚夫妇家庭中的教育情况, 249
national performance standards in proposed 提议的全国成绩标准, 210—216

- public support of taxes for 对教育加大公共税收支持, 205
- special 特殊教育, 204
- of teachers 师范教育, 212
- see also college education; public schools
还可参见大学教育、公共学校
- Eggers, Mitchell 米切尔·埃格, 241
- Elliott, Delbert 德尔伯特·埃利奥特, 22, 260
- Ellwood, David 戴维·埃尔伍德, 96
- employer survey 雇主调查, 111—137, 245—246, 271
- employment 就业
- of black mothers 黑人母亲的就业, 93—94
- health insurance and 健康保险与就业, 107
- irregular 非正规就业, 73
- of men, and marriage 男人的就业与婚姻, 95—96
- newspaper ads for 报纸上的招聘广告, 133—134
- part-time, involuntary 志愿性的兼职工作, 50
- welfare vs. 福利与就业的对立, 79—82
- see also blacks—employment of, unemployment; work 还可参见黑人—黑人的就业、失业、工作
- employment-to-population ratio 就业人口比率, 145—146
- ethnographic field research 民族志田野研究, 24—25
- Europe 欧洲, 149—151
- flexible workplace needed by 需要灵活的工作场所, 221
- political obstacles to change in 需要改变政治阻力, 154—155
- racism in 欧洲的种族主义, 157—158
- suburbanization in 欧洲的郊区化, 218
- welfare state in 欧洲的福利国家, 157—158, 221
- Fagan, Jerry 杰弗瑞·费根, 60
- Fair Housing Act 公平居住法案, 200
- Fair market rent (Fmr) 公平市场租金, 166
- families, 家庭
- joblessness and 失业与家庭, xvii—xviii, 72—73, 75—77
- Moynihan' report on 有关黑人家庭的莫伊尼汉报告, xvi—xvii, 172, 174
- Single-parent 单亲家庭, 87—94, 104—105, 107
- social isolation of 家庭的社会孤立, 63—65
- traditional, disappearance of 传统家庭的消失, 87—94
- two-parent, welfare, and 享受福利的双亲家庭, 163
- weakening of 家庭的衰弱, 106—107
- women-headed, and poverty 女人当家的家庭与贫困, 91
- see also AFDC; marriage 还可参见AFDC、婚姻
- Family Support Act (1988) 家庭支持法案, 164
- family values 家庭价值, 91
- 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 (FHA) 联邦住房管理局, 46
- firearms 手枪, 60—61, 72
- Florida 佛罗里达, 34, 184
- focus groups 焦点小组, 247—248
- Fogg, Neal 尼尔·福格, 95
- food stamps 食物券, 94, 156, 165, 255
- France 法国, 150, 157, 160, 207, 215—216
- Frazier, E. Franklin E·法兰克林·弗雷泽, 17—18
- Freeman, Richard B. 理查德·弗里曼, 28, 34
- Fund for Community Revitalization and Redevelopment 社区复兴与发展基金, 247

- Furstenberg, Frank 法兰克·弗斯滕伯格, 62, 63, 102
- Galaxy Classroom Foundation 星球课堂基金, 213
- Gallup poll 盖洛普民意测验, 254—255
- gangs 黑帮, 4, 9, 11, 21
- Gautreaux program 高特罗计划, 33—39, 200—201
-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GAO) 美国审计总署, 163—164
- General Social Survey 综合社会调查, 162, 203
- Germany 德国, 150, 154, 160, 207, 210, 216—217, 220, 221
- ghetto-related behaviors 聚居区相关的行为, 52—53, 55—86
- role models in 角色榜样 71—72, 112
- Gilder, George 乔治·吉尔德, 164, 175
- global economy 全球经济
- educational skills needed for 全球经济对教育技能的需求, 221
- increased competition in 全球经济中竞争的加剧, 152, 155
- problems from changes in 全球经济变革导致的问题, xx, 28—29, 54, 151, 207, 236
- unemployment or underemployment in 全球经济中的失业或就业不充分问题, 153
- Goals 2000: Educate America Act 《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案》，214, 217
- Gottschalk, Peter 彼得·戈特沙尔克, 34, 225, 227—229, 231
- Great Depression (1930s) 1930年代的大萧条, 15, 16, 46, 48
- Griffin, Michael 迈克尔·格里芬, 184
- Gross, Andrew 安德鲁·格罗斯, 241
- Group of Seven (G7) jobs conference (1994) G7 就业峰会, 207—208
- Hacker, Andrew 安德鲁·海克尔, 183
- Hamill, Pete 彼得·哈米尔, 178
- Handler, Joel F. 乔尔·汉德勒, 169
- Hannerz, Ulf 乌尔夫·汉纳兹, 71, 72, 177
- Harris poll 哈里斯民意调查, 161, 205
- Harvey, James J. 詹姆斯·哈维, 211
- Hawaii 夏威夷, 165
- Hawkins, Yusef 尤赛夫·霍金斯, 184
- Head Start, fade-out of gains from 领先计划, 该计划的效果逐渐减弱, xv—xvi
- health insurance and care 健康和保健, 107, 168, 205, 215, 234, 238
- Heckman, James 詹姆斯·赫克曼, xvi
- Henderson, Vivian 薇薇安·亨德森, 196, 201
- Herrnstein, Richard 理查德·赫恩斯坦, xv—xvii
- Hicks-Bartlett, Sharon 莎伦·希克斯-巴特莱特, 142
- high schools, *see* public schools 中学, 参见公共学校
- high-wage strategies 高收入策略, 152
- highway system, proposed public jobs for upgrading of 提议对公路系统进行升级以创造公共就业机会, 226—227
- Hirschman, Albert 阿尔伯特·赫希曼, 187
- Hispanics (Latinos) 西班牙人(拉丁裔)
- antagonisms between blacks and 黑人与西班牙人的对立, 183, 188—189
- employers' perceptions of 雇主对西班牙人的看法, 112, 113, 129
- employment ads for 面向西班牙人的招聘广告, 134
- joblessness among 西班牙人的失业, 19
- Koreans' attitude toward 韩国人对西班牙人的态度, 191—192
- in manufacturing sector 制造业中的西班牙人, 126—127, 144
- projected growth of 西班牙人的预计增

- 长, 189
- “reservation wage” of 西班牙人的
“保留工资”, 140, 141
- single-parent families of 西班牙人中的
单亲家庭, 87—88
- on welfare 西班牙人的福利, 171
- see also Cubans; Mexicans; Puerto
Ricans 还可参见古巴人、墨西哥
人、波多黎各人
- Hochschild, Jennifer 詹尼弗·霍克希尔
德, 194
- Hoffman, Saul 索尔·霍夫曼, 96
- Holland (the Netherlands) 荷兰, 150,
158, 160
- Holzer, Harry J. 哈里·霍尔泽, 41—42
- housing 住房
- desegregation of 居住隔离, 189
- exclusionary zoning of 住房方面的排
斥性分区, 47, 200
- landlord abandonment of 业主抛弃住
房, 45—46
- restrictive practices in 住房方面的限制
性措施, 24, 200
- subsidies for 住房补贴, 155, 166
- see also public housing 还可参见公共
住房
- Housing Act of 1949 1949年的住房法
案, 48
- Houston 休斯顿, 189
- Hout, Michael 迈克尔·豪特, 194
- Hughes Galaxy Classroom 休斯星球课
堂, 213
- hustling 骗钱, 142
- Ihlandfeldt, Keith R. 基斯·伊兰德菲
特, 41
- illegitimacy 非婚生育
- decline in stigma of 对非婚生育的污名
逐渐减少, 105, 108
- girl's motivations for 女孩子非婚生育
的动机, 107—109
- middle-class rejection of 中产阶级对非
婚生育的拒绝, 108
- statistics on 有关非婚生育的统计, 87
- teenage 青少年, 9, 94, 176—177
- whether welfare a factor in 福利是否
是影响非婚生育的因素之一, 94, 126
- Illinois 伊利诺伊, 61, 83
- immigrants 移民
- Assyrian 亚述人, 245
- competition with low-skilled workers by
移民与低技术工人之间的竞争, 34,
78, 140—141
- employment ads for 面向移民的招聘广
告, 134
- in Europe 欧洲移民, 149—151, 157—
158, 221
- Korean 韩国移民, 189—192
- redlining and 歧视与移民, 6
- individualism 个体主义
- opportunity-enhancing programs suppor-
ted by 个体主义所支持的增强机会
政策, 204
- poverty explained in terms of 对贫困
的个体主义解释, 159—160
- welfare opposed in terms of 根据个
体主义反对福利制度, 158—159, 161—
162, 203
- infrastructure maintenance programs,
proposed 个体主义所提倡的基础设
施维持计划, 226—227, 231, 233
- inner-city ghetto 内城聚居区
- age-structure change in 内城聚居区中
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 44—45
- central problem of 内城聚居区的核心
问题, xix
- culture of, see culture—of inner-city
ghetto 文化, 参见文化—城市中心聚
居区
- depopulation of and outmigration from
人口从内城聚居区向外迁移, xvii,
6, 16, 44—46, 241—243

- employers' attitudes toward 雇主对内城聚居区的态度, 111—126
- geographical spread of 内城区聚居区的地理扩张, 14—15
- glorification of 对内城聚居区的赞美, 173
- joblessness in, *see* joblessness 内城聚居区的失业, 参见失业
- no European equivalent to 欧洲没有类似于美国这样的内城聚居区, 149
- reason for 内城聚居区形成的原因, 23—24
- sexual relationships in 内城聚居区中的性关系, 108—109
- social deterioration in 内城聚居区中社会关系的恶化, 3—11, 34—37, 46, 174
- social isolation in 内城聚居区中的社会孤立, 63—65
- speech patterns in 内城聚居区中人们的说话方式, 117
- violence in 内城聚居区中的暴力, 6—7, 21—23
- intelligence, *The Bell Curve* on 《钟型曲线》论智商, xv—xvii
- International Harvester 国际收割机械公司, 34, 35
- Ireland 爱尔兰, 160
- Italy 意大利, 158, 160, 207
- Jackson(Mississippi) 杰克逊(密西西比州首府), 256
- Jahoda, Marie 玛丽·加达, 73
- Japan 日本, 152, 207, 210, 216—217, 220
- Jargowsky, Paul 保罗·贾高斯基, 12, 14, 242, 256—258
- Jencks, Christopher 克里斯托弗·詹克斯, 95
- job information and placement centers, proposed 提议成立就业信息与安置中心, 224
- job interview 求职面试, 132—133
- joblessness 失业
- Austrian study of 奥地利人对失业的研究, 73—74
- city-suburban cooperation vs. 城市与郊区的合作以解决失业问题, 219—220
- cultural factors in 失业中的文化因素, 72—86
- economic recovery and 经济复苏与失业, 14—16
- impact of 失业的影响, xvii, xxi, 16—17
- informal work and 非正式工作与失业, 74—75
- marriage affected by 失业与婚姻的影响, 94—97, 105—106
- not in 1950s ghettos 1950年代的聚居区并不存在失业问题, 53—54
- statistics on 有关失业的统计, 19—20
- violent crime and 暴力犯罪与失业, 22
- job networks 求职网络, 65—66, 135, 142, 155, 224
- job conference, international (1994) 1994年的国际就业峰会, 207—208
- job training and retraining 就业培训与再培训, 204, 205, 233—234, 282
- Johnson, Lyndon B. 林顿·约翰逊, 91, 161, 201
- Kain, John 约翰·凯恩, 263
- Kasarda, John 约翰·卡萨达, 31—32, 256
- Katz, Lawrence F. 劳伦斯·卡茨, 28, 34
- Kaus, Mickey 米奇·考斯, 176—177, 229—233
- King, Martin Luther, Jr. 马丁·路德·金, 35, 196
- King, Rodney 罗德尼·金, 190
- Kirschenman, Joleen 乔琳·基尔申曼, 132, 246, 270—271

- Kluegel, James 詹姆斯·柯吕格尔, 159
 Korean-black tension 韩国人与黑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189—192
 Korpi, Walter 瓦尔特·科尔皮, 163
 Krogh, Marilyn 玛丽莲·柯劳格, 96, 245, 246
 labor force, criteria for 劳动力的标准, 259
 labor unions 工会
 decline of 工会的衰落, 28
 employed black men in 参加工会的就业黑人男性, 249
 language skills 语言技能, 117, 121, 143
 Latinos, *see* Hispanics 拉丁裔或拉丁人, 参见西班牙人
 Lazarsfeld, Paul F. 保罗·拉拉斯菲尔德, 73
 Lemann, Nicholas 尼古拉斯·莱曼, 176
 Le Pen, Jean-Marie 让-玛丽·勒庞, 157
 Lerman, Robert 罗伯特·勒曼, 27, 32—33
 liberals, ideology of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xiii—xiv, xvii, 167, 171, 174, 176, 198, 253
 Liebow, Elliot 艾略特·列堡, 176
 longitudinal data, definition of 纵向数据的界定, 91
 Los Angeles 洛杉矶
 crack-cocaine in 洛杉矶的快克-可卡因问题, 60
 discrimination in 洛杉矶的歧视问题, 136
 job growth in 洛杉矶的就业增长, 32
 Korean-black antagonism in 洛杉矶市黑人与韩国人的对立, 190—191
 Latinos as outnumbering blacks in 洛杉矶市的拉丁裔人口数量超过黑人, 189
 1992 riot in 1992年洛杉矶的暴乱, xix, 184, 190—191
 Simpson case in 辛普森案, xix—xx
 Louisiana 路易斯安那, xxi, 61
 low-skilled worker 低技术工人, 25—30
 crime often preferred by 低技术工人经常犯罪问题, 143
 decline in demand for 低技术工作岗位的减少, 28—30
 decline in real wages of 低技术工人实际工资的降低, 28, 54
 in Europe 欧洲的低技术工人, 150—154
 female 女性低技术工人, 27—28
 proposed public-sector jobs for 提议为低技术工人提供公共部门工作岗位, 225—233
 turnover of 低技术工人的转变, 141—142
 low-wage strategies 低工资策略, 152—153
 Magnet, Myron 米隆·马格尼特, 177
 “male breadwinner” concept “男人挣钱养家”概念, 105
 manufacturing sector 制造业
 1990s increase in jobs in 1990年代制造业就业机会的增多, 145
 in Europe 欧洲的制造业, 150
 historical statistics on employment in 有关制造业就业情况的统计, 126—127, 249, 250
 recent loss of employment in 当前制造业就业人数的减少, 29—31, 142, 144
 Mare, Robert 罗伯特·梅尔, 95
 Marienthal(Austria) 马林塔尔(奥地利), 73—74
 marriage 婚姻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 人们对于婚姻的态度变化, 97—107
 decline in rate of 结婚率的降低, 88—95
 earnings of young men and probability of 年轻人男人的收入与结婚可能性

- 之间的关系,95—97
- male-female antagonisms and 男女对立与婚姻,100—105
- statistics on 有关婚姻状况的统计,268
- Marshall, Ray 雷·马歇尔,152, 210, 215, 216, 220
- Marshall, T.H. T·H·马歇尔,159
- Massey, Douglas 道格拉斯·马西,15, 23, 241
- Mass production system 批量生产体系, 26—28, 151
- Mead, Lawrence 劳伦斯·米德,164, 175
- media 媒体
- ghetto residents' criticism of 聚居区居民对媒体的批判,178—179
- racial violence reported in 媒体对种族暴力的报道,183—184
- "underclass" in 媒体报道中的“底层阶级”,174—178
- Medicaid 医疗补助项目,94, 156
- Medicare 医疗保险项目,156
- Memphis 孟菲斯,14, 166, 242, 256
- Merton, Robert K. 罗伯特·默顿,173
- Metro Chicago Information Center (MCIC) 芝加哥地铁信息中心,247
- Mexicans 墨西哥人,39, 51—52, 65, 87—89, 93, 97—98, 106, 126, 129, 139—141, 188, 223, 244—245, 250
- Miami 迈阿密,189
- Michigan Panel Study Income Dynamics (PSID) 密歇根大学收入动态追踪研究项目,270
- Milwaukee 密尔沃基,14, 242
- Mincy, Ronald 罗纳德·明希,96
- Minneapolis 明尼阿波利斯,220
- Montana 蒙大拿,165
- Morenoff, Jeffrey 杰弗瑞·莫雷诺夫, 242
- Moss, Philip 菲利普·莫斯,142
- movie theaters, racial antagonism at 影院中发生的种族对立,187
- Moving to Opportunity 迁向机会之地, 200—201
- Moyers, Bill 比尔·莫耶斯,176, 177
- Moynihan, Daniel Patrick 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170
- The Negro Family* 《黑人家庭》,xvi—xvii, 172,174
- Murray, Charles 查尔斯·穆雷,xv—xvii, 164, 175
- Myrdal, Gunnar 纳纳·缪达尔,175
- 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 国家司法研究所,61
- National Longitudinal Youth Survey 全国纵向青年调查,22
- 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NORC) 全国民意研究中心,162, 203, 205, 244
- National performance standard in education, proposed 提议在教育领域制定全国成绩标准,210—216
- NBC poll 全美广播公司调查,161
- Neckerman, Kathryn 凯瑟琳·内克曼, 132, 142, 143, 246, 270—271
- Negro Family, The* (Moynihan) 莫伊尼汉的《黑人家庭》报告,xvi—xvii, 172, 174
- neighborhoods 居民点或生活区
- census tracts as 居民点作为普查地段, 12
- in Chicago's Black Belt 芝加哥黑人地段的居民点,12—13
- effects of, on adolescent social outcomes 生活区对青少年的社会影响,248
- highway-building destruction of 居民点中公路建设的毁坏,47
- importance of 居民点或生活区的重要性,265
- Nelson, Kathryn 凯瑟琳·尼尔森,242, 243
- Newark 纽瓦克,166, 187, 256

- New Deal 新政, 151, 161
- New Federalism 新联邦主义, 49, 55, 185
- New Jersey 新泽西, 61
- New Mexico 新墨西哥, 165
- New Orleans 新奥尔良, 166, 256
- New York City 纽约市
 crack-cocaine in 纽约市的快克-可卡因, 60
 ghetto in 纽约市的聚居区, 174, 256
 job changes for educated workers in 纽约市教育程度较高的工人所面临的就业变化, 32
 Korean-black antagonisms in 纽约市黑人与韩国人的对立, 191
 Latinos in 纽约市的拉丁裔人口, 189
 loss of jobs in 纽约市的失业, 29—30, 109
 racial violence reported in 新闻报道中的纽约种族暴力, 183—184
 WPA construction in 公共事业振兴署在纽约市的施工项目, 229
- Norway 挪威, 150
- nursery schools, in France 法国的幼稚园, 215—216
- O'Connor, Alice 爱丽丝·奥康纳, 18
- O'Hare, William 威廉·奥黑尔, 262
- opportunity-enhancing programs, strong support for 对增强机会政策的强烈支持, 204—205, 237
- Panhandling 乞讨, 71
- Parental-leave Programs 育婴假政策, 215
- Park, Robert E. 罗伯特·帕克, 17
- part-time employment, involuntary 非志愿性的兼职就业, 50
- Pauti, Anne 安妮·波蒂, 262
- Pavetti, LaDonna 拉登娜·帕威提, 80
-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ct(PRA) 个人责任法案, 169
- Philadelphia 费城, 14, 29, 30, 32, 63, 76, 166, 189, 242, 256
- police 警察
 racial harassment by 警察造成的种族侵扰, 41
 and size of ghettos 警察与聚居区规模, 15
- polygraph tests 测谎, 122
- Popkin, Susan J. 苏珊·波普金, 38
- Poverty 贫困
 Concentrated 贫困的集中化, 15—16, 42, 174, 241—243, 254, 258
 “culture” of 贫困“文化”, 72, 176—177
 ghetto residents' belief about 聚居区居民的贫困观念, 179—181
 increase in 贫困的增加, 56
 individualistic explanations for 有关贫困的个体主义解释, 159—161
 measurement and definition of 对贫困的界定和测量, 194, 254—256
 “new urban” “城市新贫困”, 19
 persistently poor families 持续贫困的家庭, 91
 public opinion poll on threshold of 有关贫困标准的公共舆论调查, 254—256
 single parenthood and 单亲与贫困, 91—94
 statistics on 有关贫困状况的统计, 11—12, 194—195, 254—255
 structural explanations of 有关贫困的结构解释, xiv, xvii—xix, 159—160, 172
 U.S. programs vs. 美国的反贫困政策, 156
- Presidential election, suburb's vote in 总统选举在郊区的投票, 186
- Price, Hugh 休·普锐斯, 254
- Prothrow-Stirh, Deborah 德博拉·普罗throw-斯蒂斯, 72
- PSID(Michigan 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 密歇根大学收入动态追踪研究

- 项目, 270
- public housing 公共住房
- perceived dangers of 人们对在公共住房居住的危險的认识, 61, 63
- relocation of residents from 转移公共住房的居民, 38—39, 200—201
- segregation as result of 公主住房的隔离化后果, 24, 47—48, 155
- public opinion Surveys 公共舆论调查, 161—162, 202, 204—206, 254—255
- public schools 公共学校
- computers needed in 公共学校对电脑的需求, 212
- decline in, and “forced integration” 公共学校的衰落与“强制整合”, 202
- employers’ negative impression of 雇主对于公共学校的消极印象, 114
- guns in 公共学校中的枪支问题, 61
- high schools 中学
- dropouts 辍学, 26, 34, 262
- lack of counseling 缺乏辅导, 70
- skills of graduates 毕业生的技能, 220—221
- inadequate 不恰当的中学教育, xv—xvi, 8, 9, 117
- national performance standards for, proposed, 提议制定全国成绩标准, 210—216
- private-sector involvement in 公私合办中学教育, 213—214
- proposed public evaluation of 建立大众要重视中学教育, 214
- public support for integration of 对于中学整合的大众支持, 202
- traditional function of 中学教育的传统功能, 151
- unequal allocation of funds for 中学教育基金的不平等分配, 211—212
- public-sector jobs of last resort 公共部门就业作为终极手段, 225—226
- see also WPA-style jobs 还可参见振兴公
共事业式就业
- Puerto Ricans 波多黎各人, 39, 51, 85, 87—89, 126, 140, 189, 244—245, 250
- race-based programs, partially supported by whites 部分得到白人支持的基于种族的政策, 201—204
- race-neutral programs 种族中立政策, 205—206, 235
- races 种族
- antagonisms of 种族对立, 183—206
- Korean-black tension 韩国人与黑人的紧张关系, 189—192
- Latino-black tensions 拉丁裔与黑人的紧张关系, 183, 188—189
- at movie theaters 电影院中发生的种族对立, 187
- political leaders and 政治领袖与种族对立, xx—xxi, 187, 192
- white-black tensions 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183, 186—188
- author’s vision of unity between 作者有关种族团结的观点, xxi—xxii
- common concerns and values of 大众担忧与种族价值, xx
- increasing urban division by 城市中各种族之间的日益分裂, xix—xx
- racism 种族主义
- in employment 就业中的种族主义, 77—78, 118, 127—137
- in Europe 欧洲的种族主义, 157—158
- welfare and 福利与种族主义, 162, 166, 171, 203
- Rainwater, Lee 李·雷恩沃特, 72, 177
- Reagan administration 里根政府, 49, 155, 157, 161, 175, 222
- redlining 福利歧视, 24, 44—46
- Regan, Edward V. 爱德华·里根, 226—227, 231
- Reich, Robert 罗伯特·瑞奇, 207
- Rein, Martin 马丁·赖因, 27, 32—33

- Republican Party 共和党, 69—71, 230, 237
- restrictive covenants 限制性契约, 24, 47
- Rodda, David 戴维·罗达, 96
- role models 角色榜样, 71—72, 112
- Roosevelt, Franklin, D. 富兰克林·罗斯福, 226, 229, 232
- Rosenbaum, James E. 詹姆斯·罗森鲍姆, 38
- Rotberg, Iris C. 伊里斯·罗特伯格, 211
- Rusk, David 戴维·鲁斯克, 219
- St. Louis 圣路易斯, 166
- SAT(Scholastic Aptitude Test) 学术能力测试, 199
- School-to-Work Opportunities Act (SWOA) 从学校向工作机会过渡法案, 217—218
- Sears, Roebuck and Company 西尔斯罗巴克公司, 34—35
- service sector 服务业
- in Europe 欧洲的服务业, 154
 - low-skilled black males in 服务业中的低技术黑人男性, 30—31, 33, 141—142
 - new jobs in 服务业中的新工作机会, 27, 143, 154
 - women employed in 服务业中的女性就业, 32—33
- sexual relationships 性关系, 97—100, 108—109
- Shibuya, Kumiko 涉谷久美子, 241
- Simpson, O. J. 辛普森, xix—xx
- Sjoquist, David L. 戴维·肖奎斯特, 41
- Smith, Eliot 艾略特·史密斯, 159
- Smith, Ryan 莱安·史密斯, 203—204
- social citizenship rights (social rights) 社会资格权利(社会权利), 155—159, 161, 204
-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社会认知理论, 75
- social inequality 社会不平等
- author's proposals for policies vs. 作者关于战胜社会不平等的建议, 208—210, 237—238
 - Congress's retreat from programs vs. 国会的战胜社会不平等政策的倒退, 234—237
- Social Opportunity Survey 社会机会调查, 138, 244
- social organization 社会组织
- and disorganization 与社会解组, 20—21, 52
 - and decline in population density 与人口密度的降低, 46
 - and drugs and firearms 与毒品和枪支, 59, 61, 64
 - effect of increasing ghetto jobs 聚居区就业机会增加的后果, 238
 - effect on supervision of children 对于儿童监管的影响, 62—64
- South Dakota 南达科塔, 165
- Spear, Allan 艾伦·斯皮尔, 23
- state employment agencies 国家就业扶持机构, 135
- Steinberg, Laurence 劳伦斯·斯坦伯格, 62
- Stier, Haya 海雅·斯蒂尔, 85
- structural explanations of poverty 有关贫困的结构解释, xiv, xviii—xix, 159—160, 172
- suburbanization 郊区化
- of employment 就业的郊区化, 47—44, 54, 223—224
 - in Europe 欧洲的郊区化, 218
 - federal governments' policy of 联邦政府的郊区化政策, 46—47, 49, 54—55
 - need for city-suburban cooperation 需要城市与郊区之间的合作, 218—220
 - of presidential elections 总统选举的郊区化, 186
 - of white population 白人人口的郊区化, 46, 49, 185
- Sum, Andrew 安德鲁·萨姆, 95

- Swidler, Ann 安·斯威德勒, 71
- Taub, Richard 理查德·陶布, 98, 140, 141
- Taylor, William, L. 威廉·泰勒, 197
- technological changes 技术变革, 28—29, 151—152
- Tele-Communications, Inc. 远程通信公司, 213
- Testa, Mark 马克·泰斯塔, 89—90, 96, 97
- Texas 得克萨斯, 256
- Thurow, Lester 莱斯特·瑟罗, 229
- Tienda, Marta 玛尔塔·廷达, 85
- Tilly, Christopher 克里斯多弗·蒂利, 142
- Tobin, James S. 詹姆斯·托宾, 272
- transportation problems of workers 工人的交通问题, 39—42, 223—224, 281
-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Wilson) 《真正的穷人》(威尔逊著), xvii, 16, 37, 42—43, 94, 241, 242, 276
- underclass 底层阶级
- controversy about 有关底层阶级的争论, 276
 - mainstream elements in culture of 底层文化中的主流要素, 67
 - media perception of 媒体对于底层阶级的认识, 174—178
- unemployment 失业
- in Europe 欧洲的失业, 153, 158, 221, 234
 - persistent, see joblessness 持久失业, 参见失业(joblessness)
 - of southern-born blacks 南部出生的黑人的失业, 176
- unemployment insurance 失业保险, 155—156
- UPFLS (Urban Poverty and Family Life Study) 城市贫困与家庭生活研究, ix—xi, xxii—xxiii, 22—23, 111, 243—248
- Van Haitsma, Martha 玛莎·范·赫茨玛, 52, 93
- violence 暴力, 6—7, 21—23, 188—189
- from drug activity 源于毒品活动的暴力, 59—61
 - media reports on 有关暴力的媒体报道, 183—184
 - seen by children as way of life 暴力被儿童视为生活方式, 72
- Wacquant, Loic 卢瓦克·华康德, 5
- wages 工资
- in Europe 欧洲的工资状况, 154
 - growing inequality in 工资收入的日渐不平等, 28, 234
 - of low-skilled women 低技术女性的工作, 27
 - minimum 最低工资, 50, 154, 222, 228—232
 - real, decline in 实得工资的降低, 25, 54, 154
 - “reservation” 保留工资, 139—141
 - rural, decline of 农业工资的降低, 262
- Wagner Housing Act of 1937 1937年的瓦格纳住房法案, 47
- Warner, W.Lloyd W·劳埃德·沃纳, 18
- War on Poverty 向贫困开战, 91, 161
- Washington, D.C. 华盛顿特区, 14, 60
- Weaver, Frank C. 弗兰克·韦弗, 213
- welfare 福利
- Clinton's proposed reform of 克林顿提议进行的福利改革, 168—169, 228
 - Economic constraints on recipients of 对于福利受助者的经济限制, 79—82, 92, 167
 - employers' recruitment from 雇主对福利受助者的招聘, 135
 - fathers removed from responsibility by 福利免除了父亲的责任, 107

- GAO study on 美国审计总署对福利的研究, 163—164
- ghetto-related attitudes toward 针对福利的聚居区相关态度, 85—86
- individual objection to 个体对于福利的反对, 158—159, 161—162, 203
- isolation caused by 福利导致的孤立, 65
- long-vs. short-term use of 福利的长期接受 vs. 短期接受, 166—167
- obligations of recipients of 福利受助者的义务, 164, 168—169
- poverty-tract attitudes toward 贫困地带的人们对于福利的态度, 251
- racist feelings about 有关福利的种族主义情绪, 162, 166, 171, 203
- Republican proposals for reform of 共和党的福利改革提案, 169—171, 230
- southern-vs. northern-born blacks on 南部出生的黑人于北部出生的黑人有关福利的态度差异, 176
- whether factor in illegitimacy 福利是否是影响非婚生育的因素, 94, 126, 163, 177
- women's avoidance of marriage by 女性因福利受助而避免结婚, 103—104
- work as objective of 以就业作为福利的目标, 164, 168—169
- work requirements and 工作要求与福利, 161
- Western Electric 西部电气公司, 34, 35
- white-collar jobs 白领工作, 143, 144
- whites 白人
- antagonisms between blacks and 黑人与白人的对立, 183, 186—188
- birth rate of 白人的出生率, 87
- in central cities 中心城区的白人, 18
- concentrated poverty among 白人的贫困集中化, 258
- disadvantaged, affirmative action for 针对弱势白人的平权行动, 198
- educational programs for blacks favored by 支持黑人教育项目, 204
- employers' perception of 雇主对白人的评价, 112—113
- employment ads in newspapers of 白人报纸上的招聘广告, 134
- in Europe 欧洲的白人, 157
- illegitimacy among 白人的非婚生育问题, 87, 97
- manufacturing-sector statistics on 有关制造业中白人就业状况的统计, 250
- marriage rate of 白人的结婚率, 88—90
- race-based programs questioned by 白人对基于种族的政策的质疑, 201—204
- "reservation wage" of 白人的保留工资, 140, 141
- in senior management positions 担任高级管理职位的白人, 278
- Simpson case and 辛普森案与白人, xix—xx
- single-parent families of 白人的单亲家庭, 87—88
- suburbanization of 白人的郊区化, 46, 49, 185
- on welfare 白人对福利的看法, 167, 171
- Wilkerson, Isable 伊莎贝尔·威尔克森, 60
- Winship, Christopher 克里斯托弗·温希普, 95
- women 女性
- employment and wages of 女性的就业与工资, 27—28, 32—33
- working mothers 工薪母亲, 82—83
- see also blacks—female; marriage 还可参见黑人—女性黑人、黑人婚姻
- work 工作
- disappearance of 工作机会的消失
- author's definition 作者对工作的界定, 74—75
- behavioral factors and 行为因素与工作, 52—53, 55—86

- as central problem of inner-city ghetto
作为内城聚居区核心问题的工作,
xix, 234
- ideological explanations 有关工作的
意识形态解释, xiii—xiv
- low-skilled worker and 低技术工人
与工作, 25
- family's effect on attitudes toward 家
庭对于工作态度的影响, 106—107
- as framework for daily behavior 工作
作为日常行为框架, 73
- ghetto residents' belief about 聚居区居
民的工作信念, 179—181
- increasing gap between high-paid and
low-paid 低薪工作与高薪工作之间
距离的日益扩大, 153
- informal and illegal 非正式工作与非法
工作, 70, 74—75, 80, 142—143
- overtime 超时工作, 26
- poverty-tract attitudes toward 贫困地
带人们的工作态度, 251
- transition from school to 从学校向工
作的过渡, 216—218
- by welfare recipients 福利受助者的工
作, 164, 168—169
- work ethic of races, compared 不同种族
的工作伦理, 111—113
- WPA-style jobs 振兴公共事业式就业,
226, 229—233, 235, 237, 238
- federal administration needed for 联邦
政府需要对公共事业类工作进行管理,
232—233
- Yoon, In-Jin 尹麟镇, 191—192
- Zeisel, Hans 汉斯·蔡塞尔, 73
- zoning laws 区划法, 47, 200

译者说明

本书的致谢、导言和第一到第四章，由成伯清翻译；第五到第八章、附录、索引及所有注释，由王佳鹏翻译。

WHEN WORK DISAPPEARS: THE WORLD OF THE NEW URBAN POOR

By WILLIAM JULIUS WILSON

Copyright: © 1996 BY WILLIAM JULIUS WILS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AROL MANN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6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CENTURY PUBLISH-

ING GROUP OF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都市文化研究译丛

《当工作消失时：城市新穷人的世界》

[美]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

《裸城：原真性城市场所的生与死》

[美]莎伦·佐金

《漫长的革命》

[英]雷蒙德·威廉斯

《透过电视了解城市：电视剧里的城市特性》

[英]彼得·格林汉姆

《规划世界城市：全球化与城市政治》

[英]彼得·纽曼、安迪·索恩利

《没有郊区的城市》

[美]戴维·鲁斯克

《城市秩序：城市、文化与权力导论》

[英]约翰·伦尼·肖特

《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

[美]戴维·哈维

《下城：1880—1950年间的兴衰》

[美]罗伯特·M·福格尔森

《水晶之城：窥探洛杉矶的未来》

[美]迈克·戴维斯

《一种最佳体制：美国城市教育史》

[美]戴维·B·泰亚克

《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

[美]理查德·利罕

《空间与政治》

[法]亨利·勒菲弗

《真正的穷人：内城区、底层阶级和公共政策》

[美]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

《布尔乔亚的恶梦：1870—1930年的美国城市郊区》

[美]罗伯特·M·福格尔森

《巴黎，19世纪的首都》

[德]瓦尔特·本雅明



本书作者利用大量的调查数据和个人访问记录，审视了美国大城市内城区在 20 世纪中后期开始的衰落，而失业问题正是衰落的核心所在，全球化使得蓝领的工作机会消失殆尽，除此之外，单亲家庭、毒品与暴力犯罪也困扰着内城区。作者认为失业危机将影响到所有美国人，他也坚信自己的解决方案能让整个美国社会受益。

上架建议：城市文化

ISBN 978-7-208-14062-2



9 787208 140622 >

定价：52.00 元

易文网：www.ewen.co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当工作消失时 城市新穷人的世界

作者=(美)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著

页数=329

SS号=14097041

DX号=

出版日期=2016.10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致谢

导言

第一部分 城市新贫困

第一章 从制度聚居区到失业聚居区

第二章 社会变迁与脆弱的聚居区

第三章 聚居区行为模式与机会结构

第四章 内城区家庭的衰落

第五章 种族的意义和重要性：雇主与内城区雇员

第二部分 对社会政策的挑战

第六章 美国有关贫困与福利的信念体系

第七章 种族对立和基于种族的社会政策

第八章 更广阔的视野：跨民族视角下的社会政策选

择

附录A 有关贫困集中化的观点

附录B 城市不平等研究中心的方法论说明

附录C 有关城市贫困与家庭生活研究的数据

参考文献

索引

译者说明

封底